



銘記歷史 鑒往知來
東南亞華僑抗日史料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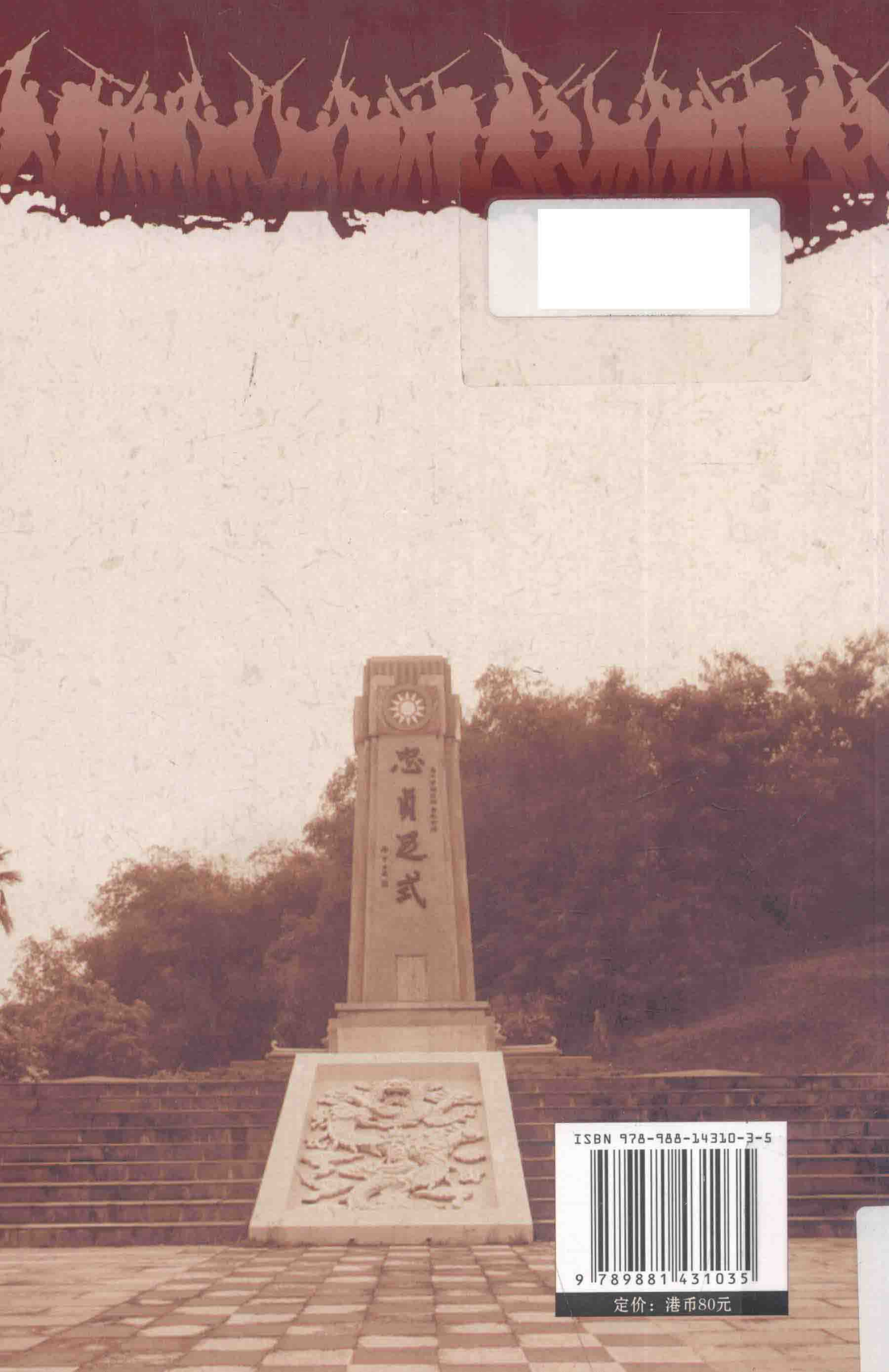
丛书之三

馬來西亞華僑抗日史料選輯

黎亞久 盧朝基 編輯兼責任編輯



生活文化基金會出版



忠貞之式

ISBN 978-968-14310-3-5



9 789881 431035

定价：港币80元

马来西亚华侨抗日史料选辑

黎亚久 卢朝基 编辑兼责任编辑



生活文化基金会 出版

马来西亚华侨抗日史料选辑

策 划：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编 辑：黎亚久 卢朝基

责任编辑：黎亚久 卢朝基

出 版：生活文化基金会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26-28 号富腾工业中心 1403 室)

电 话：26930551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2015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数：1000 本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988-14310-3-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梁英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 and 许多有关国家都以各种形式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目的是提醒后人铭记历史，总结历史，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为此，香港的东南亚归侨决定重新挖掘和搜集有关东南亚各国华侨抗日斗争的史料，编辑出版一套《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尽管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但是我们这些老归侨，作为那场浩劫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今天重温东南亚华侨当年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经历过的苦难生活记忆，再次听到他们对侵略者的控诉，看到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感受到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和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这一切仍然使我们心潮澎湃，难以忘怀。

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这个阶段，东南亚华侨主要的抗日活动是通过捐献财物，支援中国抗战。第二个阶段是从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占领东南亚各国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这个阶段，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从支援中国抗战转变为直接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以及秘密为盟军提供情报活动等。这套丛书的内容，自然也涵盖了这两个阶段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史实。可以说，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历时之久，范围之广，牺牲之大，在海外华侨反压迫斗争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

众所周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人民已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抗争，而自1937年

“七七事变”算起，中国人民也已展开了四年多的全面抗战。祖国处在危亡关头，家乡亲人生死未卜，远在东南亚的华侨自然感到悲愤难平，把抗日救国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时，东南亚各国是西方列强统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虽遭到损失，但为保护它们作为东南亚殖民地“宗主国”的既得利益，却依然心存侥幸，对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行动采取“中立”立场，因而对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施加种种阻挠和压制。

与此同时，长期处于欧洲列强殖民统治和压榨下的东南亚各国原住民，以及他们的部分政治领导人，也曾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认识不足，甚至幻想利用日本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以为可以借此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从此获得民族独立。

直到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突袭珍珠港，日军大举南下，迅速占领东南亚各地，这些西方“宗主国”才被迫仓促应战，但显然为时已晚。这时，法国、荷兰已遭到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蹂躏，隔着海峡的英国也已岌岌可危，实际上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结果是，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如入无人之境，英、法、荷兰守军以及澳大利亚援军闻风丧胆，节节败退，最后只好相继宣布投降。从此，东南亚华侨与当地各族民众一起，在日军的刺刀下度过了三年半的苦难岁月。

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形势下，早在太平洋战争前，东南亚华侨就率先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他们克服重重阻力，以“筹赈祖国难民”的名义，开展了形式多样、规模宏大和持续多年的支援中国抗战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是华侨社会大团结的一次空前的总动员。

当时，东南亚各地华侨的抗日活动，主要是募集捐款和中国抗战所急需的物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后，中国军民在极其艰难困苦条件下浴血抗战的事迹，进一步鼓舞了东南亚各地华侨的爱国精神，华侨捐款捐物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各地的爱国华侨学校、华侨报刊和华侨社团，成为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力量。不仅华侨

大商家慷慨解囊，华侨工人、商贩、三轮车夫也为支援祖国抗战而献出自己的微薄收入。陈嘉庚先生曾将海外华侨广泛深入的抗日救国行动概括为“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各地华校师生则通过文艺义演、义卖等活动募集捐款。当年在各地华侨聚居的街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华侨中小学生背着捐款箱挨家挨户募捐的身影。

根据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捐款为国币 13 亿多元。实际的捐献总额显然大大超过这一数字，因为各地华侨同时通过其他途径，将捐款直接汇寄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以及广东、福建等地的中国军队和慈善团体，而这些捐献并没有包括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上述统计数字内。同时，东南亚各地华侨还募集了大量寒衣、药品等，寄往中国抗战地区的军民。这些物品的总价值更是无法统计。

与此同时，海外华侨为了赡养在国内的亲属，每年都通过各种途径汇款到家乡，通称为侨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侨汇是中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当年中国弥补外贸逆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国政府财政部统计，1937—1943 年，海外华侨通过银行寄回国内的款项约为国币 56 亿元，而通过各地民信局和商号汇寄的“侨批”并没有包括在内。因此，侨汇对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此外，东南亚华侨还积极购买中国政府发行的抗战公债。直到抗战胜利后，绝大多数购买了公债的华侨并没有要求中国政府偿还这些公债。实际上，当年华侨在购买抗战公债时，就是一心要支援祖国，只要祖国抗战胜利，根本没有想要中国政府日后偿还这些公债。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地还有许多华侨青年学生冲破重重阻挠，告别双亲，毅然回国，与祖国军民一起浴血奋战，不少人为此血洒疆场。其中，李林烈士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直到今天，《告别南洋》的悲壮歌声，仿佛还在我们耳际回响。

在动员和组织东南亚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工作中，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南亚各地华侨成立的各种形式的筹赈会或赈济会等团体，

如新加坡筹赈会、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伤兵大会、菲律宾援助抗敌委员会、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缅甸华侨救灾总会等，都曾发挥动员、组织当地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积极作用。

为了统筹东南亚各地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泰国等地45个城市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的代表168人出席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荷属东印度华侨代表）和李清泉（菲律宾华侨代表）为副主席。南侨总会的办事处设在新加坡，南洋各地均建有分会。南侨总会的成立，使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掀起新的高潮，也使这一爱国运动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到1940年，南侨总会的基层组织已增加到702个。

除了动员、组织和领导东南亚华侨筹赈祖国难民的行动以外，南侨总会对中国抗战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动员华侨捐献了300多辆卡车，同时组织3200多名南侨机工一起回国，投身于滇缅公路的抗日物资运输任务。这些华侨热血青年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日夜奋战在崇山峻岭的蜿蜒公路上，其中1000多人在那里光荣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南侨机工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华侨的抗日活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此后，在日本侵略军的统治下，东南亚华侨已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公开进行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那些在战前曾领导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华侨社团领袖则先后遭到日本占领当局逮捕，并被关押在各地的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与此同时，除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在东南亚分别进行抗日活动外，当地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或配合盟军秘密进行情报搜集和联络工作。其中著名的抗日武装组织就有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盟军136部队的中国龙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即48支队）等，以及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泰国反日大同盟、印度尼西亚华侨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等抗日组织。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了长达十几年的艰难曲折的抗日救国运动。东南亚华侨的英勇斗争和为此做出的巨大牺牲，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这些斗争和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

对东南亚华侨的抗日运动，我们应该赞扬华侨热爱祖国、称颂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功绩。这个评价当然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一评价还不足以概括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主要是出于热爱祖国、保卫中国的斗争，而同时是热爱和保卫他们在东南亚家园的斗争，他们的斗争自然是居住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保卫世界和平与人类正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直接打击日军主力，有力削弱制约了日军在华的军力，间接继续支援了中国抗日主战场的战斗。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南亚以后，东南亚华侨和当地各族人民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日本占领者的残暴统治与压迫，使当地人民对这个自称的“亚洲解放者”的幻想迅速破灭。因此，东南亚华侨开展的抗日斗争，实际上与当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是相互支持，休戚与共的。同时，华侨在与各民族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也必然增强了落地生根的主人公意识。因此，许多人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实际上为华侨后裔从外国侨民的身份转化为当地公民身份奠定了基础，自然也使他们在战后成为当地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洋战争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各地已有漫长的历史。东南亚华侨在文化认同等方面实际上早已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日本占领东南亚各国后，对当地华侨采取与对待西方人和当地原住民不同的政策，如将参与抗日活动的华侨称为“敌性华侨”，将他们的领导人逮捕入狱，又与欧洲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并给予不同的待遇，关闭原有的西方语文学校，同时为拉拢华侨，又允许华文小学在表示效忠南京汪伪政权的前提下继续存在，等

等。所有这一切，在战后初期对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演变以及华侨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

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复杂的历史画面，而历史从来就不可能是单一色彩的。从东南亚华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一特殊历史阶段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太平洋战争前后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对东南亚各国现代历史以及战后华侨社会的发展变化，如东南亚华侨与当地民族独立运动关系的发展变化，东南亚各国独立后的原住民政权对华侨政策的发展变化，以及各国华侨后裔与当地不同族裔间关系的发展变化等等，无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这段历史资料的保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对它认真进行挖掘、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当然，我们今天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既需要掌握更完整的历史资料，也需要树立科学的历史观，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不是将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的意义仅限于支援中国抗战，而应该将这一斗争作为东南亚现代历史发展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也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察分析。

在这场战争结束 70 年后的今天，香港文化生活基金会在出版《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之后，再次得到广大归侨以及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同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手，牵头组织，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和出版包括十六种图书和音像资料的《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完全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我对所有为完成这一重大工程而不辞辛劳、默默奉献的仁人志士深表钦佩，对他们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坚强毅力，致以由衷的敬意，同时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得到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使它得以继续深入进行下去。我认为，我们研究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事迹以及华侨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是为缅怀先辈，悼念亡魂，更是希望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为后代昭示未来。

2015 年 7 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篇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简史.....	1
再版前言.....	12
第一章 战前马来亚内外形势.....	16
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的形成与日本准备南侵.....	16
二、马来亚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初步形成.....	17
三、英国殖民政府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推行消极防御政策.....	23
四、马共积极准备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27
第二章 日军侵占马来亚，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	29
一、大检证、大屠杀.....	29
二、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疯狂的经济掠夺.....	31
三、军事统治与血腥镇压.....	32
四、愚民政策与奴化教育.....	35
五、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36
第三章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37
一、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建立与发展.....	37
二、武装斗争的三个阶段.....	45
三、人民抗日军的战术与作战方法.....	55
四、除奸与收编群众自发武装.....	60
五、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来源.....	66
六、人民抗日军的政治教育.....	68
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功绩和历史地位.....	71
第四章 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73
一、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战争.....	74
二、大力支援人民抗日军.....	76

三、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工作蓬勃开展.....	81
四、各阶层联合共同抗日.....	82
第五章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东南亚联军的合作关系.....	85
一、合作的初始阶段.....	85
二、马共暨人民抗日军与联军签订合作抗日协议的经过.....	87
三、一三六部队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91
四、人民抗日军积极准备配合联军反攻.....	94
第六章 日本投降与人民抗日军复员.....	98
一、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8
二、马共提出“八大主张”，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	102
三、马来亚重新沦为英帝国殖民地.....	107
四、和平民主运动遭到残酷镇压.....	111
五、人民抗日军复员.....	115
第七章 历史的回顾.....	118
 第二篇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选编）.....	 1299
一 星华义勇军怎样的诞生.....	131
二 星华义勇军血战经过.....	132
三 三年半来抗敌工作回顾.....	1388
四 星加坡保卫战的回忆.....	140
 第三篇 马来亚华侨抗日史料选辑.....	 143
一 不让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留白 ——简介近年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活动.....	144
二 我对香港八路军办事处领导马来亚 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点滴回忆.....	157
三 回忆新加坡华侨义勇军.....	166
四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英军“136 部队”.....	175
五 九一石山脚事件回顾.....	183

六	白衣烈士从法西斯监牢里寄出来的信.....	188
七	“抗敌后援会”在马华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192
八	“民先”的二、三事.....	208
九	“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巡回演出的贡献.....	212
十	新加坡铜锣合唱团的成立经过及其活动.....	216
十一	难忘的一天记日军在知知港余朗朗村的大屠杀.....	220
十二	1943年5月7日冲破半山芭监狱的回忆.....	225
十三	雪兰莪的抗日武装斗争.....	2299
十四	红旗漫卷东海岸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	2298

第四篇	抗日英烈.....	283
一	马来亚工人阶级杰出领袖白衣同志.....	284
二	星华抗日义勇军总指挥、传奇性烈士林江石.....	288
三	德才兼备、最有威望的领导者——张元豹（黄诚）烈士.....	294
四	悼念人民抗日军一独领导人许庆彪同志.....	296
五	日寇屠刀下忠贞不屈的林亚当烈士.....	298
六	抗日优秀干部赖来福.....	300
七	痛悼民族英雄——阿Q同志.....	304

附录：	马来亚华侨抗日大事记.....	306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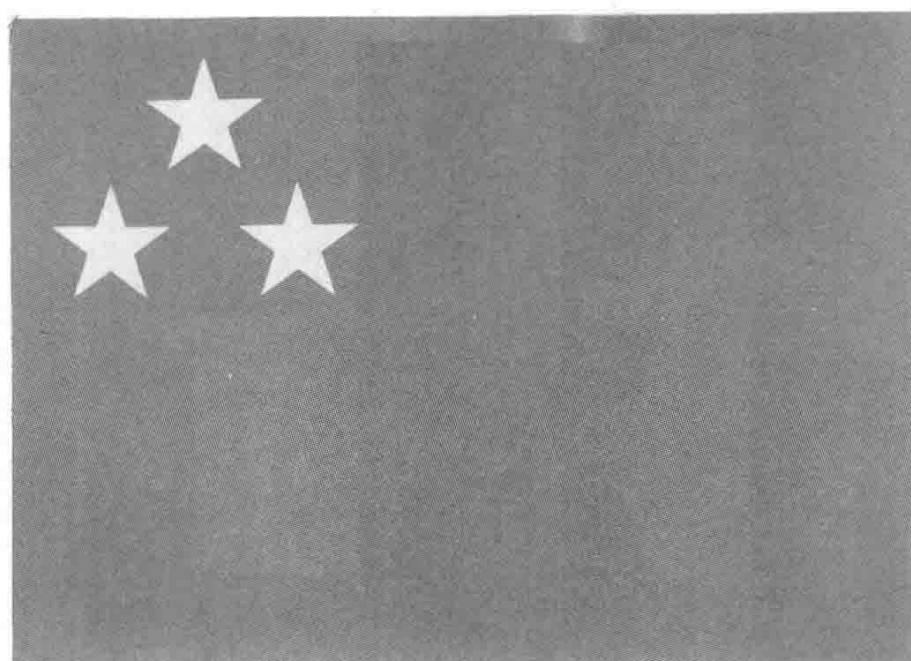
第一篇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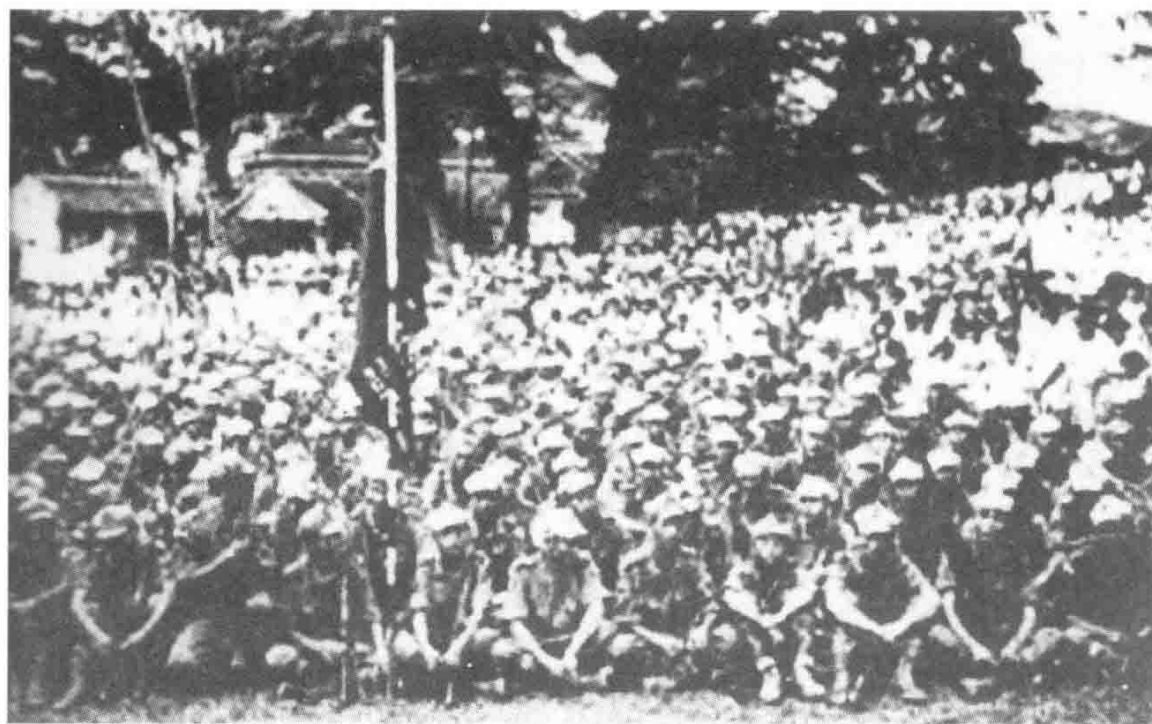
广州新马侨友会 编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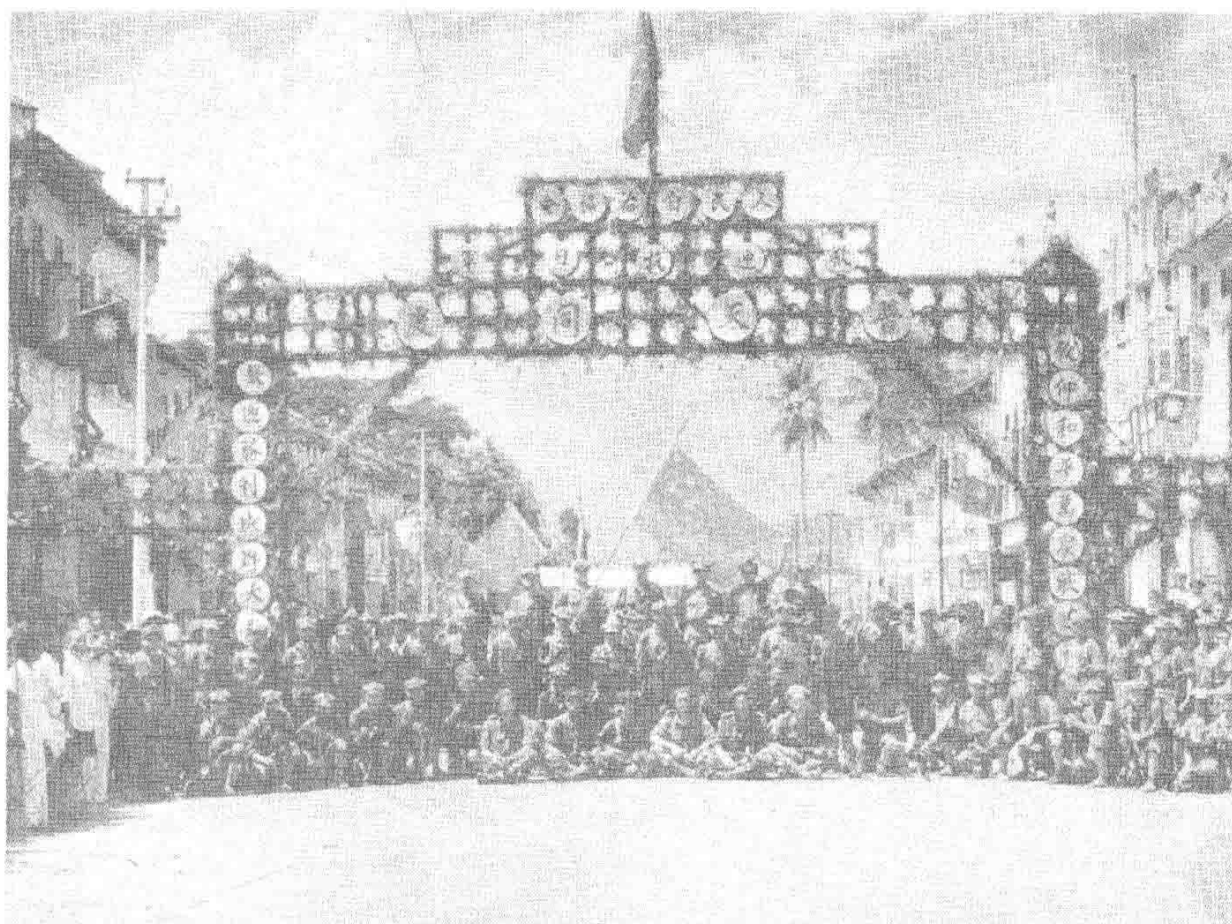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军旗(红底黄星)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某部



宣传画



日本投降后，丹絨马林人民自治协会欢迎抗日军入城。



霹雳州积莪营人民夹道欢迎抗日军入城。



盟军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登授予人民抗日军
军委陈平“缅甸星”和“1939/45 星”勋章



蒙巴登授予人民抗日军中央军委刘尧勋章。



第四独立队战士在新山接受复员检阅。



第二独立队战士在森美兰接受复员检阅。



吉隆坡军民联欢庆祝抗日军复员。



抗日军的英籍女战士白娜(Dorothy Baker)

人民抗日军的部分领导干部



中央军委
陈平



中央军委
刘尧



第一独立队队长
陈大智



第二独立队队长
邓福隆



第三独立队队长
王香甫



第四独立队队长
陈田



陈五独立队队长
廖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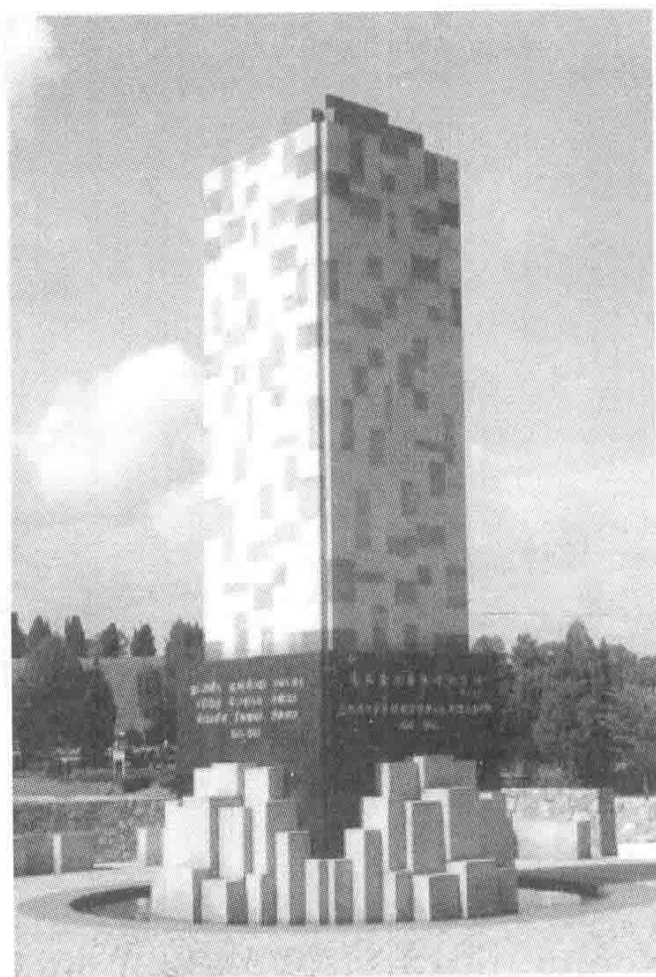
第六独立队队长
汪清



第八独立队队长
白丝木



位于石山脚农村原址的九一烈士纪念碑，现已折毁。



竖立在森美兰州汝来孝恩园内的各民族抗日纪念碑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原编委会

主 编 司马乔

责任编辑 曾冠彪 罗须磨

文 训 梁 明

撰 稿 (第一至第七章)

曾冠彪 罗须磨

林文光 文 训

梁 明 亚 竹

陈忠秋

督 印 陈云彪

广州新马侨友会 编

再版前言

广州新马侨友会会长、广东华侨博物馆馆长 王明惠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缅怀为抗日斗争而牺牲的烈士和所有作出贡献的人们，广州新马侨友会决定编辑出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简史》一书，在1991年编辑出版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基础上，选其第一至第七章，另收入我会1996年编辑出版的《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中罗须磨撰写的《回忆新加坡华侨义勇军》，英群撰写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英军“136”部队》，以及综合整理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编辑出版的《功勋永不忘》中的《九一石山脚事件回顾》等文章，翔实记载和反映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三年八个月期间，马来亚华侨与各民族人民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创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奋起抗日卫马，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

在日本法西斯残酷统治马来亚三年八个月期间，被杀害的马来亚各族人民超过7万人，被无辜逮捕受刑致死和被监禁摧残致死的近8万人。至于被迫劳役致死、因超经济掠夺而造成饥饿死亡的约有30余万人。在这场浩劫中，华侨首当其冲，受害最为惨重。据估计，华侨死亡人数约40万，占当时马来亚华侨总数百分之十七左右。那里有侵略，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有抗争。在马来亚华侨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上，以团结马来亚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应运而生。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武装队伍，其成员来自马来亚各民族、各阶层，以马来亚华侨为主体，深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在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逐步成长壮大。至日本投降前夕，人

民抗日军合计共有总兵力近1万人，拥有1万5千人的半武装组织，多达4万5千余人成员。日据时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军进行了340多次大小战斗，共毙伤敌人5千5百余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开辟了马来亚历史上由人民自组军队反抗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紧密相连，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最终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然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海外媒体虽有过一些报道，但大多是片面和失实的，有些则是蓄意歪曲历史，把人民抗日军与联军合作抗日的情况和过程，篡改得面目全非，把英军在战时建立起来的情报联络组（即所谓的136部队）吹捧得功大如天，说什么人民抗日军是由他们组织、训练、供给粮食、武装，才发展壮大；有些文章甚至把打家劫舍、冒充“华侨抗日军”战士的土匪组织与人民抗日军相提并论，混淆视听。凡此种种，均是无稽之谈。其共同的出发点，是企图否认和贬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马来亚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一些报刊和某些书籍，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情况，作了一些善意的报道，但因撰稿人不是当年战争的直接参加者，所收集的材料难免有其局限性，以致多有疏漏，甚至误传。

为了全面真实记载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卫马历史，以正视听，广州新马侨友会于1987年组织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编辑委员会，由曾冠彪、罗须磨、陆明、林文光、张昌、叶志辉、尹天雄、王汕平、吴亚浪、老卢、曾月华（亚珍）、文训、阿竹、陈六、若冰、汪发友等16人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定写作计划分发各地，广泛征集史料和征求意见，分别组织各地熟悉情况的抗日军退伍军人召开座谈会，选出专人对所收集的史料进行核实，分工整理，进行编辑，在各独立队队史初稿的基础上，反复加以综合、补充、和修改。历经四年多，最终完成书稿的编辑工作。编委会成员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战友、对烈士的深厚感情，克服困难，无偿地付出了宝贵

的时间和精力，还慷慨解囊，赞助编辑出版经费，更不辞劳苦，自费到各地采访、收集资料，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编辑、出版，作出宝贵的贡献，给后人留下珍贵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历史，填补了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空白，获得新马人民的广泛好评，甚至翻译成马来文出版，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马来亚抗日战争的重要史料和历史教科书。虽然编委会成员和当事人大多已经离世，但是他们留下的珍贵历史，及其慎终追远的精神，却永远存世，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不容篡改。70年前发生在马来亚半岛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人民参与的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终结了日本法西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留下的英雄业绩和伟大的民族抗日精神，激发了马来亚各族人民战后要求国家独立解放的热情，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继而在马来亚各族人民和各党派共同奋斗下，赢得了国家独立，结束了英殖民统治的历史。当今，维护国家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建设美好家园，建设繁荣富强国家，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那些别有用心蓄意篡改歪曲马来亚抗日战争历史，抹杀人民抗日军在反抗日本侵略、争取国家独立的事业中所建立的功绩的言论，是经不起历史涤荡的，是不得民心的。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史，是马来亚各族人民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也是篡改不了的。马来亚人民抗日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万古流芳！

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简史》的宗旨。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谨对所有为反侵略正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抗日烈士及各族死难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哀悼！

本书编辑完成后，承蒙香港《铭记历史，鉴往知来——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编委会纳入丛书之内，作为居港东南亚各国广大华侨华人向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的献礼，我们深感高兴，

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要向参与、支持编辑出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简史》的香港新马研究社同人暨所有海内外热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5年6月于广州

第一章 战前马来亚内外形势

一、 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 的形成与日本准备南侵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冲突频繁，国际局势激烈动荡，战争的阴云笼罩全球。

继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英、法两国政府被迫对德宣战，从而爆发了欧洲战争。德国纳粹军队以闪电攻势，迅速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直迫英伦三岛和北非。

1940年9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署了军事轴心同盟条约，妄图重新瓜分世界。

1941年6月22日，德军又以闪电战的方式，突然进攻苏联，迫使苏联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了，战争的性质也从原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战，转变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

1941年——1945年的南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必然发展。日本南侵是早有预谋的。从1931年开始，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东亚的美梦，就一直在亚洲大陆张牙舞爪，首先是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继而在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日本的这一野蛮侵略行为，遭到中国军民强有力的反击，并受到世界公正舆论的严厉谴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结成了广泛的爱国抗日统一战线，全民奋起抗敌。到了1939年武汉战役之后，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的泥足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为了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一方面，它必须设法截断中国从南方获得外援的途径，以恢复其在中国战场上的

主动地位，并以此威迫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另一方面，它也极需攫取东南亚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用来维持其对华的长期战争。

1941年7月28日，在日本陆军的支持下，近卫文磨再次上台，成立了亲纳粹的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4日，日军二万余人侵入印度支那南部，占据了向东南亚扩张的桥头堡。

1941年10月，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人内阁取代了近卫文磨政府。东条英机军人内阁上台后，便作出了立即向美英荷开战的决定，使日本的南侵计划进一步具体化。日本的南侵计划，其长远的战略目标是独霸亚洲，建立一个东起阿留申群岛，西到缅甸、印度、南到澳大利亚，形成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为新加坡不仅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而且又是太平洋与印度洋间的交通要冲，只有夺取了新加坡，才能有效地从海上控制东南亚以至南太平洋；而马来半岛的橡胶和锡的产量，则是居于东南亚各国的首位，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到了1941年11月初，日军大本营终于确定了向美英荷开战的日期。由陆军大将寺内寿一任日本南方派遣军的总司令，由山下奉文中将任侵马日军司令官，统率第二十五军辖下的近卫师团、第五、第十八师团发动进攻。日军侵马号称兵力10万，实际参加作战只有4万余人。1941年12月8日，南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入侵马来亚，马来亚人民从此陷入沉重的灾难中。

二、 马来亚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初步形成

(一) 新、马华人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

据1941年的人口统计，新、马五百多万人口中，华人占237万余人，马来人占227万余人，印度人占74万多人。广大的新、马华人，不但和平时期为新、马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战争期间，更是风起云涌地投身到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中，为支持其宗祖国的抗

战出钱出力，为抵抗日本对新、马的侵略和血腥统治而英勇战斗、壮烈牺牲；为争取战后马来亚的独立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直至日本侵马战争爆发初期，华人的抗日运动还是非法的、有罪的。许多人因抗日的罪名而被捕入狱，被递解出境。然而，马华抗日反帝民主运动是扼杀不了的。长期以来，新、马广大华人为争取抗日合法权利，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和民主，前仆后继地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马华人具有悠久的反帝反殖的民主运动历史传统，一方面是热爱其宗祖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宰割，尤其是后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要求民主，要求改善生活，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两个方面互为影响，互相促进，推动了马来亚民主运动的广泛开展。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马来亚人民（其中华人占大多数）便开始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34年，先后爆发了铁路工人、煤炭工人的大规模罢工和新加坡水兵的抗英起义；1935年，马来亚总工会（当时为非法的地下组织）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全马工人示威大游行，要求民主，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待遇；1936年，新加坡的清洁、运输、锯木、建筑等行业工人都先后举行了多次罢工斗争，在马来半岛也先后爆发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大罢工，以后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第一次新、马总罢工。这些斗争，不但锻炼了人民，同时也给了英殖民统治当局以沉重的打击。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来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更是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是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在马来亚，内部的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反对日本侵略已成为各民族共同的首要任务。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各族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以及华侨爱国抗日运动，必然地和反对日本侵略、保卫马来亚的抗日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条件已逐步具备。在这期间，马共召开了第六次中央扩大会议，针对当时的形势，对党的路线、方针作了调整，提出要

求英殖民当局释放政治犯，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给予人民抗日的自由，武装民众，积极备战，坚决粉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阴谋。

在马共的领导下，新、马各地纷纷成立了各阶层、各行业（包括工、农、青、学、妇、文教界等）半公开的“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青年纷纷走上街头，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爱国的主张，推动各阶层、各行业进行义捐、义卖、义演、义唱活动，抵制日货，打击汉奸走狗。工人抗日爱国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当年峇株巴辖Batu Pahat（柔佛州）及甘马挽Kg. Kemaman（丁加奴州）两地的日资铁矿，近万名工人先后举行大罢工，抗议日本侵华的罪行，迫使该两地矿场停产。从1938年至1939年期间，先后有新加坡电车工人、清洁工人、人力车工人、建筑工人、海港局工人；柔佛州新山的黄梨园工人；森美兰州马口橡胶工人；雪兰莪州煤炭山的煤矿工人、新街场锡矿工人、加影橡胶工人；霹雳州近打锡矿工人；檳城码头工人；彭亨州劳勿锡矿工人；丁加奴州龙运铁矿工人……等等，都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大示威。特别是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加坡五万工人和人民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抗日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二）华侨中上层的爱国运动

在新、马抗日斗争史上，除了上述由工、农、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主流之外，华侨中、上层人士对抗日救亡工作，亦是不遗余力，这是应该肯定的。自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西安事变”的激励下，新、马华侨社会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摒弃以往的帮派成见和行会之争，走上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道路。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华侨中上层代表举行大会，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选出委员32名，由爱国侨领陈嘉庚担任主席。继新加坡之后，马来亚各地也相继成立了统一的筹赈机构，在各州首府设立总会，各地区设立分会。1938年10月10日，在一些华侨开明人士的倡议下，又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南洋华侨

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仍由陈嘉庚担任主席，庄西言（印度尼西亚）、李清泉（菲律宾）任副主席，总办事处设在新加坡怡和轩。至此，南洋华侨的抗日救国工作，开始有了一个合法的、统一的机构，推动了中、上层爱国抗日运动的开展。

华侨筹赈会成立后，为抗日救国曾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除向各侨团、侨商劝募特别捐和常月捐外，还发动各社团、学校举办义卖、义演、献金、献药，征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等等，成绩显著。例如，卖花筹赈是当时各阶层华侨响应最热烈、最普遍的一项爱国行动。据有关资料统计，1938-1940年的3年间，新、马华侨通过各种方式捐款平均每月达400多万元（旧国币，15元折当时叻币1元）。征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半年之内报名人数3,200余人，分成九批取道越南、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省，主要在长达三千多公里、地处崇山峻岭的滇缅公路上服务。

华侨筹赈会只是由各社团（主要是各地中华总商会）选派代表组成的一个协商性委员会，并无固定的团体或个人会员，其所以能在筹赈工作中取得成绩，关键是得到广大华族工农大众的有力支持。举凡筹赈会发起的爱国行动，如卖花、义演、抵制日货、发动日资铁矿工人罢工、征募华侨机工回国……等等，各界“抗敌后援会”无不全力以赴，带领群众走在最前列。如果离开了工农大众的全力支持，筹赈会单靠少数上层人士是难于完成大业的。1939年7月7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刊登一篇题为“抗战二周年与华侨”的文章，就曾坦率地指出：“救亡组织在马来亚，除了筹赈会而外，还有两大主流，第一是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第二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部。它们都在宣传、筹赈、除奸、抵货等目标之下工作，虽然受特殊环境的限制，仍不断地努力，那功绩是很大很大的。”

（三）抗日阵线内的斗争

这种在抗日救国旗帜下的团结合作，标志着马来亚反法西斯抗日联合战线的初步形成，马来亚抗日民主运动面临空前的大好形势。

但是，英殖民当局对于人民的抗日觉醒却害怕得很，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它一方面对抗援会的各种抗日活动宣布为非法，实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又对华侨筹赈总会施加种种压力，禁止华侨筹赈会与抗援会接触。（逮捕侯西反并将他驱逐出境就是其中一例。）与此同时，当地华侨社会中的右派势力也跳了出来，与英当局一唱一和，把工农大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污蔑为“马共对抗日团体的渗透”，妄图在华侨社会中制造分裂。针对右派势力的这种分裂行为，抗援会以耶鲁、吴天、洪涛、英浪、厌之等五人联名的方式，于1938年7月30日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题为《我们的态度》的文章，向英当局表明态度：“希望当地政府充分认识我们的目的只是抗日救国，并且允许我们在合法公开的方式下，展开马华救亡运动。”文章还同时向上层侨领及各帮派、各社团发出呼吁：“我们认为在当前民族大危机之下，不论上下阶层侨胞，都有做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下，我们十分愿意和上层侨领以及各帮各派各社团各地方各种信仰不同的侨胞，根据共同救国纲领来密切合作，来热烈地开展马华救亡工作。”

《我们的态度》一文发表后，在华侨各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上层开明人士以及广大工、农、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但少数的右派人物仍坚持其顽固立场，利用其控制的报刊、社团、继续向抗援会发起攻击，一时间，在抗日阵线内部引发了一场左派和右派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对中国抗战和对马来亚抗日的态度问题。

关于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时值新四军“皖南事件”发生，国民党制造摩擦、制造分裂、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引起广大侨胞极大的愤慨，群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制造分裂，立即释放被捕的新四军指战员。在抗敌后援会内还组织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号召。群众的这一正义要求和爱国行动，却遭到了当时的右派势力的猛烈攻击。这一争论，曾经引起了华侨上层人士的关注。为了考察中国抗战的实情，慰劳前方壮士，1940年3月7日，南侨总会发起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全团50余人，由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前往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及八路军延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实地考察，目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消极抗战的种种事实，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终于认清了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特别是陈嘉庚于考察完毕，归途中路经福建时，以其在国民党统治区考察的结果，直言不讳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势力在海外制造的种种谎言，澄清了是非。此后，海外少数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始略有收敛。

关于对马来亚抗日的态度问题，当时的右派言论，极力主张“华侨只谈爱国，支持祖国的抗战，绝不介入马来亚的抗日实际斗争。”这种“抗日分家”、自相矛盾的荒谬主张，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国际形势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当战火已经燃烧至马来亚门外的时候，大多数华侨上层人士终于觉悟到华侨具有“双重救亡任务”，承认“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侨胞，他们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们的意志是坚定的，他们的热血行动和牺牲精神真足于撼天地、泣鬼神，他们认清日军的侵略是无止境的，决不会以攻占中国大陆为满足，他们会继续进攻东南亚，……”“英国政府对远东的局势，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们在马来亚布置了10万大军，但并无抗战的决心与士气，而手无寸铁的华侨，却热血沸腾，意志激昂。华侨认为远隔重洋的祖国抗战，固然要尽力后援，就是本身托足的居留地，也处于同样危急的地步，须予抢救。”（摘自《新马华人抗日史料》载“战前新马华人救亡运动”）这是华侨上层人士的爱国正义呼声，他们这种认识和行动上的转变，为促进马来亚抗日大联合，创造了有利的气氛。

（四）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

马华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在组织上结成一体，实始于“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诞生。当时，马来亚战事已爆发22天，马来亚半壁河山已陷入日军手中，日军兵临仕林河畔。在此危急关头，英国殖民当

局才被迫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急不及待地请求陈嘉庚出面召开新加坡华侨总动员大会。会议于1941年12月30日举行，即席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由陈嘉庚担任主席；总务部主任叶玉堆、副主任刘玉水；劳工服务部主任林谋盛（中国国民党党员），副主任刘牡丹；保卫团主任郑古悦，副主任黄奕欢、陈锡清（马共代表）；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马共代表）；宣传部主任胡愈之，副主任唐伯涛、邵宗汉。对于当时的抗日大联合，战后出版的《大战与南侨》一书有如此追述：“此总会为当时华侨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之大联合阵线，其敌忾同仇之精神，团结一致之气象，有足垂为模范者。”其代表性之广，影响之深，由此可见。

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的同时，因受日本迫害而从中国华南各地前来新、马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士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沈兹九等人，于12月下旬在直落亚逸爱同学校召开全星洲文化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交换对动员后方文化界参加新、马抗战工作的意见，即席决定组织“星华文化界战时文工团”（简称“文工团”），随即召开了成立大会，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文工团成立后，除了组织歌咏队深入各街道宣传抗战外，主要工作是配合抗敌动员总会民众武装部举办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前后招收了两批学员，经短期训练后，参加民众武装部的工作，然后分配到星华义勇军担任政训员。

抗敌动员总会以及星华文工团，从成立至解散，虽然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但对动员群众参加抗日，维护社会治安，组织星华义勇军参加保卫新加坡战斗等方面，曾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全马人民团结抗日作出了榜样。

三、英国殖民政府加紧镇压抗日 民主运动，推行消极防御政策

战后许多报刊、专著，在论述马来亚英军战败的原因时，往往都是归咎于双方兵力悬殊，说什么英军缺乏飞机、装备；有的则是指责英军士气低落，缺乏攻击精神；有的则埋怨马来亚气候炎热，湿度太

高，使英军不能适应在如此的气候条件下作战……等等，却没有片文只字敢于披露马来亚迅速沦陷的最主要内因，是英国殖民当局顽固坚持其殖民统治政策所种下的恶果。

在三十年代末，面对着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威胁，空前觉醒的新、马各族人民要求联合抗日、保卫马来亚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与新、马人民高昂的抗日热情恰恰相反，英国殖民政府不但拒不接受马共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不给人民以武装抗日的权利，而且变本加厉地残酷镇压新、马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禁止各行业工人组织合法的工会，禁止抗日的示威游行，取缔街头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就是对于像华侨筹赈会这样的合法社团，英国殖民政府也要加以限制，作了四条规定。即（一）不得表明筹款助买军火，（二）不得提议抵制日货，（三）款项须统筹统汇，不得别设机关，（四）款项汇交国内何处，由总督指定。根据这四条规定，筹赈会只能成为慈善机构，不能称为抗日团体。

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下，当时许多进步民主人士遭到逮捕，并被递解出境。较早期因抗日而被拘捕并递解出境的有新加坡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王炎之、粘文华、苏棠影和辜俊英等四人，这就是当时曾经轰动新、马的“四君子”事件。随后陆续被逮捕监禁的抗日群众数以千计，先后被递解出境的也有多批。连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如侯西反）也不例外。到了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还有马共的主要成员林江石、戴英浪、陈荣火（陈青山）、江田、杨果、陈锡清等人遭到逮捕。林江石被捕后，在法庭上不顾法官的阻挠，发表长篇演说，公开阐明马共抗日主张，谴责英殖民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呼吁当局改弦易辙，依靠人民群众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他的演说博得了阵阵的掌声，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案件。杨果、陈锡清等三十余人于1941年被递解出境，后因他们所乘的轮船在开往香港的途中，适逢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因而不得不折回新加坡。

英国殖民政府之所以如此加紧镇压新、马抗日民主运动，是与它顽固坚持殖民统治政策分不开的，它害怕人民的觉醒，将会直接威胁其根本利益，动摇其殖民统治的根基。当时的珊顿总督就曾经露骨地

承认，他担心这种群众性的抗日民主运动，最终“很可能改变成排日与抗英的运动。”一语道破了英当局的隐忧。

英国殖民政府的这一顽固立场，就是在马来亚战争爆发的初期，也没有改变过来。只是在前线节节失利，吉打、槟城已告失守的时候，才不得已接受马共的抗日主张，被迫同意无条件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近二百名政治犯，并同意马共选派骨干到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去接受游击战训练。到了马来半岛即将沦陷，英当局眼看大势已去，才不得不由新加坡总督汤姆士出面，匆忙召集陈嘉庚等社会知名人士举行紧急会议，要求人民“抛弃前嫌，同心合力，共济时艰。”即使如此，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时，它还对该总会的宗旨和任务作了诸多限制，只允许执行以下三项任务：（一）组织全市义勇警察，维持治安，及担任防空工作（每人只发给一根木棒）；（二）组织宣传队；（三）设立劳工服务团，代政府征雇民工。由于马共派出的以林江石（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为首的十人代表团坚决提议武装民众，协同英军作战，这一动议获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在抗敌动员总会的组织机构里增设一个“民众武装部”，由林江石任该部主任，并立即着手组织“星华义勇军”。几天内就招募了3千多人，再三请求当局发给武器，参加作战。直到日军准备进攻新加坡的前夕，星华义勇军才从英国人手中领到勉强发给的一千支旧式步枪和猎枪，平均每支步枪配备十五发子弹。星华义勇军的指战员，就是凭藉这一非常简陋的武器走上前线，投入了保卫新加坡的壮烈战斗。

英国殖民当局在对新、马人民的抗日运动实施镇压的同时，对新、马的防务也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这是和它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一贯采取的绥靖政策分不开的。这个政策的核心是鼓励日本北进，进攻苏联，妄图利用苏联西伯利亚的辽阔土地拖住日军的大部主力，而无力向南扩张，以免它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不过是英、美政府的如意算盘而已，而日本的南侵是其既定政策，并不曾因为英、美的引诱而有所改变。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曾多次向日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甚至以“石油禁运”相威胁，谋求与日妥协，到了1941年10月，当日军大举南移，四万余日军开进越南的金兰湾时，英国参谋本部的战情分析，仍然认为“日军可能要在中国大陆的西南方另辟战场，由云贵进入四川。”1941年9月29日，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召开了一次高级军政官员会议，检讨远东的局势，主持会议的是奉命前来调查远东局势的英远东战时会议主席（内阁情报部长）达夫古柏，出席会议的有澳大利亚驻英国特使佩居、英军远东总司令波樊、英驻中国空军总司令莱敦、新加坡总督汤姆士、英驻中国大使卡尔、驻曼谷公使克劳斯比等人。会议认为“日本之主要立足地为越南，可能成为攻击马来亚的跳板，但在近数个月内不致对南方有所动作，因此时日方正集中力量应付苏联，无力南进，加上从12月至2月间，马来亚东海岸正值东北季候风时节，海上波涛汹涌，日军不可能渡海作战。而日本特使来栖三郎此时正在访问华盛顿，美、日双方正在就石油禁运问题进行谈判，新、马当不致立即受到日军的军事威胁。”

虽然，英国对于当时日军的南移，也作了一些部署和反应，那就是派遣“威尔斯太子号”（The Prince of Wales）主力舰和“击退号”（Repulse）战斗巡洋舰前来马来亚水域协防。但这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举动，希望以此来遏止日本的南侵。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当时就曾这样说：“我认为日本对付不了美英俄三国现在联合起来反对它。……只要我提到的舰队一到（注：指上述两舰），日本更会迟疑，这可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卷，551页）很明显，在派遣上述两舰时，并不是从实战去考虑，而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因而，在派出上述两艘战舰时，并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同行，也缺乏陆基空军的掩护，所以当两舰到达马来亚水域仅一个星期，（即1941年12月10日，也就是日军在北马登陆的第三天）就被日本空军炸沉。这是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遭到的首次严重打击。

日军登陆后，英当局对马来亚的防御仍是寄希望于英、澳、印军队，而不愿意动员马来亚本身的人力、物力来协同作战。到了马来半岛大部陷落敌手，英军节节败退，新加坡危在旦夕的紧急关头，才被

迫于1941年12月18日与马共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从此以后，马共始得于公开地、合法地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马来亚抗日战争，并在英军撤退、新马沦陷后，肩负起领导新、马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神圣历史使命，掀开了马来亚历史新的一页。

四、马共积极准备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马共从其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就高举为马来亚的民族独立，为马来亚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大旗。但由于长期以来遭受到英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处于非法的地位，加上内部在较长时间里受到叛徒、内奸莱特的控制、出卖，其领导成员一批一批地遭到逮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在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下，从三十年代中、末期开始，该党便走了迂回曲折、荆棘满途的发展道路。尽管如此，马共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在其历史进程中，也确实为马来亚各族人民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尤其是组织和领导马来亚抗日武装斗争，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马来亚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10日，马共七届二次中央执委会又进一步向英当局提出武装人民，实行全面抗日战争的积极主张，会议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向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提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口号，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在敌后组建抗日游击队，带领群众拿起武器，抗击日军，为保卫新、马而浴血奋战。同日，马共领导下的新加坡火锯联合会、货仓工友会、米业运输工友互助社、驳业工友联合会、石业工人联合会、华人司机互助会、码头工友互助会、人力车工友互助会等八大工人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致函新加坡总督，并发表宣言，呼吁全民团结奋起抗战，要求新加坡政府给以新加坡近60万华人武装抗日的自由和权利，为消灭日本侵略者而奋斗。

马来亚各州马共地方党组织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决议，把建立抗日民族联合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作为战时最主要的任务。在军事上，一方面从各州选派了165名党员骨干，先后分成四批赶赴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短期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就地发动群众收

藏粮食及各种军用物资，捡拾英军溃败时丢弃的武器弹药，建设营地，组建抗日武装部队。新加坡沦陷前，在霹雳、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彭亨东部和西部、吉打等几个州，已先后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抗日游击部队（或小组）投入战斗，开展敌后游击战，破坏铁路、桥梁、狙击日军，收留和护送散失的英军撤退，在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的防卫战中，曾经起到了牵制日军的作用。总之，从北马到南马，随着英军的溃退和日军的进占，战事打到那里，那里就有英军遗弃的枪支弹药，那里的人民就捡起这些被丢弃的武器，反击日军的侵略。新、马人民的这种英勇抗敌精神，和英军丢盔弃甲、落荒南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当时由马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由于得不到英当局的支持和英军的配合，力量是单薄的，加上初期缺乏作战经验，在英军大踏步向南溃退的形势下，单凭这几批小股抗日武装，是无法阻止日军南下的。不过，游击战的枪声毕竟是打响了，人民抗日武装队伍终于冲破英当局的重重阻挠而建立起来了，反动的殖民政策阻挡不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一历史发展，是英当局始料所不及的。如果在战前，英当局能实行稍为开明的政策，给以人民武装抗日的权利，与人民联合起来抵御日军的进犯，马来亚的战局必会改观，那是无可置疑的。

综观战争前夕的历史，马来亚所面临的形势是：拥有十万正规军和数百架战机的英国当局，由于执行对日妥协的方针和顽固坚持殖民统治的政策，完全脱离了马来亚人民，结果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下，竟是不堪一击，难逃投降的厄运；而手无寸铁的马来亚人民，虽有抗日的热情和决心，但却没有抗日的自由和权利。

在人民内部，抗日联合阵线的发展也不平衡，中上层对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缺乏信心；由于殖民地政府长期实行“分而治之”的民族分化政策所种下的恶果和日军的欺骗宣传，造成相当一部分马、印族人民对日军侵略的危害性初期普遍认识不足，对马来亚的抗日斗争，则多是抱着旁观的态度。

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决定了这场战争必然会面临不少的困难，只能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前进。

第二章 日军侵占马来亚，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南太平洋战争，至1942年2月15日，继马来半岛陷落以后，号称有金汤之固的新加坡也告沦陷，驻马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率众投降，马来亚的版图从此改变了颜色。

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以后，为了加强其军政控制，掠夺被占领地区的物质资源和劳力资源，实行以战养战，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对马来亚各族人民实施野蛮暴戾与穷凶极恶的统治，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从而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在腥风血雨中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殊死的战斗。

侵马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这里仅根据战时群众目睹以及战后见诸报章的不完全统计资料，简述如下：

一、大检证、大屠杀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3天，由1942年2月18日至3月2日，首先从新加坡开始，进行大检证大屠杀，而后遍及全马各地。大检证的命令由山下奉文第二十五军大本营下达，由第二野战宪兵部执行，第五、第十八及近卫师团各派两个中队支持，先后分区强令居民集中检证，毫无甄别、毫无凭证、毫无审讯、不准声辩，随意检出无辜群众5万人，押赴海滨、市外集体刺杀、枪杀。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目的在于恫吓全马人民，使其俯首顺从日军残暴统治。在马来亚各州，也先后进行大检证、大逮捕、大屠杀。当时在新、马各地被杀的群众，加上因受残酷毒刑，凌辱虐待而死的受害者在15万人以上，英国维德上校

在东京法庭指控日军在马来亚的暴行，所提被害人数也是15万人。加上因日军施政暴虐，造成饥病而死的各族人民超过50万人。

在马来半岛受害最惨的地区是柔佛州的巴株巴辖和文律一带，1942年2月20开始，日军数次围捕屠杀无辜平民1300多人，男女老幼一律刺杀、烧杀或枪杀，婴孩被刺刀挑起抛进河港或火屋中。巴力士隆、张厝港由日军挑拨唆使受蒙骗的暴徒，杀害无辜华人数千人。2月13日，日军屠杀士乃、德茂村男女老幼900余人。麻坡屠杀300余人；振林山数次屠杀千余人。哥打丁宜2月23-25日屠杀3100多人；十四碑先后4次屠杀500余人。3月20日至30日在居銮前后屠杀2000多人。丰盛港屠杀400余人，新山东山屠杀百余人。每次屠杀，伴随强奸、烧屋、抢劫（也有其他民族败类乘机盗掠）。

其他各州，无一幸免。马六甲州3月21日大检证，群众被杀300余人，逮捕2000余人，其中被刑杀、冤杀和病死狱中数百人。亚沙汉被围屠198人；火锯厂工人被关木屋中烧死156人。马捷区屠杀200余农民及其老幼家属；吉山被屠杀157人。热水湖被刺死50余人；野新区被围起枪杀27人。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在3月18日被数百日军包围，不分青红皂白，残杀1680人，全村侥幸逃脱及轻伤治愈者仅数十余人。马口、冷宜一带农村、胶园的群众被残杀一千多人。见农底打士屠村死者数百人。霹雳州美罗地区被集体屠杀数百人。宋溪埠被杀150余人。金保新路屠杀200余人。冷甲围屠后，关在屋内烧死儿童16人。弹丸小镇高乌、仁丹被枪杀37人。吉打州3月21日在双溪大年地区屠杀300余人。亚罗斯打等地也杀200余人。彭亨州文德甲、淡马鲁、直凉各地被检证屠杀数百人。较大城市槟城4月5日以后3次大检证，逮捕5,000余人，超过半数当场被屠杀，在狱中被刑杀或病死千余人。吉隆坡及雪兰莪州各地被捕杀近千人。未找到文字记载的大屠杀事件很多，全马没有一块未染血腥的洁静土壤。

1942年2月13日，日军对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英国伤兵和医生员工400人，全部射杀或刺死，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凶残暴戾和惨无人道。

日本宪兵部和警备队随意滥捕无辜人民，三年八个月间长期持续不断。被捕人民，普遍遭受灌水、火烫、电刑、火棍、悬空吊打、鞭

打、拔指甲、拔头发、拶指、摔打、狗咬、剥光妇女衣服烫阴部等等酷刑，致死致残人数何止三万人。槟城两个绰号杀人王的宪兵比赛砍头杀人，一个先砍满一百得“优胜”，另一个也达90余人。

二、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疯狂的经济掠夺

日本马来亚军政监部实施各种经济政策，从公开勒索讹诈到抢劫，敲髓吸血，不择手段。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半个月，军政部就于3月2日召开昭南岛华侨代表大会，强令全马华侨要交献5000万元“奉纳金”，作为抵罪赎命钱。这5000万元的“奉纳金”，由受日军控制的华侨协会负责征募，限于1942年6月20日缴交。当时全马华侨拥有财产300万元以上的，无不纷纷廉价变卖产业、财物，极力筹措，6月20日期满还是无法筹足，最后由各州和特别市华侨协会，以华侨产业为抵押联保，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款2200万元（一年为期，年利六厘），方才如数凑足。接着又要华侨集款奉献飞机，续后，再命各州经营进出口贸易华商缴纳所谓巩固国防基金，勒索花招层出不穷。人民在经济上屡遭严重打击，元气大损，生活深陷困境。

紧随侵略军队的脚跟，日本南方开发金库和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在新加坡、檳城、吉隆坡、马六甲分别设立分行，支店网遍布各州，以控制各州金融流通。同时发出毫无储备基金的军用票（香蕉票），和原有通货新加坡元等值，不久，叻币就在市面绝迹。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究竟发行了多少军用票，连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据1941年马来亚英政府货币委员会所公布的资料，当时马来亚通货共达21,900万元叻币。这二亿多元叻币（实为马来亚人民的血汗钱）全被日本军政府掠走，而取代叻币在市面流通的却是毫无预备基金的军用票（香蕉票）。战后有人统计，日本军政府在马来亚滥发军用票至少达70亿--80亿元，部分地区华人战后登记，沦陷期间其资财损失4.4亿叻币，全马人民在沦陷期间蒙受的经济和物资的损失就更加惨重了。

日本财阀以株式会社等的形式，对马来亚的工商业，实行垄断。这些株式会社或组合，均是日本财阀所操纵，他们的任务是在占领区

实行经济掠夺和榨取的政策，可以任意“收买”民间的产业和商品，而民间的一切物资，均操纵在日本财阀手中，任由他们占用。马来亚丰富的锡矿和橡胶两大产业，也全由财阀集团属下的株式会社从事开采。各地华人锡矿、树胶园、油棕园、各种工厂、板厂、碾米厂、胶品制造厂、印刷厂等等产业，均遭强制低价收购。霹雳州华资锡矿在其威胁操纵下被掠夺达470家。随军南来的日本浪民投机商，互相仿效进行强抢豪夺。民族资本的工矿企业，绝大部分破产。全马344万英亩胶园，沦陷期间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状态。部分挖锡船的发动机，被拆去安装在机动帆船上，以维持近海航运。碾米厂的存谷，也被以市价五分之一的低价强制收购，单是吉打一地就有几十万担。无偿征用汽车千余辆。1945年棉纺织品等重要生活物资，被军警搜刮没收，仅新加坡一地225家布商损失就超过2000万元叻币。

日本浪民、投机商人，勾结各地日本军政实权人物，设立各种组合，垄断商业贸易，举凡米谷、粮油、烟、茶、蔬菜、水果、木材、水产、禽畜蛋类、五金、百货，等等，都成立组合，低价收购、然后高价出售，以此吮吸人民血汗，大发战争财。

1944年起日军在东南亚已丧失了制空和制海权，海上运输受到联军的严密封锁，马来亚物资供应非常短缺，加上日军各株式会社竞相抛出军用票抢购各类物资，结果造成物价暴涨，1942年6月间，各种工业原料价格平均较战前贵了十倍，到1942年底，增加至二十倍，及至1944年，市场物价平均已暴涨到一百倍以上。日军政府更借口“从事福利建设与吸收游资”，再三提高各项税率，至1945年，各种税率已分别增加至战前的一倍至四十倍。

三、军事统治与血腥镇压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为了维持其法西斯政权以及“确保重要国防资源的急速取得”，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统治，设置军政监部作为其最高行政机关，由军方自任行政，一切行政实施的责任在于军队。日本统治者毫不讳言地宣称：其统治的首要任务是把握“物”“心”两

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用军事力量、军事行动来掠夺占领区的物资，要用军威来慑服民心。

马来军政监部最初设于昭南岛（即新加坡），后来迁往霹雳州的太平市。其行政机构一改再改，目的无非是适应战局的需要，便于鱼肉人民。各州政府机关，不仅部局一级官吏全属日本军人掌权，科（课）一级也非他们莫属，当地民族只能担任科课的副职，只有执行权，没有决定权。如1943年昭南市5个部属下23个科长全部是日本人。日本南云舰队受到歼灭性打击以后，马来军政监部感到日益孤立，必须进一步利用当地人力物力，以稳住阵脚，苟延残喘。于是在昭南市及马来7州（吉打及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州的行政管理已移交泰国），分别设立“咨询委员会”，撑起“民意机关”的幌子，以蒙骗各族人民。被圈定的112名议员，只讨论社会生活小问题，不敢过问政府施政。

日本军政府对人民实行严密的户口联保制度，每一户人家必须领有安居证，方被认为是合法良民，并强令人民参加自警团队，利用人民内部互相牵制、互相监视，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军政监部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家长，以及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不论居住在任何市镇或乡村，都是自警团成员；自警团十家联合组成一个联保班（班长即甲长），每十班为一分区（分区长即为保长），十分区为一区（设置区长若干人）；每一市镇、乡村都必须设立自警团岗哨，自警团员按区、分区及班的组织，昼夜轮流站岗。法令还规定自警团的职责是：维持“治安”，防范共党游击队，监视来往行人，登记前来投宿的陌生人等。自警团员若不尽职，就得追究责任。在自警团的严密监视下，城乡人民毫无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稍有不慎，往往招来杀身之祸。

日本宪兵队是执行军事统治的最残暴机构，就像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一样。宪兵队可以随时逮捕、审讯任何平民百姓，掌握着生杀的大权，他们所采用的酷刑逼供方法，更是举世无匹。根据缴获的日本陆军训练手册，完全证实酷刑逼供是被日本政府正式批准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手段。这本手册的名称是：《询问战争俘虏的方法》，手册指示日军通常使用的方法如下：

酷刑：包括拳打、脚踢，以及任何足以使身体受到痛苦的方法。

恫吓：用酷刑、杀害、饥饿、单独监禁、不准睡眠等足以使人遭受痛苦的方法来恫吓。

灌水：这是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刑罚，将受刑者朝天绑在长凳上，将水从鼻孔和咀部灌进他的肺部，直到他失去知觉为止，跟着在他肚子上施加压力，将水挤出，如此周而复始。

火烫：一般是用点燃的烟头、蜡烛、烧红的铁条烧炙受刑者身体上敏感的部位，如鼻孔、耳朵、肚脐、生殖器、乳头等。

电刑：在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接通电流，使身体触电而震动。

夹棍：将受刑者双手反绑，令其跪在地上，将一根大棍放在腿弯处，在大腿上加重压力，往往使膝盖被压脱节，痛不堪言。

悬空吊人：将受刑者两手手腕、手臂、或头部用绳子绑住，悬空吊起，并加以鞭打。

跪刑：令受刑者在尖利的石子或三角木头上，跪上数小时之久，不准移动。

拔指甲：用钳子将受刑者的手指甲、脚趾甲拔掉。

夹手指：将木棍夹在手指的中央，用绳子绑住手指，越拉越紧，手指剧痛难忍，指骨往往被夹断。

除此以外，宪兵队还常常别出心裁，创造种种酷刑。日治时期，凡是被日本军政府逮捕的平民百姓，无不经历过这种酷刑的逼供审问，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打断骨头，不少人当场被活活打死。

日本宪兵部残酷迫害抗日志士和抗日群众的暴行，不胜枚举，这里仅举出一、二事例，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的凶残罪迹。

吉打双溪牙兰抗日同盟会负责人郑翼秋（原名郑慈来），不幸于1942年初，被双溪大年日本宪兵部逮捕，日本宪兵为了从他的口中掏出抗日组织的机密，用尽了种种酷刑。他们牵来一条凶恶的军犬（狼狗），扒在翼秋的背上，用跺脚作信号，指挥军犬行动。军犬在日军的指令下，张开血口，在翼秋的背上咬下一大块肌肉，顿时血流如注，惨不忍睹。然而翼秋仍是一声不吭，怒视着敌人。气极败坏的日本宪兵见这一招不行，就进一步迫翼秋伸出舌头，用拳猛打他的下颚，使上下颚互相撞击，牙齿竟咬穿了舌头。十指痛连心，而舌头尖的痛楚

比这还厉害！坚强的翼秋并没有被酷刑所屈服，但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伤口化脓溃烂，得不到医治，一个星期以后，在一个凄风苦雨的下午，便被拉出去枪杀了。

槟城码头工会主席李来晚，被捕时，日军见他年老，一束银须垂至胸膛，就从他的头顶淋下汽油，然后引火自须部燃烧起，被活活烧死在狱中。

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一桩桩，一件件，真是数也数不清！

四、愚民政策与奴化教育

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华侨必须起而与大日本军协力，向大东亚共荣圈迈进。”日本统治马来亚的文化政策，就是以此梦呓为出发点。一是愚民政策：最初关闭所有的公立私立学校，1942年4月首先重开马来文和印文学校，指定以日语为主课，每晨师生都须向东遥拜，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日本国歌）。10月份才准许开放部分华文学校，课程与教师须经市、州长批准，华文只作辅助语文，战前全马华校1,522间，学生137,328人。1943年1月，只开185间，学生24,078人。复课的马来学校占原有数的90.7%，印校76.9%，而华校只有12%。禁止各族人民收藏可以收听本土以外电台的短波收音机；禁止华侨与中国家乡亲友通讯；禁止悬挂除太阳旗以外的任何旗帜；禁止谈论任何政治问题……。

二是奴化政策：全面推行日本化，强迫学生和诱导成人学习日语，广播日本音乐，放映日本电影。纪年用“昭和”，时钟用东京时间。报刊全部归由军政监部新闻班所主办或者监办，马来文日报《马来新闻》，刊物《亚洲黎明》，印文《印度斯坦日报》，英文《昭南时报》，日文《昭南新闻》，华文《昭南日报》、《兴亚日报》、《彼南日报》全部如此，统一口径，掩饰日军和轴心国败绩，宣扬“皇军德政”，粉饰繁荣，满纸谎言。日本文化政策完全失败的基本原因，一是侵略者的语言与强盗语言同出一辙，受害者只有反感；二是经济的残酷掠夺与军事的血腥屠杀，抵消其一切自欺欺人的甜言蜜语。

五、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战前马来亚本已不太繁荣的经济，在日本法西斯的强抢豪夺下，已经彻底崩溃，物资奇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为了维持战争的需要，日军占领马来亚以后，便即推行所谓“增产运动”，采取强迫手段，强迫人民种植米粮以及蔬菜、番薯、木薯、芋头、花生、玉米等短期作物，聊以充饥，而将配给的米粮一减再减。1944年6月，日军为了强迫人民种粮，利用廉价劳力为其流血流汗，发起组织所谓“勤劳奉仕队”（其实是变相的拉夫），对象是年轻力壮的男子，到日军指定的地点无偿劳动。

1944年底，日军政监部颁行《男子就业限制法令》，强迫侍从、店员、电话员工、洗衣工、娱乐场职工、小贩、厨师、裁缝等，年龄18-50岁，必须转业务农，否则将强制参加兵补、义勇军、特别警察或军队劳工。在柔佛兴楼开辟新昭南农村，全马各地也分散辟地种植杂粮蔬菜。虽然砍伐大量树胶园林，种植各种稻谷17万多英亩，但产量仅够种植者及其家属消费。全马粮食产量只有需求量的34%，每月尚须由泰国进口大米5万多吨。全马城市居民粮食配给，最初成人每月每人20斤大米（妇孺酌减），后来减为8斤，乡村居民全不配给，只得靠喝稀粥、吃木薯度日。不少人因饥饿而死，大多数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上各种疾病，尤其因缺乏维生素而患脚气病和疥疮者特多。

日军的残暴，还表现在虐杀“死亡铁路”的劳工上面。1942年11月开工建筑连结仰光曼谷的250英里铁路，到1943年12月完成时，被强迫劳动的64,000名英澳战俘，因受虐待、毒打、残害、患病不治和枪决致死的达16,000人，幸存的战俘平均每人体重减轻70磅。被强征和诱骗筑路的马来亚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缅甸人有15万人，惨死的6万余人。战后有人作了如下的统计：“这条‘死亡铁路’每一哩长的路轨，是用64名盟军战俘和240名民夫的性命换来的！”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章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一、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建立与发展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在战争的紧急关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在毫无战争经验的情况下，由马共创建的人民武装。全军八个独立队，有四个是以参加过“101特别训练学校”军训的学员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余四个独立队，则是由各州的马共地方组织就地选派干部创建的。

现将各独立队的建立与发展过程，简述如下：

第一独立队——活动地点：雪兰莪州

“一独”在1942年1月1日宣布成立，成立的仪式则于1942年1月4日在吉隆坡北郊双文丹（Serendah）的义山亭举行。部队刚成立时，由第一批“101军校”受训学员，结合由马共雪兰莪州地委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组成三个分队，合计有兵员160余人。独立队党代表许庆彪，队长陈天庆，副队长廖奕林，政治部陈祥，管理部刘尧。成立大会还未开完，就遭到日机的空袭，有队员一人当场中弹（后不幸牺牲），部队被迫撤往山区。初期开展除奸活动，组织群众和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部队和群众的损失都很大，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供应困难。特别是1942年9月1日发生的“石山脚事件”（亦称“九一”事件），由于叛徒、内奸莱特的出卖，马共中央受到很大的损失，共有18人在这一事件中壮烈牺牲。因为日军的连续扫荡，“一独”被迫把三个分队（包括在“九一事件”前建立的模范中队）集中到顿巴央（S.Tampeian）地区，改编为联合中队。联合中队在粉碎了日军几次大规模的进攻后，形势有所好转，队伍不断扩大。1943年春，

在南区武来岸（Beroga）建立了第八中队，中区恢复了模范中队建制，北区吉磷（Kerling）建立了第二十九中队。同年底，又在新古毛（K.Kubu）成立第三十五中队。1944年底，在第八中队的基础上，扩建了第十二中队。1945年4-5月间，第八中队调往西海岸的万津（Banting）地区，在武来岸又成立了一个新中队——第八十一中队。到这时候，“一独”已有6个中队，约850余人。1945年春，第十二中队奉命开赴森美兰州，支持第二独立队恢复建制。为了配合联军反攻，“一独”和英军136部队达成协议，从各中队抽调军事骨干，在地方抗日组织的配合下，建立了四个新的中队（称公开队），按顺序分别命名为第一、二、三、四中队，约650人。至此，“一独”新老中队合计有9个中队，1300余人。三年八个月期间，“一独”共进行大小战斗120多次，毙伤敌8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280余支。

第二独立队——活动地点：森美兰州。

1941年12月31日，在新加坡由马共中央命名成立。“101军校”受训骨干30人从新加坡出发，于1942年4月在知知港（Titi）和马共森州地委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汇合组成二个中队，约230余人，正式建成第二独立队，党代表赖莱福（杜龙山），队长黄国平，副队长刘冠文（后由邓昌继任），政治部马丁（曾冠彪），管理部廖德（曾权）。“二独”的建队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道路。先是因为行军不慎和攻打瓜拉庇拉（Kuala Pilah）警察局没有经验，使武器和人员受到了损失（副队长刘冠文在此役牺牲）。其次是到达知知港后就遇到日军对群众的大屠杀，被害群众达1600余人。最后是日军的反复扫荡，造成人员散失，伤病员增多（最多时占30%以上），供应十分困难。但由于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上下一心，不怕困难，也由于当地马共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到1942年10月，就发展到四个中队，即：模范中队（在知知港一带活动），第十五中队（在葫芦顶Simpang Pertang一带活动），第四十三中队（在知知港的双沟罗丹、半芭梨望一带活动），马口中

队（在马口Bahau、冷宜Dangi一带活动），和一个独立分队——第五十一独立分队（在芙蓉Seremban郊外活动）合计有兵员约520余人。

为了反击日军对群众的屠杀，“二独”在1942年4月，发起进攻知港警察局，毙敌数人。接着又在抗击日军的扫荡中，毙敌佐级军官一人。日军因此调来几千兵力，对“二独”实行长达五个多月的围攻。这期间，“二独”和敌人发生的战斗不下二十余次，毙伤敌100多人。为了保存力量，特别是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6月间，“二独”奉命开赴西彭亨，会合西彭人民抗日游击队，建立第六独立队。直到1943年底，马共中央才决定在森州恢复第二独立队的建制，由“一独”、“六独”、“三独”各抽调一个中队，任命邓福隆为正队长，斯科为副队长，商钦为保管部负责人，重新开展森州的游击战争。到日本投降时，“二独”共拥有四个中队，加上原来由“三独”划给“二独”指挥的马六甲流动队，共有四个公开中队，兵员600余人。“二独”没有新老队之分，日本投降后全部进驻城镇，并参加复员。

第三独立队——活动地点：柔佛州北部。

1942年1月20日正式成立。成立仪式在新加坡芽笼32巷一间平房里举行。当时由马共中央代表行授旗礼，宣布独立队领导人名单：党代表陈书，队长小杨（吴科雄），副队长袁治英，政治部肖尔新，管理部李明（李镜明）。同时宣布成立二个中队：第一中队党代表陈田（后调往四独并未到任），中队长林文光；第二中队党代表胡萍（此人在1948年6月以后成为大叛徒，改名何浪），中队长李开发。会后全队乘车北上，到永平三合港时为战火所阻。后来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结合，司令部决定第一中队北上余民打（Jementah），第二中队东去巴罗（Paloh），还派人南下麻坡（Muar）成立第三中队。同年4月，在东甲（Tangkak）地区成立了第四中队。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各中队伤亡很多，粮食供应困难，疾病流行，战士无一完全健康。柔北当时有十多股群众自发武装，其中有的盗用抗日游击队的名义，打家劫舍，残害百姓。“三独”除说服收编其大部外，对少数顽固不化、继续作

恶的，则只有以武力解决。1943年，日军进攻更为频繁，“三独”各个中队不断流动作战，以迂回伏击战术，打击困扰敌人。在战斗中，又建立了第五中队（在西隆坡、昔加末Segamat以北），第七中队（在永平），第九中队（在甲蓬Bt.Kepong），第十二中队（在打色Tasek，金马士以北、柔森彭三州交界处），第十五中队（在拉美士Labis），第十八中队（在弄边B.Rompin彭亨弄边河出口处）。1945年5月13日，“三独”发起“红五月运动”，同时进攻柔北地区17个（另一说则是23个）警察局，获得了全部胜利。接着粉碎了日暮途穷的日军提出的“和平分管地区，联合抗英”和跟随而来的排华阴谋。到日本投降前夕，“三独”共拥有九个秘密中队，三个公开中队，兵员约1,500人。

第四独立队——活动地点：柔佛州南部。

1942年1月30日在新加坡武吉知马汉光学校宣布成立。独立队党代表陈路（胡天保），队长阿福（余洪），副队长陈培农，政治部阿川（郑戴明），管理部李文辉。（注：另有资料说，当时在新加坡宣布司令部成员名单，政治部和管理部均设有副职，政治部副职为吴亚浪，管理部副职是南学、即张天和）。会后立即开赴士乃（Senai）泗隆港，会合已在那里集中的、由马共柔南地委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组成第一、第二、第三（后改称第九中队）、第四等共四个中队，分赴士乃、玻璃城（Kg. Poh Lee Sen）、笨珍（Pontian）、居銮（Kluang）等地活动。柔南人民在沦陷后遭受日军掳掠烧杀十分严重，死亡一万余人。日军进攻抗日部队也较频繁激烈，部队初期只能流动与敌周旋，经常靠野菜、菠萝充饥，战死、病死的战士都不少。1942年8月以后，“四独”伺机出击日军警察局，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一年中胜利击退日军八次规模大小不等的进攻，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1943年司令部迁至天吉港（在哥打丁宜Kota Tinggi西北大森林中）建立根据地，先后组建了第七中队（在哥打丁宜），第十三中队（后改称第二十中队，在文律Benut），第十八中队（在丰盛港Mersing）和模范中队（在天吉港）。四次进攻古来日军，并进攻东山、东兴、勃兰东、白板等地警察局，

两次击退日军对天吉港的大规模的围攻。在海上一次夺取日军七艘大型机动船及船上所载的十吨大米，俘虏押运的日军20余人。还成功地平息了日军在文律地区煽动的排华风潮。三年多时间里，“四独”与日军共作战150多次，（其中80多次是主动进攻），毙伤敌军警及走狗一千多人，自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到日本投降时，“四独”共拥有八个秘密中队，五个公开中队，兵力合计1300余人。

以上四个独立队，均是由“101军校”受训的学员作骨干，结合当地游击队组建而成。四批受训骨干共165人。第一批15人，第二批30人，第三、四批各60人。原计划第一批派到北马，第二批到霹雳，第三批到雪兰莪，第四批到柔佛。但因英军撤退太快，不但第五批以后的计划被迫取消，也使得第一批只能到达吉隆坡北郊，第二批到达淡边，第三批到达三合港，第四批到达士乃泗隆港。他们虽然在陌生的环境下工作，但很快就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为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蒙受了重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到日军投降时，除个别人中途叛变，或做了逃兵外，这批骨干生还者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如第一批只剩下四人，第三批只剩下18人，牺牲之大由此可见。

第五独立队——活动地点：霹雳州。

日军1941年12月26日占领怡保之前，马共霹雳州地委就在朱毛（Chemor）和仕林河（Slim R.）两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朱毛地区有队员近百人，仕林河地区也有60-70人。霹雳全州沦陷后，马共霹雳州地委立即组织人力从战场上捡拾英军遗弃的枪械四百余支，弹药一批，初步武装了自己。在与马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霹房地委于1942年1月下旬决定成立霹雳州军委，统一领导全州的抗日武装，把部队命名为“霹雳人民抗日军”。5月间，才由马共中央正式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司令部党代表张奇生（后由廖伟中继任），队长赖莱福（从森州调任），副队长黄立，政治部萧力，管理部蔡福。初期辖有四个中队：第一中队（后改为模范中队）在朱毛，

第二中队在和丰（Sungai Siput），第三中队（后改为第十三中队）在波赖（Simpang Pulai），第四中队在美罗（Bidor）。部队刚成立，还来不及对外公布，日军便发起了进攻，迫使“五独”的正式成立被延至1942年12月1日。“五独”成立以后，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司令部及模范中队从干丹营地（Kanthan H.）转移到地骨（Tikus），再转移到务边（Gopeng）；第二中队从沙叻营地（Salak）出发，转移到玲珑（Lenggong）；第三中队从波赖转移到甲板（Papan）。

日军除了在军事上发动对“五独”的进攻外，同时也开展政治攻势，叫嚣“三月灭共”。“五独”则以加强军事进攻和除奸活动来回答，先后进攻朱毛、端洛（Tronoh）、红毛丹（Tg.Rambutan）等六处警察局，并在狮尾（怡保市郊区）伏击敌特高科的巡逻队，取得全胜。以后又与第六独立队合作，消灭了盘踞在吉兰丹州牙拉顶（Ulu Galas）的二股土匪，在该地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在对日战争中，“五独”相继成立了第十二中队（在牙拉顶），第十四中队（在太平Taiping），第十六中队（在实兆远Sitiawan），第十九中队（在朱毛），第三十五中队（在玲珑）。为配合联军的反攻，1945年又组建了五个公开队。到日本投降时，“五独”共拥有八个老中队，四个新中队，共1500余人。

第六独立队——活动地点：彭亨州西部。

早在1942年2月间，在西彭马共地委的领导下，当地便成立了抗日游击队，由黄春任党代表，辖有四个分队，约200余人。因人多枪少，同时缺少军事经验，在日军的进攻下，受到了不少的损失。1943年5月，第二独立队奉命东调西彭亨，大大加强了该州的抗日力量。调去的“二独”人马和西彭抗日游击队结合，于1943年8月13日正式成立了第六独立队。党代表峰云（小张），队长曾冠彪（马丁），副队长陈豪，政治部吴亮明（后由赖文明继任），管理部汪清。辖有模范中队（在文冬Bentong），第162中队（在明光Mengkuang），第157中队（在文积Mancis），第153中队（在劳勿Raub），第159中队（在文德甲

Mentakab)。以后又陆续成立了牙拉顶中队（在吉兰丹州，以后移交给“五独”，改编成第十二中队）和164中队（在瓜拉立卑Kuala Lipis），总兵力一千余人。

“六独”成立以后，除了加强消灭敌奸、走狗、巩固农村阵地，粉碎了敌人进攻外，曾经先后进攻文积（Mancis）、而连突（Jerantut）、直凉（Triang）、加叻（Karak）27碑等地警察局。另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收编和围剿境内四股群众武装和土匪，并在布劳（Pulai）击退日军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消灭日兵40余人。“六独”的民族工作也做得较好，曾在瓜拉立卑建立了一支马来人抗日小队。到日本投降时，“六独”共拥有五个老队，四个新队和一个独立分队，加上各地的后备队兵力近二千人。

第七独立队——活动地点：彭亨州东部和丁加奴州。

1944年11月7日成立。早在1942年2月初，马共东彭地委已着手组织一批胶工和城镇青年，收集英军遗弃的步枪十余支，在惹姆（Kg. Jeram丁加奴州境内）胶园成立游击队，趁日军占领关丹后立足未稳，于三月间进攻雅姆警察局，获得胜利，缴枪20余支。马共在丁加奴州的甘马挽（Kemaman）、甘马昔（Kemasik）、基惹（Kg.Kijal）和北加（B.Paka）一带的基层组织，也组成一支60余人的队伍，于1942年5月20日下午，用三支猎枪和30多把大刀，一举攻下基惹警察局，缴获来福枪5支。接着连夜进攻甘马昔警察局，又缴枪105支（大部分猎枪，是日军从丁加奴州各地收集来暂放甘马昔警局的）。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东彭关丹抗日游击队”。到1944年11月7日，才正式整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党代表庄清，队长张祺，副队长杨清，政治部阿山，管理部吴克。辖有四个中队一个独立分队，兵员约700余人。“七独”从未取得联军一枪一弹的支持，三年间大小战斗近百次，进攻过11个警察局，击退千余日军的七路围攻，共缴枪500余支，并粉碎了日军的“招降”阴谋。“七独”也未曾建立新队，日本投降后以老队参加复员。

第八独立队——活动地点：吉打和玻璃市州

第八独立队的正式命名，虽然迟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但它的活动和全马各地一样，在沦陷初期就开始了。因为吉打州毗邻泰国，最先遭到日军的进攻，当地马共组织和各族人民都缺乏思想准备，加以受破坏严重，各抗日组织失去相互联系，初期只由个别马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分别组织抗日武装小组，进行除奸和游击活动。这类抗日小组，前后共组织有七、八个之多，但在日军的连续镇压下，大多数被摧毁或被瓦解，幸存的只好隐蔽起来，或转移到安全地区。其中有二个小组，因为有比较坚强的领导，不但能继续坚持斗争，而且不断有所发展。其中活跃在吉中和吉南的游击小组，在马共地委成员张云的领导下，组成吉打（东）抗日游击队，他们从除奸活动开始，发展到进攻警察局。1943年底转移到华玲（Baling）山区，和第五独立队建立了联系，并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力量进一步壮大，队伍发展到60多人。在吉北活动的游击小组，最初只有三支半枪（其中一支是锯短的步枪），称“三支半枪游击队”。他们除了除奸以外，还消灭了曾残酷镇压工人的日人矿山经理。1944年初，发起进攻亚森（Asun）警察局，缴枪十余支。他们最成功的一次战斗，是新路反击战，重创和毙伤敌军40余人。此外他们还协助训练和支持泰南抗日义勇队，并和他密切合作，进攻泰南昔罗县日军据点和古务（Kubu）警察局，缴枪12支。为了统一指挥，1945年3月，吉北抗日游击队和吉东抗日游击队统一编制，改称“吉打人民抗日军”，并和英军136部队建立了联系。日本投降后，“吉打人民抗日军”一度改称“吉打人民解放军”，引起英方抗议，结果由马共中央军委将其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队长何小力，副队长张江海，白丝木，辖有四个公开中队，除部分老战士提前转到地方工作外，有兵员500余人。

八个独立队共有秘密中队（又称老队）46个，独立分队2个，约5,400余人；公开中队（又称新队）21个，约4,500余人。合计共有新老中队67个，总兵力约一万人。（注：日本投降后进驻城镇的部队，除

上述21个新中队外，还有“二独”、“七独”、“八独”的老队12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

八个独立队的编制基本统一。独立队设司令部，司令部辖中队指挥部，中队辖三个分队，分队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队员10—12人。因为是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每个独立队所辖中队的数目，视情况而定，不受限制。同样，中队所辖分队，分队所辖小队的数目，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每个中队人数在100人至200人之间。各独立队的指挥作战，组织管理和民运工作，都是分别筹划，各自为战。中队的活动也相对独立进行。战争的规模基本上是以中队为单位的游击战，在靠近城镇地带，则多数以分队和小队为单位进行作战。三年多的战争期间，极少以独立队的规模组织作战（如第三独立队组织的“5·13”战役那样）。各独立队之间协同作战，更是绝无仅有（如“五独”、“六独”协同清剿牙拉顶山区的土匪）。由于叛徒内奸莱特的出卖，从1943年4月以后，马共中央委员除东彭仅有一个外，基本上已损失殆尽，全马统一的领导机构，事实上就不再存在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日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即使如此，各独立队之间的相互支持，还是有的，如“五独”于1942年支持“一独”武器；1944年底，“一独”、“六独”、“三独”支援“二独”恢复建制等等。

二、武装斗争的三个阶段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斗争，是在没有外援，没有补给，尤其是在没有丝毫作战经验的情况下展开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其所以能够如此，除了有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日益好转的形势配合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马共的领导，有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华族群众的全力支持，以及抗日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实战中不断提高战斗素质的结果。

人民抗日军刚成立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缺少武器、弹药。英国殖民当局到最后关头虽然接受了马共提出的“合作抗日”的主张，

并答应给予人民以武器，但骨子里仍然没有改变其仇视人民及害怕人民的立场。如选派到“101军校”受训的大批学员，英方最初曾口头许诺结业后每人配给长短枪各一支，手提机关枪每三人一支，轻机枪每五人一挺，手榴弹每人五箱（60粒），但到结业时，却大打折扣，如第一批15人，结业时只领得短枪15支（一说30支），手提机关枪5支，手榴弹30箱。只有第二批配备较好，30人共领得英式风机关枪一挺，轻机枪二挺，手提机关枪10支，左轮短枪15支，手榴弹60箱，弹药一批。第三、四批基本上是人手一件，外加少量短枪和手提机关枪。这些武器中，不少还是杂牌枪，而且全是陈旧的。如第三批所分得的步枪，全是德国马枪、荷兰步枪之类，竟没有一支来福枪。因而造成第三、第四批学员结业时，曾发生全体学员拒绝出席英方举行的欢送会，以示抗议的事。总计四批学员所领得的枪支，总数仅在200件左右。这当然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需要。第三独立队建队初时，就曾因枪支不足而不得不把部分自愿来参军的队员送回农村。同样的事在别的独立队里也有发生。这样，武器弹药的缺乏，就成了影响抗日军发展壮大的一個主要困难。

其次是毫无作战经验和缺乏军事常识。抗日军的成员都是来自工、农、学生和部分其它阶层人士，没有一个是当过兵的，而且一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不要说打仗，许多人过去连枪都没有摸过，（英殖民当局从来不招募华人充当军警）。英军“101”军校虽然对四批学员给予军训，但内容只是如何瞄准、开枪，如何装卸、维护、保管枪械，以及如可使用雷管炸药等军事常识。至于如何行军操练，如何指挥作战，战略战术之类，则丝毫没有涉及。由于缺乏经验，抗日军曾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第三独立队在1942年2月初，就曾发生过在行军时丢失枪支，后来攻打瓜拉比拉警察局又遭到失败（副队长刘冠文在此役中牺牲），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第三是各种物资的匮乏和供应的困难，包括粮食、药品、衣服和鞋帽等，特别是在日军反复扫荡的情况下，尤为艰苦。吃不上饭，睡不着觉，衣服破了无法补，病了没药医是常有的事。如第一独立队有一个时期只能靠榴莲核过活，第三独立队仅靠野竹笋和米糠充饥，第

四独立队一连几个月以黄梨和薯叶为生，没有米，没有油，没有盐，都十分平常，更不要说肉类了。因为缺乏营养，战士们又不适应大森林的水土，加上缺医少药，常常枵腹行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多，总计几年来染疾死亡的战士，约占牺牲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才有较大的改善。

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三年八个月战争中，人民抗日军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组织发动群众阶段，从全马沦陷至1943年1月止；第二阶段为积极防御阶段，从1943年2月至1944年10月；第三阶段为准备反攻阶段，从1944年底起至日军投降。

各阶段情况分述如下：

（一） 第一阶段——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

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如何站稳脚跟、维护生存、抵御日军不断进攻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日军占领全马后，除了立即以“检证”和大屠杀来强迫人民服从它的野蛮统治以外，一方面，大肆宣扬它的所谓“赫赫战果”，以欺骗利诱的方法收买一部分亲日分子为其效劳，破坏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另一方面，一发现有抗日军活动，立即发动军事进攻，屠杀外围群众，纵火焚烧房屋，造成群众害怕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军的处境非常困难，干部战士除病死的以外，被捕和牺牲的都比较多。而更为严重的是叛徒、内奸莱特的出卖和破坏，造成中上层干部损失严重。战后才查明，新加坡刚沦陷不久，叛徒莱特就秘密投入日军的怀抱，他用召开干部会议的方法，把许多负责干部一批批的秘密出卖给日军，其中破坏最严重的是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机关几次被破坏，和雪兰莪“九一”石山脚事件，造成在整个日占时期新加坡抗日活动的瘫痪，和许多抗日军高级领导人的牺牲。例如，四个独立队的第一任领导人，在这段时间内约有80%的人被捕或牺牲，致使日常的领导工作，仅得一至二人维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抗日军处境的险恶和困难。

除此之外，莱特还以“不给敌人一片树胶、一斤锡沙”为借口，于1942年5月30日在柔北三合港召开的中南马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上，提出以“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为重点”，以“罢工、怠工等斗争来破坏敌人的生产”为理由，把抗日武装斗争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还指责当时各独立队袭击日军交通线、破坏日占区铁路、桥梁的战斗为“冒险”。提出要把武器收藏起来，部队分散到农村去“活动”的荒谬主张。只是由于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抵制，他的这一包藏祸心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在需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形势下，会议通过的“保存力量、充实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的决定，却为以后的右倾保守和机会主义定下了调子，在后来的斗争中一直没有受到清算，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给抗日武装斗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为了改变处境，克服困难，抗日军在这时期不得不集中力量去宣传和发动群众，派出不少人员配合地方开展民运工作。针对当时敌奸活动猖狂的特点，又组织了许多除奸小组或流动队深入农村、矿山和胶园，根据群众的举报，在经过调查并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开展除奸灭叛工作。此举不但打击了敌奸、走狗的气焰，并且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以致后来除奸小组的活动，能够从乡村逐渐转移到城镇，在日军的眼皮下打狗除奸，给日军以很大的震动。关于这点，各独立队都有不少生动的事例。

针对沦陷初期各地有不少群众自发武装活动的情况（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华族），抗日军组织力量，争取他们共同抗日。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利用从战场上捡拾或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在当时许多人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自发地拉起队伍，有些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些还打着“抗日”的旗号，进行招摇撞骗，个别最坏的，甚至奸淫妇女、强抢民女为妻，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给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他们针对其他民族（如对马来族）的土匪行径，影响尤其恶劣，为害更加深远。这类群众自发武装队伍，最盛时期全马约有三、四十股之多。每股从几人、十几人到一、二百人不等，总数约有近千人枪，尤以柔佛、彭亨、霹雳三州为多。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为了让群众识别真正的抗日队伍，抗日军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对

这些群众自发武装，各独立队大都采取教育和收编为主的方针，只有对极少数行为极端恶劣，而又怙恶不悛的，才采取军事行动加以瓦解或消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1943年中起，除少数例外，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大多数已参加了抗日军。这不但加强了抗日军的力量，而且对于进一步发动群众，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日军的频繁进攻，因为处在敌强我弱和众寡悬殊的条件下，人民抗日军只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利用热带大森林覆盖的有利条件，跟日军兜圈子，打冷枪骚扰，挫伤其锐气，再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进行伏击，大量杀伤或部分歼灭敌人，使其士气衰竭，知难而退。1942年10月，约二千多名日军分数路围攻雪兰莪双文丹（Serendah）顿巴央（S.Tampeian）抗日军营地，“一独”联合中队在三处据险伏击，然后分成小队迅速撤离，灵活穿插敌后，见敌就打，打了就跑，两天之内，毙伤日军一百余人，而抗日军仅死伤各一人。1943年初，“五独”第三中队在怡保市郊波赖山上，抗击日军的三路合围，分兵伏击，而后迅速退出战斗，分散四面八方，大打麻雀战，使日军迷失进攻目标，只好灰溜溜收尸而返。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为了避免单纯的消极防御，抗日军在防御中也穿插着局部的进攻，用小部队攻打日军据点和警察局，迫使日军不得不分散其兵力，作面的布防，削弱其大部队的进攻优势。如“六独”的数次袭击敌营，破坏日军交通线；“二独”袭击知知港警察局，伏击敌军车；“三独”没收日军“奉纳金”，炸毁铁路；“四独”的八次战斗，和攻打冷金（Renggam）警察局，等等，虽然规模不大，但都起到了牵制与削弱敌人进攻的作用。总计从1942年2月全马沦陷到1943年1月这段期间，抗日军在20多次的大小战斗中，共毙伤日军警约600人，缴枪200余支。

（二）第二阶段——积极防御，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经过一年多艰苦的战斗和持续不断的努力，群众已逐步发动起来。1943年2、3月间，马共在雪兰莪州某地召开了扩大的七届三中执委会

会议，有部分地方党军高级干部参加。会议通过了“抗日九大纲领”^(注1)，还制定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统一的军旗、军礼、军纪、军歌等。七届三中执委会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马来亚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抗日九大纲领”的鼓舞下，不但大大地激励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更坚定了各族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如抗日同盟会、抗日联合会、抗日后备队、抗日自卫团等纷纷建立，遍布矿山、胶园和农村，在城镇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形成一条广泛的抗日战线，抗日军的处境也大为改观，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反观日军，情况则愈来愈不妙。从1943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逐步败退，完全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为了挽救其日益明显的败局，它在占领区进行垂死挣扎。一方面，更加疯狂地掠夺马来亚的人力、物力资源，另一方面，除继续进行欺骗宣传外，又使出玩弄政治骗局的一手，在各地导演一出所谓“土生人民参政”的丑剧，企图诱使各族人民与之进行合作。

由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存在和发展，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统治威信，动摇了其统治基础，日军只好集中更强大的兵力，向人民抗日军发动猛烈的进攻。在柔南、柔北、森美兰、雪兰莪、霹雳这几个主要的州里，无一例外地都对抗日军进行所谓“军事围剿”。这些围剿，

注1：马共中央第三次执委会通过的抗日九大纲领内容：

- (一)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 (二) 建立由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 (三) 开放人民言论、组织、信仰的绝对自由，取消旧制度奴役人民的法令，释放政治犯及抗日俘虏。
- (四) 改善民生，救济失业难民，普遍加饷加薪，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
- (五) 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 (六) 以各民族语言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 (七) 没收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发还被日军没收的人民及各友邦人民的财产。
- (八) 实行关税自主，建立和各友邦友好条约与商务关系，承认友邦贸易自由。
- (九)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独立，赞助日本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除了攻势更加猛烈、范围更加广阔、时间更加持久之外，还伴之以肃清乡村、强迫百姓搬离游击区，企图割断抗日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如从1943年6月到10月这段时间，日军就向第四独立队发动了三次大围攻，在围攻前，先将德茂芭、茨廊、180依吉、海南港、乌水港、笨珍路27碑等地的外围群众赶走，放火把房屋烧光。同年5月，日军动员数千兵力，进攻“三独”司令部所在地彼咯(Bekok)，除了使用大炮轰击外，还动用飞机进行轰炸；与此同时，又向活跃在昔加末(Segamat)以北西隆坡地区的“三独”第五中队发动进攻，在那里制造了一个长达数十英里的无人区。同年3—5月，日军在森美兰州向“二独”进行了反复扫荡，除了在外围烧杀、驱赶群众外，还企图驻营不走，最后迫使“二独”东调西彭亨。

在雪兰莪州，从1943年3月起，直到同年12月，日军同样向“一独”第八中队连续发动了五次进攻，每次动用兵力都在千人左右。日军所到之处，群众被屠杀，房屋被烧毁。又如在霹雳州，1943年初日军便抽调几千兵力，从和丰到朱毛一带，实行严密的封锁，把靠近森林的上万农民全部赶走，焚毁山边房屋，同时向活动在和丰灵丹(Kg Lintang)的“五独”部队发起进攻，迫使抗日军撤走，以后又跟踪追击到务边，沿途烧杀抢掠，使群众蒙受很大的损失。

针对日军猖狂的进攻，抗日军的战术仍和第一阶段相同，只是更多地采用伏击战来杀伤敌人。因为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日军的行动往往被抗日军预先侦知，为打伏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以上提到的日军对第四独立队的三次大围攻，第一次围攻刚开始，日军就在上泗隆、一百八十依吉、德茂芭三处中伏；第二次大围攻也先后在茨廊、瑞林园、老杞等地遭到伏击。其次，是避开日军主力，主动转移到外线去作战，或在公路上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截击日军的供应，或攻击日军的据点和警察局，牵制敌人。如日军对“三独”、“五独”的进攻，和对“四独”的第三次大“围剿”，就是这样被打退的。日军不但没有达到消灭抗日军的目的，相反，却往往以损兵折将告终。

与政治上玩弄骗局相配合，日军在向抗日军进攻的同时，也使出了“招安”的一手，这是不同于前一阶段的一个特点。其中最阴险的

一着，是指使以高克平、黄国平^{（注2）}为首的一批叛徒，宣扬成立马共伪中央，公开发表声明，攻击马共犯了“不抗英”而“抗日”的错误。他们还根据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把霹雳州列为“招安”的重点，组成“昭南队”，协同日本特高科制定所谓“三月灭共”的计划，对被捕的群众实行收买利诱，然后释放出来，混入革命队伍伺机进行策反和破坏。为粉碎敌人这一阴谋，打击和惩办为首的叛徒和敌奸，抗日军联同各地抗日组织，除了广为宣传揭露敌人这一阴谋、号召群众提高警惕外，同时派出许多行动小组或流动队，对其中罪大恶极、活动猖狂者加以惩处。其中最具典型的两件事：一是1943年5月，“五独”流动队在怡保郊区消灭日本特高科的一次战斗；另一件就要数到同年“七独”在惹姆胶园粉碎敌人“招安”的行动了。

抗日军和抗日组织还根据“胁从不究”的方针，对那些还没有完全泯灭民族良知，没有罪行或罪行轻微，有悔过表现的“失足者”加以争取，鼓励他们脱离敌人，回到人民中来。这样做的结果，果然有不少人脱离了敌人的队伍，投向人民。其中有些人不但带回日军发给的枪械，而且还提供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个别人甚至事先跟抗日组织联系好，然后诱骗那些死心为敌人效劳的叛徒或敌奸到约定地点，让抗日组织加以俘获或处置。由于抗日军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日军的“招安”阴谋，很快就偃旗息鼓，寿终正寝了。

日军为掩饰失败，挽回面子，竟然在有些地方指使其走狗化装成抗日军，演出接受“招安”的闹剧，这也可算是三年八个月生死斗争中一桩有趣的插曲了。

进入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显露出胜利的曙光，而日军的处境则如江河日下，日军为了实现其进军印度的野心和应付联军在缅甸的反攻，将其驻马来亚的精锐部队全部调走，这时，兵力不足和士气低落成为日军致命的弱点。为了防止抗日军的进攻，日军开始强迫居民在市镇四周建筑栅栏，并且收缩兵力，只驻防在一些大中城市。这时期日军对抗日军的战术也起了变化，变全面围剿为重点进攻，1944

注2：高克平是原马共马六甲州委书记，沦陷后不久即被捕，叛变投敌，接受日军指示，组织马共伪中央，号召群众抗英。黄国平原是第二独立队的队长，在出席“九一”会议的途中被捕，叛变投敌。

年日军只对“四独”的天吉港发起二次大围剿，其余地方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有时则派出小股部队，对抗日军进行“游击”。这样一来，反而给抗日军提供了歼敌的机会。例如，1944年5月间，日军在柔北昔加末西隆坡不远处的“八十格”伏击抗日军，反被抗日军所伏击，全队14人，除一人逃得性命外，其余均被抗日军击毙。在雪州的古毛叻思(Rasa)，柔南的老杞、和平港等地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例子。

鉴于日军龟缩在大中城市，抗日军也及时把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中小市镇。攻打中小城镇日军的据点和警察局，就是这时期抗日军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抗日军积极防御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初“四独”四次进攻古来(Kulai)和勃兰东(Plenton)之战，特别是年底攻打水上警察局及西的里(Sedili)海上夺粮；“三独”进攻亚沙汗(Asahan)、巴罗(Paloh)、巴莪(Pagoh)和永平铁山警察局；“五独”进攻端洛(Tronoh)警察局；“二独”进攻瓜拉比拉(Kuala Pilah)警察局和马来义勇军兵营；以及“一独”拔除大港敌人据点和武来岸(Broga)警察局等，都是其中较为成功的战例。

在抗日形势日益好转的基础上，1944年10月，马共在雪兰莪召开了全马地委和独立队司令部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相互交流了抗日武装斗争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加强军政干部培训，扩充抗日武装部队，把人民抗日军编为秘密队和公开队，秘密队不与联军接触，保持其独立性，建立参谋本部领导，公开队与联军合作，接受空投武器和进驻英军联络官，以及准备在各州建立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军等各项决定，准备迎接联军反攻。会议以后，马来亚各地随即掀起了拥军、扩军热潮，迎来了准备反攻阶段。

(三) 第三阶段——主动出击，准备反攻

1945年是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载入史册的。

从年头开始，各族人民便以关切的心情，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抗日的活动中。广大人民更加积极地支持抗日军，出现了无数青年热烈要求加入人民抗日军的动人情景。抗日

军更加壮大了，也更加活跃了。新年刚过，便传来了喜讯：“一独”在靠近吉隆坡的新街场咕腰地方，伏击日军中尉警长带领的有一百多人的巡逻队，取得毙伤敌34人，缴枪二十余支的胜利。各地抗日军也都纷纷出动，一时形成了杀敌夺武高潮。特别是柔北第三独立队所进行的“5·13战役”，即1945年5月13日向柔北地区的17个警察局，（一说23个）同时发起进攻，除在昔加末、巴罗、和麻坡遭到抵抗外，其余均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胜利，共夺得武器二百余支，俘敌近三百人。在这一胜利形势的影响下，抗日群众组织也更加活跃，他们的活动，不仅已深入到中小城市，甚至更伸展到大城市中去了。许多中上层人士，包括军警中的许多头目，都暗中向抗日组织靠拢，日军的处境更加孤立。到了德国法西斯战败以后，大家心里都明白：日本法西斯的寿命不长了，它的末日已是屈指可数了。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也没有缓和下来。日军由于在太平洋各岛上的作战连续失败，迫使它在马来半岛积极备战，把许多残败部队集中到半岛上来。一方面，它沿着贯通南北的铁路干线一带继续肃清乡村，进攻人民抗日军，特别是进攻靠近新加坡的柔南抗日军。另一方面，继续玩弄政治阴谋：第一步是派其爪牙四出活动，企图和抗日军建立联系。在柔北它找到了当地抗日组织，并通过抗日组织向抗日军提出了如下的合作条件：“双方划地为界，各不相扰，只要抗日军放弃抗日，合作抗英，日军将向抗日军提供物资和武器”。这个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抗日军的严正拒绝。日军见此计不成，其阴谋的第二步就是煽动排华。排华的恶浪，首先在峇株巴辖（Batu Pahat）地方发生，后来蔓延到森美兰的马口和霹雳的一些地区。由于抗日军采取了正确的对策，后来日本也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排华浪潮才逐步平息下来，无辜的人民始得免于遭受更严重的性命和财产损失。

战后有一些人把这一次的排华事件归咎于人民抗日军。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第一，挑动民族分裂和相互仇视，特别是挑拨马、华两族的团结，是日本法西斯一贯的政策，这是从它占领马来亚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的。第二，这次排华，从挑动到组织、指挥都是由日军一手包办，这是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的。第三，排华的首发

地点恰恰是在峇株巴辖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因为那里正是日军阴谋与抗日军划地而治的试验点。

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形势急转直下，抗日军原定配合联军反攻的各种部署，均无法实施，而是以和平进驻各地城镇，结束了这场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

三、人民抗日军的战术与作战方法

抗日战争期间，人民抗日军在军事上长期处于劣势的地位。因为日军不但在数量上比抗日军众多（每一次进攻，常常动用十倍、二十倍、有时甚至是百倍于抗日军的兵力），而且武器比抗日军好（抗日军只有步枪、机关枪等轻武器，而且大都是陈旧的），比抗日军训练有素，作战经验更为丰富。除此之外，它还占有许多军事据点，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有较为充足的后方供应，而抗日军则是缺少这些条件。但为什么在三年八个月的战争中，抗日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愈战愈强，力量越来越壮大呢？

关于这点，过去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归因有马共的领导；有的说是因为抗日军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有的认为是因为有英军提供的训练和援助；也有的认为是因为马来亚到处有大森林的掩护，便于游击队活动而不利于日军重武器火力的发挥；如此等等。不能否认，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有马共的领导是很主要的，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日军是侵略者，对各族人民实行最野蛮的法西斯统治，而抗日军则高举反法西斯的大旗，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得到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组成部分，因而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当然，这还不是一切。抗日军除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外，还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在和日军作战过程中，抗日军逐步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坚决、主动、灵活、积极。”这就是说：行动要坚决，作战要主动，战术要灵活，态度要积极。所谓行动坚决，

就是不论进攻或退却，都要当机立断不能犹疑不决，所谓作战主动，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力争主动，不能被动挨打；所谓战术灵活，就是用什么方法跟敌人作战，一切要依情况而定，没有固定的模式；所谓态度积极，就是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打击敌人，而不消极等待。这“八字”原则是互相联系，不能机械分开的。它实质上是游击战术的具体应用，也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围城打援”，“声东击西”等等作战方法实施的指导原则。

总结几年来和日军作战的经验，抗日军最常用的作战方法，有以下几种：

阻击战。这是在日军进剿时最常使用的战术。如1942年10月，日军动员了千余兵力，向活跃在顿巴央的“一独”联合中队发动进攻，先是封锁了由间津十三条石起经双门丹、顿巴央至叻思、古毛间的长达50公里的交通线，接着分兵三路，从南、北、中三个方向分进合击。战斗在当天下午打响，抗日军分据三个山头，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日军三次冲锋，始终未能攻占正面山头。到了傍晚，日军改变战术，分左右二路从山脚包抄上来，左路先到山腰，受到抗日军火力截击，右路日军闻声也向左边山头开火，却不料射向左路的日军，昏暗中互相打了起来。抗日军又派出小队，穿插敌后，见敌就打，打得日军蒙头转向，腹背受敌，最后遗尸几十具，狼狈撤离战场。但日军并没有从山脚撤离，而是守在山边，封锁了路口。第二天一早，他又重整旗鼓，重新发起了进攻。联合中队事前已经作了准备，等到敌人接近营地时，从各个山头突然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然后按计划安全转移。当日军进入抗日军营地时，又触响了抗日军预先埋下的炸药，数声巨响，炸得日军血肉横飞。这一仗，击毙日军尉官二名，重伤日军少佐一名，击毙日兵数十人，伤80余人。抗日军也牺牲一名机枪手，另一名战士受伤。

1943年1月初，日军向波赖山“五独”第三中队发起进攻，波赖山位于怡保市东面，该地山高林密，悬岩陡壁。日军起初动员了一千多兵力，还出动空军配合轰炸。抗日军坚守有利地形，给以迎头痛击。第二

天，日军增兵二千多，并动用大炮，分三路猛攻，抗日军则分途伏击，然后迅速撤离。日军迷失目标，只好撤走。此役毙伤日军数十人。

有时阻击战中也结合进行反击战，给日军以更大的杀伤。如：1944年9月，日军动员了五千多兵力，分四路进攻“四独”根据地天吉港。该处是森林中的一块盆地，只有哥打河贯通其间。日军进攻时还运来“亚答”、木料，准备长驻。除了用海军封锁河面外，还出动空军投弹百多枚。面对日军优势兵力，抗日军实行坚壁清野，除留下小部分兵力阻击敌人外，主力立即转移到外线，以小队为单位。破坏敌人铁路桥梁，截击敌人运输车辆，牵制敌人的进攻。日军虽然进到天吉港，却找不到抗日军的踪迹，外线又不断受到抗日军的袭击，为保护其后方的交通线，因而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回防，正当日军分兵时，抗日军则迅速化零为整，占据有利地形，在日军必经的路上埋设地雷，痛歼敌人。9月30日上午，日军在泗色路上中伏，死伤100人左右。另一队敌兵在取道玻璃城返回古来时，又在“才成园”芭洋（沼泽地）里中伏，死伤100多人，最后迫使日军全线撤走。此役日军共死伤200余人。

1944年4月，日军动用千余兵力，分七路向“七独”惹姆山营地进攻，还出动飞机配合。抗日军避开正面作战，在敌人进攻的各条路上埋设地雷。起初日军大摇大摆，毫无戒备，结果，被炸得血肉横飞。抗日军同时采用阻击、偷袭等战术骚扰敌人，并在惹姆至甘马挽之间的森林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消灭日军数十人，夺枪20余支，俘虏敌军5人。战斗中，有一民兵亦空手俘获敌兵一人。当战斗结束时，抗日军吹号集合，日军误以为抗日军又要发起进攻，结果，从惹姆和从甘马挽二个不同方向赶来的敌军，都错把对方当成抗日军而互相开火，致使伤亡惨重。日军计划为期一个月的围剿，不到半个月便草草收场。此役日军死伤一百余人，包括击毙敌指挥官田岛大佐在内。

1945年2月发生在吉打新路的反击战，1945年8月发生在文律的反排华战斗，都是在敌人的进攻中，抗日军采取反击战术而取得较好战果的例子。

伏击战。1943年2月，日军数百人向“六独”牙拉顶根据地进攻。抗日军坚壁清野，严阵以待。次日，日军三百人行经本路港石山下抗日军第一道防线，不见动静，便继续前进，九时刚过，日军大队人马走到布劳（牙拉顶根据地中的一个小市场，有店铺二十来间）镇东妈娘庙后约百米处时，突然遭到抗日军的伏击，日军马上散开进行两翼包抄。由于敌强我弱，抗日军杀伤敌人后即分二路退却，另择有利地形埋伏。十时以后，日军搜索进山，在水利沟附近又陷入抗日军的伏击圈。一阵猛烈的火力过后，日军纷纷倒地，活着的想夺路逃走，不料又被埋伏在另一边的抗日军开枪射击。日军只得仓惶地拖着十几具尸体逃出山口，回到布劳镇住下。当晚，日军不断遭到抗日军的冷枪骚扰，闹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个日军在河边取水，又被抗日军射倒。迫使日军不敢再住，马上全线撤走。此役日军死伤40余人，包括一个名叫“上井”的军官。抗日军伤一人，缴枪十余支。

1945年2月，日军一巡逻队百余人，在离吉隆坡市区仅几英里的新街场地方进行搜索。抗日军侦知这一情况，采取“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战术，在敌军必经之路的一个叫咕腰的地方设伏。下午五时，敌先头部队30多人迈着疲惫和零乱的步伐，进入了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种枪支一齐开火，敌兵纷纷中弹倒地，没有中弹的则企图夺路逃走，但在敌军官的强迫命令下，又转过身来向前冲，立即又遭到抗日军的机枪扫射，几颗手榴弹也在敌群中开花。敌军因伤亡众多，只得向后退却。这时几个敌兵利用地形掩护，向抗日军机枪阵地爬来，企图夺取机枪，抗日军发起反击，经过肉搏，才把这几个敌兵消灭。抗日军同时绕过公路，截击来援之敌。敌人看见情况不妙，立刻率残部退走。此役毙伤敌34人，夺得枪械20余支。

一般说，伏击战是利用“打其无备”的情况，袭击运动中之敌，所以常常能收到较好的战果。譬如“五独”1943年在怡保郊区伏击日军特高科特务，1944年在玲珑遮薄甘榜伏击一队敌军；“三独”1943年在昔加末“八十格”地方伏击敌巡逻队；“一独”1944年在“那督坳”地方伏击日军巡逻队；“二独”1943年在简塘尾伏击敌军，以及

“七独”1944年在邦振(Panching)伏击敌运输火车等都是明显的例子。这种伏击战，各独立队都有不少成功战例，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

进攻战。1944年底，“二独”发起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及马来义勇军兵营的战斗，事先经过细致的侦察，集中优势兵力，先以一小队破坏交通电讯和封锁路口，然后兵分二路，以偷袭战术，同时进攻上述两个地点，使其不能互相呼应。战斗的目的，是为营救被关在警局的20多名政治犯，并夺取警局和义勇军的武器。由于计划周密，指挥统一，行动迅速，出敌不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夺枪80余支。

1945年5月13日，“三独”发起了“5·13战役”，对在柔北地区的17个警察局（一说是23个）同时发动进攻。除了在昔加末、巴罗和麻坡遇到抵抗外，其余基本上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里只介绍攻打昔加末的战斗。该地除有上百名警察外，还驻有一支日军警备队，人数有几十人。警备队驻在昔加末市政局后面一个叫水池山的小山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三独”的目的不在攻坚，而在占领警察局和夺取警察局里的军火库。警察局位于昔加末市内南北交通干线上，靠近火车站，离日军警备队约有半英里。

战斗任务由“三独”的两个中队联合执行。战斗一打响。战士们便勇猛地冲进警察局。那些警察不堪一击，只打了几枪，便纷纷缴械投降。恰好当时有一个日军警备队副队长也在警局内。抗日军令他投降，他却拔出指挥刀进行抵抗，当场被打死。另一个滞留在市内的日军伍长，亦被活捉。整个战斗只进行了十几分钟，抗日军便完全占领了警察局、火车站和邮电局。

激烈的战斗是在水池山下进行。日军警备队一听到警察局方面的枪声，便整队驰援。刚到山下，就遭到抗日军猛烈火力的阻击。日军一时摸不清情况，便退回山上固守。几分钟后，又冲下山来，但还是无法突破抗日军的火力网。日军于是改变策略，从左面发起冲击，不料又遭到猛烈火力的杀伤，不得已退了回去。最后改从两翼包抄，抗日军也转移阵地，同样以两翼反包抄敌人。就这样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日军始终无法冲下山来。直到警察局方面的抗日军完成了夺取军火库的任务后，才撤出了战斗。这次进攻仅昔加末一地，便打死打伤日军

十几人，包括一警备队副队长、一日军伍长（后来他企图夺枪被击毙），一个厚生科长和一个宣传队队长，缴获各种枪械200余支，弹药一大批。抗日军仅有一名战士腿部受伤。

关于抗日军的作战方法，仅列以上几种，以见一斑。不论什么作战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情报要准和及时。凡是情况把握准和及时的，一般都能成功，否则就有失败的危险，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方面，抗日军是有血的教训的，这里就不举例了。

四、除奸与收编群众自发武装

日军为了巩固其统治，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努力培植亲日势力，收买利诱一些没有民族气节和无知的人，为其利益服务。同时，残酷镇压所有抗日活动。这是日军统治手段的两个方面。

起初，日军为了收买笼络人心，针对各民族的不同情况，分别玩弄不同的政治花招。例如：召开各州苏丹的代表会议，让他们成立常设机构，同时，指使一个名叫依不拉欣·耶谷（Ibrahim Yacob）的民族主义者发起建立马来义勇军和由马来人组成的“兵补”，唆使印度人建立“印度独立同盟”和印度国民军，在各州建立“华侨协会”（或称维持会）和“欧亚混种人协会”等等。表面上日军好像很尊重各族人民的“意愿”，实际上，它是利用这些机构来协助执行其奴役人民的各项政策，为其统治利益服务。针对以上情况，抗日军和抗日组织的政策是揭露其欺骗宣传和政治伎俩，号召群众为各民族人民的真正利益和民族独立，与日本统治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当时由于对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更多的了解，对于如何进一步促进民族主义者的觉醒，争取他们站到共同的抗日战线上来；对于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的人，如何更好地揭露其真面目，清除他们的影响，使他们在群众中陷于孤立，却没有进行更多有效的工作。这不能不是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损失，也错过了一次推进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良机。对于“华侨协会”，情况稍有不同。除了揭露它是日军的统治工具之外，考虑到多数人是被迫加入的，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更多的是进行教

育和争取的工作。在这一方针指导之下，“华侨协会”中有不少人逐渐站到抗日运动这方面来，他们除了捐款、捐粮、捐助药品，支持抗日军外，有些还为掩护抗日军伤病员，提供日军活动情报做出了贡献。个别地方的“华侨协会”甚至成了“白皮红心”机构。这包括后来成立的“自警团”的情况也是如此。关于这点，各州都有不少生动的事例。对于那些忠实为日军服务、屡教不改，而且对抗日运动造成危害的人，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才会对他们采取措施，或加以警告，或加以罚款，即使如此，只要他们改变态度，或停止做坏事，也就既往不咎。只有极个别死心塌地，坚持与人民为敌到底，并给人民造成严重危害的人，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才会对他加以惩处。

日军除了扶植亲日势力，还收买一些坏人，包括抗日组织中的叛徒做他的走狗，以破坏抗日斗争，这些走狗或者带领日军进攻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杀害抗日群众，或者刺探抗日组织秘密，出卖抗日干部，或者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民心，或者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其中有些人是罪恶累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的。例如叛徒阿郑（黄雄奋）就是这样一个坏人。他原是第三独立队的一个干部，后来叛变投敌，马上带领日军搜捕抗日群众。在他的指认下，有十几个抗日群众被捕。这些群众，后来大部分被日军杀害了。他还带领敌人进攻抗日军，造成三十多个抗日军伤病员死亡。也有一些人虽然不是叛徒，但却是日军的忠实爪牙，他们杀害群众，鱼肉人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这种人各州都有一些。这是群众最为切齿痛恨的。

还有一种人，他也干了一些坏事，但不是一贯的干坏事，虽也有一些罪恶，但罪恶不是太严重。这种人，有的是为了贪图小利，有的是为了仗势欺人或其他不良动机。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在当时，都成了罪恶势力的一部分，成了日军统治人民的工具。

由于日军大肆收买坏人和不良分子做他的走狗，所以，沦陷初期，敌奸横行，特务气焰嚣张。为了跟日军作斗争，为了发动群众，保卫群众的利益，抗日军和抗日组织就非常有必要发起一个除奸运动。

对于除奸运动，抗日军和抗日组织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是在调查和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敌奸

加以严厉惩处，对那些不是一贯做坏事，尤其是罪恶不是那么严重的敌奸，则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壮大抗日力量，而且对于分化瓦解敌奸队伍，使日军陷于孤立是很有好处的。由于当时对敌斗争残酷和极端复杂的情况，由于群众所受的极大灾难和痛苦，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在个别地方、个别时候虽曾出现过对个别敌奸的处理不当的情况，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这绝不是事情的本质和主流，一经发现即及时纠正过来。

关于收编群众自发武装情况：

上文已谈过沦陷初期一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的情况。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了满足个人贪欲，而干起打家劫舍，危害人民的勾当，这类队伍，其成员大多数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第二类，有抗日的思想和要求，也有自发的抗日行动，其中有些人是因仇恨日军的暴行或躲避敌奸的迫害而迫上“梁山”的。这类队伍以工人居多，亦有个别学生；第三类，不抗日，却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干的是抢劫勾当，这类队伍有较严密的组织，其成员大都是原来的社会流氓，他们常以“华侨抗日军”的名义，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他们和第一类队伍最大的不同点。

沦陷初期，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活动最为活跃。有些凭借武力，向群众征粮、征款、勒索群众财物，公开抢劫，个别头头更是强奸妇女，强抢民女为妻，如有抗拒，往往遭到杀害。其中最猖狂的，几乎每晚都出动抢劫，给群众造成很大的灾难。例如，活动在柔北居銮、巴罗一带的以李桂庭、李有才为首的一股，曾在一个晚上洗劫了三合港街场上的所有店铺；活动在金马士以北一带的以李铭、封国柱为首的一股，除了把一个有上千人口的马来农村彻底洗劫之外，还将一个马来村长的女儿强奸后加以杀害，这股匪徒特别恶劣，他们常以马来同胞为迫害对象，给民族和睦和民族团结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又如活动在余文打一带的以李单为首的一股，除了洗劫之外，还强抢民女为妻，几个匪首，几乎每人都抢有少女作为泄欲的工具，在这类队伍活动的地方，群众很自然地迫切要求抗日军为民除害，保障他们性命和财产的安全。考虑到并没有发现这类队伍跟日军有勾结的行为，抗日

军从大局出发，对他们一般采取教育和收编的方针，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只有对少数顽固不化，继续为非作歹的才采用武力加以解决。

抗日军处理这类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彻底改编将其原来的队伍加以解散，成员都编到抗日军里，对第一类队伍大都采用这种形式；一种是照旧保持其队伍，抗日军只派少数干部进驻该队，加强政治工作，对第二类队伍包括一部分第一类队伍多采用这种形式；最后一种是订立合作抗日协议，规定双方都负有一定的义务。譬如：承诺互不伤害对方和在日军进攻时互相支持等，这是对第三类队伍包括少部分第一类队伍所采取的政策。实践结果，凡是真心想抗日的，这种收编都取得了成功，相反，即使收编到抗日军里，也难保其不在某种适宜条件下有叛变的危险。在这方面，抗日军是有教训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以李铭、封国柱为首的一股，经抗日军做了工作以后，同意被第三独立队收编为第六中队。李铭被委任为副中队长，“三独”派了鲁东担任党代表，李海山为中队长，另派了几位干部去加强领导。但是不久，李铭故态复萌，又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还无故杀人，并且把派去的鲁东等人统统拘禁起来。“三独”忍无可忍，终于在争取到从其内部分化出来的、以李卓、李桂叔侄为首的真正愿意抗日的人的协助下，派出队伍去把李铭和他的几个死党解决了，六中也予以解散，成员编到其他中队里去。

又如，在彭亨劳勿积罗山有一支以李洪森为首的队伍，在经过派人做了工作以后，1942年秋天，同意接受上彭人民抗日军的领导，共同抗日，初时被命名为第十八中队。“六独”成立以后，被改为第158中队。由“六独”派黄爱平任党代表，李洪森仍任中队长。但李洪森劣性不改，到处以抗日军名义，勒索群众财物，影响很坏，经过一再教育，仍不思改过。“六独”最后被迫派队伍进入该队营地，要求李洪森接受改编调动。李洪森的死党带头反抗，双方随即发生战斗，结果，有十多名匪徒当场被击毙，第158中队副中队长陈秀清等四名战士不幸牺牲，另两名战士负伤。事发时，李洪森恰好

带部分匪徒在外活动，得免一死。其残部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敢在西彭地区活动了。

有的队伍，即使人员收编在抗日军里，但在抗日军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候，部分品性恶劣的也有分化出去的情况。如在文律地区活动的“四独”第13中队，原收编有以林金水为首的7个成员，1942年底，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中队党代表陈振耀被捕叛变，初建的队伍受到了破坏。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林金水趁着中队大部分人马外出的时机，串通几个死党，把留守的中队副队长陈亚福杀死，把其他几个队员捆绑在大树林里，便拉队携枪逃走了。

一般来说，大多数自发武装队伍的成员，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抗日军的教育下，许多人都成了坚定的抗日战士。例如，上面提到的从李铭那里分化出来的李卓、李桂叔侄俩，就是其中的代表。李桂后来还成为抗日军的战斗英雄，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

在彭亨、霹雳、吉兰丹三州交界，位于吉兰丹境内的牙拉顶(Ulu Galas)山区，沦陷后不久便有三支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在活动，他们都打着“华侨抗日军”的旗号，人数从四、五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其中一批以冯成、刘旺为首的，其成员大都是工人和当地青年，他们是真心要抗日的。另一批以一个走江湖名叫高百乡为首的，表面也讲“抗日”，实际是以“抗日”名义向群众要钱要物；最后一批以蒋石波和一个外号叫“独眼龙”、真名叫杨广的人为首，成员大多数是亡命之徒，这类组织以土匪行径闻名。例如，沦陷初期在瓜毛生(Gua Musang在吉兰丹州)就有十多家胶园主被他们洗劫一空。有个叫古亚横的一家八口都惨遭杀害，只有最小的儿子逃得性命。1942年农历初二，蒋石波带领匪徒到石山下抢劫，当抢至黄金仙家时，遭黄氏兄弟拼死抵抗，蒋石波被打伤右手，被迫撤走。1943年3月，杨广带人到大谷畲村勒索，被组织起来自卫的武装乡民包围，击毙六、七人。他们惯用的手法是“箍头壳”，即用铁环紧箍人的头脑，再以木（竹）片敲逼，使人不堪痛苦而交出财物。他们常假借“华侨抗日军”的名义，其实以“抗日”之名，行土匪之实。群众对他们切齿痛恨。

1943年初，日军为巩固其统治，向牙拉顶山区发动进攻。冯成为抗拒日军，和西彭抗日军建立了联系。1943年1月，抗日军派出以张剑青为首的七人小组前往该地，结果冯成接受改编，成立了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又经过争取，蒋石波、杨广、高百乡也同意接受抗日军番号，叫做抗日军吉兰丹部队第二、第三分队。三方达成协议，愿意彼此合作，打退日军的进攻。但在1943年2月，日军进攻时，蒋石波、杨广却按兵不动，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高百乡则表面敷衍，并不积极配合，后来又带队全部溜走，只有冯成真心实意和群众一起，击退日军几次进攻，打死日军40多人，最后迫使日军撤走。事件中，蒋石波、杨广看到冯成部队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自己则十分孤立，从此便制造事端，与冯成发生摩擦。1943年8月，“六独”正式成立，冯成队伍改为“六独”牙拉顶分队，冯成仍任队长。1944年4月，牙拉顶划归“五独”领导，牙拉顶分队被编入“五独”第12中队。从此，蒋石波、杨广、高百乡等更与第12中队分道扬镳，从制造摩擦到制造血案。1944年4月，第12中队小队长孙增祥带领侦察班到本路港侦察，遭到杨广人马的袭击，腹部中弹牺牲。同年5月，蒋、杨背信弃义，率队偷袭第12中队营地，战斗中使杨获（原吉兰丹部队第2分队党代表）和一名小队长牺牲。后来第12中队发动全面反击，迫使蒋石波、杨广撤至槟榔畲，第12中队派刘旺为代表，前去谈判，竟遭杀害。“五独”忍无可忍，展开军事围剿，终于将蒋石波、杨广队伍击溃，并逐至泰马边境，成为流寇。高百乡的队伍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投向抗日军，一部分随高百乡流窜外地。后来，高百乡在“五独”追击蒋石波、杨广的战斗中，在吉兰丹河上游东岸一个不知名的小居民点被俘，畏罪自杀身死。冯成自接受抗日军领导后，始终表现很好，他战斗英勇，一直坚持斗争，坚持抗日，直到后来被捕出境，病逝于广州。

蒋石波、杨广率残部逃往泰马边境后，一直到1945年12月1日人民抗日军复员，才又回到宜力（Grik）、玲珑一带活动，并对抗日军复员战士进行报复。在峇眼色海（Bagan Serai）的瓜拉古楼（Kuala

Kurau)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杀害了抗日军复员战士陈惠民等2家共12口人！

五、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来源

战后，一些不知情的人士以为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来源，全由英国人提供。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实，英殖民当局在新加坡沦陷前夕提供给抗日军的武器，只有二百件左右。很明显，单凭这二百支枪，不仅谈不上武装全马八个独立队的近万名战士，更不可能仅凭这么一点武器，跟日军展开三年多的战斗。

不错，正如现在许多人所知道的，1945年5月以后，联军依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关于协议的内容，请参阅本书第五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东南亚联军的合作关系”），开始向抗日军空投武器，但空投的武器数量有多少，恐怕就不是很多人都清楚的了。这里不妨引用英国人自己提供的数字，根据1945年9月13日由及尔·戴维斯中校(Lt. Col. D. G. Gill Davis. 注意：不是负责跟抗日军联络的那个台维斯)在新加坡公布的136部队备忘录称：联军原计划向抗日军空投3,500件武器，后来因日军宣布投降，仅提供了2,000件。（见英国军管政府档案PSD/39）那么，抗日军复员时，英国人从抗日军那里又收到多少武器呢？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说是4,765件（见英国作家克拉特考特·李查特《1945—63新加坡和马来亚的革命和暴乱》一书），另一个数字是5,497件（见英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英军136部队》一文）。前者数字是根据抗日军复员时交给英军的武器得来的，后者的数字则没有注明出处。我们暂且以前者的数字为依据，那就是说；英国人从抗日军那里收回的武器较之它所提供的还多出2,765件。由此可见，认为抗日军的武器都由英国人提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顺便说一句，英群提供的数字也并非凭空臆断，因为参加抗日军复员的战士共有6,800人，这个人数和交出的武器数还是较为接近的。）

其实，抗日军在复员前，所拥有的武器远非4,765件，也不止5,497件。现在大家都知道，抗日军是分为公开队和秘密队的，公开队参加复员，秘密队在日军投降后开出城市不久便解散了，武器都收藏起来。根据公开队和秘密队合计总兵力计算，抗日军在复员前至少拥有8,000—8,700件武器，虽不能说绝对准确，但相信离事实不会太远。那么，在联军空投的2,000件武器之前，抗日军靠自己的力量已拥有6,000—7,000件武器。（例如：第七独立队在日军投降时拥有长短枪500余件，这些武器没有一件是从英军手上得来的。）这些武器是怎样来的呢？靠自己制造或从走私的渠道购买？答案是否定的。

先说第一种情况：自己制造。为了作战的需要，人民抗日军是拥有一些小型军械厂的。这类小型军械厂配备有简陋的维修工具如手摇磨床、铣床、台钳等，条件好些的还配备有车床和发电机。这类军械厂，各个独立队都有1—2处，但它实际上只能做些修补工作，或制造一些小零件和地雷等，限于设备和材料的缺乏，是没有能力从事武器制造的，更不要说批量生产了。因此，说抗日军的武器来源于自己制造的说法可以排除。

从走私的渠道购买？也没有可能。因为当时毗邻马来亚周围的地区都被日军占领，或在日军的势力范围内。加上战争期间，走私武器一被发现，就有性命危险。即使有人走私武器，按当时的情况，人民抗日军也没有财力购买。

那么人民抗日军是怎样拥有武器的？答案是：

第一，靠和日本军警的作战中获得。这是游击队获得武器的最主要来源。

第二，从英军遗弃的，从民间贡献的，包括从收编群众自发武装中获得武器。抗日军因为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即使当时抗日军在收集英军遗弃的枪械时有漏掉的，最后都由群众收集起来，献给抗日军。收编群众自发武装所得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民间贡献的一种。

第三，在日军投降前后，从个别日军手中获得武器。这种事各地都有。当时个别日军为求自保，或者把手中的武器交给抗日军，或者

打开军械库让抗日军去搬运，甚至有开车把武器送上门的。但这种情况为时很短暂，前后大概只有十天时间。

这就是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来源，尤其是第一，第二两种途径。因为武器来之不易，有些还是用性命换来的，所以人人养成爱护武器的习惯，把武器看得比性命还重要。

六、人民抗日军的政治教育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一支有理想、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每个成员都明白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这就是打倒日本法西斯，争取马来亚的民族解放。

抗日军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首先是来自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大家的生活经历不同，认识也有差别，为了步调一致，增强战斗力，部队从一开始，就把政治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政治教育是在求得政治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人民抗日军之所以能在日军的重重围困下，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不被打败而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坚持政治教育所产生的结果。

总结几年来的经验，人民抗日军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1、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抗日必胜信念。这在初期尤为重要。当时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和南洋各地，大肆吹嘘其所谓“赫赫战果”，编造种种“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看不见抗日斗争的前途，悲观失望，丧失斗志。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扫除这种错误认识，提高胜利信心，分析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日必胜”的道理，以及出路在什么地方，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战士们和困难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加强了团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般来说，对于为什么要抗日，许多人从自己切身的体验中是比较好理解 and 接受的，但对于打倒日本法西斯的最终目的为的是什么，就不一定人人都能自觉理解了。有些人有抗日的要求，却不一定有民

族解放的意识。部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提高战士们的民族解放觉悟。因为只有明白为什么而战，才能更好地去作战；明确树立为马来亚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目的，就能更自觉、更勇敢地去进行抗日斗争。提高政治觉悟当然不仅仅只包括民族解放觉悟这样一个内容，但民族解放觉悟却是当时提高政治觉悟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自从1943年3月马共发表了“抗日九大纲领”以后，把“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作为政治教育内容也就更明确、更具体了。从此，“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就成为人民抗日军的基本宗旨，也是抗日军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内容。

2、密切军民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人民抗日军来自人民，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帮助，抗日军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如何使每一个战士时时刻刻牢记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建立起军民鱼水关系，也是抗日军政治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这个要求下，决不允许任何人擅取群众一针一线，损坏群众一草一木，如有违反必受处分。为此，抗日军制订了四条纪律、十项注意^(注3)这些纪律的制订，除了有利于军事行动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建立军民鱼水关系。执行四条纪律、十项注意，是抗日军保护群众利益，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的最起码要求。在三年八个月的斗争中，有多少抗日军战士，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而英勇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为了解除对群众性命财产的威胁，而深入敌人据点，打狗除奸；为了保护群众免遭土匪和暴徒的蹂躏，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打退或制止了各种暴行……至于为群众治病，减轻群众的痛苦，协助调解纠纷，帮助群众组织起来保卫自己……更是不胜枚举。因为人民抗日

注3：人民抗日军四条纪律：

- | | |
|-----------|-----------|
| 一、绝对服从指挥， | 二、严守军事秘密， |
| 三、没收敌产归公， | 四、爱护群众利益。 |

十项注意：

- | | |
|----------|-----------|
| 一、态度要和霭， | 二、买卖要公平， |
| 三、借东西要还， | 四、损坏东西要赔， |
| 五、内务要整洁， | 六、肮脏要打扫， |
| 七、不打骂俘虏， | 八、不调戏妇女， |
| 九、大便上厕所， | 十、洗澡避女人。 |

军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自己是人民的子弟，所以才会有此民拥军、军爱民的动人情景。这是军民鱼水关系的最好体现，也是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之一。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人民抗日军建立军民鱼水关系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促进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和民族团结，特别是马、华、印三大民族的和睦相处和团结。抗日军从建军的第一天起就把这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和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后来，人民抗日军把红底左上角缀三颗金星（象征代表马华印三大民族）作为军旗的标志，更进一步体现了三大民族团结、战斗，和共同争取胜利的思想。沦陷期间，各地都有不少马、印族青年与抗日军战士并肩进行抗日斗争，特别是山地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参与和支持抗日斗争，就是一例。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的殖民统治，“分而治之”的政策，三大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等）和时代的局限，特别是由于内奸叛徒莱特的干扰和破坏，在建立更广泛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方面，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

3、官兵平等，团结友爱。这是处理抗日军内部关系的准则，也是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人民抗日军内部，只是工作分工的不同，在人格尊严和政治地位上是一律平等的。凡是要求士兵遵守纪律、服从指挥、爱护人民、保卫人民利益……官兵都要一样遵行；指挥员如果犯了错误同样要受到批评和处分，决不允许有什么例外。生活上，当官的更不能有特殊，大家吃同样的饭菜、睡同样的竹枝床（用山竹子编成），行军、战斗更是如此。除此之外，当官的有更多的义务关心士兵，听取士兵的意见和要求，帮助士兵解决各种困难，协助士兵提高文化和思想认识水平。当官的只要这样做了，士兵就会以加倍、十倍的热情尊敬他，执行他的命令，做好各项工作。这样，部队的凝聚力就会大大加强，战斗力就会大大提高，这样的部队是不容易被敌人打垮的。

以上是人民抗日军政治教育任务最主要的几点。此外，还有如国内外形势、共产党的领导、铁的纪律、军事训练和军事技术、马来亚抗日的前途等等，都是政治教育所涉及的内容。其目的就在于把抗日军培养成一支有政治觉悟的、能密切联系群众的、有严明纪律和团结战斗的队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抗日军采取了种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和方法：如每月举行1—2次讨论会，讨论各种政治时事问题。在这种讨论会上，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言和提出各种问题。每周举行一次生活检讨会，对生活上存在的问题，进行诚意的相互批评和检讨。组织歌咏队、识字班、各种文化娱乐小组等，经常进行交流或者联欢。在有条件的时候，也举行军民联欢会，这不但受到群众的欢迎，对部队也是一种教育和鼓舞。或根据各人爱好，组织打篮球、跳高、赛跑，甚至举行运动会。或出版墙报，进行自我教育……。除此之外，各独立队还根据需求和可能，举办短期干部训练班，抽调骨干进行系统的轮训……，所有这些，对于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密切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加深彼此的了解，提高干部战士认识水平和觉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功绩和历史地位

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现在60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当时的情况。虽然人民抗日军存在的时间不足四年，但它对马来亚人民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尽管战后有人出于种种动机，想尽千方百计企图歪曲它，诬蔑它，甚至想否认它的存在，但历史将会证明这种企图是不会得逞的。从广义来说，否定人民抗日军，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马来亚各族人民对抗战所做出的贡献，人民是不会允许的。当法西斯侵略者入侵的时候，马来亚人民没有逃避，更没有屈服投降，而是挺起胸膛，面对敌人的屠刀，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这就是马来亚人民的浩气，这就是马来亚人民的反抗精神，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在马来亚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这是一。

第二，人民抗日军的建立，开创了马来亚历史上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武装，为保卫人民利益，反抗外来侵略，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并在国际条件的配合下取得胜利的历史。马来亚人民是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的，例如发生在19世纪末的霹雳战争、彭亨战争、森美兰战争，以及爆发在雪兰莪的反英起义，这些战争，揭开了马来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新篇章，是正义的。但是，由于这些反抗或者是由

封建贵族所领导，或者是缺乏革命的政党作核心和明确的政治纲领，最后都失败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则不同，它是第一次真正由人民自己掌握、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民武装，仅从这一点来说，它在马来亚的历史上就是空前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种种原因，在日本投降后没有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但从此之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奴役和宰割马来亚的人民了。马来亚最终在1957年取得独立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统治，牵制了日军在马的七万兵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抗日军的存在，日军掠夺马来亚资源的企图受到沉重的打击。为了巩固其统治和镇压马来亚人民的反抗，它不得不在马来亚保持一定的军力。一般维持在七至八万人之间。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八个月的斗争中，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日军作战340多次，（其中一百多次是主动进攻，十多次是反击敌人大规模围剿）毙伤敌5,500余人。抗日军本身也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见《大战与南侨》第30页“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记”）

最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存在和发展，抗日九大纲领的提出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提高了人民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战后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除了国际因素之外，不能不看到这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三年多武装斗争所引发和影响的结果。

总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三年八个月的武装斗争，就是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就是依靠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首先是马、华、印三大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就是马来亚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拥有武装，为保卫人民自己的利益，进行有组织抵抗的战争。

这就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功绩和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所应作出的公正评价。

第四章 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马来亚抗日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其特点是：军民一体，血肉相连，生死与共，互相支持，协同作战。特别是在人民抗日军没有稳定根据地这一特定的条件下，这种不可分离的军民鱼水关系，就更加显示出其重要性。

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疯狂入侵，及其对马来亚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武装抗日成为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和自觉行动。而人民抗日军不但要依靠人民来求得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利益而战，因而必然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大力的支持。在广阔的抗日游击区，除了有一支人数逾万的人民抗日军武装部队外，尚有数十万有组织的抗日群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半武装组织的抗日后备队员），作为人民抗日军的坚强后盾，形成一条广泛的抗日战线，他们不但在粮食、物资、药品等方面给以部队最大的支持，而且在军事行动上，与抗日军密切配合，提供情报，参加或配合作战，救护、医治部队伤病员，掩护部队安全转移，源源不断地为部队输送新的兵源等等，从而保证了人民抗日军在敌人的反复围剿、进攻中，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得以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去战胜敌人。在这一条广泛的抗日战线上，军是民、民亦军，鱼水相依，驻马数万日军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穿着军装的上万抗日军人，而且是数十万有组织和半武装的抗日军民，就更加显得力不从心，疲于奔命。这就是人民抗日军战斗力的源泉，是人民抗日军胜利之本。

毫无疑问，只有人民才是马来亚这场抗日游击战争的真正主角。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战争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华人为主组成，华人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广阔的华人农村成了抗日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游击区，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马来亚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所造成的。三、四十年代，在马来亚人口中华人的比例很大，约占43%，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在前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下，华人和各族人民一样，政治上受欺凌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压榨，具有反帝、反殖的优良传统。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早已引起新、马广大华人的义愤，他们既拥护中国的对日抗战，更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抗日战争期间，群众踊跃参加抗日军打日本的事例，比比皆是，涌现出很多激动人心和可歌可泣的事例。如雪兰莪州武来岸埠有一家群众四兄弟——连奇、亚球、鄢来、亚光，都一齐参加人民抗日军，家里是部队的交通站；还有一家罗勒（罗秋炳）兄弟三人均先后参加部队，母亲（叶婶）是地方抗日组织与部队联络的交通员，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穿梭来往于敌占区，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北区古毛埠的雷英、观锡、阿竹等三户人家，也是全家一齐参加抗日军，家里是地方抗日组织的交通站，在1944年夏季的一次日军大围剿中，三家人的房屋同时被日军烧毁，观锡的父亲被日军逮捕后杀害，阿竹的哥哥被捕坐牢牺牲，雷英的妹妹被日兵强奸致死，二弟被捕受酷刑以致重伤，医治无效，于日本投降后逝世。“二独”新队副队长斯科（肖克科）一家八人，除父母外都参加了抗日军，三弟肖运先、四弟肖云华在战争中牺牲，妻子陈秋蓉被捕坐牢三年，受尽酷刑，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出来，因伤致残。其父母支持抗日军，在日军扫荡时房屋被焚毁，其父被迫投河自尽，母亲亦遭迫害而病逝。吉打州美农埠的郑金利几兄弟都参加了抗日军或地方抗日工作，并先后英勇献身。彭亨州文德甲三英里客家村，在一次动员参军的群众大会上，有一位名叫梁雪梅的中年妇女，当场鼓励她的独生女儿卢兰花报名参加人民抗日军，并为女儿准备戎装，送女上队。以后，她还与其丈夫卢江分工负

责村里的抗日组织工作，卢江专职搞好粮食生产，支援部队，而梁雪梅本人则隔天便到文德甲镇一趟，了解日军活动情况，并代部队购买所需物品。当时文德甲驻扎有日军警备队，日本奸细在市内活动猖狂，她随时都有遭到逮捕和被杀害的危险，但梁雪梅却置生死于度外，坚持为抗日而工作，被当地群众誉为“革命母亲”。

人民群众在参加抗日战争的过程，必需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这个时期的抗日群众组织计有：抗日同盟会（简称“抗盟”，有些地区称为抗日联合会或抗日总会，名称不同，实质一样）、抗日后备队（或叫抗日自卫队，是群众半武装组织）、抗日别动队、流动队、锄奸队、抗日妇女会、儿童团等等。这些抗日群众组织，都是在马共地方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其成员遍布华人农村和中、小城镇，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给了日本占领军以沉重的打击。

除了广大华人以外，马、印两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由于觉悟程度的差异，虽然不像华族人民那样踊跃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初期对人民抗日军普遍持中立、同情的态度，后来同样是不满日本的统治，有部分人也直接投身抗日的行列，与华族人民并肩作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马来族人民逐渐看清日军残暴侵略本质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假谎言以后，部分人也陆续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和其他抗日活动。“六独”一六四中队曾经建立了一个马来人小队。加央马来青年小组协助吉北人民抗日军驱赶一股华人土匪团伙。1945年，从吉打到柔佛，参加抗日后备队的马来青年约有百余人。1945年1月，北马“疋各周”地区，有100多名马来青年，组成马来抗日游击队，后来受日军进攻冲散，其中80多人仍然集中整训，准备配合联军反攻，坚持到日本投降以后才复员。

印族人民因受波斯领导的国民军的影响，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要争取印度的独立，必须和日军合作反英，因而对抗日表现中立，未能单独组成抗日游击队。但仍有不少头脑清醒者，参加各地的人民抗日军或参加抗日活动。如“一独”、“五独”及其他一些独立队，就曾

有一些印度籍战士。参加抗日军的印族青年，作战表现都很英勇。“一独”模范中队的风机枪（重机枪）手印度籍战士金水，在顿巴央反围攻伏击战中，射击既准且狠，杀敌成绩最为显著。

原始森林的土著民族秉性正直，忠诚勤劳勇敢，他们纯朴的信仰是：“人是应该平等的”。在其部落生活中，分配生活物资，男女老幼一律平等。因此，他们对日军的凶残暴行，自然会深恶痛绝。在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各地山区，土著民族在粮食供应，巡逻放哨，交通传讯，营地住宿等方面，都给人民抗日军大力支持。1943年“二独”司令部遭日军围攻，撤退到原始森林土著民族的村落，由土著民族提供粮食，并带路选择营地。“六独”有两位土著民族交通员，名叫乌巴和亚水，负责开辟山路交通线，并常为部队猎取野兽改善生活，有时猎物较多，还制成肉干分送给各个部队。上彭的土著民族部落，都是部队的交通站和临时宿营地，土著民族把抗日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军民关系非常融洽。1942年底，日军围攻“五独”第四中队，在外围放哨的土着村民，迅速绕道通知抗日军，使四中能在伏击中消灭日军10余人。他们开辟山路数百英里，由阿均带引抗日军从霹雳到吉兰丹合击土匪，阿均后来坚决要求参加抗日军，终于被接纳。另一位土著民族的英雄人物阿央，被日军逮捕，受尽毒打酷刑，宁死不肯供出抗日军行踪，被囚禁两个月才乘隙逃回。“三独”还组织了一支纯粹由山地土著民族参加的小队。“五独”的长途运输，也多是由土著民族协助的。

二、大力支援人民抗日军

各民族和各界人民对人民抗日军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包括捐助粮食、药品和现金，协助锄奸，惩治败类和叛徒，提供日军和警探动态等情报，掩护抗日军工作人员和伤病员，输送新战士参军等等。人民抗日军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人民群众孕育自己的武装队伍，像爱护自己的亲人一样，竭尽全力来帮助抗日军，并为此受到日本军警的逮捕、杀害，房屋被烧，蒙受重大牺牲和财产损失。

1、捐助物资及经济。人民抗日军的粮食，90%以上依靠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供应，其中华族农民提供的占最大比重。很多农民省衣俭食节约粮食支援抗日武装部队，多数交由交通站民运工作者收集后，分段分批运送到部队驻地附近，才由战士下山驮背上营地。部分粮食是用群众捐助的现金在农村圩镇购买。药品、日用品大部分也由民运人员购买。抗日同情捐一般是逐月缴交。1943年11月在新山区农村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当场就捐献千余元现金和一批药品。每逢铲除重要日探和败类，群众解除心中恨，最外围的交通站就会收到不少粮食和猪肉、鸡鸭等副食品，既是慰问，也是鞭策。雪兰莪有些群众绕道回避日本军警的检查关卡，肩挑背负粮食，跋涉十几公里送交人民抗日军，协助解决了两个中队因受进攻而遭到的粮食困难。华玲日本粮仓管理员，制造“半途被劫”的假象欺骗日军，将3卡车大米，在半途公路边交给抗日军组织的各族群众搬走。士乃抗日会青年组成“飞车队”，多次将行驶火车的货车厢门打开，将粮食、副食品甚至整箱手榴弹掀下路旁，由抗日会组织群众运走。日军罐头厂工人将大量海鱼输出供给抗日军。和平港抗日会组织群众煮晒海盐，运送给抗日部队。柔佛一些群众甚至给前线正在作战中的抗日军送上饮食。雪兰莪、柔佛、彭亨各地建成十几个集体农场，既供场员食用，又大量支持抗日部队。彭亨立卑榴梿港有一位姓黄的华人（广西籍），自己开芭种粮食，在抗盟会亚福（颜天迎）的发动下，一次就捐赠60袋（面粉袋）粮食。

土著民族对抗日军的粮食支援一贯很慷慨，“五独”第四中队在受日军围困期间，90%的食物依靠土著民族支援木薯、地瓜叶等度过难关。1944年下半年以后，部分马来农民看清人民抗日军全心全意打击日本、保护人民的实际行为，开始捐赠粮食给抗日部队，吉打牛英村由马来村长带头收集粮食交给民运人员运走，森美兰简塘尾马来村也出售大量粮食给“二独”，板底、兰那港、冷甲、山香港等地都有马来群众向抗日部队捐赠粮食。

沦陷期间，市面药品不多。抗日军生活艰苦，缺衣少食，多吃野菜山果，病人增多，伤员不少，主要是依靠群众冒险输送药品和协助治疗。新山日军医院的护士和工人，不断从医院偷出药品暗中送给抗

日部队。不少城镇商人和中小资本家，也捐助各类成药、酏粉剂和棉花绷带。各地都有一些医生，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部队伤病员免费治疗。武来岸印度医生索多甘(Doctor Kam)在两年间为“一独”八中数十伤病员义务医治。古毛万春堂老板张宝臣，长期义务捐赠和帮助抗日军购买药品医治伤病员，被暗藏败类告密，为宪兵逮捕杀害。天吉港、美罗、惹姆山等抗日军驻地的中医、西医和草药医生，都是来自乡镇的抗日群众。

各地抗日游击队成立初期，武器的主要来源，是同情抗日的群众所捡拾的败退英军丢弃的武器，或是捐献家藏猎枪，少数是用募集的同情捐，向群众购得。由群众收集和捐献的步枪、猎枪和少数手提机关枪，总数约800余支。牙拉顶抗击进犯日军时，群众不但捐献猎枪、连几代收藏下来的土炮都推出给抗日军助战。各地所办抗日刊物的出版用具和纸张，很难购买，部分由商店捐赠，部分靠日机空袭时群众从外国洋行的仓库里搬运出来，供报社使用。

群众提供大量的物资和经济支持，丝毫没有希图得到补偿或报酬，唯一的愿望是打败日本法西斯。很多群众遇难临被日军杀害时，迸发出充满仇恨的最响亮口号，也是“打倒日本法西斯”！

2、协助锄奸及提供情报。各州锄奸活动，消灭日本宪兵部和警备队的暗探线人，以及作恶多端的民族败类和叛徒，主要是由抗日武装部队派出锄奸组（别动队）执行任务。部分是由抗盟会或地方抗日组织建立的别动队动手处决，有时是由两者联合行动。不论如何执行任务，情报来源都是依靠地方群众组织派人调查、侦察和配合。

“一独”二十九中队依靠群众提供准确详细的情报，才能清除在吉磷山边伪装设厂造纸的十几个日军便衣侦察员。1943年3月在隆邦路上咖啡店顺利消灭凶恶叛徒廖奕林等4人，也是端赖群众组织所提供的准确情报。吉打锄奸组在美农闹市，在警备队和警察的眼皮下，击毙凶狠残暴的日探组长李亚狗父子，就是依靠一个毫无组织关系的老伯，以又惊又喜的心情，向素未谋面的锄奸组员，非常仔细地介绍李亚狗等活动地点、时间和有关情况，而获得成功的。在吉隆坡半山芭枪毙大汉奸黄铁珊，是由参加抗盟的一个菜市卖鱼青年提供情报和现场指

点。在雪州清剿怙恶不悛的青龙山匪徒，是由抗日群众先在匪帮中进行分化工作，以削弱匪帮的战斗力的，然后取得成功的。

1945年“二独”在芙蓉沙都律消灭大叛徒亚铁、暗探李彦章等人，除亚铁受伤未死外，其余全部被消灭，缴获了几支短枪。抗日军能顺利消灭这些叛徒、走狗，是通过当地的抗日群众组织，事先争取了暗探黄涛做内应，假借宴会的名义宴请那些叛徒、走狗，抗日军战士化装成群众潜伏在外面，趁他们酩酊大醉时，冲入宴会厅突然袭击。

1943年4月，“五独”一中组织敢死队在怡保市郊袭击日本特高科便衣队7人，也是由地方别动队协作行动。“一独”模范中队锄奸队在间津、甲洞、文良港一带的锄奸活动，基本上是在地方武工队配合下进行的。

安顺、美罗地区消灭为虎作伥的汉奸保长，捕捉和处决日本暗探和奸细，都是由地方别动队执行。吉隆坡近郊有4个地方抗日别动队，在鹅麦消灭叛徒陈观龙兄弟，在间津枪毙叛徒记才，在暗邦百六间伏击今野宣传队队长，都产生较大影响。华玲牛英村的马来村长，放出大办喜事筵席的虚假空气，引诱警备队暗探阿歪自投罗网，由锄奸队加以处决。

各地人民抗日军的军事行动，对日军据点和警察局的进攻，粉碎日军的围剿，群众情报网都起决定战役胜负的耳目作用。“三独”“五·一三”战役进攻17所警察局（另一说是23所），天吉港反围攻战，布劳镇伏击战等等重大战役，群众情报工作都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情报的传送，主要依靠爬山越水奔跑面告。不少群众和交通员因此在途中或事后被日本军警捕杀，每份情报都沁透广大人民力争击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3、输送武装战士和掩护抗日人员。在粮食供给困难，日军连续进攻的时刻，还有一批批新战士相继参加部队，使抗日军不断发展壮大，主要依靠抗日同盟会等群众组织，持续选送经过挑选甄别的抗日青年参加武装部队。多数是先参加抗日后备队、自卫队，然后从中择优选送。“一独”的武装队员当中，400多人来自抗盟所选送，新队队员有500余人从后备队、自卫队调配。城镇青年要求参加抗日部队，也是经

由抗盟等群众组织或可靠人士介绍。抗日青年都以能获选送上部队为光荣，所以新战士的抗日积极性普遍很高。玻璃市州苏丹就以侄儿皇碑能得参加抗日斗争，看作是为王室增添光彩。

群众对抗日人员的掩护是多方面的。一些外派锄奸队员和地方抗日工作人员，大都靠群众用“雇工”、“土产收购商”等等名义，给予寄宿，倍加掩护和照顾。

群众对抗日军伤病员的掩护和帮助医疗诊治，是出于内心的同情和爱护，也是高尚的人道主义体现。马共雪兰莪州地委书记杨果病重时，由群众掩护在家医治，这家人冒的是杀头、烧屋的危险。“一独”的伤病战士，由群众在野外林中，搭棚收容，请医生治疗，三餐秘密送饮食，轮流放岗哨。当日军进攻时，群众背负着重病号协助转移。

“一独”有一名病重的女政工干部，由梁氏几姊妹轮流背负，走了20几公里山林小路，送至安全地点疗养。模范中队有几个病号，更是在马来农村由马来族人民掩护寄宿医病。“二独”队长马丁，1942年2月中旬发大热症，由当地抗日群众组织护送至冷宜附近一家由印度人管理的橡胶园治病，不料碰上日军在马口至冷宜一带进行检证、大屠杀（共杀了千多人），几十名日兵来到该胶园入屋搜查，将屋内30多名华工驱赶出门前空地。当时马丁高烧至昏昏沉沉不能走路，日兵见他病得不省人事，用枪托推了他几下便走出门前，叫那些华工列队逐个查问：有无参加共产党？有无外来游击队？同时叫他们脱下上衣，作出准备刺杀的姿势。那些华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知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后来找到那位印度经理查问，也说本园没有外人，这些华人都是做了很久的老工人。一位日本军官要他担保，他毅然答应。结果日军找不到借口下毒手，马丁和30多位华工获救。待日军离开后，印度经理才吩咐华工把马丁抬到胶园山后治疗。各州群众对抗日武装人员的救治，情况大同小异，不少是当作亲生儿女，掩护在家里治疗。

群众对人民抗日军的支持，无微不至，甚至超越了军队后勤部门的作用，这是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显著特色。

三、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工作蓬勃开展

对各族人民广泛宣传反对日军侵略，揭露日军残暴罪行，介绍国际反对德、意、日侵略同盟战争形势，以提高和加强群众反对日军侵略的信心与决心，主要是依靠各地抗日群众组织进行的。这些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工作，比较长期持续的，是各州出版的秘密小报。这些小报多数由马共地方组织领导，少数由抗日军组织编印，但是大量的编写、印刷和散发工作，则由有组织的群众按不同的地区、路线分头进行，互相保密，单线联系。抗日小报多是八开纸，钢板腊纸油印，不定期出版。印好的小报，交通员走山路传送，走公路的是装于自行车钢管内，菜篓底，米袋内，远的送往近百公里以外，交由地方群众组织散发传阅，并秘密分派给城乡同情抗日的群众。这些抗日小报，成为当时群众的最主要精神粮食，一张小报往往经上百人传阅，影响面很广。各州的主要抗日小报先后出版有317种，部分出版时间不长就被敌人破坏。计有：

新加坡：《自由报》中文版，《解放报》中文、英文版。

柔 南：《群众报》中文，《打日本》中文、英文、马来文，《抗建报》中文，《胜利呼声》英文。

柔 北：《抗日新闻》中文、马来文，《大众报》中文。

森美兰：《大众报》中文。

雪兰莪：《抗日先锋报》中文，《人民抗日报》中文，《民主呼声》英文，《解放报》中文，《自由报》印文、马来文，《抗日新闻》马来文。

东彭亨：《民意报》中文、英文、马来文。

西彭亨：《人民报》中文，《抗日新闻》英文、马来文、印度文，《游击报》（后改为《革命军人》）中文。

霹 雳：《人道报》中文，《光明报》中文，《马来亚之声》英文，《人民呼声》马来文，《自由呼声》印文。

吉 打：《活路报》中文、马来文，《先锋报》中文，《爱国报》中文。

檳城：《真理报》中文，《公道报》中文，《真报》（初名《光明》）中文。

各地有时还印发中、英、印、马来文的传单，如公布被消灭重要敌探或民族败类的严重罪行，揭发日本侵略者制造排华阴谋等等。各民族觉醒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雪兰莪的《自由报》分别由印族的马林、阿亮编译印文版，由马来族阿勇编译马来文版，三人又合编英文版《民主呼声》。东彭亨的英文版《民意报》，由日本南侵时避入山林中的英国妇女白娜编辑。西彭亨的马来文版《抗日新闻》由雪兰莪巴生苏丹的弟弟亚荣（华文名）编印。吉打马来文版《活路报》是由印族青年辛格协助编印。

各地抗日同盟会或部队分别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开展宣传工作。“六独”的战士在马来族抗日青年带领下，到马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七独”和抗日群众联合组织琼剧宣传队。“四独”还组织有马来战士参加的武装宣传队。其他各州都有由群众组织分别成立的文艺宣传队。沦陷时期群众文娱生活单调贫乏，歌舞剧团宣传队在人民抗日军保卫下，在农村、胶林演出，很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在吉东日落湾、东彭兴隆火锯厂林场等地区演出后，且有日宪线人主动向宣传队表态认错，表示此后愿为抗日工作效劳。

更多的经常性的宣传工作，是由与群众劳动生活在一起的民运人员逐家逐户以谈天的方式进行，群众的同情捐和捐赠物资，也是靠他们收集以后逐级上缴给武装部队。民运人员绝大部分是没有参加政党的抗日人士。传播最广，深入千家万户，越传越生动，影响最大的是抗日群众的口头宣传。新路反击战的胜利，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全吉打。群众的宣传活动，反映出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显示出广大群众与抗日军同心同德、苦乐相连的亲密关系。

四、各阶层联合共同抗日

抗日群众组织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孤立日本侵略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

对中上层的团结工作，一开始就受到各级抗日群众组织的充分注意。部分华族资本家，被迫当上维持会（华侨协会）会长，既怕得罪日本侵略者，又怀有民族受难的内疚意识，抗盟通过会长的平时好友和打进协会工作的人员，加以说服劝解，使知知港、文德甲、芙蓉、马口、淡边、双溪大年等30几个华侨协会（维持会）会长，秘密参加抗盟或暗中捐助粮食、药品和现金给人民抗日军，通报有关日军动态、日军调动、宪警活动等情报。吉打州华侨协会或维持会会长还将藏在辗米厂中的短波收音机提供给抗日报社收录新闻，将协会作为抗日小报转运站。士乃维持会会长等5个老板，捐助粮食药品和副食品。雪州《抗日先锋报》是在一位资本家的别墅中收听新闻和编写印刷的。茹嫩(Junun)华侨协会会长通过警备队长妻子（华人）的关系进行劝导，使警备队的镇压矛头转向盗抢案件，全区抗日工作人员无人被杀害。

联合各民族人民的工作，相对地比较逊色，但也争取到不少马来族知识分子和马来村长，对抗日工作给予不少支持。彭亨、柔佛、雪兰莪、吉打各地由马来族知识青年参加的宣传队，在团结马来农村的群众支持抗日活动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各地森林土著民族对抗日部队的大力支持，是一批民族工作者深入其部落宣传，最后以杀鸡为盟的形式，将联合抗日的关系固定下来。

对于不满侵略战争的日本统治机构工作人员，以及被迫参加镇压群众的一些警察与侦探，抗日群众组织运用各种不同途径和方法，加以争取，化敌为友，促使其为抗日斗争服务。较大量的争取对象是马来籍警察。武来岸警察局40名警察，自称是为吃饭才当警察的，经过当地抗日群众做通其思想，由抗日军假装战斗场面，收缴了其全部武器。柔南笨珍27碑警察局30名警察，经马来村长说服，将24支步枪全部交由抗日军和平收缴，然后回到农村务农。上彭直凉警察局的警长经过抗盟会的教育和争取，答应作内应，当抗日军进攻时，下令警察投降。吉打监狱的马来籍狱卒阿末，将被捕人员的情况通知抗日工作人员，抗日组织据此及时采取措施，从而减小损失和牺牲。争取暗探的工作，一般都是通过其亲属和亲密朋友进行，危险性较小，效果却较好。阿罗斯打警察局的10名暗探，经其抗日友人劝说，宁愿受拘禁

和罚款，长期不和抗日人员作对。芙蓉市个别暗探，还作锄奸队的内应，消灭叛徒和暗探头子。各地区维持会所属自警团，由华族青壮年被迫组成，手执木棍轮流在路口放哨，在抗日组织影响下，很多成为向抗日人员通风报信的耳目。吉打日商真锡武之，不满侵略战争使他远离娇妻幼儿，抗日群众使用华侨协会名义，促他协助担保一些被捕无辜群众及尚未暴露身份的抗日人员。

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对人民抗日军的武装斗争，产生非常重要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为马来亚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第五章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东南亚联军的合作关系

一、合作的初始阶段

在南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驻防新加坡的少数军官，根据日本不断加强南中国海海军力量；并向法国维希傀儡政权施加压力，驻军印度支那；使用威慑、利诱两手交替手法，强使泰国銮披汶政权签订日泰协议等迹象，已感日本侵略阴影逐渐逼近。在古泛罗上校(Basil Goodfellow)、台维斯上尉(John Davis)、布伦米上尉(Richard Broome)主持下，制订马来亚别动队计划，于1941年5月间在新加坡裕廊区(Jurong)设立“101特别训练学校”(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101 S.T.S)。然而，由于英国远东军总部盲目自信防务实力，过低估计日军侵略能量，所以对此并不重视，缺乏支持，形同虚设。

马共与英方达成共同抗日协议以后，12月20日开始就从新加坡、霹雳、雪兰莪、柔佛前后4批派送165名马共党员参加101特别训练学校学习。但因战局急转直下，加上英方本来就缺乏诚意，每批学员仅进行7-10天的学习，便仓促“结业”，随即被派往敌后单独作战。除上述人员外，马共还先后派出15名骨干到吉隆坡、25名骨干到柔佛州的居銮，参加英军所办的军事情报训练班，也是学习了10天便告结束，结果他们都和101学校的第一、第三批学员一起，回到内地参加各地的抗日游击队。

101学校4批学员，分别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南北地区和当地马共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结合，在组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独立队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骨干作用。这些州的抗日游击队，由此得到充实和加强。上述4个独立队早于4批学员到达之前，已经分别组织抗日游击队。除了以上四个独立队外，其他独立队，并无101学校学员参与。

第五独立队于1941年12月下旬就在霹雳朱毛和仕林河地区，分别建立抗日游击队；第六独立队于1942年4月，也已建成2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第七独立队不仅没有101学校学员参加，在1942年2月组成抗日部队，甚至从未得到联军空降武器支持；第八独立队前身，是战火刚在新加坡燃烧时，已在吉打中部和北部分别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不仅没有101学校学员参加，也未得到联军帮助军训。

新、马沦陷后，英军一些人员来不及撤退，流落各地山林，部分先后向日军或警察局投降，或被搜捕或被击毙，部分在群众的秘密掩护和指引下，终于找到人民抗日军，由抗日军给予收容照顾。其中少数英军尚能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和战斗。“二独”收容的炮兵亚影（苏格兰人），在部队三年多，能坚持艰苦生活，与战士共同生活战斗，以后转到“六独”，在日本投降前夕病逝。东彭亨林明矿场总经理白克和妹妹白娜，1942年初就为第七独立队所收容，白克熬不住山林艰苦生活，不幸病逝。白娜参加抗日小报《民意报》英文版的编写出版工作，她和抗日军战士关系颇为融洽。曾由第二独立队收容的英军第60炮排排长、澳洲籍人舍菲尔德(Shepherd)和野战部队小队长罗耶(Royah)，这两个性格开朗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和抗日军战士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

当时流落在霹雳州仕林河的原101学校教务长查普曼上校(F.S. Chapman)，也是靠当地游击队的收容，并护送他到雪兰莪州的第一独立队营地，后因日军频繁进攻，安全没有保障，又由“一独”派人护送他到西彭亨加叻路12碑板厂，西彭抗日军获悉，派人将他接到人民抗日军营地，给予特殊照顾。直至1943年5月东南亚联军第一批联络员在霹雳州西海岸登陆后，西彭亨人民抗日军再将他护送到霹雳州的美罗，与联军第一批联络员汇合，并与东南亚联军总部恢复了电讯联系。

在这一期间，人民抗日军并未曾与联军正式签订合作抗日的任何协议，也未曾获得联军的任何军事援助，但出于联合抗日的良好愿望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将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共同抗日的患难士兵区别对待，对流落马来亚的英军散兵，竭尽所能加以保护。这种举动使被收容的英军人员深受感动。查普曼和布伦米等人对于人民抗日军优待流

散英军的情景，有着深刻的印象和切身体会，战后他们回忆这段经历时不能不承认：转移营地时，患病的英军由抗日军战士抬运；较好的食物（鸡蛋、鱼肉）留给英军官和患病兵士吃食，人民抗日军指战员则吃木薯、野菜。他们感慨地说：“我们赖他们为生”，“如果没有人民抗日军的照顾，是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

英国军官奎利（Quayle）坦率说，他对游击队的待遇非常赞赏，他能生存下来，全归功于游击队的照顾和尽量给予的帮助。

可是，由于荒山丛林中，营养缺乏，疾病侵袭，医药困难，平时养尊处优的英军官兵，无法适应，所以病亡颇多。全马各地人民抗日军前后收容的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军官士兵合计70余人，大部分患病逝世，坚持到日本投降时幸存的，只有数人。

在1943年5月，联军东南亚总部发出了军事行动“Gustavus I”号命令，由台维斯上尉率领5人（其中华籍4人，于5月11日乘坐陈旧而且小的荷兰024号潜艇离开哥伦坡，24日夜8时到达霹雳州邦咯岛（P.Pangkor）以南，天定（Dinding）以北靠近昔加里山的地区冒险登陆，几经转折，台维斯终于会晤马共霹靂地委负责人，台维斯带来了联军东南亚总部的委任状，表示希望与马来亚共产党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合作抗日的意愿。双方基于共同抗日的强烈愿望，立即决定了加强联系的方法。随后由地方抗日组织将台维斯等人带往美罗山区抗日军营地，派出精悍武装分队，加强护卫。此后，人民抗日军才开始正式与联军东南亚总部建立了电讯的联系。

二、马共暨人民抗日军与联军签订合作抗日协议的经过

1943年11月2日，联军联络员林谋盛乘潜艇在峇眼那督（Bagan Datoh）登陆，同样由人民抗日军派人接应，带领到美罗（Bidor）山区营地和台维斯等会合。经过先遣人员用无线电和在印度的联军总部联系，按照总部的指示，查普曼、台维斯、布伦米、林谋盛四人作为联军方面代表，于12月30日与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会的代表张红（莱特）、陈平，在美罗山区白兰丹

(Blantan) 营地举行正式谈判，次日双方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一三六部队代表得到总部指令，任何会商只谈军事，不涉及战后的政治问题。故此，双方只讨论合作抗日的意图和要求，联军代表要求抗日军加强开展抗日军事、政治活动，配合联军反攻。马共及人民抗日军代表要求联军支持武器、弹药、药品、财物及帮助军事训练。

可是，双方各自抱着不同的政治目的。马共及人民抗日军期望在消灭和驱赶日本侵略军以后，为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得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经济繁荣和文明富裕的生活，创建独立自主，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这是符合马来亚各族人民长远利益的。联军代表则是企图利用人民抗日军牵制日军，减少英军反攻马来亚的阻力与损失，消灭和驱逐日本守备军以后，恢复英国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殖民统治，夺回大不列颠帝国的“美金奶牛”。彼此尖锐对立的政治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为了达成抗日协议，双方代表经过两天的详细讨论，制订合作条款，最后签订协议全文如下：

一、合作条款

1. A. 张红先生宣称代表马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会，承诺凡在此会议达成的协议，将予遵守并实行之。

B. 台维斯、查普曼、布伦米和陈春霖（即林谋盛）是联军东南亚统帅部的军事代表，他们被授权与在马来亚抗日的任何党派进行合作。

2. 张红先生同意，在联军反攻马来亚时，马共将予充分合作，为此目的，将接受和遵守联军统帅在马作战的有关命令。

二、建议和决议细节

1. 在扼要介绍了马来亚抗日组织的人数和力量之后，张红先生探询联军方面，如何希望这些抗日组织与之合作。联军代表在概述了军事上和谍报活动上的要求之后，双方一致认为，除了使群众继续保持

抗日斗争精神外，当前唯一应做的事，就是煽起劳工纠纷，对水上运输和海军舰艇修理厂进行破坏等等。至于其他方面，双方同意要有一个准备阶段，以便联合行动。张红先生同时强调，他们现在要大力宣传在联军反攻马来亚时与联军完全合作的必要性。

2. 在问及抗日组织需要何种帮助时，张红先生提出要求如下：

A. 武器弹药； B. 药品及医生；

C. 军事训练； D. 财物资助

关于A点及B点，军事代表表示联军统帅部将尽一切可能运送至马来亚，以加强合作。至于提供医务人员，暂时还有困难，但允诺进一步研究实现的可能性。

对于C点，答复如下：①在运输条件许可时，将尽快把在印度的华人教官派遣来马。②由抗日组织选派华人学生至印度接受训练，结业后回马执教；目前先尽快派一个六人小组至印受训。③派遣欧籍教官稍后来马事将予研究。

对于D点，军事代表已向上级提出要求给予财政援助，预料月内将有答复。张红先生估计抗日组织月需50,000至70,000元，方能应付需求。

3. 在军事代表再三强调建立无线电联系的急迫性后，有关第2项第2点（如上述）的细节，表示尚须讨论。但对于第一批武器及弹药立即付运的详细计划已经拟订，进一步了解具体运输路线事也已获同意。

上述条款除必须获得马共、抗日军、抗日同盟会组成的联合总部批准外，还必须承认如下附加条款或类似附加条款精神的文字，方为有效。

附加条款如下：“马共与联军的合作，必须持续到联军能完全维护马来亚的和平与秩序的时候为止。”

签字者：

张 红

台维斯

布伦米

陈春霖

协议未获联军总部核准前，1944年10月马共于吉隆坡间津召开全马党、军高级干部非常会议，主要讨论如何与联军合作、配合联军反攻、和争取实现国家独立等问题，并作出如下决定：要求各独立队扩大队伍，抽调部分骨干和战士作为基础，建立与联军合作的新队，新队接受联军武器装备，接受联军派联络官驻队；原有的队伍（称为老队）不与联军接触，保持其独立性，另建立参谋本部进行领导；各州加紧开办军事训练学校（班），培养军事、行政管理人才；筹建“民族解放同盟”，为实现国家独立作准备。因此，1945年2月联军空投“一三六”部队人员来马后，老队并没有公开和他们接触。与联军合作建立的新队，也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立队番号不变，并无“一三六”部队之称。

协议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联合东南亚联军共同抗日的战略部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增强了双方的联系和配合，使口头承诺契约化，提高了联军反攻马来亚的作战信心，也有利于处于迅速发展中的人民抗日军充实武器装备和加强军事训练，改善医药和生活物资供应情况。显然，这是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件大事，也是东南亚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一块碑石。只是由于日本在东南亚联军计划发动反攻马来亚战役之前25天就宣布投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配合联军里外夹击歼灭日本守备军的作战行动，才未实现。

协议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反映出英国的叵测野心。首先协议规定“马共……将接受和遵守联军统帅部的有关命令”，而不是“马共……将遵照联军统帅部在马作战的有关计划，积极配合作战。”这是英国隐藏祸心，企图日后提出要求指挥某些人民抗日部队的伏笔。如果实现此条款，即可能丧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立性，也可能接受其一石二鸟的命令，为英国殖民当局火中取栗，使英军借手日军，达到同时消灭日军和抗日军的阴险目的。其次是马共“承诺凡在此会议达成的协议，将予遵守并实行之。”联军方面却不作出同等的“承诺”，遵守不遵守，实行不实行，由联军酌情审势而定。再次是双方代表在会议开始时，同意不讨论战后的政治与政策问题，然而附加条款却写上：“马共与联军的合作，必须持续到联军能完全维护马来亚的和平和秩

序的时候为止。”言外之意，就是要恢复原有殖民地统治的时候为止。英国殖民当局一刻也没有忘记千方百计恢复其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附加条件暗藏人民抗日军不要阻碍英国恢复殖民统治的含意。

三、一三六部队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英军撤出新、马后，设在哥伦坡(Colombo)的联军东南亚总部，准备加强马来亚敌后的情报工作，以便对反攻马来亚作军事部署。但是，那时联军东南亚总部对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缺乏了解的。要进入马来亚日本占领区进行敌后工作，白种人难于胜任，最合适的人选是中国人，尤其是广东、福建籍的华人。为了利用华人参与开展敌后工作，古泛罗、台维斯及布伦米三人受命在印度招募华人，筹组一支别动队——定名为一三六部队，准备潜回马来亚进行敌后活动。起初是邀请“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合作，后来在原新加坡华人林谋盛，庄惠泉的联络沟通下，由吴铁城及英国驻华大使山森(Samson)在重庆分别代表中国和英国政府，签订协议共同组织一三六部队。中国政府委派林谋盛为驻锡兰联军总部的联络官，兼任一三六部队中由华人组成的龙组马来亚区区长。1943年8月9日，增补委任副区长庄惠泉。台维斯和布伦米因熟悉马来亚情况，又懂华语，故被委任为一三六部队顾问。

一三六部队实为情报组织，并非作战部队，其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军事情报员，一类为电讯员，华人成员由中国国民党海外部派遣，军官全是英国人，由联军总部（实际是英军）直接指挥和控制。在日本投降前，一三六部队的组织是保密的，联军总部派出与人民抗日军联络的人员，也从未使用过一三六部队的番号。战后曾经有人宣扬说什么人民抗日军是由一三六部队提供装备、训练，并由其组织、指挥，这是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不值一驳的。

一三六部队人员潜回马来亚后，在人民抗日军的保护下进行工作，他们一旦离开了抗日军保护区就寸步难行。他们初期也曾计划单独行

动，有部分人不听人民抗日军劝告，冒然离开抗日军部队，潜入城市活动。但由于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都以失败告终。

1944年2、3月间，其部分人员在霹雳州先后被捕，2月27日，林谋盛也在打巴十字路被捕，于6月29日病逝于华都牙也狱中。一三六部队进入城镇人员大多数被捕，保藏于山林营地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又因损坏无法使用，半年多时间，断绝和印度联军总部的一切联系。

1944年5月29日，由美国运输舰运载一批一三六部队人员到澳大利亚接受军事训练半个月，几经辗转秘密转移，延至9月中旬，17名队员（英人8人，华人9人）才乘澳洲潜艇离澳北上，偷渡爪哇浪博海峡，于10月5日由马丁少校率领，在柔佛南部东海岸登陆，处境十分困难，无法单独活动，直至12月中旬，才到农村找到抗日民运工作人员，带领会晤人民抗日军。后来在第四独立队战士带领下，在新加坡军港海峡对面侦察日本海军活动情况，将情报发回印度联军总部，联军飞机及潜艇据此击毁击伤数艘日本军舰。

有的一三六部队人员，由于得不到抗日军的帮助，更是一事无成。据1945年5月6日空降到霹雳与吉兰丹边界的华籍成员蒋伯钧等给联军东南亚总部的报告说：“由于领队的英人军官粗鲁、骄傲，与当地抗日分子和人民发生摩擦，引起公愤，多方干扰工作，且在敌人水陆封锁之下，更无法开展工作（未和人民抗日军联系上），直至日本投降，还滞留在山中。”

美罗山区营地的一三六部队人员，经过多方拼凑修理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在1944年10月恢复了和联军总部的联系。根据1943年底马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代表与联军东南亚统帅部军事代表签订共同抗日协议（互助条约），延至1945年2月才获联军总部核准，从1945年2月26日开始，空投联络人员，同年5月以后以美国远程轰炸机B24及B29，自加尔各答起飞，逐次按电讯联络指定地点，向各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营地附近山林之间旷地空投武器、军用物资、医药及生活用品。一三六部队人员从此改由飞机空降至马来亚。

一三六部队从1943年5月至1945年9月1日，乘坐潜艇登陆或乘远程轰炸机空降马来亚的总人数140余人，其中英、美、澳籍军官、军医90

余人（包括21名校官）。另华人23批次，共49人（不包括林谋盛），其中在霹雳7批次14人，柔佛南部3批次9人、柔佛北部1批次4人，森美兰5批次7人，雪兰莪3批次5人，吉打2批次6人，彭亨2批次4人。此外，尚有十几批次只空投物资不投人。

联军东南亚总部明确指示，潜入马来亚的一三六部队，并无作战任务。因此，基本上都是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尽量隐蔽躲藏，遇到日军进攻时，都是在抗日军火力掩护下先行安全撤退。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一三六部队在马来亚敌后的两年三个月时间里，除了协助联军东南亚总部沟通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之间的联系外，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以及人民抗日军的情况），用密码电报发回联军总部和重庆中国国民党“中统”情报机构。

人民抗日军对一三六部队人员的护卫照顾，普遍都是尽力而为，在柔佛、雪兰莪等地，都是派出武器装备较好、能征惯战的分队（排）来护卫一三六部队小组；美罗山区一三六部队驻马总部的抗日军护卫精锐战士，最多时达150多人。饮食的照顾，待为宾客。查普曼说：“我们有机会尝到中餐的各种美味，如海蛞蝓、鲨鱼翅、牛肉、猪肉、各种鱼、鸡、旦及蔬菜等。”布伦米也说：卫队每天搞椰子油炸糖薯粉糕饼给联军当餐，人民抗日军则吃小地瓜拌豆酱。实际上，抗日军在粮食供应紧张时，多是吃木薯或野菜。联军东南亚总部，显然曾经发出过试图争取控制与指挥部分人民抗日军的指令。1945年4月18日，联军代表台维斯等和人民抗日军代表进行一次会议，重申1943年底的共同抗日协议，人民抗日军代表要求联军继续提供武器装备、医药用器和经费。联军代表则要求人民抗日军提供外围的军事、政治与经济情报，由联军指挥霹雳一带的人民抗日军部队。抗日军代表表示乐意提供外围情报，愿意积极合作配合反攻马来亚，但是无法同意将霹雳一带的人民抗日军部队交由联军指挥。驻“六独”的联军联络官伦纳少校，曾强迫而连突营地升英国旗也遭坚决反对。联军企图直接控制和指挥人民抗日军的图谋，终于未能实现。

日本投降后，一三六部队人员则留在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司令部

和各中队担任“联络官”和翻译员，联络官实是监视官，密切监视人民抗日军的行动。不少联络官更是毫不掩饰其骄横无礼和轻蔑态度，引起抗日军战士的很大反感。陪同潜入敌后，担任翻译员、电讯员的华人，幸存者49人，其中大部分人员对人民抗日军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三数月后，一三六部队遂即取消，先后遣散，英军官大部分回国，部分参加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机构，成为镇压马来亚人民民主运动的帮凶。华人成员35人回归中国，9人因家庭关系留在马来亚。他们的感受归纳出一条：“为了配合联军反法西斯战争而投身异域探虎穴，固然神圣，可是实质上总不外是为英帝国主义收复马来亚，……为帝国主义重新奴役殖民地人民效命。”（《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第421页），这段话，可以反映出一三六部队华人成员的矛盾心情。

四、人民抗日军积极准备配合联军反攻

联军反攻马来亚的计划，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几经修改，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最后，对马来亚的反攻日（D day）被确定为1945年9月9日。

反攻马来亚，在东南亚军事战略部署上，被列居首要位置，因为反攻与收复马来亚，将把日本南方军拦腰截断为南北两段，用以分割孤立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及泰国、安南的日本侵略军，以便各个击破，分别围歼。但是反攻马来亚计划却比反攻菲律宾推迟了11个月，这是由于英国想要借助于美国海军与空军优势，进一步削弱曾经嚣张一时的日军制海制空权，切断日军海上运输补给线（船队），最大限度地孤立马来亚日本守备军队，以便轻易摘取大西瓜。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不断发展壮大，使联军取得与人民抗日军联系以后增强了反攻的信心，相信人民抗日军将会积极有力地配合反攻，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拔除日军小据点，分散日军的兵力，阻滞日军的调动，骚扰日军的后勤，振奋各民族的抗日决心，打击日军的士气，瘫痪日本在马来亚的统治。

联军反攻马来亚的重要桥头堡，霹雳州西海岸被认为是合适的选择。在那里登陆可以避开雪兰莪巴生至波德申一带的日军防守主力，切断南北马日军的联系，配合分别在南北马敌前登陆和东海岸的突击登陆，包围歼灭中马的日军主力，使新加坡日本守军成为釜底游鱼。

为此，联军特别加强对霹雳州第五独立队的联系，要求直接指挥该区的人民抗日军，并于1945年8月首次在霹雳空降了30名廓尔喀（Gurkha）武装士兵。

出于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考虑，联军空降给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的武器装备，都是以“轻、旧、差、缺”为标准：1. 没有重机枪、追击炮等进攻性武器，火力配备不强；2. 所供给的卡宾枪、斯汀枪，只适宜于丛林作战；3. 子弹盒配备数量只有英美士兵的三分之一（每支卡宾枪只有150-200发子弹，仅够2-3次持续1小时战斗的消耗）。

自从1944年10月，美军在菲律宾人民抗日军配合下，展开反攻，于4个月后全歼日军；德国法西斯败局日益明朗，东南亚联军对马来亚的反攻时间，已是屈指可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不约而同地对各地的日本警备队和警察局加紧袭击，从1944年底到日本投降之前，各独立队主动出击百余次。

第一独立队进攻并拔除雪兰莪大港武装警察据点，收缴步枪30余支。又攻占双波和武来岸警察局，并在吉隆坡市警察局附近击毙大汉奸黄铁珊和日军情报站——今野宣传队队长杜船；奇袭雪邦胶园日军巢穴；在新街场咕腰路口伏击一中队日军；在咕腰击毙击伤日军30多人。还在林金港、古毛埠那督坳伏击歼灭大批日军。抗日军日渐逼近市镇作战，日军已感草木皆兵。

第二独立队进攻瓜拉庇拉警察局和马来义勇军兵营，缴枪数十支，救出20几个被囚禁的抗日人员。在日本警备队和武装警察严密防守的森美兰州首邑芙蓉市内，在有敌警参加的宴会上消灭了几个狂妄嚣张的日本宪兵部暗探，日本爪牙，相顾失色。

第三独立队各中队于1945年初，相继派遣锄奸队潜入日军戒备森严的城镇，狙击暗探，严惩走狗，搞得敌探风声鹤唳，十分恐慌。5月份全面开展“红五月”活动，统一组织“五·一三”战役，各中队分

工负责对麻坡、金马士以外的柔佛州北部17个城镇警察局进行强攻，除在昔加末、巴罗及麻坡遇到抵抗外，其余警察局兵不血刃，300多名警察全部缴枪投降。昔加末近百名警察稍为抵抗，就在强烈火力下弃枪投降，附近数十名日本警备队冲锋3次，企图救援都受阻击，伤亡重大。巴罗警察局在驻局的日军被击毙后，几十名警察全部俯首缴枪。

第四独立队于1944年9月在天吉港地区多处设伏，前后歼灭日军200余人。多次袭击日军运输车、小据点。从1945年1月到6月，在柔佛南部地区发生较大战斗30余次，给日军很大震动。

第五独立队在霹雳地区和日军战斗比较频繁，在美罗、玲珑等地区多次袭击日军，在近打河上伏击日军巡逻艇，战果显著。远征吉兰丹的第十二中队突击日军据点，解放了麻叻坡。

第六独立队在北彭亨和吉兰丹州连续追剿杀害抢掠老百姓和抗日战士的土匪队伍（部分窃用“华侨抗日军”名义），以免人民继续遭受残害，消除联军反攻时后方可能受到骚扰的隐患。六独进攻直凉警察局获得全胜，袭击文积路27碑警察局共收缴步枪20余支，轻机枪2挺。日本暗探到农村有去无回，日本警备队从此不敢进入山区捣乱。

第七独立队在东彭亨及丁加奴一带，依靠夺取日本军警武器，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伏击林明公路日军运输车，进攻邦振警察局，深入东彭日本军政统治中心关丹市，在游乐场击毙特高科特务张禄，没收林明伪维持会会长潘先兴的财产及粮食，都使日军及其爪牙惴惴不安，士气低沉。

第八独立队前身吉打人民抗日军，锄奸活动比较频繁。袭击新路敌人，伤毙日军40多人。进攻泰国南部日军据点及昔罗古务警察局，夜袭亚顺及武吉茹嫩警察局，伏击进犯日落湾的日本警备队，都取得较大胜利。

马来亚各地人民抗日同盟会，为配合联军反攻，积极进行扩大组织，加强统战工作和民运工作，加强抗日宣传和收集情报，密切和各该地人民抗日军（锄奸队）的联系。

受到日军屠杀残害最酷烈的柔佛州南部，人民对日仇恨最深刻，组织发展最迅速。仅士乃区抗盟，就有专职干部10人，由马共区委领

导组织训练班，对抗日人员进行轮训，每期2-3天。同时还培养了一些马来籍干部，少数马来青年农民参加了抗日民运工作。各族干部逐家逐户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大好形势，宣传新任务，提高各族人民必胜的信心。

各地抗盟还加强对中上层的争取工作，争取尚有民族意识的头面人士对抗日工作给予秘密支持，捐钱、捐粮给人民抗日军，部分侨领在这段期间参加了抗盟。有些马来农民开始捐助粮食给抗日部队，由民运人员收转。对日本鹰犬走卒，即用各种方式给予警告。多数地区分别争取大量不带枪械只执木棍值班的自警团，同时向警察局发动政治攻势，少数警察参加抗日情报工作。各地抗盟还组织抗日自卫队，由附近的抗日军派员给予训练。

“七独”成立周年庆祝大会，在农场举行文艺晚会，演出抗日歌舞话剧及琼剧，几个农场的群众代表300多人观看演出。宣传队还到附近林场演出3天，敌伪自卫队及暗探参加观剧，不敢上报，反而向当地抗盟人员汇报日军动态。“一独”在吉隆坡郊外伏击毙伤日军30余人后，随即在新街场农村召开祝捷大会，在接近日本统治核心地区只有20多公里的地方，就有1,000余群众参加，更是反映出各民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普遍深信不疑，为联军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会的主动出击，使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消沉挨打，士气日益低落。一些马来族人民开始公开支持抗日活动。为了挽救败局，日本马来战区司令部曾下令逼迫各地日军对人民抗日军发动中队规模以上的“围攻”、骚扰，不下50次，结果都是损兵折将，劳而无功。后来，日军又在霹雳、彭亨、柔佛各州，都向人民抗日军提出“分地而治，彼此停火，共同抗英”的诱降花招。这些花招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抗日军的严词拒绝。此事明显反映出，日本马来军区司令部已经充分觉察到，人民抗日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日军抗御联军反攻作战时的最大威胁。

打败日本法西斯，解放马来亚；已经指日可待了。

第六章 日本投降与人民抗日军复员

一、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东京广播电台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国于7月26日所公布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正如日本马来亚军政部总务部长滨田上佐所说：“中国问题使日本陷入泥沼，举凡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消耗殆尽。”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及1943年2月结束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以后，日军败势已经萌现，日本南云舰队被歼灭后，制海制空权丧失殆尽，战火逼近日本本土，美国空军连续五个月猛烈轰炸日本本土及东京，造成21万多人伤亡。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7月，美英舰队开始大举轰击日本沿海及各大城市，8月6日，美国空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13万人伤亡。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进军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面临被全部歼灭危机；中国军队战略大反攻全面展开。9日，长崎受到第二颗原子弹轰炸，伤亡8万人。至此，日本内外窘迫，四面楚歌，国内经济严重困难，侵略者力尽气竭，已成瓮中之鳖。御前会议经过8月14日最后一次剧烈争吵以后，终于作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

驻防马来亚的以第五师为主力的日本侵略军，士气早已明显低落。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日本海空军的濒临覆灭，马来军区的日益孤立无援，都使日本官兵感到无比的恐慌；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斗实力的不断发展增强，更使各地的日本警备队胆怯气馁。各地日军年来数十次围攻，都是战场上稍微接触就草草收兵，回营交差，谎报战果。这充分反映出日军中下级军官与士兵的沮丧心理和消极情绪。

《终战诏书》宣布后，各地日军初期还是极力捂紧盖子，不愿公开承认战败投降。槟城和哥打峇鲁等地，都发生过狂欢的群众在大街

上讲述传播日本投降的消息，因而被日本宪兵捕捉的事件。檳城日本当局到8月21日才公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吉隆坡的各族人民，甚至到了8月20日，看见威武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列队行进街市，并开展维持治安的工作，才敢肯定日本确已投降，纷纷赶制和悬挂三星军旗。

各州的日本驻军，在得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一般都龟缩在营房之内，很少出外，尤其是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以后，更加少见外出。各州的警察局，大多数被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后备队、别动队所缴械，被限令不得随意离开警局活动。吉打州和少数在抗日时期同抗日组织有联系的警察局，则由人民抗日军授权参加维持治安工作。

日本侵略军士兵对无条件投降的反应不很一致。绝大部分是服从东南亚联军司令部的命令，维持现状，等待联军前来接受投降，静观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维持治安、惩治敌特、叛徒和歹徒，收缴警察局枪械弹药，没收敌产和释放政治犯，不予干涉过问。

部分日军主动和人民抗日军联系，如：驻打巴、安顺一带的日军，在太平日本军政监部的授意下，曾经派人到霹雳州“五独”第四中队寻找抗日军进行试探性的谈判，要求与抗日军“联合抗英”，表示如果抗日军接受这个“要求”，其听属部队可交由抗日军统一指挥。及后，霹雳州警察总监和宪兵队长也先后找到进驻太平附近的“五独”第十六中队，进行试探，提出同样的要求。“五独”司令部分析当时的形势，看出日军缺乏投降的诚意，而是企图假借与抗日军合作的名义，负隅顽抗，于是断然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也有少数日军，表示愿意向人民抗日军靠拢，希望得到抗日军的宽恕。小队规模的日军和个别下级军官、军士，携带武器向就近的人民抗日军投诚的情况较多，大多数独立队都遇过。有些会讲闽南话或普通话的日军，则化装成平民，转移地区，在农村边沿开荒种植，或远走外地，乔装居民。

少数日军警备队，经过谈判，向人民抗日军交出部分武器，全属轻武器，多是三八式步枪、子弹、手榴弹，有些还交出军靴、望远镜等军用物资（较少手枪、轻机枪），枪械数量多者超过百支。

在和人民抗日军作过激烈战斗，而且饱受人民抗日军铁拳滋味的日军，如雪兰莪中部、森美兰西部、柔佛南部、吉打北部的日本警备

队，则对人民抗日军怀着相当强烈的敌对情绪。吉打州驻日德拉的日本警备队，曾经阻挠过人民抗日军的通行。日本投降后21天，9月5日，马六甲日本宪兵部大本率领数十名日军包围马六甲人民委员会，将抗日军代表老雷，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吴世健以及郑学琛、陈应祯、林振锡、林揆义、谢重生、陈易经、康景南、彭玉楼、张森森、曾才等12人绑架，途中跳车逃脱两人，其他10人被押上汽艇载往五屿，途中二人挣脱捆绳跳海逃生，其中1人（郑学琛）溺死，另一人（陈易经）侥幸生返，余人全被日军残忍屠杀，壮烈牺牲。（注：抗日军闻讯立即派出队伍前往救援，抵达五屿岛时，发现吴世健、彭玉楼、曾才三人尚在奄奄一息，于是立即将死者及伤者用船载回马六甲海岸，然后用专车将伤者送往野新医院救治，由于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这些日军的野蛮兽性，临死还是毫不收敛。日本马来军区司令板垣大将，初时曾想率领2、3万士气低落的孤军，负隅顽抗、蛮干一通，由于卧病的南方军最高司令寺内寿一规劝阻止，才放弃“神风”敢死队式孤注一掷的念头。

马来亚日本占领军获悉投降讯息以后，就积极进行一些企图掩盖其罪行的秘密措施。首先是烧毁大量罪证文件。从新加坡日军军政监部到马来11州各城市的宪兵部、警备队等暴力镇压部门，到处焚烧有关暴行档案，显然这是出于由上而下的秘密统一布置，造成战后搜集日军严重罪行具体资料的巨大困难，也是日占期间军政档案严重残缺的主要原因。同时，各部队、机关、商行大量抛售粮食、布疋、胶锡、杂货，以及家私、衣服，收回军票销毁，用意在于抵赖和减轻日后赔偿责任。其次是消灭罪证活口，日本南方军冈第1061部队参谋部所属第八特别班的浪机关和海军潮机关，专干间谍特务活动，成员洞悉日军卑鄙凶残行径，投降后，曾由暗杀班布置毒杀或屠杀非日本人成员，以求杀人灭口。再次是纵容包庇一些罪恶昭著、血债累累的日本凶犯潜逃。如新加坡大检证大屠杀要犯、日本第三军参谋战犯辻政信化装逃匿；各地都有一些双手沾满人民血迹的日本宪兵突然不知去向。檳城两个亲手斩杀无辜华族几十人的宪兵，化装成华人，企图搭船逃往

威省，在码头被工人群众认出来，结果被愤怒的人群当场打死。也有少数日本军官畏罪或绝望而自杀。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东京湾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签投降书表。9月12日，日本马来军区司令板垣大将代表已患重病的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在新加坡市政厅大厦签递投降书，由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接受降表。续后，分驻马来亚各地的日军分别在以后几天内，向各该地（州）的联军代表举行投降缴械仪式。除槟城、玻璃市以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八个独立队，都派出代表分别参加各该州日军投降仪式。

马来亚地区日军俘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部门的文职人员、职员、商人及其家属，超过10几万人。从1945年10月下旬开始，日军俘虏分批运往新加坡南面的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度过一段耕种生活以后，不久就被先后遣返日本。

对于日本侵马期间的滔天罪行，（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各族人民强烈要求严惩日本战争罪犯及其帮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认真执行了人民的嘱托，分别在各地逮捕、审讯和惩罚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特务、投敌叛徒与民族败类。不过，由于那时国内外形势的限制，审判与惩罚日本战犯的工作，只能留待联军回归马来亚后，组织军事法庭进行调查与审讯。

使马来亚人民、被害群众和抗日烈士遗属大失所望的，是英国政府出于对人民的深刻偏见，对大量屠杀与残害马来亚人民的日本战犯，惩罚的人数特别稀少，惩罚程度也明显偏低。由东南亚联军所组成的战犯委员会，审查并提出控诉的东南亚日军战犯1101名。实际上违反国际公法，屠杀无辜平民，酷刑虐杀犯人，无故伤害百姓，杀害无辜老幼妇孺的日本战犯，最少高于此数几倍。如新加坡参与策划大屠杀的重要罪犯，和参谋部的铃木中将，辻政信、林少佐、警备大队长宫本与市川、水野、乡市、小园、绪方等等，血债累累，民愤极大，都未受到传讯，逍遥法外。而且绝大部分凶残战犯仅被判处徒刑，监禁不久，新马227名战犯就于1951年8月14日，被遣送返日本，在英国对日和约签订后，即被释放。最明显的不合理判决，是对新加坡大检证

大屠杀5万华人的重要战犯的审判，1947年4月2日判决，只有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及宪兵总队司令大石正行被判处死刑，另5人无期徒刑，其他凶手全无罪责！英国统治者对新马人民的轻视蔑视和仇视心理，是不加掩饰，昭然若揭的。

二、马共提出“八大主张”，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

在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下，作为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支柱的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正处在一个转折的关头。日本侵略的外部矛盾虽解决了，而新的矛盾——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突出起来。马来亚的前途如何？这是各族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

马来亚共产党在领导各民族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由于日本法西斯的野蛮残暴和内奸、特务的出卖破坏，蒙受严重的牺牲，优秀的党员，从中央委员到一般武装战士及民运工作者，为抗日战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占马共原有成员将近半数，加上无党派的抗日群众，总人数超过万余人。（其中在作战中牺牲或被捕遇害以及因病、因伤致死的抗日军人约三千余人），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是保卫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因此，在3年8个月的残酷斗争中，马共的组织在浴血战斗中得到锻炼，茁壮成长，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劳动群众的鱼水关系日益密切，党员人数由不足2,000人增长到8,000多人。

原昭南岛日本宪兵分队长大西觉少佐，曾领导专门破坏抗日活动的谍报机关。战后他于1977年写成并出版回忆录《昭南华侨被肃清事件》，揭露马来亚共产党书记莱特充当日本间谍，在新加坡出卖13名马共中央委员和大批埋藏武器军械，出卖1942年9月1日在石山脚召开的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卖大批的抗日领导干部，出卖“不胜枚举的各种情报”。

可惜当时马共广大党员，没有人能够及时识穿并揭露这条化为美女的、隐藏党内窃据领导岗位长达8年之久的毒蛇。这个当过法国、英

国、日本间谍的无产阶级叛徒、内奸莱特，赶在英国回归马来亚之前9天，于1945年8月25日召开了中北马党军会议。莱特“分析”战后国际形势，强调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政治大势趋向和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和平环境，以加强经济建设、治疗战火创伤。马来亚各民族之间，政治觉悟不平衡；群众饱受3年8个月的战争惨祸，希望和平宁静，厌恶战争，但不分析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尤其是英国）已经筋疲力尽，十分虚弱，人民厌恶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亚非拉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思潮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马来亚周围各地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方兴未艾；马来亚各族人民不愿重过殖民地奴隶生活，等等重要因素。

莱特根据上述片面的似是而非的分析，指出当前实现抗日九大纲领第一条“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和第五条“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于是提出马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决策：加强和平斗争，争取实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民主和自治，首先争取在英联邦内部的制宪自治。并提出以“八大主张”替代抗日九大纲领，人民抗日军老队率先解散，新队开进城市，配合各地开展和平民主运动的政策意见。

当时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接受了莱特的论点，这是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悲剧。这些领导干部都是长期坚定、勇敢地分散领导抗日斗争的革命坚强骨干，得到广大人民抗日军战士和抗日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因此他们怀有对战士和人民负责的强烈责任感，艰巨的武装斗争和日本的突然宣布投降，使他们对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组织准备。莱特提出新时期和平民主斗争理论，虽然引起他们的思想混乱与疑虑，但未能提出有力的反对论证。长期分散的地下工作环境和艰巨严酷的武装斗争，要求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统一，也造成使他们对莱特的决定，产生盲目服从的态度。

会议最后由莱特提出的马来亚共产党“八大主张”获得了通过，作为此后和平民主运动的指导纲领。马共八项政治主张的内容随即向全马公布，并广泛进行宣传：

一、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联盟，拥护新国际和平组织——联合国。

二、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普选的民意机关。

三、废除日本统治的一切机构及其一切法令、法律。

四、实现言论、出版、组织、集会、信仰的绝对自由。

五、振兴工商业，改善民生，加饷加薪，救济失业和难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六、实行民主教育，废除旧教育，用各民族语言，发展民族文化。

七、平抑物价，审判贪官污吏和投机黑市分子。

八、优待抗日士兵，救济死亡将士家属。

在马共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人民抗日军决定和平进驻各地城镇。但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Admiral Lord Mountbatten)，为了维护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于8月17日就对联军先遣队下达不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驻各地城市的命令。其险恶用意，非常清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维护马来亚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作为蔑视殖民主义者反动图谋的答复，南自柔佛的新山，北到玻璃市的加央，包括昔加末、麻坡、马六甲、芙蓉、瓜拉庇拉、加影、吉隆坡、巴生、安顺、金保、怡保、金马仑、太平、居林、双溪大年、哥打峇鲁、瓜拉丁加奴、关丹、瓜拉立卑、文冬等等50多个大中小城市，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都先后派遣中队或分队进驻。第四独立队还派遣一支精锐武装队伍进驻新加坡。第八独立队曾派一小队短暂进驻檳城。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普遍受到各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多数城镇的各族人民，都建扎牌坊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欢迎自己子弟兵的光荣进驻。饱受3年8个月苦难折磨的人民，狂喜心情，可以想见，真是万人空巷，途为之塞，鞭炮铺地，胜过春节。印度族和马来族人民，大都表露出很高热情。

人民军队进驻城镇，主要任务是保障各民族人民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这是当时维护人民利益的最重要措施。做法是收缴各地警察局枪械和弹药，防止他们混水摸鱼，继续残害人民。各地抗日同盟会协助抗日后备队，组织青年工人和城镇青年，成立治安巡逻队或临时治安委员会，帮助人民抗日军维持治安。由于人民抗日军在各族人民

心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拥护，所进驻的城市，治安都很安宁，偷盗案件极少发生。个别离开驻地较远的市镇，偶有出现偷盗、流氓行为，人民抗日军派出武装小队赶往巡逻或暂驻后，治安秩序就恢复正常了。吉打州不少警察局在抗日时期和第八独立队或抗日同盟会有过联系，未对抗日活动采取敌对行为的，一般不予缴械，而是要他们在人民委员会（自治会）指导下，协助维持当地治安秩序。

人民抗日军还支持人民委员会或人民自治会稳定市场物价。第一独立队于8月20日进驻吉隆坡以后，随即发出安民布告，禁止乱涨物价，禁止征用民间物资及摊派捐款，同时派员巡视肉菜和粮食市场，严防非法提价。吉隆坡市场物价因而相当稳定，各族人民很感满意。被当地报刊誉为“在联军未抵达接管前对吉隆坡市区维持秩序的良好功绩”（见《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第798页）后因英国军管政府宣布日本军票作废，加以管理无能，竞相掠夺，才造成黑市猖獗，物价高涨。

人民抗日军在各州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派出中队驻扎，以加强和各民族人民及群众团体的联系。在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前后，抗日同盟会发动各民族人民以协商方式，选派代表，成立该地人民委员会或人民自治会。雪兰莪、森美兰、霹雳、柔北、柔南、马六甲、丁加奴、东彭、西彭等各州都成立州级人民委员会，执行部分的政府职能。其他各地的人民委员会，都是当地各族人民的自治机构，新加坡、檳城、吉隆坡、怡保、阿罗斯打、加央、芙蓉、新山、哥打峇鲁、瓜拉丁加奴、关丹、文冬等各市、州的主要城邑，以及双溪大年、居林、大山脚、太平、安顺、金保、巴生、加影、万挠、瓜拉庇拉、昔加末、麻坡、文德甲、劳勿、立卑、瓜拉吉来等30几个城镇，尚有人民抗日军较多活动的牛仑、华玲、纯笃、拉务勿刹、新古毛、煤炭山等几十个乡镇，都建立不同规模的人民委员会（吉打州原称人民自治会，后改为人民委员会），在各自行政区域内行使地区性初级自治权力。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多数是该地区同情抗日、有一定群众威信的华人和少数马来人、印度人参加（如加央、峇都巴辖、新山、马六甲等地的人委会，都有马来王族或战前马来副市长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活动，得到人民抗日军的积极支持。

人民委员会的大量工作，是维护各民族人民的正常生活，活跃市场，平抑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营运。平抑物价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各群众团体，尤其是刚从地下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各业工会发挥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工人的热情普遍很高。人委会宣布取消日本会社、组合的各种垄断规定，取消中间强制性克扣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见面，市场顿时活跃起来。以华人为主的工商界不少人向人委会提出投诉，要求收回被日本侵略军及垄断组织所掠夺的印刷厂、碾莪厂、砖瓦厂、火柴厂、板厂、碾米厂、榨油厂、树胶制品厂等等企业和客货汽车（这些汽车多被东京急行株式会社所抢收），经过调查属实，由人民抗日军协助从没收的敌产中，拨还给民族资本家，经过修整复原，恢复生产。多数客货汽车运输，在9月间已经陆续恢复营运。

人委会通过群众团体的配合，将人民抗日军没收的敌人物资、粮食和布匹，一部分救济和抚恤抗日烈士的遗属，一部分直接分给仓库附近的各民族贫苦群众。

多数城市由人民抗日军派员和日本宪兵部及警备队谈判，责成释放被拘留的抗日工作人员与抗日群众。少数没有抗日军进驻的县镇，由人民委员会责令警察局释放抗日嫌疑犯人。全马各州规模较大，囚禁犯人百人以上的14座监狱，多数是由人民抗日军派出武装部队，直达狱内，强令狱吏释放政治犯人。太平监狱迟至9月15日经人民抗日军办事处与日本狱长交涉，才将250余名抗日政治犯人释放出狱。三年多来共有1,860名抗日烈士和无辜群众已在太平狱中牺牲。

人委会还发起并联合各民族、各阶层团体，召开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军民联欢大会和欢迎人民抗日军的各种活动。带动各群众团体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安排演出场所，提供运输工具方面，支持歌咏队、话剧团的工作。

数年间，被敌特暗探诬告杀害、酷刑毒打、敲诈勒索的各族人民有十几万人，绝大多数是华人。受害者及其亲属纷纷向人委会和人民抗日军办事处控告，或是口头，或用书面，络绎不绝。人委会对其中罪证确凿，情节严重的案件，通过抗日军办事处转送给人民代表组成

人民法庭审判裁决。对严重罪犯，民愤极大的，一般都是由别动队（或锄奸队）进行逮捕拘押候审。经过调查核实，由人民抗日军代表宣布罪状，经过法庭审议，陪审的群众代表多数同意，军事代表定讞，然后召开群众公审大会，由人民抗日军派出执刑队或由别动队执行枪决。除了罪恶深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无法宽恕的特务、敌奸、叛徒以外，大多数是在受到教育，认罪悔过，并对受害人有所赔偿以后，觅人担保释放。

各地人民委员会成立时间只有20到30多天，于9月下旬，先后被各该地英军军事管制政府强行接管，组织机构随即撤销。人民委员会是马来亚人民历史上第一次当家作主的实践演习，虽然执政施政都不全面，但已为人民掌握政权斗争提供初步的经验，且为促进各民族人民团结，安定人民生活，增强各族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思想意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它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三、马来亚重新沦为英帝国殖民地

1945年9月3日，东南亚联军的英军先遣部队，在槟城登陆。第十五军于9月5日在新加坡登陆，第三十四军主力部队9月9日在马来亚西海岸中部的摩立(Morib)登陆，分左右两翼，迅速沿公路推向加影（巴生港口一带为日军驻防重点地区），于12日就进驻吉隆坡，14日进驻怡保。英军的登陆地点和进军的路线，都是出于安全的选择，预防可能遇到意外的敌对军事行动。英军控制了槟城、新加坡和吉隆坡3个战略据点，然后由3地分兵逐步进驻吉打、玻璃市、柔佛、森美兰、霹雳和东海岸彭亨、丁加奴、吉兰丹各地。英军假设可能遭遇敌对军事行动的对象，除了抗拒投降的少数日军外，同时怀着对马来亚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日益高涨情绪的恐惧心理而登陆的，登陆以后，时时、处处、事事都表现出对马来亚人民的敌对意识。

9月12日，蒙巴登在新加坡接受日本南方军代表板垣签递降书以后，在半个月内，就收缴了全马各地日军的全部武器和军事装备。9月15日，宣布成立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实行军政统治，由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马来亚民政长官，隶属于东南亚英军最高司令部，由蒙巴登直接领导。同时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统辖第十五军及第三十四军。新加坡和马来亚完全由第十四兵团武力支持下的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所统治，从政权和国民经济上加强控制，逐渐旋紧高压螺丝，勒紧殖民统治的绞索。

英国梦想恢复对马来亚殖民统治，最露骨的表白，是1945年10月10日英国工党政府主管殖民事务的国务大臣，在答复下议院议员关于统治马来亚前途施政方针的质询时，明确宣布：“对马来亚的前途，……在适当时期内，使其成为不列颠联合邦的一员，我们已作了审慎的考虑。因此，英国政府的政策，要求一个制宪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和一个马来亚的公民制度，使得一切认马来亚为其祖国的人民，均能获得平等公民权，为达到此一目的，非常需要马来诸邦的统治者商订新的协议，并在海峡殖民地方面采取新的制宪步骤。马来亚联邦将包括马来半岛的九个邦和檳城及马六甲两个殖民地。现阶段的新加坡将需要个别的制宪工作，考虑到它的特殊经济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利益，我们将另有规定，使其构成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但新加坡与半岛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能最终会达成统一的目的。檳城与马六甲的人民将不致丧失作为英国属民的权利。……”

这篇政策性谈话，是用锦绣外衣加以乔装打扮的，其真实嘴脸即是麦克麦考尔爵士周游马来亚各邦，施展威迫利诱的手法，诱使马来各邦苏丹签订“允许英王陛下在各邦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的协议书，马来各邦的统治者，将把政治主权转移给英王委派的马来联邦总督。这种维持新加坡殖民地地位和坚持对马来亚联邦管辖权的设想，实际上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已由英国殖民部的马来亚策划组制订出来，用以恢复和巩固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分为两个，就是为了贯彻上述图谋。日益衰落的不列颠帝国的殖民部，没有公开讲出来的内心设想是：首先要争取英王对马来亚各邦的管辖权，使新加坡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用以加强对马来亚的影响，万一失去对马来亚的直接管辖权，也要抓紧新加坡这块“英王皇冠上的宝石”。因此，

不难理解，军管政府何以极力打击马来亚人民抗日战士，用软硬兼施的手法镇压马来亚人民争取民主自治的正义活动。

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急不及待地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先后撤销全马来亚各城镇的人民委员会。具有初级人民政权的组织被无条件撤销，意味着人民手中的抗日胜利果实，民主权利得而复失。人民的民主自治权利和殖民地统治的内涵性质，显然是水火不相容的。各地的军事管制政府，大量收容、雇用原日本宪兵部、警备队和警察局的特务、暗探，使一部分欺压人民的民族败类，又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人民抗日军还没有复员之前，就公然在丁加奴等地的大庭广众之间，撕毁人民团体所贴的标语，扯破旗帜，非常嚣张。军管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曾逮捕了若干通敌嫌疑犯，但最后他们几乎都被释放了”（巴素博士《东南亚之华侨》）。阿罗斯打和檳城等城镇，都发生过耀武扬威的日本—英国两朝暗探，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抗日工作人员的事件。

英国本土在6年战争期间，城市受到战火的严重破坏，全国财富损失四分之三，工农业生产下降衰退，还损失了11亿英镑的国外投资，增添了30亿英镑外债。“英帝国主义的市场被美国抢去了，英国的殖民地危机四伏，它的落后的基本工业濒于危机。”（《三十年的斗争》高兰）特别是食品供应相当困难。因此，英国统治马来亚的军事管制政府，另一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来亚各族人民的剥削，将英国本土的经济困难转嫁给马来亚人民。首先，于1945年9月8日，悍然宣布无偿地废除在马来亚流通了3年半的70亿到80亿之间的日本军用票，使马来亚与新加坡500多万各族人民蒙受极大损失，生活顿时陷入严重困境，不少人因此绝望自杀。为了吃饭度日，人民只好变卖各种物资财产。从当时的物价和商品流通情况估算，英国新发行的通货数量高于战前1—2倍，也就是说，从日本军用票作废一举，最少从马来亚人民身上，刮去各种树胶油脂农产、锡铁矿产、工业物资和各业劳务5—8亿新加坡元，多于日本所敲诈劫夺的5,000万元奉纳金10几倍。

英国的垄断资本，随着英军的炮舰、坦克开进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争先恐后地蜂涌而来，夺取锡矿、胶园、煤矿、铁路、炼锡厂、

油类加工厂等等工矿和农林、交通企业、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利。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浪潮，很快就冲击到马来亚来，同时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家，不再依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美国经济也在东南亚地区逐渐排挤英国固有的优势地位，但是马来亚树胶年产量很快就恢复到60万吨以上，占全世界总产量40%左右；锡的年产量很快恢复到7万多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胶锡的出口总值占总出口总值的70%左右。加上铁砂、棕油、椰油、木材、罐装菠萝的出口，两三年内就从几亿元增加到10几亿元。输入除食品与石油类以外，化工品类、交通器材和以纺织品为主的轻工业产品，多数来自英国及联邦各自治领。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所得利润每年也有2亿美元以上的收益。因此，新加坡与马来亚在战后几年岁月里，为贫困拮据的英国所赚的外汇，多于大不列颠帝国的其他方面所得。因此，被称之为是英国的“美元制造厂”。1945年至1946年之间，新、马许多邮局所收大量寄往英国的私人包裹当中，很大比重是白糖、鸡蛋等食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利益使军事管制政府决定坚决镇压马来亚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各种合理活动。

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图谋维持殖民统治的主要手段，一是进行改良欺骗、施放虚假民主烟幕；二是挑拨民族团结，制造马来人排华事件；三是露出狰狞面孔，实行血腥镇压。

军管政府在强制撤销各地人民委员会的同时，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编导咨询委员会的虚假民主闹剧。实际上是继承日本统治马来亚粉饰太平的旧花招，玩弄假民主，实施小恩小惠，用于欺骗人民。从英国军管政府所导演咨询委员会所讨论的议案中，可以看出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1945年12月12日，新加坡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的议案是：公共卫生福利问题，贿赂社会罪恶问题，货物保险，雇用女招待，小贩食物档，为妓女设立居所等等，根本不敢接触重大的政治问题。

“分而治之”是英国殖民当局几百年来统治各处殖民地的主要手法。军管政府在存在的半年多期间，充分使用了这套罪恶手段。在人民抗日军还没有复员的时候，就组织和怂恿马来民族当中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事端，蒙骗广大马来群众，提出“马来人万岁！打倒

中国人！”的口号，煽起排华事件。少数暴徒乘机进行屠杀男女老幼华人，抢劫烧屋。北自吉打，南至柔佛，各州大都发生过此类仇者快、亲者痛的不同规模的排华流血事件。马口发生排华，人民抗日军战士，为维护民族感情，坚持不开枪，有5人惨死在暴徒的巴冷刀下。这些血债，必须记算在英国殖民统治工具——军管政府的身上。

英国政府先是派遣麦克麦考尔爵士于1945年10月18日至12月21日期间，逐个诱使各州苏丹签订承认英王对各该州享有充分管辖权的协议，然后抛出明显不顾各族人民强烈要求合理公民权利的《白皮书》，既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又贯彻分而治之的诡计，挑拨马、华民族和睦共处、融洽友好关系，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1945年末，全马来亚人口总数约520万人，如果撇开新加坡不算，只计马来半岛的人数约为432万人，其中华人约占38%，马来人约占49%，华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已经在新、马境内居住10年以上或在当地出生的合法居民，他们在日本统治期间，是反抗日本侵略者最积极的力量，蒙受最大牺牲，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主要是由他们当中的青壮年子弟所组成，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是，拟议中的马来亚联邦计划，却对华人严加限制，规定华人申请公民权，“必须具备良好的品格，具备充分之马来语或英语知识……”所谓“良好”的品格，“充分”之马来语或英语知识，都是统治者用以排斥广大华人的关阻、铁栅，其目的在于制造民族偏见，煽起民族纠纷。

四、和平民主运动遭到残酷镇压

英国政府于1941年12月18日，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共产党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已经确认马共的合法地位。1943年12月31日，东南亚联军总部派遣代表台维斯等在霹雳州和马共、人民抗日军、抗日同盟会代表，签订联合抗日、配合联军反攻马来亚的军事协定，再次肯定马共的合法地位。日本投降后，马共立即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和群众运动，加强和各民族各阶层的联系，这有利于扩大民族民主联合战线阵营，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

马来亚共产党内大多数人已估计到，英国为维护其反动的殖民权益，有朝一日将可能全面镇压以马共为首的人民民主力量。所以尽管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身份，尚是保持秘密状态。为了便于加强和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以及各民族党团组织 and 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各市各州分别设立马来亚共产党办事处。

马共各州、市办事处成立于1945年9月，在各该州、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办事处是马共对外联络的窗口，主要是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宣传和解释马共八大主张，向各界人民阐述马共对各项政治事件的见解和意见，向英国军管政府转达各界人民的正当要求，对英当局侵犯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行为提出抗议和交涉，带动和联合各阶层人民进行和平民主斗争的统一行动。1945年10月，全马各地庆祝抗日胜利的大游行，新加坡一地就有450个群众团体参加；1946年2月15日在各大城市举行纪念“沦陷日”大游行；以后，多次领导举行争取民主自由与反对迫害的游行和斗争。1946年初，吉打东部部分马来农民受到怀有险恶居心的统治者挑拨离间，造成该地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马共吉打州委办事处党代表及时赶往会晤马来村长，说明事情真相，消除误会，平息了一起可能引起流血冲突的严重事件。

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主力的人民民主阵营，是反帝反殖最坚定的和平民主力量，经过抗日战火严峻锻炼的一万多名人民抗日战士，分布在职工联合会、农民联合会、新民主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学生、教师会中，发挥骨干作用，站在反帝反殖斗争的最前列。组织起来的数十万各族工农劳动群众，是民主斗争的基本力量。新马华人资产阶级，战后初期绝大部分希望争取比较合理的“华人权益”，对争取马来亚民主自治的斗争，一般也积极支持。受压迫、剥削比较深重的印度工人，也积极参加当地工人运动。战后马来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迅速发展，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小市民，受着封建制度和宗教体系的双重影响，上层人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带动部分工人，提出联合各民族共同争取实现民主自决的要求。

在此形势下，建立马来亚和平民主联合阵线是非常必要的，也符合新马各民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马来国民党（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于1945年11月30日在霹雳州怡保成立。该党由布哈努丁（Burhanuddin）博士领导，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8项决议，要求在马来亚实现自治，施行民主政治，保障各民族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反映了马来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和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愿望，得到众多马来知识青年的拥护，在北马、阿罗斯打和吉隆坡等城市都成立办事处。在反帝反殖，新、马联成一体，优先照顾马来民族的利益，各民族人民获得公民权利机会合理均等，和发展各民族文化教育等方面，马来国民党和马来亚共产党有着共同的主张，因此被认为是马来民族的左翼组织。

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在马来亚政治地位激烈争论的风浪中诞生，1945年12月21日宣布成立。主席是菲力何亚廉（Philip Hoalim），秘书长林丰美，最积极的组织者和活动骨干是约翰伊伯(John Eber)，同盟的成员主要是受英文教育的律师、教师、医生、公务员，多数是侨生的华人、印度人、欧亚混血人。他们的活动方式受到英国政党的重大影响。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有8条，主张“成立一个自治的马来亚政府，参加英联邦；立法议员全部民选；凡满21岁的马来亚公民，不论其种族、性别、宗教或财产，皆可参加投票；……”等等。纲领内容是温和的低级要求。马盟比较关心各民族教育的平等发展，但马来文是必修课程。主张新加坡并入马来联邦。这些主张，必然受到企图维护特权的阶层的反对，也受到想恢复殖民统治的英国殖民当局的敌视。^{（注4）}

注4： 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国民党、马来人祖国青年协会、马来青年党（Angatan Pemuda Insaf，简称API）、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马来亚职工联合总会、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中华总商会，等等11个政党及群众团体，于1946年12月14日在新加坡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约翰·伊伯。一星期以后改名“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提出6项立宪原则：

1、新加坡应该包括在一个团结统一的马来亚之内；2、通过立法议会的完全选举，以达成马来亚的自治目的；3、对所有定居并效忠于马来亚的人民，给予平等权益的公民权；

在马来亚共产党八大主张的指引下，马来亚人民曾经设想依照英美等国的模式，进行议会斗争。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总团部，就仿效议会的组织形式以作演习。可是和平的意愿，却换来英国统治者的无情打击：全马工人运动，处处受到残暴的压制，多起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工人，横遭镇压和枪杀；民族教育、集会、游行、文艺团体演出都受到严格限制，抗日战士无端受到逮捕、监禁或驱逐出境，就业受到歧视和排斥。加以军管政府重用依附日本的作恶分子，黑市猖獗，人民生活困难，和平民主的八大主张，满途荆棘。出于大不列颠战略利益的考虑，英国宁可选择马来封建集团，而不能容忍人民民主的合理要求。

军事管制政府从1945年9月份开始就大量逮捕和诬陷抗日后备战士及抗日群众。9月22日，一名原日本宪兵部的暗探，死于新加坡铁巴刹（菜市）附近，6个抗日工作人员却因此被当作嫌疑犯逮捕起来，尽管没有充分证据，被告也完全否认，结果还是判处5人死刑，1人监禁6个月。霹雳州江沙万浓区比咯村发生马来人排华事件，进行自卫的18个华人，全部被判处死刑，而砍死华人妇孺老弱百余人的暴徒，却只有两人被判处死刑。及至人民抗日军复员以后，打击镇压抗日战士的行动，就全面加紧进行，不足两个月，就逮捕了几十个人民抗日战士。1946年2月15日，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大中城市，十数万人开会并游行纪

4、马来亚苏丹享有充分主权及立宪君主的地位；5、回教事务及有关马来习俗之事的管
理，应持于马来人之手；6、鼓励马来人社团之进步。

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所提马来亚宪制的意见，和马来亚民主同盟于5月间所提意见一样，
被英国当局摒弃一边。

1947年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和马来民族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简称Putera）
结成PMCJA - PUTERA联盟，形成广泛的民族联合阵线，提出《人民宪法》：给予马来
人55%的代表权；给予各族人民平等的公民权利；设立“各民族协议会”和“统治者会议”。
这个委曲求全的《人民宪法》，还是被英国殖民统治当局撇在脑后。

英国政府于1946年4月1日片面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军事管制政府同时撤销），立即
受到马来亚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后，基于分而治之政策和维持新加坡殖民地统治的
需要，英国政府与马来苏丹代表以及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UMNO）的代表协商，制订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宪制，
新加坡终于被分割出去，仍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然而，殖民帝国没有料想到，新加坡
人民经过斗争，还是在1959年6月3日实现内部自治，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不
列颠“皇冠上的宝石”，终于被殖民地人民摘掉了。

念四年前的沦陷日，各地军管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残暴镇压空手群众，新加坡5名青年学生被枪杀，受伤群众几十人，马共新加坡办事处代表林亚亮及群众百余人被捕，卢成、陈如旧等“十君子”被驱逐出境。柔佛拉美士游行群众被杀15人，吉隆坡、檳城、怡保各地横遭镇压群众的鲜血洒染街头。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维克多·巴素博士(Dr. V. Purcell)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对于华侨的政策，许多年来均以时常接近敌视边沿的怀疑态度为其特点。”（见《东南亚之华侨》）

五、人民抗日军复员

英国军事当局在英军完成了对新、马各州战略据点的控制，并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中队及分队驻地附近，作了监视布置以后，就向马共中央军委提出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照会。莱特假借马共中央的名义，在1945年11月15日正式接受这个决定，并以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分驻全马各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发布全军复员的命令。

当时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虚设机构，中央军委实际上是由莱特一人所控制操纵。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的决定，在抗日军战士和各民族人民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般群众普遍表示惋惜和失望，感到人民的权益将失去有力的忠实保卫者。

战斗在吉打玻璃市州一带的吉打人民抗日军，早在马共中央发布和平民主“八大主张”之前，在陈鲁、陈古、张云、刘荣光等领导核心主持下，曾经将“人民抗日军”的旗号改为“人民解放军”，计划以武力抗拒英军回归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英军统领就此向马共中央军委提出抗议，结果，陈鲁等人受到处分，调离部队，部队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

广大人民抗日战士对复员的决定，普遍表示不满，认为面对帝国主义殖民者，无条件放下长期流血牺牲换来的人民武装，人民民主权利就毫无保障。

当时，中央军委布置各独立队和中队、分队、层层组织指战员学习国际形势和八大主张，解释复员和进行和平民主斗争的原因。同时通过8月23日创刊的《民声报》及《现代日报》、《南洋商报》等报刊，阐明人民抗日军准备复员的缘由。刘尧也在中央军委作出复员决定的一星期后，假座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对各界代表及记者发表谈话，说明接受英军司令部关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决定的各种理由：首先是日本已经投降，人民抗日军的任务已经完成；其次是国际形势趋向和平，人民要求和平；再次是人民抗日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和马来亚人民一起，协助政府建设民主自由的新马来亚。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士在3年8个月期间，为维护马来亚各民族人民的生存权利，在非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和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定卓越的斗争，以弱敌强，以寡击众，三千余战士和抗日后备队队员，作出英勇壮烈的牺牲，取得显著彪炳的战果，进行了340多次战斗，毙伤敌人5,500多人，牵制数万日军，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战后竟受英军当局的排挤打击，甚至被强令复员，实在太不公平了。由东南亚联军派遣，乘潜艇在马来亚敌后登陆，和人民抗日军联络的重庆特派人员张德爵，在《由守备军而远征军再为游击队》文中，对人民抗日军战士的评价是：“在抗日军内，所有老少男女平等，唯一的目标是打倒日本蝗军，没有要求代价。”另一特遣人员夏士新给联军的工作报告中，也由于人民抗日军的英勇精神而引发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民族的子弟”的感赞。人民抗日军战士虽然大部分不是马共党员，但对中央军委的决定，行动上还是服从命令，思想不通也无条件执行。部分战士抑制不住内心的不满，有的找机会大量消耗子弹，有的将枪械零件拆下丢弃。

1945年11月下旬最后几天，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属下的中队，开始分别地区进行集中。12月1日，以独立队为单位，分别在8个城市，举行复员仪式。8个独立队，包括下属33个中队，1个独立分队的6,800名武装战士，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在城市举行的最后一次检阅，在军乐伴奏下，列队通过检阅台，向各民族人民告别，而后乘车回归住宿营地。几个独立队在检阅后立即缴出武器，有的独立队是

回营地才逐件点交。第二独立队500多战士，在芙蓉皇家山广场举行复员典礼时，全体起哄，冲上皇家山营房，两天后经过说服，方才忍痛交出武器。此事显示了广大人民抗日战士的激愤心情。

以下是各个独立队复员的地点：

第一独立队5个中队，在雪兰莪州吉隆坡跑马场复员。

第二独立队4个中队，在森美兰州芙蓉皇家山广场复员。

第三独立队3个中队，在柔佛州昔加末复员。

第四独立队5个中队，在柔佛州新山复员。

第五独立队4个中队，在霹雳州怡保复员。

第六独立队4个中队，在西彭亨文冬广场复员。

第七独立队4个中队，1个直属分队，在东彭亨关丹复员。

第八独立队4个中队，在吉打州阿罗斯打市政局广场复员。

各独立队所缴交的武器，包括卡宾枪、斯汀枪、来福枪、三八式步枪、轻机枪、手枪、手榴弹和子弹。各种枪械合计5,497件，子弹数十万发。战斗于东彭亨和丁加奴的第七独立队，从来没有接受过东南亚联军的空投武器物资，却交出数百支来福枪和三八式步枪。在森美兰州，人民抗日军所交武器数量，也超过盟军空投武器总数。据台维斯1945年9月13日在新加坡发表的“136部队备忘录”披露：“供应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总数共为2,000件。”（原计划供应3,500件，后因日军投降而终止）

复员的人民抗日军战士，每人得到复员费350元。复员后就在营地召开退伍同志大会，议决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总会的领导下，成立各州的分会，选出分会的常务委员和会长。每个战士认捐100元作为退伍同志会的组织基金。退伍同志会是人民抗日军退伍战士团结战斗的组织，分为全马总会、州会、区会3级组织。人民抗日军复员后，继续加强团结，密切联系群众，为争取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和全马人民一道继续奋斗。

第七章 历史的回顾

在马来亚的历史长河中，三年八个月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时间上是短暂的，但它无疑是马来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能否认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对推动与促进战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独立的历史功绩。但是，对于如何看待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成就与不足？如何评价马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军的历史地位？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持全盘否定或是笼统肯定的态度，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要对这些问题求得正确的答案，就必须持公正的、客观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

总的来说，经过三年八个月的浴血奋战，马来亚反法西斯抗日的任务已经完成，抗日战争已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日本法西斯驱逐出马来亚以后，却没有实现“抗日九大纲领”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战略目标，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这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那么，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究竟有那些成就？其不足之处又表现在那里呢？从军事上说，人民抗日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大量消灭日军，大片地解放农村和城镇、夺取决定性胜利的程度。马来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这个历史条件就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马来亚抗日战争是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日本妄想独霸东亚，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上的广阔战场上对中国、美国、英国、苏联，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作战，最后力竭而降，马来亚人民是与各国人民一道，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从历史的观点看，马来亚各族人民当时是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毫无权利，手无寸铁。到了日军入侵以后，才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捡拾英军遗弃的武器，建立游击队，克服了千难万险，逐渐发展

成拥有八个独立队，人数逾万，遍布全马九个州的庞大队伍。在三年八个月中，人民抗日军从无到有，在战争中成长壮大，给日本占领军以巨大的威胁和打击，保护了人民，打击了敌人，这在马来亚历史上是空前的。所以，更不应低估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成就，尤其是不应该低估为战争作出巨大牺牲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和数十万军民对马来亚历史所作的伟大贡献。这些成就和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团结和教育了人民，组织起来保卫自己，削弱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蹂躏，特别是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激起了马来亚人民的极大义愤。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武装部队和多种形式的抗日组织，军民团结，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民力量以打击日军，普遍地反抗日敌、奸细的迫害，肃清其势力，破坏其统治以保卫自己，使日本占领军妄图大肆掠夺马来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阴谋不能完全得逞。抗战期间，全马12个州（市），数十万有组织的各族人民，团结在马来亚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军周围，形成了一股空前未有的政治力量，这在马来亚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

第二，在军事上削弱了日军，牵制其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八个独立队，将近一万兵力，分散在九个州内，坚持不懈地展开游击战争，使数万日军疲于奔命，泥足深陷在马来亚战线而不能自拔，而且不断受到损失。据不完全统计，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损兵折将累计达5,500余人。对日军来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他们在东南亚各占领区中最难对付的游击部队之一。

第三，明确提出了驱赶日本法西斯，实现马来亚独立的主张，增强民族意识，为发展民族独立运动初步打下了基础。

马来亚主要由马、华、印三族居民组成，这三族都是外来移民。马来族移民较早，建立了九个土邦，而华、印两族移民较晚，加上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大国的传统观念，和英国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愚民政策影响，过去都自视为外国侨民，本土观念较为薄弱。所以，马来亚人民过去不像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具有较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马来

亚三族之逐渐团结成一个整体，形成独立运动，是通过反对英、日侵略者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中马共提出以“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为主要内容的抗日九大纲领，及其“三大民族团结起来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口号与实践，成为马来亚独立运动的巨大推动力。日本投降后，全马出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斗争的三族团结的局面，全马各族人民空前广泛团结起来，为反对英国政府发布的关于马来亚新宪制的《白皮书》和《蓝皮书》而进行了卓越的斗争。（注：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间，英国政府派出特使游说各州苏丹，签订了“允许英王陛下在各邦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的协议书，在此基础上，1946年1月，英国政府便单方面公布了《白皮书》，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1948年2月又公布《蓝皮书》，宣布将马来亚联邦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并宣布将新加坡分割出去，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联邦也好，联合邦也好，当时英国政府仍然掌握着管辖权，连自治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是独立了。因而，英国政府此举，立即遭到全马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这一民族独立运动，后来在马共倡议下，以各社团的抗日复员军人为骨干，联合全马41个政团为基础，成立了各阶层更广泛的“马来亚全国行动委员会”（简称“泛马行动委员会”）来领导反对英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斗争。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如此蓬勃发展，不能不追溯到抗日战争中，马共和人民抗日军明确提出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政治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抗日游击战争提高了民族的觉悟，增强了民族独立的意识，为各民族的团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继而在全马各政党、各社团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争取和斗争下，终于迫使英国政府放弃其宗主国地位，于1957年8月31日同意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

人们在肯定上述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成就的同时，不禁要提出如下的疑问：既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其战略目标，在战争期间力量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壮大，抗日群众工作的

开展也为战后建国创造了初步有利的条件，但为什么在日本投降后却放弃了独立纲领，而未能取得反侵略斗争的彻底胜利呢？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过去有不少人曾经为之困扰，感到迷惑不解。现在，马来亚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许多历史的真相已经大白，特别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形势发展，各种误解、偏见、成见，都将逐渐消除，只要人们冷静地去反思一下过去，是不难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的。

现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马来亚抗日战争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最根本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在当时形势下，马来亚自身实现独立的条件尚不完备；第二，作为抗日战争领导核心的马共内部存在严重的问题，造成指导上的失误；第三，英国政府坚持其殖民统治政策，顽固地镇压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三者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马共的失误，致使马来亚自身的不足条件没法及时弥补，也不可能最有效地领导全马各族人民对英殖民当局进行坚强的、长期的、胜利的斗争，结果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轻易地奉送给了英国统治者。

日本突然宣布投降的当时，马来亚自身实现独立的条件不完备，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不平衡。马来亚人民是由马、华、印三个主要民族组成的。因此，要在日本投降以后，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具备各种条件，首先是必须形成对三族人民都具有号召力的、为三族人民共同支持的、能立即率领人民从抗日战争转变为独立运动的具有政权性质的统一机构。但由于三族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局面当时尚未能形成。

马共提出了以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的“抗日九大纲领”，为实现这个纲领，曾经作过广泛的宣传，制定了三族团结的准则。而且在全马各个州普遍开展民族工作，唤醒各民族的觉醒，这对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从全面来看，则还没有使三大民族在这一国家独立的目标下达到最广泛的团结，更不可能产生统一的行动。

在抗日战争中，马共过于依靠华族，使日军和英国殖民当局藉以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制约了抗日战争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全面发

展。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华族二百二十余万人，除了在海峡殖民地拥有英属民籍的土生华人(Baba，马六甲居多)之外，当时绝大多数人仍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日本对中国进行罪恶的侵略战争，早已激起了他们的抗日热情，掀起了强大的抗日爱国运动。到了日本法西斯南侵，马来亚被迅速占领，广大华人面对宿敌，新仇旧恨，更萌发了对日本法西斯的刻骨仇恨。因此，华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是势所必然的。当时在人口中占有近半数的马来族则有所不同，因受英国的长期统治与压迫，他们对英国积怨甚深，而对日本法西斯却未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其抗日情绪是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逐渐萌发的。加上各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条件的不同，甚难沟通。因此，除少数与华族较接近的人士之外，对人民抗日军多采取同情或中立态度。

马来亚的印度人在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十。除少数中上层人士外，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马，在英资大胶园里当割胶工人。一般在三年契约期满后，英国殖民者就把他们送回印度。（也有一部分人仍滞留在马来亚不走的）所以，他们的“侨民”思想比华族更浓厚。他们仇视英殖民当局，更盼望印度取得独立。日军为了利用印度的民族主义力量来打击英国在亚洲的势力，它在占领马来亚后，便着手推动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组织“印度独立同盟”，并诱骗、胁迫在马来亚作战被俘的印军俘虏加入由日军一手策划的所谓“印度国民军”，诱导他们为日军准备进攻印度的战略目的服务。当时虽然有少数进步人士看清了日军的真正意图，积极投身抗日运动，但仍有一部分印度籍民却受了蒙蔽。等到后来日军的阴谋逐渐暴露，败局日益明显的时候，一些人又陷入彷徨和悲观失望之中。而马共和抗日军那时对印族中的情况所知不多，没有做好各民族的统战工作，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时揭露日军的欺骗宣传，争取印度族站到共同的抗日阵线上来，把争取印度的独立和马来亚的抗日战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争取马来亚独立必不可少的三大民族的团结阵线，始终没能建立起来。

军事上的准备也是不足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还停留在游击战的阶段，装备落后，没有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不可能集中优势的兵力去打规模较大的战争。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一支强大的、包括各民族的人民军队作后盾，要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是不可能的。

不论是抗日战争，或是民族独立运动，都必须依靠一个坚强的、正确的政党来领导。而作为抗日战争领导核心的马来亚共产党，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就被大叛徒、大内奸莱特混进党内，用两面派的手法，骗取了“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以极其卑劣的手段，在组织上对高层干部和党员实行轮番出卖，在政治路线上采取一系列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极左极右、似是而非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以干扰马共党内、干扰人民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给马共，给马来亚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损失。其所犯下的罪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罕见的。

清算莱特的罪行，本是马共内部的事。但因人民抗日军是由马共所创建和领导的，莱特的出卖，不仅危及了马共内部，而且危及了人民抗日军，同时也危及了全马各族人民。为了说明抗日战争未能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本书不得不从已揭露出来并已公诸于世的历史材料中，从马共人士透露的一些情况中，加以综合介绍，让读者有所了解，以便对马来亚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作出公正的、客观的判断。

莱特原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叛徒，最初由法国政府所豢养，后由法国转让给英国特务机关，成为国际间谍，于1935年打着“第三国际远东局特派代表”的旗号混进马共，1939年以欺骗手段篡夺了中央书记职务，是马共党内的大内奸。当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奸细，造成马共领导机构受到极端严重的破坏。据现有资料揭露，日军占领新加坡不到三个月，莱特已出卖马共中央委员有黄诚（黄石），阿宁（郑声烈），张锦章，林江石（黄伯遂），阿白衣（李良），刘文（钟步青），小路（陈培青），阿丘（丘联杰）等人，在莱特一手制造的“九·一”事件中当场牺牲的有中央委员小忠（李振宗）和朱老（朱日光）。1943年4月，中央委员蔡克明和小平

（林旺生）先后在新加坡和雪兰莪境内由莱特出卖而被捕。至此，马共在1941年第七次中央扩大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成员，除东彭仅存下亚仲一人外，其余全已被捕或牺牲殆尽，中央委员会名存实亡。但莱特仍然以中央书记名义发号施令。与此同时，全马各州（市）的领导干部也大量被捕，机构受严重破坏（新加坡损失最为惨重），以致无人知晓中央情况，也无人揭露莱特的可疑行径，使得这个大内奸仍然能以党的“领袖”身份控制党、军重要事务。

莱特秘密投降日本占领军后，除了大规模出卖抗日志士外，也曾妄图改变原马共中央所制定的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路线，曾经窜到“三独”司令部所在地，假借中央的名义勒令解散抗日游击队，放弃武装斗争，但遭到全体指战员的抵制，其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又向全军发出了所谓“保存实力，等待时机，配合联军反攻”的消极作战方针，妄图捆住人民抗日军的手脚，使部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不是积极作战，从战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幸当时各个独立队司令部在各该州马共地委领导或配合支持下，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各自独立作战，莱特不可能一一实行控制，干扰还不致太大。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地马共组织对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重视不够，民族工作发展不平衡，不重视抗日游击区域的政权建设，以及各独立队缺乏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等的失误，或多或少都是和莱特提出的“消极抗日”的方针有关。

最关重大的是他代表马共与联军签署的合作条款。1943年12月底，在霹雳地委的接应下，莱特化名张红，代表马共、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会，与东南亚联军总部代表台维斯等人会谈，签订了“美罗军事协议”。这一次的谈判，从策略上看，为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各抗日反法西斯军队之间的协作是完全必要的，合作的意向无可非议。但友军之间的合作必须是平等和友善的。而莱特签署的协议却把人民抗日军变成英军的附庸，成为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的牺牲品，完全丧失其独立地位。这是明目张胆的叛卖。但是这个秘密协议除曾经参加谈判的个别人外，当时在马共党内却无人知晓。直至日本突然投降，马来亚独立问题立待决定的时候，莱特急忙抛出“八大主张”取代“独

立纲领”，强令人民抗日军复员，完全出卖马来亚人民抗日成果，使英国顺利地恢复其在马来亚的殖民地统治地位。历史证明，大叛徒、大内奸莱特是这段可悲历史的罪魁祸首。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马共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又是战斗力很强的政党，为何对一个混进党内12年，窃据最高领导职务达八年之久，而且犯有严重罪行的奸细却不能觉察，直至铸成大错才来清算？这在不知实情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造成这个恶果的原因有几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首先，马共成员绝大多数是华籍。英国统治者对马共及其同情者采用逮捕驱逐的办法，成批成批地将马共各级干部（特别是高层的领导干部）逮捕驱逐出境。因此，长期以来，马共高层领导的连续性受到破坏，无法形成一个较稳定的领导核心，这就给了莱特混进党内进行破坏以可乘之机。

其次，马来亚地处国际交通要冲，各色人种混杂，外籍人加入马共不觉奇异。加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行个人崇拜，马共干部也盲目地推崇“领袖”，把莱特吹捧为神奇人物，受到盲目的信任。更主要的还是因马共长期处于激烈的地下斗争环境，组织高度机密和分散。莱特利用这种环境，借口严密组织，除了规定的交通员之外，不许任何人接近他，因而使他能够逃避党组织的监督，以售其奸。

最后，莱特不是一般的奸细，他善于运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面伪装革命，用各种巧妙的手段，包括提出各种似是而非的论据和政策，迎合各个时期的各种思潮，骗取党内的信任，这对于当时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马共青年党员有很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他又以极隐蔽的办法与其主子合作，而英、日特务机关，则与之紧密配合，制造各种假象，千方百计加以掩护，也使他的罪行不易被觉察。

莱特的手法无疑是狡猾的，他的罪行确实骇人听闻。但如果把这个内奸看成是能呼风唤雨，能扭转历史航向的人物，那就错了。凡是鬼魅不能见太阳，莱特只有伪装革命才能掩饰其奸细面目，继续其破坏阴谋。加上他在革命阵营中是完全脱离群众的，他只能暗中破坏，却无法阻止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马来亚共产党经过三年八个月艰苦

卓绝的抗日战争，把党的队伍扩大了4倍，达到8,000余人；创建了拥有上万战斗员的人民抗日军，和将近50万人的抗日群众组织，领导马来亚人民坚持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直至取得胜利。这些历史成就的取得，靠的是马共无数党员干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主动性和无限忠诚；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敌忾同仇，团结战斗，不惜任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靠的是原马共中央早已制定的武装抗日正确路线和政策。区区一个内奸莱特，何能螳臂挡车！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共广大党员、干部的视野扩大了，政治警觉性提高了，从实践中逐步识破了莱特的真面目，1947年终于清算了这个大叛徒、大内奸。这个混进马共党内多年的国际间谍，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英国政府坚持其殖民统治政策，顽固地镇压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更是给马来亚人民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早在1943年2月，即9万英军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后仅仅一年，英国战时内阁已责令其殖民地部与陆军部共同草拟收复远东各殖民地的军政方案，马来亚是其中的重要收复目标之一。是年7月成立了由霍恩主持的马来亚策划小组。12月，霍恩小组已经完成了重新占领马来亚后的政制计划。1944年5月，英国战时内阁的“马来亚与婆罗洲调查委员会”接受了那个计划，并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军政官员队伍，准备做接收大员，一到日本宣布投降，便跟随着英军蜂拥而至，按照他们早已拟订的殖民主义政策，重建殖民地奴役制度。

1945年9月3日英军首批在槟城登陆，12日在新加坡接受日军投降，英国以两个军的兵力重新占领了马来亚，随即成立军事管制政府。

英军重返后施行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宣布日本军用票作废，而对人民毫无补偿，人民不得不变卖物资，去换取英当局抛出的马来亚新货币，一下子就掠夺了数以亿计的人民手中物资。为了防止马来亚人民的反抗，英军迅速接管了刚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委员会，接着又迫使人民抗日军复员。

当英军站稳了脚跟，殖民地政权确立之后，对马来亚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便日益加紧了。

1946年1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马来亚新宪制的《白皮书》，把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分开，均由英王委派的总督为最高统治者。这份《白皮书》立即受到全马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1月29日，新加坡数十万工人首先发起了反对《白皮书》的总罢工，一场反对《白皮书》，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在全马来亚展开。2月15日，全马各大城市举行悼念日军占领四周年大会，英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在新加坡、拉美士等地打死打伤许多工人和青年，当场逮捕了新加坡马共代表林亚亮等人，造成“2·15”流血事件。同时搜查了新加坡总工会，《新民主》报等机关团体，逮捕了全马总工会筹委主席卢成等10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即有名的新加坡“十君子事件”。）英国政府抛出的《白皮书》在全马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对下，同年12月23日又抛出一项《蓝皮书》以代替《白皮书》。《蓝皮书》公布后，除了上层少数人拥护外，各族人民仍坚决反对。

英国统治者把马共和抗日军人视为推行其殖民政策的主要障碍，制造了许多事端加以打击。“2·15”事件和新加坡大逮捕之后，相继在柔佛州搜查该州总工会，逮捕吉隆坡原抗日同盟会干部宋光、霹雳州总工会主席陈洪明、麻坡马共办事处代表符洪亮、柔南抗日军人朱高、霹雳的赵辉煌等人。1947年4月28日，英军警在吉打州的南区芭口橡胶园(Dublin Estate)对正在开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数百名马、华、印橡胶工人（其中较多数是印籍工人），进行武装血腥镇压，当场开枪打死华工罗德，打伤印籍工人数十人，逮捕了总工会代表林苏及印籍工人“三米”等4人，造成震动全马的“罗德惨案”，事件层出不穷。马共和抗日军退伍军人不顾英军的打击，于1947年7月20日和10月20日，两次由全国行动委员会和马来人统一阵线共同发起举行全马总罢工，要求民族自决的口号响彻云霄。但到了1948年2月1日，英国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宣布，根据《蓝皮书》组成的“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顽固地推行其既定的统治政策。

1948年6月，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确定在东南亚搞一个所谓的“防疫带”，准备全面军事进攻。

6月初，英当局逮捕了新加坡橡胶工会主席，和新加坡总工会副主席。6月12日，新加坡政府下令禁止全马工会联合会的活动。

6月17日，马来亚高级专员授权各州警察局，对抗拒者可就地枪杀，柔北立即出动军警镇压印籍胶工大罢工，造成大流血事件。6月17日，包围马共的机关报《民声报》，逮捕编辑、员工三十余人，并封闭了《民声报》。

6月21日，宣布全马来亚处于“紧急状态”，发布了《紧急治安条例》，向马来亚人民发动军事进攻。从6月20日晚间至21日晨全马逮捕600多人，300多个工会和群众团体被封闭。7月下旬宣布马共及其他许多组织为非法。大批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及无辜群众，陆续被驱逐出境。至此，英国在马来亚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登峰造极。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回顾过去，马来亚人民为了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曾经走了一段漫长的、崎岖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一历史潮流，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看看今天，在世界人民的持久斗争下，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系，终于土崩瓦解。

第二篇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选编）

胡铁君 编



一 星华义勇军怎样的诞生

星华义勇军是华侨抗敌的急先锋，他们首先代表了马来亚 2 百 50 万侨胞反法西斯的实际行动，他们站在新加坡前线的最前线，用血和肉去拼敌人的枪与弹，用血和泪去写华侨保卫新加坡的光荣历史，用血和泪去号召全马民众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法西斯侵略者，但是星华义勇军是怎样诞生及他们的战斗经过情形，因为那时星洲情势混乱，华文报已停刊，很少人知道详细情形。故特于兹公诸社会，作为侨众的参考。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寇发动侵略马来亚，于吉兰丹哥打峇鲁登陆，以破竹攻势击败英兵，重庆中央政府鉴于马来亚情势严重，欲保护华侨第二故乡，欲增辟海外战场以牵制日寇兵力，必须动员海外侨民。乃向英驻重庆大使建议，由英大使转电汤姆斯爵士进行动员工作，最初总督仅作消极的防空工作人员雇用，其后因北马情形更严重，霹雳重要防地相继陷落，12 月 27 日政治部长及总商会长连瀛洲，林谋盛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处，传达总督欲彼领导华侨总动员，协助英当局保卫马来亚。29 日总督乃召集各政党及侨领开会，会中曾决定华侨总动员事项。30 日陈嘉庚乃假中华总商会，以总督命令召集侨众大会，大会曾通过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会，分设保卫团，劳工服务团，民众武装部——星华义勇军。31 日继续开会选举职员，并决定以晋江会馆为总办事处，保卫团，劳工服务团立刻征募团员，协助英政府服务战时工作，民众武装部经会议公推正主任一人（马来亚共产党员林江石），副主任二人（中国国民党员，名字不详），负责组织星华义勇军，在当年参加大会之各抗日社团设立义勇军报名处，开始征募自愿入伍之华侨热血青年，一星期间报名者已达三千之众，其后陆续报名者数达万名，而柔佛之黄梨及树胶工友约数万，跃跃欲动，愿与星洲义勇军配合行动。

1942年1月31日夜，英政治部长以电话请民众武装部正主任林江石谈话，据称“柔佛英军已撤回星洲，柔佛长堤已炸断，明天，新加坡保卫战将开始，当局已决定死守星洲，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星华义勇军应立即集中，开赴前线，协助当局保卫星洲”。2月1日林主任乃发出命令，将星华义勇军集中于该军司令部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因当时星洲情势混乱，交通困难，报名参加义勇军人员，多因空袭迁移地址，故该军虽有甚多侨众加入，然出发赴南师总部者，实只一千三百人。马来亚英军司令部派出之官佐亦已抵达总部，以英人打理上校为总司令官，副司令为华人胡铁君少校负责指挥该军，民众武装部，由晋江会馆迁移至司令部执行任务。

二 星华义勇军血战经过

第一连出发 1942年2月4日中午，第一连同志奉命出发裕廊18碑前线。连部设于离马路约300公尺的胶园里，右侧方为第一排防地，中央及左翼是第二排第三排防地。在右侧方大约是10英里的十八吉芭最前端，面临着碧绿大海，对面是新山，敌人进攻新加坡的根据地，十八吉芭不是高山，也不是大杵林，不过是一个荆棘丛生，泥泞没膝的一个很难行走的地方，我们的前哨阵地设在芭的中央一间茅屋里，每当奉命赴前线警戒的时候，同志们必须经过一条羊肠小径，那里泥泞过膝荆棘丛生，甚至有许多枯腐的荆棘，埋藏在土中。通过这条艰险的道路时，一不小心，足就要受伤，但是这种的艰苦，我们毫不觉得，因为那时我们只知抗日杀敌，大家都抖擞着精神，在那里筑防御工事及演习战斗工作，每个人都以愉快的心情迎接敌人进攻。

第一次奏凯 记得5日的深夜，陈灿与十几个同志利用地物，将浮在水面上像鸡笼似的东西，用腰间的巴冷刀，砍成了一个圆形小口，大家分散的埋伏在里面，海潮渐渐地涨大了，下衣也湿了，一阵一阵的海风迎面吹来，带来了敌人的野炮声、喇叭声及新山的犬吠声。

同志们鼓足了勇气，抖擞着精神，加紧防范监视着敌人的行动，敌人的探照灯在找寻我们的阵地，照耀得如同白昼，好在我们已经早就掩蔽着，敌人没有法子找到我们的阵地，过了一会，敌军巡逻队扑通扑通的，向着新加坡的海岸前进，同志们不慌不忙等候敌人靠近我们的防线时，大家向着敌艇瞄准，长官下一个“放”的命令，敌人的狗命，随着枪声倒了几个，巡逻艇迅速地退却了，当时除派一位同志，向上峰报告战情外，其他的同志仍旧肃静地执行防卫任务。

第二次得胜 6号的晚上，风声更加紧张，指挥官命令加紧戒严，敌人照样的用着探照灯，搜索我军，因为昨天晚上吃了亏，敌人派更多的橡皮艇，大约是有30多艘，但每艘橡皮艇只坐着一个敌兵，在前进时露着狰狞面目，同志们一点也不害怕，相反的更增加同志们敌忾同仇的决心，当敌艇抵达我军火力有效射程内时，同志们的手榴弹在敌艇左右爆炸了，步枪也集中火力在发射！不断地发射！把30多艘敌艇都通通葬身于海底，兽兵一个也没有生还，夜是静悄悄，四面的虫声和海的怒涛声，好像是向我们奏凯旋歌。

登陆战开始 7日的早上，英国军官——连长——召集全连同志训话：“根据各方面情报指示，敌人将于今晚或明晨开始向新加坡大规模登陆，诸同志应该更加严密地防备。”新山的大炮怒吼着，敌人借着重火器的掩护，于8日下午七点半钟开始登陆了，同志们依着老法子，等敌军靠近防线时才开始攻击，这一次敌人败退了，是晚深夜三点多钟，敌机在我军阵地上空，投下很多照明弹，大地如同白昼，大概是第一次败退敌军报告了我们的防御阵地，飞机上的机关枪弹，如同暴雨一样落在同志们的周边；对岸的炮兵也集中了火力向我们炮击，在此种情况下，我军仍屹然不动，一直到黎明时才与敌人发生剧烈战斗，你来我往，杀得敌人心胆也寒，我军正想乘胜追击时，友军防线崩溃了，我军受着右侧方的压力，如不趁势退却，将陷入敌军包围圈，因此不能不向后撤退。

裕廊律15碑之役 敌军的炸弹与大炮，沿着裕廊律继续炸击，天公也不作美，下着很大的雨，大家徒步向裕廊15碑（碑或石指英里，下同）前进，驻扎在没有人住的空屋。——那时该处居民早已疏散——早

餐后，全连义勇军同志开了一个会议，准备向上峰请求给我们更好的武器，更多的子弹，准备反攻敌人，与敌人作殊死战。可是计划还没有提出，而中午 12 点钟，敌人的重机关枪开始向我军阵地扫射，敌军的尖兵队开始向我军防地跃进，立刻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双方均有死伤，在我军英勇抵抗下，敌军被迫采取守势，二小时后，敌军复卷土重来，并有飞机数架在上空掩护，在战壕里可以很清晰看到飞机上的太阳旗和那日本字，本来英空军在马来亚内陆作战时已经被敌机压倒了，因此我军上空绝无掩护，任敌人作低空扫射，而且那 15 碑一带童山秃秃，绝无天然遮蔽物，在此双重压迫下，我军复向后方撤退。

裕廊律 11 碑之役 裕廊律 11 条石一带所有高地日军未曾登陆时，英军司令部早已部署着大批军队于该处，并且筑有坚强的防御工事，当我军在裕廊 18 碑一带与敌军激战时，这些防地就连续不断，遭受敌机轰炸。8 日深夜我军奉命由 15 碑撤至此地布防，该处的地形，是品字形，尖端高地为我军，右翼为印军，左翼则为澳洲军，我军虽经一夜辛劳，但为着战局紧迫，大家都鼓着勇气，忘记了疲倦，黑夜中加紧布防，及巡逻与警戒。这夜平静地过去了，9 日早晨九点半钟，我军因携带的炊具工具沿途略有遗失，因此诸多不便，故早晨大家仅进些点心充饥，这时我军哨兵瞥见日寇三人坐着脚踏车，沿裕廊律柏油路前进。该哨兵一面监视敌军行动，一面派同志向上峰报告，当敌人迫近我哨兵警戒线时，我军来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三名兽兵已饮弹而亡，不久敌军大队兵员配合着空军战车，向这品字形阵地，分头攻击。我军不顾情势之恶劣，奋勇迎敌，坚决保持阵地，在这广大的战场上剧战数小时，不幸的右翼印兵防线开始崩溃，我军压力加重，正连长英人此时已受伤毙命，乃由副连长负责指挥全连同志继续作战，左翼澳洲军已与我军采取密切联络，并向敌军作勇猛冲锋，我军为配合友军作战，亦争先恐后，奋勇向前，敌先锋队一名已被我军擒获，并毙敌多人，我军亦有 6 人殉难，双方在旅进旅退中，争取主动。正在此时后方澳军主要阵地遭敌机蹂躏，破坏不堪，再继续死守，情势已不允许，乃迫得与澳军共同退却，曾突破数度包围线，并遭敌

军埋伏射击，是时星岛四周，已在浓烟炮火笼罩着，我军仍据守武吉知马六条石与敌人继续顽抗，至最后 5 分钟。

包围大星洲坚守林厝港 林厝港是距新加坡相当遥远的一个地方，从武吉知马 10 条石向西行，经过丁宜飞机场一直前进，在马路尽头就是林厝港 19 碑半，那里在平时是一个风景柔美地方。可是在战时，它就成为保卫新加坡的要冲，英军总司令部曾部署着一队澳洲军防守该处，星华义勇军第二连是驻守在右方的英人“专吉生”胶园里，利用胶工住的屋宇作为我军驻扎地方，有一排是负责警戒连部，其他二排则分别巡视海岸。敌人对林厝港是非常注意，经常用大炮飞机向那边轰炸，最初炮弹是稀疏，后来渐渐地密了，机关枪也在我军阵地作低空扫射，但是同志们并不因此动摇了抗敌复仇决心，对于阵地的防守，丝毫不肯放松，6 号夜间，适值第一排第二班负责警戒时，5 艘敌橡皮艇开始向我军防地进发，我军与澳洲军一同发炮，把敌艇击沉 3 艘，余下 2 艘，狼狈退回去了。

专吉生胶园我敌大搏斗 7 日起敌炮兵开始连续不断地向我军阵地作有次序的点放，敌机也与敌炮兵采取一致行动，一批一批的飞来我军上空，扫射机关枪与投放炸弹，暴风雨一样的炸弹，落在我军阵地，但并不得到很大收获，只有一个同志受了伤。黄昏后敌人投放照明弹，一方面指示炮兵目标，一方面在找寻我军躲避所，以使用机关枪扫射，这是登陆战马上就要发生的征兆，同志们更加小心防卫，个个持着枪很紧张的等候敌人前进。时光慢慢地过去，黎明的时候敌人的登陆行动终于开始了。最先敌人用 5 艘登陆艇作前锋，一经靠近我军阵地，立刻击沉了，随后敌人更多舰艇，并且上空有飞机掩护，浩浩荡荡前进，那时候双方喊杀之声震天动地，彼此的炮火，好像连珠炮一样的响着，左翼澳洲军的战斗似乎更剧烈，不过经过了一个钟头，枪声渐次消沉，同志们都很欢喜，以为进攻左翼的兽兵已败北，正面的进攻当然也不能为力，当大家很高兴的时候，左侧方突然有日军谈话声音，我军乃知事态不妙，立刻埋伏在茅芭里等候敌人，一个命令，手榴弹与枪弹向敌兵打去，两个兽兵僵直直躺在那里，已是血肉模糊，以后更多的日军，如潮涌一样向我军阵地围攻，那时同志们

虽然坚决地抵抗，但已知左翼澳洲军阵地一定发生了变化，我军的官长指示了方向及集合地方，各排分别的突围而出，此役双方死伤颇重。

三次遭遇战日兽兵惨败 在撤退的路途中与敌人发生三次遭遇战。第一次我军以迅速的战斗行动，击毙敌兵1名，其余的兽兵乃向后方窜逃，另一个班长他的名字叫做梁文雅，在一个羊肠小道上也碰上5名兽兵，立刻展开战斗，此役毙敌3人，我方亦有2个同志受伤殉难，约摸是再前进半英里又遇着一队几十名兽兵，双方亦发生战斗，我因众寡悬殊，并不敢恋战，且战且退，直至与友军取得联络，敌兵始不敢追击。

林厝港 16 碑华澳军共抗敌 同志们按照上峰指示，集合于林厝港 16 碑与澳洲军三百余人汇合一处，声势乃振，敌机追踪炸击，使童山上的我军，有不少死伤，敌步兵对那 16 碑高地，也作包围行动，加且包围圈已次第缩小，澳军当局乃决定突围，大家满坐在罗里车上，一直的冲出，不幸得很一辆罗里车受了伤，不能走动，那些兵士均被敌人捉去，有一部不肯被俘受辱者，坚决的与敌人战至一枪一弹，才壮烈殉职。

17 条半碑 19 烈士战死 冲出专吉生胶园时，第三排一部同志失去了联络，而该排排长何微波左手且受了伤，当退至 17 条半碑时，遭敌包围，同志们毫不惧怕，坚决地与敌人作殊死斗，结果激战一点多钟，而该排冯松经、莫奉恋、冯廷坤、何琼等 20 位同志，除该排长尚生存外，其余均壮烈战死于星洲曦光社后面高地。

林厝港 12 碑我敌成拉锯战 9 日中午 12 时，我军全连同志均集合在 12 碑，此时澳洲军已与我军取得密切联络，该处与日军部队，曾发生非常激烈恶斗，在一点半钟的攻击中，义军死两人伤若干人，澳洲军阵亡 10 人，敌兵则战死 30 多人，经过这场恶斗后，敌气焰已稍减，我军乃联合澳洲军开始反攻，敌军狼狈败逃，我军乘胜追击，进展 5 英里，是时我军仍有一二小部队，仍在后方与敌激战，见我大队反攻获胜，乃与大队汇合，及后敌再派兵增援反攻，我军因实力悬殊，且战且退，以候援军抵达。

第三连第四连奉命援救我军 第三连原防巴丝班让 13 碑一带防地，第四连则防守后港樟宜一带，因武吉知马战局危急，乃奉命离防援救我军，是时武吉知马一带浓烟蔽天，战事甚混乱，双方几成混战，在英印军与澳洲军数次反攻新山时，我军亦配合动作，旅进旅退，转战于武吉知马之原，建功殊伟，但牺牲亦重，据后来昭南日报随军记者报道日军当局曾误认我军为中华民国正规军便衣队，延慢了日军登陆时日，此后新加坡战局起了绝大变化，英当局已决定将星洲作战略放弃，我军无法，乃奉命陆续从前线，返回总部，星华义勇军于 2 月 13 日宣布解散，然仍有大部同志继续战至 15 号英军投降前最后一分钟，星洲沦陷后，诸同志继续为抗日而努力，因此遭敌屠杀者不少，而在敌后工作，建立功勋者亦甚多。

保护星洲人民粮食 抢救丹戎巴葛货仓

“没有行军，先行粮”这是中国古代用兵一个先决条件，直至现在这话还是适合，当年新加坡遍地烽火浓烟蔽天，每个人民都感觉到粮食的重要，政府当局为万全计，也曾将米粮及白糖等分配到各会馆各商号寄存，目的在减少敌机的破坏力。政府物质存量虽丰，然星洲是否要作长期战斗，那时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复这问题，因此星华义勇军对于全星人民粮食非常重视。当那年 2 月 3 日敌机炸中了丹戎巴葛货仓时，火势燃烧甚烈，眼看这些珍贵粮食用品要毁于大火中，那些胆怯的抢救员，已屈服于敌机暴弹下，“打理”上校——我军的司令官，说明了粮食重要，征得林主任同意，仍派出三百余同志，前往目的地抢救，以最英勇姿态进行工作，使得英籍抢救员频频以拇指或 V 字向着义勇军同志们微笑。可是敌人很狡猾，他们知道炸中了货仓一定有人抢救，乃利用着焚烧货仓的浓烟为掩蔽，从高空前来偷袭，投下暴雨式的炸弹，但是义勇军在空袭警报发出后，仍继续工作，直至最后一刹那，才全部卧倒，因此迫不及待，很多人伏在同志们的背上，有一处连续伏着 4 个同志，而上面 2 个同志是死亡了，第 3 位背上也

受了伤。这次的空袭死亡3人，轻重伤数十人，同志们的英勇事实，于次日华字报上和大家见面了。

樟宜受训

老 陈

1942年1月，新加坡正燃烧着抗日的火焰，武装民众，保卫大星洲的口号，响遍了每一个角落，可是当时军事人才贫乏得实在可怜，抗敌动员委员会为补救这种缺点，曾由武装部林主任派出23位同志，赴美芝律义军行营长官处，检查体格，然后派赴樟宜十三条半石训练营训练，这些同志们多数懂得英语，训练期间，虽屡遭敌机低空扫射，但大家并没有恐惧与气馁，仍旧在紧张情况进行工作，不幸得很一位同志竟死于暴敌枪弹之下，那时我们虽然没有派到前线与义勇军同志并肩作战，但是这些人员，于星洲沦陷后分散至各地教练与组织人民抗日军，给予马来亚军事上很大的帮助与发展，据我所知，吉隆坡（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刘尧同志就是训练营杰出人才。

三 三年半来抗敌工作回顾

A. C.

星洲陷落后，我同着几个同志，离开星洲，他们有的在柔佛金马士下车，有的在中马的雪兰莪下车，我是不断地前进，直至北马一个村镇才下车。目睹着那些乡村给日寇蹂躏得鸡犬不宁，许多人避居深山，民族败类到处在做那趁火打劫的勾当，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中。

继续为抗日而奋斗，是星华义勇军解散时的共同口号，共同工作目标，日子是模糊了，一天的中午，我集合了该村十几个热血青年，在一个广大的山林里开会，决定了组织游击队方针，此后大家照按方针，努力工作，我们的队伍，开始建立起来。敌人的进攻，也加紧了。

我们的流动队时常与敌奸走狗发生冲突，但是每次的冲突汉奸走狗都饮弹毙命，我们的队伍没有一次不安全凯旋。

经过了相当时日，我们的队伍与其他的队伍取得联络，并且接纳上峰命令，经常开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最初的一年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也非常困难，粮食的恐慌与药品的缺乏，使许多同志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身体瘦得使人不敢相信。每天仅吃些少木薯与食盐，有时一连数天都没有吃，吃粥的机会更少，饭是不用说。如果病倒了，那也只有听天由命。在这些困难条件下，同志们并不失望气馁，反燃烧着誓与敌人作殊死战的无名之火。夺取敌人的武器，增加我们的实力。在这种口号下，我们的队伍就在敌人的疯狂压迫下强大起来了。

敌人的强暴横蛮，使马来亚三大民族同胞，从梦中惊醒，三年半来他们都站在饥饿的死亡线上。他们已经了解自己的责任，也认清了敌和友。因此对于游击队的帮助渐次增加。不单是粮食方面，同时在情报方面也有很多贡献，因此敌人搜索游击队的困难增加了，我们袭击敌人的效果却扩大了。

我们的军训是具有特殊性的，不是仿效某个国家，我们是把一切进步的战斗精髓抽出来，加上自己研究的效果，并且配合马来亚地理环境及人情风土而成为马来亚抗日军的步兵操典。我们有时读书，有时操练，有时作野战演习，有时却做耕种工作，有时也出发“打狗”（指消灭敌奸），三年半来我们就在这样的工作范围内消耗了时光。

随着时间的延长，民众更进步了，我们也更进步了，在第一个年头的困难问题，已次第克服，群众对于粮食及金钱的帮助加多了。对于游击队的行动更加了解，更加同情，更多帮助，成千成万的各民族青年都加入抗日队伍，敌人的破坏与诽谤，毫无效果。但是敌人对游击队的进攻并不放松，反变本加厉。如叫平民作集体居住，以绝人民对游击队接济，设保甲制度，实行以华制华，农村里的犬也要杀绝，以减少兽兵搜捕游击队的困难，他若统制粮食……无不竭尽智力，想尽方法与游击队斗法，但由于马共政治路线的正确领导及民众普遍醒觉，敌人的政治攻势崩溃了。合配着政治攻势的是兽兵，不断的进攻游击队的根据地，可是每次的进攻都付出很重的代价，却没有什么收

获，不过乡民受了更大的鱼肉。那是兽兵在每次进攻失败后，都迁怒于民众，因此身陷囹圄，遭受人间最残酷毒刑而死亡的，不可胜计。

最后的一年，我们的队伍更强大，并且得到联合国给予新式武器并服装粮食药品。汉奸走狗与寇兵的死亡率增加了。横蛮强暴的日寇，终于在游击队面前宣告屈膝！

四 星加坡保卫战的回忆

铁 君

1941年12月8日，敌军在北马哥打峇鲁登陆后，很快的进展到北马。同月23日的下午，战线迫近我住的地方，因此我同一位昔日星中报同事陈君开始“撤退”，火车抵达打巴律时，一位客人说：“这列车在拿哈曾遭敌机扫射，随后华都牙也车站也遭了轰炸，真是危险啊！”他在叹气。

26日在马六甲会见江君，与甲埠青年组织抗日部队，但进行不很顺利，在那里住了一星期，正感到苦闷的当儿，在报上看到了陈嘉庚先生奉坡督命令，召开侨团大会，成立星华动员总会，该会分设保卫团、民众武装部、劳工服务团。我就在那天很欢喜地到了星洲。

次年2月1日，我开始统率该军一部，出发赴南师（南洋师范学校简称，下同）——义勇军总部。

这一群只具爱国热情而没有军事训练的青年，继续不断地向南师集中，第二天英国军官来了，武装部主任林江石同志，他同英军官“打理”上校——是义勇军的正总司令官——商量后，要加一个少校大官衔给我，作为义勇军的副司令官，当时实在有点不敢当，不过由于当时义勇军里，很少人有军事学识，因为我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在这种情形下，不过勉强接受了。战局一天一天的加紧，星洲岌岌可危。一位英军官因此闹了笑话，他要义勇军立刻开到前线负责防卫星洲，否

则前线有任何不利，要义勇军负责。这真是好笑极了。他在急迫中竟以为义勇军是神，好像没有我们，星洲立刻就要陷落了。我们回答是冷酷的：“谁叫当局这样迟缓才发枪，星洲纵有任何变化，这责任我们不能负担，而是英国的执政者”。我们的部队终于执着大概是 18 世纪的猎枪——开至星洲的最前线。在出发的那天，国民党的黄同志率领一部工程队，他们对于地雷的埋放及手榴弹的使用是有专门学识，而且会说英语具有一切军事常识，这样我在非常欢喜的情境中，把他们分别的派到每一连里面工作，同时马共宣传队，也不断的鼓励着他们。在这紧张情况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连继续由南师开到前线去防卫。记得当敌人的巡逻队在柔佛海面移动时，曾遭第一连同志袭击，获得小小的胜利，消息传出后本坡各字报就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过誉的奖语。

经过飞机大炮 24 小时的炸击后，2 月 8 日的清晨，敌人登陆了，负责防守该地的同志，正在激烈战斗中，左右及后方的友军竟退却了，在恶劣情势下，他们仍然继续奋斗，手榴弹及枪弹用完了，在粮尽援绝时，第二排且遭敌人的包围，他们虽突围而出，但损失很重。

10 日在皇宫戏院开星洲民众紧急会议，我代表义勇军出席，在大会中决定要求总督给我们较好的枪，民众都愿为我们后盾，可是这要求并没有传到总督那里。

大概是 11 日的晚上吧！升旗山的大炮怒吼了，战局的恶劣不言可知。在那时我曾同一位英国军官用电话问他们，究竟新加坡的情势是怎样了，炮兵司令部答复是：“你没有权过问”，后来经过再三的解释，并说明了我们是星华义勇军总部，假如战局真正危急时，我们要采取最后步骤，处置这里数千义勇军，于是他们说：“战局的真正变化当在三四天后”，第二第三天，义勇军陆续的从前线回到总部，究竟这次死伤多少人都不能作切实的算计，这是一件抱憾的事，而且负责收藏义勇军名册的林主任又殉难了，所以今天没有法去调查真正义勇军的姓名。

13 日的早晨大家集中着，等候打理上校司令官到来，大约近中午时他来了，用着不很流利的粤语对我们训话，“新加坡已经决定作战

略上的撤退了，当局感于义勇军的英勇，不愿将你们作无谓牺牲，上峰已经决定在今天将你们解散，希望你们在英军进攻马来亚时作为内应……”。大家听了这消息，垂头丧气，每人领了10元饷银及粮食，扫兴的各自奔走，而遗留下的枪支与弹药，则由几位共产党员负责埋藏。

我离开了南师，本想同如旧几个人，往苏门答腊，可是没有船，结果大家还是分开，那时候大家都看我们是“危险分子”，不愿与我们同住，没有法子我回到客属总会——没有人敢拒绝的公共地方。2月15日永久不能忘记的日子——新加坡的战斗停止了。16日早晨又得到超凡叔的允许，由客属总会到了他的宝号一万川栈——因为那时的客属总会容纳了数千难民，决不是一个安全地方，这里得特别感谢超凡叔，他以伟大同情心，收容一位被认为“危险分子”的我。同时许多同乡要来送旅费，我虽然没有接受，这也是要感谢的。

3月中旬，得到情报，知道火车头的检查是不大严厉，我就改装换脸并且偕同一位女士，平安地通过了检查线，在内地山间蛰居了41个月。

前天我带着稀奇与快乐的心情，踏进了可爱的新加坡，真有不胜今昔之感，许多同乡与友人都以平安两字互慰着。不过他们许多人曾被这个“不肖”的胡知芳——我的字名——的义勇军拖累了，给汉奸走狗作为勒索的借口，损失许多钱，真使我太难为情，不能不向他们赔罪，同时也有人告诉我在沦陷期间的义军同志有少数人变节，我回答他们，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因为一个团体里面的中坚分子，必须要经过大时代的淘汰，才会成功的，何况星华义勇军从组织到解散是在短时间内进行，对于他们并没有经过鉴别与训练啊！不过它已经替新加坡保卫战的历史写下了一页华侨抗日血泪史，三年多来始终未附敌而继续与敌人斗争的同志们！舍身于新加坡海岸与山头的烈士们！这该是我们的光荣吧！

第三篇

马来亚华侨抗日史料选辑

黎亚久 卢朝基 编

一 不让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留白

——简介近年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活动

(马来西亚) 刘道南 卢观英



槟榔屿南侨机工纪念碑

1938年底南洋侨领陈嘉庚发出第6号通知，号召南洋各国华族青年回国参加抗战。义愤填膺的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1939年2月18日第1批“80先锋”开始，共有9批南侨机工3000余人，先后远赴云南，经潘家湾训练所受训后，被分发到各大队在滇缅公路上，当驾驶兵或修车兵，运载军事物资前往抗战前线。

当年，由陈嘉庚创办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商报》，整年都在报道着各地筹赈会支援祖国难民的新闻。此外也相当详细的报道各地机工报名、欢送、出发的盛事。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现今西马）掀起一阵爱国热潮，华社民众视回国抗战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

1942年5月初惠通桥被炸断后，南侨机工经历了坎坷艰辛的岁月，熬过种种苦难，抗战终于胜利了。然而3000多位机工，却有三分之一牺牲在滇缅公路上，把生命献给了祖国。葬身异国，永远回不了南洋的家乡。而滞留在云南各地的机工，与当地的姑娘成了家，生儿育女，没有返回侨居地。解放后，由于5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文化革命，这些留在中国的机工，都与南洋的亲人断了联系，半个世纪以

来无法联络见面。而南洋的家人，几乎完全没有儿子、丈夫、父亲、亲人的音讯。生死未卜，双方都承受痛苦的煎熬。

这一段悲壮却被遗忘的历史，空白了超过半个世纪，直至中国1979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方被重新肯定。南侨机工才被定位为英雄。随后，史料的挖掘、搜集、整理、书写、研究的活动，才陆续地开展进行。健在机工的赤子功勋，才被中央省市重视，获得生活津贴，并获颁奖章。而其遗孀也获得津贴。文章、书刊、纪录片也跟着刊行或制作。

而1946年开始复员回到南洋各国的机工，在侨居地往往也是干回老本行：开车，修车，或维修机械，默默地生活几十年。没有人记下他们的血泪生涯、英勇事迹、奋战经历与赤子功勋的那一段光荣历史。

复员机工的历史空白：局势所致

如果说中国的南侨机工历史空白，是由于国共内战、50年代的政治运动，以及文革的浩劫所致，那么南洋地区，特别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有关南侨机工的历史空白，主要就是与战后殖民主义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是当年的政治局势所致。

英政府一贯反华反共的政策

马来西亚的前身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英殖民政府统治马来亚几百年，所执行的是高压政策。除了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法，在马来族、华族及印度族3大民族之间，制造猜忌和敌视，以分化民族间共同的反殖力量外，还特别对有着反抗传统的华族，进行打压与为难。华人社会建立起来的华文教育与华文学校，一直以来都在英政府的消灭政策下挣扎生存。

英殖民政府认为，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之后纷纷建立起来的华校，是反殖思潮的温床，是左翼力量的大本营。因此，除了一贯以来打压华校发展之外，也经常对付以致监视、扣留华校师生，甚至驱逐出境。

马来亚的英政府这一个反共的政权，认为反日、反英，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因为都具有反抗外来统治的意识。即使在 1941 年底日军入侵马来亚，到 1945 年 8 月施行黑暗统治的 3 年零 8 个月时期，英政府与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行了类似中国的“国共合作”，指示其成立的“136 部队”，与抗日军共同携手对抗日寇。英政府始终提防抗日力量在抗战结束后，会转化为抗英的力量，驱逐殖民主义的统治。

换句话说，英政府对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行动，始终是耿耿于怀的。在英政府看来，机工的爱国抗日行动，有朝一日也会转化为抗英行动。有鉴于此，对 1000 余名复员机工，英政府是采取监视的态度。

这种局势，造成复员机工回到侨居地之后，散居于各地。初期，居住在一些较大的城镇的机工，还有互助会的组织，协助复员机工寻找职业，解决生活，照顾福利等活动。但是他们一般保持低调姿态，不张扬他们在滇缅公路上的事迹。他们往往干回老本行，默默地工作，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

紧急法令的实施

英政府与马共的“国共合作”对抗日军，在战争结束后，就马上撕破其狰狞面目，转过来对付要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人民抗日军。

英政府在 1948 年 6 月颁布紧急法令，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大肆逮捕马共成员、退伍的抗日军兵员、马来民族主义运动者、左翼工团、进步师生等。此外，全国宵禁，把散居在郊区的华族村落居民，驱赶集中在所谓“新村”居住（其实是变相的集中营）。每天早上 6 点方可出村子，到橡胶园割胶，或到田地耕作，或到锡矿场劳作。傍晚 6 点以前必须回村，否则格杀不论。出村回村都得经过搜身，以避免携带食品、药物、情报进出。

在如此形势底下，马来亚共产党遂率领人员退入森林，开展为期 41 年的武装斗争（直至 1989 年双方签署和平协议，结束武装斗争）。在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 30 多年武装对峙时期，进步的左翼运动、反对

政府施政行动，始终是敏感的问题。即便到马来亚 1957 年独立（其实是新殖民地），1963 年马来西亚成立，国家统治政权仍旧延续英政府的反共政策。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局势下，复员回来的机工，更是讳莫如深，不要讲述他们在滇缅公路上的经历。记者不敢访问报道，文人也不想写文章叙述。即使是对自己家人，大部分复员机工都三缄其口，不愿多谈他们的抗战事迹。而机工本身多半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书写文章记下经历，因此也就没有留下文稿。一些机工甚至到去世前夕，其子女方晓得父亲的机工身份。

这就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南侨机工历史空白的主要原因。在这期间，在华人报章写一些史话点滴的吴志超老先生，偶尔也写过零星的文章谈及南侨机工的事迹，但从未引起注意。南侨机工历史在马来西亚就如此被遗忘了 60 余年。随着老机工一个一个逝世离开人间，老一辈的华人也逐渐忘却，年轻一代更是一无所知。“南侨机工”变成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名词。

南侨机工历史也是马来西亚华族历史的一部分

如果说南侨机工的历史，在马来西亚空白了半个世纪，主要原因是当年的白色恐怖局势之外，那么，次要原因就是华社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偏差。

南侨机工的时代背景是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中。那时寄居南洋的华人都是侨民。他们仍旧视中国是自己的祖国。当 1931 年日军侵略东三省时，华侨就深感祖国被蹂躏分割，莫不痛心悲愤。及至 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攻神州大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事实，华侨义愤填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响应南洋筹赈难民会的号召，热心捐款，赈救祖国的行动之余，1939 年的“武汉合唱团”与“新中国合唱团”的义演，更激发华社民众的愤慨。满腔热血的青年更是恨不得马上回国奔赴抗战前线。

当年华侨的祖国当然是中国。而机工奔赴的战场主要在云南的滇缅公路。当时的口号是“回国抗战”。因此在潜意识里，在观念上，

南侨机工就是为中国抗战。有鉴于此，南侨机工的历史，也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抗战历史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这种看法，后来马来西亚华社普遍上，不认为机工史是马来西亚华族历史的一环。华社没有将中国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其实，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运载军事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前线，其实同样也在牵制着日军在东南亚的战场，支援着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战争。

在这种观点下，马来西亚华社一向以来不重视南侨机工历史的记录与书写。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也把它当着外国史而仅仅用三几段描述。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所搜研的主要是二战期间日军暴行史料，也还没有意识到将南侨机工历史列入马来西亚华族史，而进行史料搜集与研究。

这也促使南侨机工历史，在几十年来几乎一直空白，没有被搜集，整理、研究的原因之一。

1995 年云南 16 老机工赴西马的破冰之旅

在中国，经过 30 年忽视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以及 50 年代政治运动和文革动乱，南侨机工及其眷属受到不合理对待后，随着 1979 年开始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给南侨机工重新定位为“抗日英雄”时，自 80 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挖掘这方面史料。随着 1986 年“云南侨联南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的成立，1989 年昆明西山南侨机工纪念碑的建立之后，搜研工作就更有计划并系统的进行

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意识到还有千多名于 1946 年开始复员的机工，回到侨居地之后的史料。也有待于挖掘与搜集。于是，在中马双方民间的联系下，就有了 1995 年 16 机工返马探亲之行。

1995 年 10 月，在云南省侨联南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的策划安排下，马来西亚海鸥公司陈凯希的赞助，以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的协办下，昆明老机工杨保华率领 15 位高龄机工，到西马来西亚吉隆坡、雪兰莪、马六甲、檳城、霹靂等州，进行了 10 余天的访问并寻

找亲人。这是 1939 年以来，留在云南各地机工第一次重新踏足当年热带家乡大地的意义深远。这可说是一场破冰之旅，开启冰封 59 年的寻踪亲情之旅。

这次寻踪亲情之旅，经过华文报章的报道后，才在华社引起关注南侨机工的悲壮历史。此后，在陈凯希先生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会长郭仁德先生的穿针引线下，才开始迎来了厦门华侨博物馆陈毅明教授等南侨机工历史学者，好几次到来搜集史料，并探访健在机工及其后代。

1995 年是复员南洋华侨机工史料搜妍工作的开始。其实，海外，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个别文史学者，也在这期间编写过一些有关复员机工访谈的文稿。砂拉越学者房汉佳博士与夫人林韶华博士，在 1996 年就出版一本题为《英雄的故事》的书，介绍砂拉越几位当年还健在机工的英勇事迹。他们是：古晋市的廖平、张天赐、冯增标和叶其平、西连县的许海星、伦乐县的李亚留。

新加坡的先贤馆馆长，资深的文史工作者韩山元，也写过多篇有关当年 9 批南侨机工从新加坡出发的史话文章，以及介绍复员回来新加坡个别机工之生活动态。马来西亚老报人吴志超，熟悉当年机工出发回国抗战动态点滴，也写过好多篇回顾文稿。吉打州文化人钟锡金，还出版过一本讲述 1995 年 16 位老机工返马，以及在滇缅路上奋战的血泪故事的书《南侨机工的悲歌》。

然而，这些文稿都是个别人士自动自发地进行，并没有组织或机构在筹划。全国华团乡会数千个，从来没有重视南侨机工历史这一块的史料搜研活动。可以这么说，在 2007 年之前，马来西亚并没有人或团体有系统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追寻健在机工，或者联系机工后人。此后 12 年，有关机工史料搜研工作，都没什么进展。

中国访团带动新马两国的机工史料搜研活动

直至 2007 年，随着陈毅明教授再次率领一些史料工作者到访西马来西亚各地，才带动起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搜寻史料活动。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接触到南侨机工历史这一块。过去我所收集的是马来亚

抗日抗英的斗争史料，也发现 18 处抗日殉难侨胞墓碑及抗日烈士纪念碑。那年我们认识了陈教授之后，才开始注意这一悲壮历史的价值。

于是，我就利用我曾经当过华文报记者之经验和方便，经常发稿寻找机工或其后代的新闻，结果就联系到不少机工后人。在上门探访后，采访了机工的奋战经历与故事。另一方面，我们也整理了机工资料，收集旧照制成展览图片，在一些地方与华团联办讲座和图片展。这些活动，经报章报道后，又引出更多机工及其后代的讯息，收集到更多资料，联系到更多机工儿孙辈。慢慢的，我们就将文史工作的精力，集中到南侨机工这一环节上来。

在不断搜研工作中，阅读了更多资料，听了更多悲壮故事，我们就深深感觉到：南侨机工这段被遗忘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应该有人专注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3200 余名机工有 3200 个爱国故事，有 3200 余宗忍心舍弃亲情、爱情、生命的情事。南侨机工历史，有其珍贵的搜研价值。为了纪念这些赤子功勋的英雄们，我们文史工作者实不应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淹没在褪色的记忆中。

当我们的认识提升更高的层次：南侨机工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马来西亚华族史的一环时；南侨机工的贡献，也是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反对军国主义的暴行的反击。我们就深信：为南侨机工历史搜研献身，是责任所在，是良心驱使，是热爱和平正义的体现。为了让下一代铭记先辈的爱国情怀，进而教育他们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的努力，我们就这样开始并继续工作下去，搜研机工史变成了我们的“专业”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只凭个人的力量，在经济上、人力上、时间上、精力上，是不足够的。必须组织年轻一代、大专学生、文史同道、民间组织，动员群众，才能有所成就，才能不让它空白于历史记录。

寻找健在机工或其后人

2008 年我们从本身所在的霹雳州，先进行寻找机工及其后代的工作开始。经过三年的联系，我们在全中国找到了 6 位健在机工：霹雳州

的黄铁魂（第7批）、黄明安（第3批）。马六甲州的98岁老机工王诗伟（第9批）。砂拉越州的冯增标（第7批）、许海兴（第 批）、李亚留（第6批）。至于健在的砂拉越机工廖平（第7批），则已经移居加拿大。王诗伟与黄明安，已在2012年逝世。

随后就陆续寻找到以下各州各地机工后裔：

（霹雳州）：蔡罗、冯国佑、钟金树、张连培、杨应、黄俊秀、张达、张财、曾官成、曾添才、谭金源、范高峰、王金凤、丘锦祥。而太平市当年有超过100名机工参加机工服务团，是霹雳州最多者。我们所找到的太平机工后人，计有：陈亚虾、李毓芬、刘耀胜、胡亚来、郭远鉴、马瑞麟、胡凯军、曹长久、叶守福、柯德福、王亚能

（檳城州）：杨镜南、谢允和、杨大胜、余德峇、吴家香、柯荣隆、林生财、巫石林、王海南、刘贵华、陈振美。

（吉打州）：邝金源。

（柔佛州）：吴新雷、谢愈仟、刘贝锦

（新加坡）：詹开平。

为了搜集史料，除了电话联系外，我们还驱车上门拜访记录资料。经过一番工作，我们就建立一个联络网。

机工及后人渴望获得肯定

在探访健在机工或其后代过程中，我们都深深感觉到：机工或其后代，都希望获得认可与肯定贡献的心愿。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肯定了南侨机工的爱国精神、英勇表现、无私付出后，都颁发勋章和津贴以表扬其贡献。但是，复员返回南洋侨居地的机工们，除了低调默默工作领取微薄工资外，几乎是一无所获。殖民政府警戒提防，独立政府不闻不问，华人社会不予肯定，史家不给予表扬。他们出生入死的艰苦奋战，冒着炸死、翻车、疟疾、严寒、饥饿的经历没有人晓得，甚至家人也所知不多。

鉴于这种渴求被肯定的普遍心愿，我们在2010年征求了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的同意，征求马来西亚资深华教工作者胡万铎与拿督林秋雅，赞助费用印制了表彰状，写上机工姓名，贴上照片，镶

入镜框，在公开场合颁赠予机工或其后人。我们前后在霹雳州、檳城州、吉打州、柔佛州、砂拉越州，颁发了 40 余面表彰状给上述机工或后人。

随后我们组成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史料搜研工作室，以更有效的进行搜研活动。另一方面，我们也组成“缅怀南侨机工之友”，以联系各地机工的后代。我们准备在 2015 年设立一个网站，传达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活动的讯息。

吊唁·挽轴·祭文

在联系机工或后代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表扬机工贡献，肯定他们的爱国精神和英勇表现外，还可通过丧事表达我们的关怀与慰问。在获得同意下，我们制作了一面挽轴，以联谊会、研究会、厦门华侨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陈嘉庚纪念馆等名义致哀致敬。当闻讯机工病故或其家人逝世，除了登门吊唁外，也送花圈致祭。我们把祭帐送到丧家悬挂，以表达我们的慰问和哀思。

若是机工病逝，举殡日，征得丧家的同意，我们也将祭祀仪式中，宣读祭文，颂扬机工的不平凡的一生，并肯定其贡献。祭文内容将叙述其参与机工经历，生活表现。随后护送灵柩引发还山。

这项措施始于 2010 年 10 月底吉打州老机工吴明逝世时。当时我们从光华日报上阅知“老机工吴明病逝”的新闻，方知悉还有一位健在机工离世。于是马上驱车到 3 小时车程外的双溪大年镇吊唁。翌日出殡宣读祭文后离开，并与其哲嗣保持联络。

2012 年 2 月，马六甲机工王诗伟百年归老后，我们赶到 400 公里外丧府，除了吊唁、送花圈、悬祭帐，宣读祭文外，更动员 2011 年重走滇缅路车队 8 辆来自柔佛州的四轮驱动车，成员穿上南侨机工制服，列队送殡。

同年 4 月，霹雳州 97 岁老机工黄明安病逝，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关怀与致敬。而 2008 年去世的老机工洪发福遗孀于 2012 年 9 月病逝时，我们也致以慰问吊唁。

机工复员 60 余年，病故之日还获机工组织的吊唁与致哀，并获祭文赞颂表扬，令丧府大为感动，深感老机工在离世时刻，尚获中国及民间的肯定，情谊可贵，死而无憾。

南侨机工当年在滇缅公路上开卡车，同“道”同道，患难与共，相互照顾，互相扶持的兄弟般情谊，我们同样应继承这种精神。这一点联谊会与研究会后辈需要加以发扬。

昆明市博物馆征集文物

2009 年陈毅明教授率领访团与云南电视台导演欧阳斌等人，前来东马砂拉越与西马各州访问并摄录纪录片。2010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追忆历史，珍爱和平”访团，再次到来拍摄纪录片《南侨机工》。率团的汤晓梅也带领昆明市博物馆文物征集组一行人，到东西马向老机工李亚留、许海星、冯增标、黄铁魂，以及钟金树、蔡罗等二代，征集颇多文物。他们捐献的文物包括：徽章、证书、奖状、襟章、肩章、信件、纪念册、挂表、旧照等。

复员机工千人，当年携带回马的文物颇多，可惜时光已过半世纪，老机工的文物随着辗转迁居而遗失不少。而新马华人风俗，老人离世，其遗留物件往往陪葬而付之一炬。因此奖状、证书、徽章、旧照、用物等，都没有保留下来。殊为可惜！倘若早 10 年，20 年前改革开放时即前来搜集史料和征集文物，料想更为丰富。

2011 年滇缅路万里行

为了了解滇缅公路，体验峭壁山谷行车之惊险，感受蜿蜒弹石路的坎坷，我们在 2010 年底在昆明市博物馆的交通安排下，亲身走了一趟滇缅路。从 0 公里出发，经楚雄、祥云、到大理、保山、龙陵、芒市，到畹町。在惠通桥凭吊 1942 年 5 月 5 日机工车队抢过吊桥的惊险壮举，在怒江畔山壁缅怀坠车英灵。

2011 年参与二战历史研究会与柔佛州古来河婆同乡会联办的“滇缅路万里行”，20 余四轮驱动车队浩浩荡荡重走滇缅公路。车队从新

加坡当年9批机工出发的怡和轩启程，经古来、吉隆坡、怡保、合艾，入泰国，经老挝，入云南。从晴隆的24道拐开始，到昆明参观西山纪念碑、走弹石路、过老鲁田，望孩婆山、视察松山战役、经707、下施甸、看三棵树、上三台山，祭亡灵、畹町纪念碑致敬、九谷桥头望腊戍等等，经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之行。

这是难得的经验。全体车队队员经受深刻的历史教育，感受了南侨机工艰苦奋战之斗志。这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唤醒社会重视南侨机工历史的一次壮举，新马两国华文大众媒体以大幅版位报道万里行动态。中国广州侨星杂志社和云南电视台，亦派员特别报道车队盛况。

南侨机工历史活动的宣教意义

沉寂了几十年的南侨机工历史，随着近年来我们开展的系列活动，开启了华社民众对这段被遗忘历史的重新认识。这主要是在活动进行前后，都通过华文大众媒体的报道宣传。外文报章也加以转载。

从座谈会、展览会、交流会，到演出、访问、寻亲人的活动，报章都不吝出版位报道。特别是2011年，云南省侨联南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一行35人到西马数大城市的访演活动，更是日日有新闻，事事有上报。在吉隆坡、马六甲、麻坡、古来、新山、怡保、槟城，访演团把悲壮的机工血泪史搬上舞台，感动了观众，也教育了观众。

其实，近年来我们已经先后在一些地方，进行了南侨机工历史的宣教工作。除了在华团举办座谈会与图片展览会之外，会场亦播放纪录片，或者也把刻录的纪录片光盘馈赠予观众，以加深宣教效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发送纪录片光盘给华文中学，请校方播映给学生观赏。

我们尽量做到图片展不要纯粹是大格局的图片，也要注意本土化。观众对展出图片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开始。因此，加入地方上的人物与事物图片，更能吸引观众。比如，在怡保的图片展，我们会加入霹雳州机工的图片，包括黄铁魂、钟金树、蔡罗、张连培、郭远鉴等机工的证件、徽章、奖状，纪念册上的勉励赠语、出发前的合照等等。

纪念南侨机工历史，缅怀机工先贤，在现阶段必须主动加强宣教工作。而必须重视传统宣教效果的不足。现今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不爱阅读，不常看书。历史史册往往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传统纪录片往往也较沉闷，枯燥画面多，缺乏人性化的感性镜头。我们认为，争取当局把南侨机工历史，通过故事情节拍成连续剧，更能深入人心，教育群众。这种努力，我们海外民间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唯有靠中国方面的努力方有所成。联谊会与研究会同道，加油吧！

筹建南侨机工纪念碑

教育群众认识南侨机工历史，建筑纪念碑或纪念馆，进而将之变成一个景点，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宣教办法。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檳城，在机工复员后不久，在 50 年代初就建成两座二战殉难侨胞与南侨机工纪念碑。隶属于吉隆坡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的纪念碑，每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日纪念日，必举行祭拜致敬仪式。而檳城的纪念碑，位于观光点升旗山脚缆车站旁。每月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时 11 分，也都会举行公祭仪式。

然而，这两座纪念碑虽然屹立几十年。每年公祭，仅是上了年纪的理事会及华团代表出席。游客人来人往经过，但对其意义知晓的人可说不多。这主要是缺乏宣教，而且没有相配合的活动。

随着近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南侨机工活动的增加，也激起华族民间增建南侨机工纪念碑的愿望。经数年的筹备，柔佛州古来的南侨机工纪念碑，在 2013 年 8 月 12 日终于落成开幕。而新加坡晚晴园的南侨机工纪念浮雕塑像，也紧接着古来纪念碑而与 16 日开幕。

至于霹雳州，也在筹划建立纪念碑，地点暂定在太平。太平是该州最多机工回国抗战的地方。据目前所查到的记录，超过 100 人之众。此外这也是有华族、马来族（取名“马亚森”）、印度族（取名“李青海”与“王亚能”）3 大民族参加机工服务团，为中国抗战献出绵力的地方。而在砂拉越州，文史工作者也在致力争取当局批准，在古晋建立一座类似的纪念碑。以上努力，都是可喜之事，对纪念南侨机工历史，都有正面意义。

槟城孙中山纪念馆设南侨机工永久图片展厅

在槟城，2012年11月，槟城的纪念碑经过装修，焕然一新。既增加了和平柱，也建了机工浮雕墙。更引人注目的是，塑造了一辆栩栩如生的机工卡车上山模型。

而2014年元旦伊始，槟城人再接再厉，在孙中山纪念馆，建设马来西亚第一座南侨机工历史图片永久展览厅。该馆在前几年举办过南侨机工展览会之后，决定拨出空间设立永久展览厅。元月1日当天恭请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主持开幕礼。他赞赏纪念馆的努力，并肯定南侨机工对抗战做出的贡献。

展览厅展出的图片主要是厦门方面提供的图片。展厅的空间虽不够宽敞，但首创意义是值得嘉许的。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南侨机工历史的再次展现。让被遗忘的历史重现，不让它留白！

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史料搜研工作室

刘道南 卢观英（稿于昆明 2014-4-26）

附注：随着老一辈的复员机工高龄病逝，当年复员回来的1000多名，一个个离去。至2012年，马来西亚只剩下4位接近百岁的高龄机工。他们是：砂拉越州的李亚留（伦乐县）、许海星（西连县）、冯增标（古晋市）、黄铁魂（霹雳州和丰镇）。砂拉越州另一位老机工廖平，已经迁居加拿大。

二 我对香港八路军办事处领导马来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点滴回忆

彭光涵

一、马来亚华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和 以廖承志同志为首的香港八路军 办事处的领导是密不可分的

我是早期参加马来亚华侨抗日救亡工作的。当时我们深感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蒋介石却执行不抵抗主义和压制屠杀主张抗日人民的卖国政策情况下，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为了不当亡国奴，我们必须反对蒋介石不抵抗卖国政策，进行抗日战争。1935年我们阅读和学习了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后，即联合马来亚各地进步华侨成立了以“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主义，抗日救亡斗争”为宗旨的“马来亚抗日救国会”，但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受“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和做法的束缚，一直打不开局面，会内领导层中对如何开展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方针政策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为了解决这些分歧，我们都盼望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思想和做法的领导。由于国民党的层层封锁，我们的迫切愿望始终未能实现。1937年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建立和廖承志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后，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我们就经常听到上级领导传达廖承志同志对抗日形势的分析和对开展马来亚华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使我们认识了“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和做法的危害性。廖承志同志对马来亚华侨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中如何在共同抗日救亡前提下协商解决华侨劳资矛

盾，团结华侨资产阶级问题；进步爱国华侨社团如何克服一统天下的错误思想，积极支持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公开合法的筹赈会分工合作问题；以及在英国对中日战争执行“中立”政策条件下如何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指示。廖承志同志的指示，不但统一了我们的思想，纠正了我们的“左”倾错误，而且解决了当时马来亚华侨各阶层、各党派对如何开展华侨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存在的多年争论和严重的意见分歧。为解决当时严重影响团结资产阶级的劳资问题，经与陈嘉庚先生协商后，以筹赈会为首和爱国侨团共同成立了“调解劳资委员会”协商调解劳资矛盾，克服了在华侨企业中频繁发动罢工斗争的“左”倾做法，这样做既改善了华工的待遇，又团结了资产阶级，促成了华侨各阶层、各党派团结抗日救亡的新局面。为了表达全体华侨团结抗日的决心，1938年召开了“七七”抗战万人纪念大会。这次大会显示了华侨各党派、各阶层、各帮派团结抗日救亡的决心。召开这次大会是由“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抗援会”）与陈嘉庚先生商议决定的，以“筹赈会”为首，吸收新加坡华侨各社团、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群众的万人大会。会议如期于七月七日在新加坡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轰动了南洋各地华侨，参加会议的有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筹赈会”全体委员、各侨团代表和“星洲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星洲各业华工抗敌后援会”、“星洲华侨各业店员抗敌后援会”、“星洲妇女界抗敌后援会”、“星洲民族复兴团”等一万多人。大会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一）拥护政府抗战到底，（二）打倒日本法西斯蒂，（三）侨胞加紧出钱出力，（四）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大会由陈嘉庚先生首先致词，全面总结介绍了抗战形势，表达了侨胞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对抗战救国工作，他明确指出“对于祖国抗战应负任务有明暗两种工作，明之一面，即组织筹赈会，公开劝募筹赈和劝募公债；暗之一面，即组织爱国团，惩戒汉奸，抵制仇货，然明暗两种工作，必须分开办理，各守职责。若不明此义，相杂相混，小则阻碍筹款，减弱抵制仇货力量，大则干犯居留政府法律，致筹赈工作被禁止。……负责明之一面如筹赈会，不但名字可在报章上宣扬，且免受居留政府干涉，负责暗之一面如爱国团者，不但埋首无名，且有触犯法律之危险，准此比较，

救国工作虽同，而负责暗之一面者尤为难能可贵，了无疑义，盖如谓无名英雄也”。陈嘉庚先生致词后，“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王炎之（王宣化），吴天，苏棠影和各界各党派代表林文庆，侯西反，周献瑞等二十多人表达了团结抗日的决心。（详见1938年7月7日、8日《南洋商报》）

马来亚主要进步抗日团体“抗敌后援会”领导下的各界群众爱国社团和工会团体由于方针、政策正确，得到各阶层华侨支持和踊跃参加，到1939年末，该会直接领导的社团团员发展到40多万群众，使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领导下的“筹赈会”抗日筹款、抵制日货、抗日宣传、动员司机医务人员参加抗战等工作，成为有广泛群众基础，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二、纠正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动 华侨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部队

“七七”抗战后，国民党为了独吞华侨抗日捐款，勾结英殖民政府限制华侨捐款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1937年8月13日，英殖民政府华民政务司约见侨领陈嘉庚先生时，对华侨举行大会筹赈捐款之事作出四项约束性的规定，其中两项是：“款须统筹统汇，不得别设机关”，“款汇交国内何处，由总督指定”（见陈嘉庚先生所著《南侨回忆录》第43页）。消息公布后，各华侨爱国社团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反对英殖民政府干涉爱国华侨抗日救国内政，提出爱国华侨“分筹分汇”的合理主张（即根据捐款人的意愿，把款汇给华侨信任的单位）。进步华侨团体“抗敌后援会”并派代表回国请示中央代表陈绍禹（王明），但万万没有想到，进步华侨的合理主张却遭到王明的反对，他诬陷进步华侨的主张是破坏统一战线，要我们一切通过国民政府，不要另搞捐款机构。1938年廖承志同志得知此事后，根据周恩来同志“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搞募捐工作”的指示（见廖承志1978年所写的悼念周总理纪念文章《教诲铭心头，恩情重于山》），立即分别召见马来亚“抗敌后援会”等各地华侨进步组织到

香港研究布置工作。当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负责人讲到他们的“分筹、分汇”主张遭到王明拒绝时，廖承志同志风趣地说：“过去的事不提了（因当时中央批判王明右倾投降路线还未向华侨公开），你们放心干就是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和冯白驹同志领导的琼崖纵队等部队都是坚决抗日的部队，急需华侨动员人力物力支持他们”。这个指示满足了进步华侨和广东籍华侨保卫家乡的要求，马来亚进步华侨立即成立了“华侨援八、援四委员会”、“惠州救乡会”、“援冯（白驹）委员会”，积极进行筹集款项、药品、汽车和动员进步华侨青年参加“东江华侨服务团”和“琼崖华侨服务团”回国参战，组织司机和机工参加八路军运输队。

三、利用马来亚、新加坡有利条件， 扩大中共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

1938年至1939年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除领导华侨青年、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外，大部分时间是协助其他同志共同研究华侨报刊宣传工作。在工作中我们及时得到香港办事处的指导、宣传信息及人力的大力支持。廖承志同志在香港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对华侨的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指示我们要积极团结一切报刊工作人员，利用英、美、荷殖民当局放松对华侨报刊报道中国抗日新闻和评论中国抗日舆论的限制，以及国民党无法在海外用政权限制、控制华侨报刊的有利条件，大张旗鼓宣传陈嘉庚先生反对汪精卫和国民党右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大力宣传华侨要求抗战到底，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迫切愿望；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准备投降，在国内迫害抗日军民，残杀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将士的罪行和阴谋。宣传中共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为了解决华侨报刊不易得到国内信息的困难，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在香港的新闻界知名人士成立了《华侨通讯》，《国新社》等通讯社，转载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周恩来对抗日战争的分析文章和著作，以及抗日战报等新闻，供国外报刊登载。特别受各

华侨报刊读者欢迎的是通讯社约请新闻知名人士给各报刊写的专稿，同时还根据华侨报刊的要求，选派知名报人和记者支持各华侨报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对华侨报刊的大力支持迅速促进了马来亚、新加坡各报刊宣传反对投降，反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坚决要求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占了上风，使广大华侨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甚至抗战开始“拥护蒋总统”、“拥护国民政府”的口号都一律改成“拥护蒋总统抗战到底”、“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其意义是你不抗战我们就不拥护你，在舆论上支援了祖国人民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准备投降、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阴谋。

四、热情接送华侨进步青年和华侨抗日救亡 干部赴延安学习和抗日根据地工作

“七七”抗战后，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进步青年学生都热情要求赴延安学习或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日战争。除战争初期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上海党的地下组织接送一部分人赴延安和新四军参加学习和战斗外，绝大多数人都因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东南沿海各城市 and 国民党进行层层封锁无法成行，但都因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被英帝驱逐出境的国外华侨干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都想尽办法营救他们不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魔掌，并将他们护送到延安或抗日根据地工作。特别是1939年9月3日英德战争爆发后，英帝张伯伦政府妄图策划以牺牲中国抗战为目的、换取日本不南进侵略英帝东南亚殖民地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时，英帝为了表示对日本友好亲善，首先向马来亚救亡运动开刀，限制华侨抗日救亡运动，逮捕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人。1939年底至1940年初，英帝即在新加坡、马来亚先后逮捕了各地“抗敌后援会”和各业工会负责人数百人，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被英殖民政府以“破坏英国对中日战争中立政策和英日关系”为罪名，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逮捕，驱逐出境的。1940年5月和我同时被驱逐出境的有新加坡和马来亚霹雳州“抗敌后援会”各级负责人共十多人，被押送到香港牢狱。当时香港已处在日本南进威胁中，英国官员家属

纷纷撤离回国，接收我们的香港英籍官员和华籍警官对英国政府以抗日救亡罪驱逐我们表示不理解 and 不满。当时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迅速离开香港监牢，找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或交通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为了确保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十多人商议决定，为了避免蒋介石国民党特务的陷害，在未找到组织关系前，千万不要到国民党统治区。根据马来亚“抗敌后援会”领导人告诉我们的香港和上海法租界两个秘密通信处，我们十多人分为两个组，分头找关系。一组以我（全马“抗敌后援会”、“全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刘亚壁（新加坡华侨除奸特务队长）、刘小明（新加坡各业华工负责人）、郭戈奇（马来亚霹雳州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郭漂定等7人去澳门，其他8人一组去上海。我们分别在香港政府政治部发的要求遣送登记表中写上各人要求遣送地点，当我们的登记表送上第二天，政治部召见我们，客气地对我们说，要求去上海的可照准，后天即可乘船成行；去澳门的因我们与澳门政府有协议，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希望能谅解。我们强调我们7人在澳门有亲属，到澳门生活有依靠。要求香港政府给予照顾。召见后政治部官员要我留下，一个小时候一位华籍官员对我说：“我们同情你们的不公平遭遇，我请示了我们的负责官员，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你们每人出20港币，我们给你们买去澳门的一等舱座位，并用我们的汽车送你们上船，但你们绝不要向任何人讲你们是被我们驱逐出境的”。我立即表示感谢他们的同情和照顾。第二天我们高兴地换上最好的西装，乘坐香港政府的公用客车，登上了去澳门的客船，船上的工作人员，还把我们当成香港政府的客人，热烈欢迎我们。到了澳门我们自由了，住下旅馆，立即发信给李亚明同志（他原在新加坡领导工会工作，后派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在连贯同志领导下从事联络工作）和发信给其他联络地址，同时我们也发信给马来亚组织负责人，要求他们迅速通知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我们联系，并根据我们做秘密工作的习惯，规定了预防暴露身份和应付出事办法和措施。我们日夜盼望能很快找到组织关系，但是半个月过去了，依然渺无音讯，我们从国外带来的钱所剩不多，我们好像走失了父母的孩子一样着急不安。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和节约住旅馆的费用，经与大家商量同意我和刘少明，郭戈奇等三

人去报考有寄宿条件的澳门普通高中，但当我们办好入学手续，要搬到学校住时，其他同志对我发生了怀疑和误会，说我是他们唯一信赖的领导和希望，说我这样做是要避开他们自找出路，我理解同志们的诚挚感情，面对他们的误会和失望，突然不能自主地抱着大家痛哭，我说：“我们是共患难的同志，绝不会避开你们不管”。我躺在床上痛哭了一个多小时后，拿起入学手续和收据，去学校办理退学手续。回旅馆后我又和同志们讲，我们一定能找到组织，同时商量的做长期等待的措施和办法。二十多天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员李亚明同志来旅馆找到我们，我们像丢失的孩子又重见父母一样，紧紧握着李亚明同志的手，高兴得热泪盈眶，望眼欲穿的盼望，又逢同志的喜悦，是文字难以表达的。李亚明同志向我们说明了由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与马来亚组织查明我们的情况，延迟了与我们联络的原因，同时转达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要我先去香港汇报工作，其他同志待后几天由他带领去香港。当天我即随李亚明同志赴香港住在九龙“弥敦饭店”（当时香港比较豪华的饭店），当晚连贯同志来旅馆看望我，并告诉我廖承志同志明天接见我，并要我详细向他汇报马来亚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第二天早上9时，在“弥敦饭店”另一套间内，我早已敬慕的廖承志同志，穿着一身足球运动员的服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关心地询问我们被驱逐出境同志的身体情况和目前存在的困难，接着他细心听取我汇报马来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并亲自做了记录。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很快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当我向他汇报我们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对个别华侨奸商采取“割耳朵”进行制裁时，他立即向我指出，你们这个作法是不策略的，“华侨爱国除奸团”最好采取其他措施，不要用“割耳朵”的不策略做法。我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并向他解释马来亚“华侨爱国除奸团”采用“割耳朵”办法是因所处环境迫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原因是由华侨群众想出来的，他们为了避免采用伤害奸商生命，导致法律诉控责任；“割耳朵”不伤生命，被制裁者不愿也不敢向当地法庭投告，过去它曾起了有效制裁奸商的作用。汇报后，廖承志同志对我们抗日救亡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左”倾做法，提出诚恳批评。最后，他要求我把汇

报的情况，特别是工人运动组织情况、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写一个详细书面材料交给他，我遵照指示照办了。几天之后，刘少明，刘金余，郭戈奇等6同志也抵达香港，为了安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在九龙城附近租了两间房子给我们住，等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派交通来港，护送我们去延安。连贯同志告诉我们：“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广州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层层封锁，为了安全，我们一直不敢护送华侨干部赴内地，这次对你们是特别照顾，你们必须耐心在这里等待，待我们的交通探明安全路线后，再护送你们去延安”。我们一直等到当年9月初，“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交通的曾昌明同志赶来香港，我们才确定起程日期。曾昌明同志是早期在泰国从事华侨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回国后长期在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是老同行，他和许多马来亚老同志都相识，见面后我们谈得很融洽。他告诉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和对付国民党特务的具体办法，他讲国民党要华侨的钱，最怕得罪国外华侨，你们有回国升学的各种证明证件，是对付国民党特务的有利条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我们7人分两批走，第一批有我，刘少明，刘金余，彭湃烈士的大儿子彭士禄（原工业部副部长，现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顾问）和李克农同志的女儿李冰（原北京肿瘤医院党委书记）等6人。组织决定由我负责领队，彭士禄（当时14岁）为我的亲弟弟，要我们在路上给予特别照顾，路上一切安排由曾昌明同志负责。我们集中从香港九龙乘火车到新界大埔站下车，然后转乘汽船到大鹏湾。船到大鹏湾没有码头，我们背着行李徒步涉水上岸。当我们上岸刚到淡水镇，就遇到3架日本飞机轮番向群众射击和轰炸，不少房屋被炸毁，许多群众被炸死炸伤。我们徒步去惠州城的路上，沿途又目睹许多国民党伤兵、被日寇飞机炸死炸伤的群众以及国民党官僚机构对受伤士兵和群众见死不救的悲惨情景。到了惠州城，老乡告诉我们，最近敌机天天来轰炸，劝告我们注意防空。果然第二天飞机又来轰炸，我们趴在河岸，就离我们十多米远的一棵大树下，有几个老乡被炸得身首分离，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踏上祖国土地的两三天来，我们亲眼目睹日寇对中国人民进行狂轰滥炸，许多人民被炸死炸伤，无数房屋变成瓦砾，更激起了我们对日寇的无比仇恨，更加希望早日到抗日前线直接与敌

人进行战斗。为了避开敌机轰炸，我们乘一条小木船，连夜逆水北上，经惠阳，河源到龙川县。逆水行舟，船是靠船工用竹竿推撑着运行的，船走得很慢，虽然路程只有三百多公里，但我们却走了十多天，尤其是小船靠河边或竹林下行走，不靠城镇过夜，虽然也听到敌机轰炸，但离我们比较远，同时也可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到龙川县后，我们改乘汽车去韶关。到韶关时，韶关城关卡国民党军队对我们进行验证检查，他们看了我们的华侨证件，立即放我们进城。次日，我们即乘夜行火车安全抵达桂林。据曾昌明同志告诉我们，自日寇占领广州后，为了打通粤汉铁路，切断中国与海外的交通联系，日寇加紧向广州周围进攻，同时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到桂林后，彭士禄和李冰住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家，我、刘少明和刘金余等住在桂林郊区“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兵站招待所”，我们换上八路军军服，乘八路军的军车，经贵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集中等待去延安。当时八路军军车司机大多数是马来亚“抗敌后援会”成员，对我们很热情，主动招待和保护我们通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层层关卡，如利用夜间行车绕过国民党关卡等。由于人多车少，我们在“贵阳八路军汽车站”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足足等了一个多月，11月初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时，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并告诉我他已看了我在香港写的工作报告，并建议我将我的名字改一个字，由“彭海涵”改为“彭光涵”，并祝我们一路平安。我们到达西安后，由于国民党当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赴延安的通道上设了层层封锁，董必武同志找我们，谈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情况，为了保证安全，董老说组织决定你们3人即去洛阳，由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护送你们渡黄河，穿过日寇封锁线，胜利到达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虽然这里经过“百团大战”后，敌人经常进行扫荡，环境艰苦，但从此我们踏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八路军和革命的人民，有了枪，对于长期被压迫，从事地下工作的我们，立即感到自由解放了，心情十分舒畅，我们拥抱在一起，高声歌唱我们的胜利。

1990年10月5日

三 回忆新加坡华侨义勇军

罗须磨

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是第一次在马来亚出现的人民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是在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烧到新加坡门前，英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冲破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禁锢而成立的。这支队伍的出现，意味着新加坡华侨从外来侨民转变成为当地人民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他的存在的时间很短，从创立到遣散不过三十多天。参加作战只不过一星期，装备非常简陋，但却以其无所畏惧的勇猛战斗震撼了敌人。在战场上表现了马来亚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坚强意志，为新加坡人民争得了光荣，也为战场上的英，澳，印军所钦敬。新，马人民至今提起新加坡华侨义勇军还是津津乐道，引为骄傲。但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这支队伍当时是怎样得以成立内，怎样参加战斗的。笔者参加过'新加坡华侨动员总会'属下民众武装部的筹建工作，并作为义勇军第一连马来亚共产党的代表在前线经历过战斗，愿据个人所知，将这段历史事实写下来，以便不为持有偏见的人们所歪曲。

1941年12月8日凌晨，第一枚炸弹落在新加坡岛上，结束了新，马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南侵，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时，我和一大批政治犯还被关禁在新加坡英国人的监狱里。日本法西斯的屠刀已经架在马来亚人民的头上，而马来亚人民却没有反抗侵略，保卫自己的自由。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来亚人民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曾经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日本侵占华南起，日本法西斯南侵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时德，意，日法西斯侵吞全球的气焰嚣张，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开始形成。马来西亚华侨抗日反法西斯运动正如火如荼。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了这一运动，并进而提出建立全马来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马来亚人不分种族，宗教，

政治，信仰和派别，统一行动起来，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而战斗。同时向英国统治者呼吁：改变殖民政策，开放民主，武装民众，为反对日军入侵作好准备。但是，英帝当局害怕殖民地人民力量壮大，只想依靠其自身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对马共的呼吁充耳不闻，继续逮捕政治犯，实行殖民地黑暗统治。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就是 1941 年 3 月马共中央委员林江石的被捕事件。

林江石（原名黄伯遂，又名老黑或阿黑），是马共中央委员，曾在霹雳，雪兰莪等地活动。在中马一带的革命活动中极有影响。1941 年 3 月在新加坡被英国当局逮捕。新加坡警方在法庭上公开了他的身份，报章也曾大肆渲染。在法庭上，林江石不顾法官的阻挠，大义凛然地阐明了马共的抗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了英国殖民地政府破坏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罪恶，呼吁殖民地政府改弦易辙，与马来亚人民携手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他在法庭上的发言，理直气壮，极为感人，当时报章曾加于报道，在马来亚各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注意。但是，殖民地政府的回答是将他投入监狱！这一次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国政府宁与法西斯妥协，不顾马来亚人民命运的反动本质，同时也为它自身的失败准备了条件。

果然，战争一开始，英国派到马来亚的少爷兵及雇佣兵不堪日军一击，五十多天溃退五百余英里。1 月 31 日，就是说开战不到两个月，英军就不得不炸断柔佛海峡长堤，把马来亚内陆全部奉送给日军，孤守新加坡。

只是到了英军节节败退，守土无望的情况下，英政府才愿意考虑马共提出的共同抗日的主张，承认马共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开放宣传出版自由，并由英军 101 特别训练营协助，分批训练抗日游击队的基本队伍，并配给少量武器。在新加坡形势万分危急下，马来亚共产党向英国当局所争得的小小让步，为开展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便利。

12 月下旬，在新加坡激烈的空战声中，在马共的要求下，林江石、林亚当、黄耶鲁、陈锡清等首批政治犯从狱中释放出来。新加坡工人和各界人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欢呼反法西斯战士光荣出狱。

12月28日，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和华人社会知名人士百余人应邀出席汤姆斯在总督府的招待会，刚出狱的马共代表林江石、林亚当等人也同时被接见。这次会谈促使了新加坡全体华人动员大会的召开。

12月30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了新加坡各界华侨抗敌动员大会。大会主席为陈嘉庚，到会的有福建、潮州、客家、广府、海南等各帮侨领、文化界知名人士、工人、学生、店员、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代表。马共派出了以林江石为首的十人代表团。中国国民党在新加坡的代表和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也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新加坡华人最广泛团结的一次大会。当时新加坡居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华人。华人的命运与新加坡存亡紧密相连。因此，大会体现了同仇敌忾的团结气氛。但在武装民众这个问题上，因立场与观点不同，产生了分歧。

马来亚共产党在战争前夕就提出了“全民团结，保卫马来亚”的口号战，战争一发生，马共立即发布了紧急武装动员命令，在全马各州进行武装动员，决心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所以在华侨动员大会上提出了武装民众，保卫新加坡的建议。大会虽有部分侨领不理解，高凌百等人也反对，可是出席大会的大多数代表热烈拥护，结果还是通过了武装民众的议案，得以成立民众武装部和建立义勇军。

大会成立了常设机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总会下设民众武装部，保卫部，劳工服务团，以及总务，宣传等职能部门，推举马共代表林江石为民众武装部主任，办公地点设在晋江会馆，在马共新加坡市委的具体领导下，“星华义勇军”迅速建立起来了。

我与江水（即陈水鸭）等同志是第二批从新加坡监狱释放出狱的政治犯，那已经是1942年1月上旬了。出狱后我被指派到民众武装部，在林江石同志领导下工作，负责宣传鼓动股股长。民众武装部刚刚成立，只有少数工作人员，都是我原来不认识的，现在记得有李安东、陈如旧、黄应祥、钟宾等人，刘文同志代表中央军委常来联系。

民众武装部成立后即开始招募义勇军的工作，在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下各区设立了义勇军报名站。一星期内报名入伍的青年人已超过三千人，应召入伍的青年人亦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工人、手工业者，亦有渔民、店员、学生等各阶层人民。

我曾读到过好几种记述星华义勇军的文章，都忽视了马来亚人民革命运动，特别是抗日反法西斯运动对建立星华义勇军所起的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似乎一经某些伟人登高一呼，义勇军就奇迹般地出现了。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其实，马来亚二百余万人自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即掀起了强大的抗日爱国运动，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抗日战争。马来亚共产党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立场，配合中国和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积极领导了华侨抗日运动，马共组织了“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总会”（简称“马抗”），新加坡和各州成立了分会，有广泛的各阶层群众参加。当时活跃在新加坡的就有工界、学生界、店员、妇女、青年、文化等各界抗敌后会，人数以万计。同时存在的有在陈嘉庚影响下的民主爱国人士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如果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为基础，星华义勇军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也不可能如此奋勇作战。

为了实现武装抗日，马共中央发动了一切力量，新加坡市委派出“马共新加坡市委宣传队”等组织，日夜分赴市内各区作街头宣传；民众武装部利用新加坡广播电台向全市广播动员；由胡愈之、郁达夫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领导的文化工作团和青年干部训练班也积极进行文字、漫画及口头宣传。在这些力量推动下，全市掀起了一片武装抗日热潮，使义勇军迅速成立。

1月中旬，义勇军需要赶紧集中训练，由于设在武吉巴梭律晋江会馆的办事处不适应组建工作，民众武装部迁到金炎律南洋师范学校，机构也逐渐健全起来，英军派打理上校为联络官，负责处理有关义勇军的一切事务，义勇军也陆续集中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军需给养问题，英军不愿发给正规军服，只拨给一批深兰色斜纹布作材料，要民众武装部自行缝制。武装部从罗敏申公司征借百余部缝衣机，从裁缝业、妇女界招募志愿人员，就在义勇军总部开设临时军服工场，而市内各人民团体也发动群众，日夜赶制军服。

1月下旬，新加坡市委集中第一批入伍的马共党员约60人，在巴爷礼芭(Paya Lebar)的一间华文小学内开会，中央军委刘文同志到场作了关于党员入伍的指示，号召党员必须为义勇军战士作模范，并指定罗须磨、江水、林潮三人为党代表。

1月31日，英军炸断柔佛海峡长堤，日军已占领柔佛全境，除新加坡之外马来亚各州都已沦陷，新加坡防卫战逼在眉睫。2月1日，义勇军正式编队。

根据义勇军花名册，在英军军官主持下第一连编成了三个排：第一排是广府籍，第二排是潮州籍，第三排是客家籍，连长由英军军官担任，副连长是由英军挑选的原中国十九路军退役军人担任（此人广府籍，44岁，身躯高大，是个旧式军人，后来在战场上英勇作战牺牲，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另配一个英校学生x英豪（潮州籍）作翻译员，各排设正副排长各一人。

连队党代表由民众武装部委派到各连，作为连队政治指导人员。英军一方面不承认连队有党代表的编制，不承认党代表有指挥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尊重民众武装部与马共对义勇军的领导，不敢公然反对党代表的存在。事实上从副连长到各排的干部都尊重和拥护党代表，英籍连长也不得不表示尊重。

第二、三、四连也陆续编成，据后来知道共编成了七个连，其余已经集合待编的义勇军人员，来不及编制和武装，就不能不在新加坡即将沦陷前，紧急遣散了。在编制队伍的同时，义勇军总部聘请了星洲日报编辑胡铁君（原中国军队军官）为教官，进行操练。

2月3日，丹絨百葛码头货仓中弹起火，烈焰冲天，义勇军正在编练中，即派出300余人奔赴火场抢救，在烈火中，义勇军战士奋不顾身，抢运了大批粮食。这次抢救有两名队员不幸在烈火中牺牲，数十人受伤。

2月4日早晨，第一连轻装待发，那时我们领到的武器只有双管猎枪，每人十余发子弹，二套深兰色军服（左臂缀有红色三角形袖标），一对本地产的黄色胶鞋，一条黄色裹头巾，以及毯子，水壶，口杯等用品，装备极为简陋。

出发前，义勇军总部在“南师”召开誓师大会，林江石同志向全体义勇军指战员作了动员报告，打里上校也讲了话，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作了热情的鼓励，我代表义勇军作了答词。

是日中午，第一连从“南师”出发，乘军车经武吉知马律转入裕廊律，这时新加坡英军已丧失制空权。日军飞机肆无忌惮进行轰炸，

只有高射炮在保卫阵地。裕廊律上塞满了军车和澳洲兵，见有伤兵运往后方。我们的军车通不过去，只得弃车步行到裕廊律海岸。澳军与印军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前进。其中有个高级军官制止我们前进。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是一支军队，而且是开往前线的军队！经过领队的英籍军官解释，才让我们通过了。

到达临近海岸（裕廊十八碑附近）的一个印军兵站，就在印军附近的农村里驻扎。（发下的宵禁口令是廓尔喀语“络打拉”。）这一带都是华人的农村，利用海滩地以种植果树、养猪、养鸡等为生。农民都已经疏散了。有一些来不及转移的猪、鸡散窜野地里。第一连三个排紧相依靠，分住在果树掩映的三处农舍里。粮食由各排派员随翻译员到印军军需处领取。早上每人一份纸包的军用麦饼，有咖啡作饮料。晚餐有大米，军用罐头食品，由义勇军自行做饭。

初到时，有的战士把农民留下的猪，鸡捕捉回来宰杀，一连党支部立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说服战士们爱护农民利益，发扬义勇军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崇高精神，反对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战士们都自觉遵守了。

2月5日，打里上校以义勇军司令的身份和英印军军官数人到义勇军营地视察。当时从柔佛海峡对岸日军阵地发射的炮弹，已经落到裕廊海岸，日军飞机不断沿公路轰炸，阻断英军交通，形势已非常紧迫。

2月6日下午，第一连各排配合印军组成小分队，开往海岸，主要任务是巡逻那一带纵横交错的港汊水道，防止敌人偷袭。我们与印军混合编成许多小组用舢舨出港巡逻。一部分人定点放哨，互相呼应。

2月7日晚上，我们的巡逻小组在海上遭遇敌军小艇，舢舨上的几个战士正好是第二排潮州籍的渔民和印军，他们巧妙地使舢舨靠近敌艇，发起突然袭击，打伤了敌艇，消灭了部分敌兵，敌艇虽然逃脱了，但保卫了前沿，大振我军士气。当晚在我军右方也与敌有接触，但未有重大战斗。我们对前沿的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我们的后方是印军的阵地。

2月8日，敌军发动进攻，双方炮战激烈，敌机轰炸更加频繁。深夜可以听见在我们的右面有猛烈的战斗，敌人企图强行登陆了。9日，整日炮火和空袭更猛烈，敌已登陆，当时我方还是沉寂的，直至

10日清晨，我们被紧急通知立即迅速撤退，当时各排仍分散在港汊中，印军不待我们到达，就先仓皇撤退了。我们陆续在路上会合，沿着来路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赶上印军，路上数次遭敌机低飞扫射。我们随印军向武吉知马方向撤退，据说有被敌军切断后路的危险。

直到天黑，才到达接近武吉知马七条石的一个小镇，部队就地休息，分宿在路边小树林里。半夜，马共新加坡市委军事领导小组通过当地组织找了很久，才找到我们。市委代表询问了前线和部队撤退的沿路情况，向我传达市委的意见，因为情况急速变化，命令部队必要时相机撤回总部。

2月11日清晨，日军突然迫近公路以北的山后阵地。义勇军配合印军，开上山头增援，最初发现的是小股敌兵，但接着出现大批日军，双方展开激烈战斗，义勇军和印军一起战得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但由于缺少实战经验，伤亡较多，特别是第一排，在副连长率领下作战特别勇敢，当敌人最后一次冲击时，我方伤亡很大，副连长发狠接过印军一挺轻枪机，连呼“丢那妈”，狠狠向敌人扫射，但也成为敌人的目标，终于中弹倒地。敌人获得增援，从两侧迂回，处在右翼的澳洲军首先撤退，我军侧背受威胁，印军不得不边打边撤，义勇军也不能不跟随印军后撤，这部分印军是打得沉着顽强的。

撤出火线时，各排已经失去联络了。我率领第二排，按照市委的命令，决定撤回总部。当时日军飞机在上空轮番轰炸，低飞扫射，义勇军续有伤亡。我们穿过胶林，分数股向市区撤退，到了武吉知马三条石附近，才沿公路陆续回到“南师”。第二、三、四连稍迟出发，这几个连的作战经过，我不了解。由于政局变化太快，13日已匆匆宣布解散义勇军，总部也来不及作汇报总结。根据《大战与南侨》(1947年新加坡出版)“马来亚之部”记载的《星华义勇军总部报告抗敌经过》大致如下：“……第二连奉命出发至裕廊前线，与敌血战四日，进攻几十次，给予敌方重大损害。……第三连防守巴丝班让沿海，初时敌数次登陆未遂，最后在大炮及机枪和空军掩护下登陆，我军弹尽粮绝后退。……第四连第三排救援巴丝班让前线阵地，并援助第二连作战，敌方利用马来人奸细，及一部分投降印军作引导，由低空扫射，层层缩紧包围圈，并用大炮重机枪猛烈攻击，我军被围得水泄不通，在弹

尽粮绝之危急时，展开殊死战，一面急派交通员潜出阵地，向总部联络，请派援军营救被围兄弟。总部获得报告后，向英军要求接济军火及粮食。英军应许派送军火四车至裕廊，另四车送至巴丝班让，惜时已迟，我军被围阵亡与伤害情形惨重，不得已由各阵地退出，将四车军火自动毁灭，时第五、第六、第七连尚在总部受训中。……”

又据《新加坡简史》记载：“2月1日 义勇军集中，4日开赴前线，在前线的义勇军连队，有的驻扎在前沿战略要地裕廊十八碑，面对新山，有的防守在新加坡要冲林厝港十九碑半，有的到巴丝班让十三碑和后港樟宜一带，从5日至7日裕廊和林厝港义勇军全歼敌橡皮艇30多艘，打沉日艇3艘。8日晨，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义勇军奋战一昼夜，9日被围，退守武吉知马防线，10日至11日，武吉知马争夺战炽热进行……”这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的仅有记载。

我们撤回总部的当晚，刘文同志代表中央军委，召集我们几个党员开会，了解第一连在最前线作战与撤退的经过，12日，敌军已突破武吉知马英军防线，从三面迫近市区，敌炮火已轰击到市中心区，双方炮战激烈。

林江石同志自出狱后一直为民众武装部的工作日夜操劳，起初，为了民众武装部的经费，他要找各帮侨领寻求支持，迁到金炎律以后，为了组建军队，向英军交涉武器，装备，给养等，许多问题都要他亲自处理，有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谈判斗争，英政府虽然在万不得已的形势下接受了马共武装民众的主张，但害怕与鄙视殖民地人民的偏见仍然冥顽不化。英军坚持不发给正规军服，不给正规武器，不允许义勇军作为一支独立的战斗部队进行编制，不承认马共在部队中领导地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只是因为时间紧逼，为了尽快把义勇军武装起来，我们才不得不按英军的要求编成了义勇军。事实证明，英军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

林江石同志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人很消瘦，但还是精力旺盛，不知疲劳，我曾陪同他到英军司令部谈判关于给养的事，也曾陪同他到中巴鲁胡愈之先生的家商谈过一些事务。胡愈之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民众武装部。他与马共代表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

2月21日，已经从内部确知英军决定弃守新加坡。党决定撤回全部义勇军加以遣散，把武器埋藏起来。这件事由市委直接布置完成。

13日，第二连党代表江水同志和第三连党代表林潮同志陆续回到义勇军总部。林江石同志布置我们三人组成义勇军联络小组，负责遣散后的联系工作，我一直留在林江石同志身边协助处理总部善后事务。直至13日深夜，才凭英军司令部的特许通行证，由陈水景同志驾车，送我们往后港预定的住地。同在一起的还有警卫员古国英同志。但车开到双林寺附近，已听到密集的枪战声，已经靠近了前沿阵地。敌人已迫近市区了，英军岗哨劝阻我们前进，只得退回来绕路到一个临时集结点去。那是一个在市区边缘比较僻静的亚答屋。有十多位搞宣传工作的同志滞留在那里未疏散（其中有受了火炮弹片击伤的陈勇），次日，中央交通把林江石接走了，直至15日英军投降后，我才被领到后港三条半石的菜农区，与林江石，江水同志会合，结束了民众武装部的工作。新加坡从此落入法西斯血腥统治的黑暗年代，马来亚人民独立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也从此开始了。

四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与英军“136 部队”

英 群

(一)



136 部队部分人员与人民抗日军战士合影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136 部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从已发表的资料看，有的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附属于 136 部队，（见新加坡出版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有的把 136 部队当作一支华侨抗日部队（见《华声报》86 年第 236 期）。这些提法，都未能确切地反映历史的事实，为了澄清历史

是非，使后人了解真相，感到有责任把事实写出来，说明这个问题。

(二)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它的存在和发展在马来亚革命斗争史上是空前的。经过三年八个月的艰苦战斗，英勇作战，谱写了一页光辉的历史篇章。

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是马来亚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共就发动广大爱国华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组织了抗敌后援会，除了大力支持马华社会的筹赈和救亡工作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马来亚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由于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革命觉悟不平衡，马来亚华人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成员大多数是华人—华侨和华裔。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的战火燃烧到了马来亚，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了“抗日卫马”的主张，号召建立武装部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马共党中央组织了军事委员会，全马各州纷纷响应，着手建立武装部队。

在日军长驱直入，英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1942年1月上旬，马来亚共产党人已开始在沦陷区组织群众，收集英军抛弃的枪支，弹药，建立了抗日武装部队。与此同时，马来亚各州的马共和党组织选派了四批干部到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事训练。第一批来自新加坡，共15人。第二批来自霹雳、新加坡共30人。第三批来自雪兰莪、霹雳、西彭亨和新加坡共60人。第四批来自柔佛和新加坡共60人。他们受训后，由英军发给少量武器弹药，立即开赴前线。出发前，由马共中央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分别为第一至第四独立队，并且委任各独立队的负责人。四批受训人员中，第一批原打算活动于北马一带，但当他们到达吉隆坡以北的双文丹后，就不能再继续前进。吉隆坡很快就沦陷了，只能就地建立部队。在马共的地方组织支持下，集合已经组队的一百余人，于1942年1月上旬正式建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由于战事发展的影响，其他三批受训人员，均未能到达预定目的地。第二批只到达森美兰，第三批只到达柔北，第四批到柔南。他们都就地开展武装斗争。应该指出的是：第一，认为新加坡保卫战失败后，武装部队才转入马来亚内地继续战斗的提法是不确切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正式成立于新加坡沦陷之前，（新加坡沦陷是在1942年2月15日），在日军大举进攻时各州就着手建立武装部队。第二，认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由英军训练而组成的说法是荒谬

的。开展武装斗争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既定决策，参训人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接受英军指挥，这是一。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立之前，没有 101 学校参训人员，且在霹雳、森美兰等等各州都已经建立了武装部队，换句话说，没有接受英军训练之前，武装部队已经存在，这是二。在英军 101 特别训练学校参训的人员仅 165 人，数量上是很少的，最初只分布在 8 个独立队中的 4 个队。他们是在军事上起了骨干作用，但不等于是英军组织和指挥的，这是三。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核心是共产党员，是为党提出的反法西斯战略目的服务的军队。1942 年 2 月 15 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由于叛徒出卖，马共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许多负责同志被捕和杀害。为了领导马来亚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共中央于 1942 年 5 月底，在柔北召开了会议，通过《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文件，提出“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的主张，给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争的意志。1942 年 9 月 1 日，马共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地点在吉隆坡石山脚，参加者除中央委员之外，包括各州地委书记和各独立队的党代表或队长，这是一次对抗日武装斗争具有关键性的会议。但这次会议被叛徒莱特出卖，与会的代表大部分光荣牺牲，使马来亚斗争遭到严重打击。这就是有名的“石山脚事件”。1943 年 2 月马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执委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抗日九大纲领》，第一条就是“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这就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政治纲领和最高的行动准则。这次会议还规定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军旗为“红色大地三颗黄星”，三颗星代表华、马、印三大民族团结一致的意思。以及五角星形的军帽和以握拳为军礼。使部队有了统一的旗帜和标志。此次会议之后，马共中央再次受到破坏，独立队实际上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在党中央未能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各独立队仍坚持战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军队中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确保了党的领导作用。此外，各地方党组织和各独立队的领导日渐成熟，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使得抗日武装斗争继续向前发展。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有严明的纪律，在第一独立队正式成立时就制定了四条纪律：一、绝对服从指挥；二、严守军事秘密；三、没收敌产归公；四、爱护群众利益。随后又补充了几项注意，类似中国红军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其他各独立队也先后制定了大同小异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在1943年2月马共中央召开的执委会上，才统一规定为四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三年八个月中，这支队伍所以拖不垮，打不烂，就是依靠严格的纪律，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保护人民，为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战斗。在三年八个月的艰苦岁月里，人民抗日军依靠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才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随着日军的占领，马来亚国土的沦丧，马来亚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了马来亚抗日同盟会，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主要活动是支持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人民群众的支援是无穷无尽的。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物资贫乏，生活极端穷困。人民群众却积极地为部队筹措资金，粮食（主要是杂粮），医药等。有的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也节约下来支持部队。他们踊跃参军，有夫妻共同参军的，有一家先后参军的，也有父、子、女一起参加部队的，他们给部队递送情报，给部队带路作交通。有的为了部队的安全而牺牲自己或亲人的宝贵生命。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铭刻在每一个战士心中，增强了他们打击日军的决心和信心。总之，马来亚人民为抗日军提供了他们所能承担的一切东西。此外，还有部队直接领导下的抗日后备队，他们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是部队有力的助手。他们的任务是支持部队和配合部队作战，起了很好的作用。在部队大发展时期，大部分抗日后备队员都参加了部队，壮大了队伍，增强打击的敌人的力量。

近代马来亚人民没有经历过武装斗争，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建立以后，只能借鉴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三年八个月的斗争，逐渐总结出一条战术原则，就是“主动、积极、灵活、坚决”。在这个战术原则指导下英勇作战，其战绩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数字，只能粗略地估算，主动袭击敌人三百余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余人。抗日军也有数百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一部分同志因疾病和缺医少药，被夺去了生命。

人民抗日军为了争取联军的支持与共同抗日，遵守马共与联军 136 部队签订的共同作战协议，在 1945 年初，各州建立了与联军合作的抗日部队，装备，医药及部分粮副食品由联军空运提供。当时，原来的人民抗日军（称老队）没有公开出来与联军合作，而是从抗日军中选派一部分军事骨干、战士，以及征集素质较好的抗日后备队员组成一支新的队伍，名称也叫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内部称它为新队或公开队，原有的叫老队或秘密队，并无 136 部队之称），新队不设党代表，联军派出三至四名 136 部队人员当联络官，负责抗日军与联军总部联系，部队人事调动都服从老队指挥。这两支抗日队伍，到日本投降时已发展成一个相当强大的队伍，按记者采访的情况如下：

第一独立队管辖老队 4 个中队，新队 5 个中队

第二独立队管辖老队 4 个中队，后改进新队

第三独立队管辖老队 10 个中队，新队 3 个中队

第四独立队管辖老队 8 个中队，新队 5 个中队

第五独立队管辖老队 8 个中队，新队 4 个中队

第六独立队管辖老队 5 个中队，一个独立分队，新队 4 个中队

第七独立队管辖老队 5 个中队，后均改为新队

第八独立队管辖老队 4 个中队，后均改为新队

以上中队合计人数约在九千人以上。日本投降时老队先解散复员，把武器收藏起来，人员安排到各条战线上担负领导工作，留下新队开出城市，至 1945 年 12 月 1 日复员才交出枪支武器共 5,497 件。有人估算，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加上后备队总数约一万五千人，我认为有一定的根据。

日军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遍布全马各州（一个小队去过檳城），他们最先进入大城市——吉隆坡，占据了马来亚大半壁河山，在城镇组织和平生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委员会，维持秩序，安定治安，惩治汉奸走狗，逮捕凶犯，为马来亚人民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马来亚人民反法西斯的中坚力量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它是马来亚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是在马来亚人民哺育下成长壮大的，是马来亚人民争取解放的先锋战士，是马来亚人民的骄傲。它的历史光照千秋万代！尽管有人歪曲它，抹煞它，但它的战绩是不朽的。

(三)

“136 部队”是英国的特种部队，它的任务是在敌后搜集情报，扰乱敌人的后方，联系当地抗日武装队伍，配合英军反攻作战的军事机构。

1941 年，在日本侵略马来亚之前，英军经济作战部马来亚支部 (Malayan Branch, British 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就计划组织一个类似欧洲战场的别动队，亦即“抵抗运动”。负责制定这项计划的有三人。一是古泛罗上校，一是台维斯上尉，一是布伦米上尉。1941 年初便决定设立“特别行动执行部”这个机构，以准备应付日本，负责人是祁尔利中校，由有远东工作经验的武官为核心，在 1941 年 4、5 月间就到了新加坡。另一批英国军官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训练营，叫做“101 特别训练学校”这个学校也是隶属于“特别行动执行部”。其目的是从沦陷国家中或将被敌人占领的国家中招募经过慎重选择的男女，加以训练，并配发武器，然后潜回沦陷区去袭击敌人，尤其是当联军展开攻击的时候，配合行动，歼灭敌人。

这就是建立 136 部队的前奏曲。

在这里需要说清楚的是关于 101 特别训练学校。英国人建立这个学校的意图和目的，前面已经讲了。但是，马来亚共产党根据与英国当局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曾经派出四批党员共 165 人参加受训，其目的在于学习军事，培养军事人才，以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布伦米有以下的叙述：“当 1941 年 12 月初，日本进犯马来亚时，我们是一无所备，措手不及。我们临时抱佛脚，尽速部署。不久，事实证明，在抗日的共同事业中，马来亚共产党是我们忠诚的同盟。他们已有高度的组织和训练，不像欧洲人，他们在沦陷区中，能在不受人注目的情形下，展开活动。”马共是真诚抗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掩护和支持，136 部队不但难以在敌后站住脚跟，甚至难以生存。

新加坡沦陷前夕，中国国民党人林谋盛和庄惠泉等撤离新加坡，经印度尼西亚，印度到达重庆，被封为上校。在印度曾经会晤潘光弼，郑介民和杜聿明将军，随后派往印度负责“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正，

副总务。当时英国政府通过布伦米，邀请“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合作，经中英两国政府同意，由吴铁城和英国驻华大使森逊签署协议，共同组织 136 部队。由中国政府指派人员前往印度受训后，潜入马来亚敌后活动。英国则负担经济，负责训练及调派运送指挥等事宜。同时，派林谋盛和庄惠泉两人担任 136 部队马来亚区正副区长。

至此，136 部队正式出笼。总部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由古泛罗主持，台维斯和布伦米为顾问。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于 1943 年初由中统选派第一批人员约十余人到印度受训，此后陆续派了六批人员，他们以“龙”为徽号，第一批人员为“龙 1”，第二批人员为“龙 2”，依此顺序类推。受训的地点分别设在德里，本那，加尔各答和斯里兰卡海军基地。训练课程以游击战斗中的“黑色技艺”为主，包括使用各种武器的正确射击，偷袭，破坏等，受训时间为半年至 8 个月不等，计划受训结业后即派往马来亚。这些受训人员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情报员，一类电信员。后来实际派到马来亚去的约 40 余人。这些华人，有的曾在马来亚居住过，有的是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同时派往马来亚去的英国人约有 90 余人（其中校官 21 名）。以上是 136 部队组建的经过和它的实质。

派到马来亚去的 136 部队的人员，最先是由林谋盛带领，于 1943 年 5 月乘潜艇，在霹雳邦各岛附近登陆，不久，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系，安全得到保障，立即开展情报活动。随后还有两批分别乘潜艇在霹雳和柔南登陆。1945 年初，才开始采用空降办法。他们以小组为单位，五至七人不等。以英国人校官为领导，配以两至三名较低级的军官，有两名以上的中国人，其中一名是电讯员，另一名是情报员兼翻译员。他们的活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搜索收集情报。情报的来源绝大部分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提供。他们曾试图独立开展情报活动，在霹雳州的怡保建立据点，并派人到新加坡活动，结果机关被破获，人员遭逮捕，林谋盛也因此而被捕，死于狱中。二、组织空降。空降物资，武器装备供给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也供给挂中国国民党党徽的少数几支所谓的“华侨抗日军”，总人数不超过 300 人。三、策反。试图对印度国民军（波斯派）进行策反，但没有成功。四、开展对马来人的反日活动。由于马来人怀有戒心，实际上并没有展开。

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在敌后的活动中，没有同日军作过战，没有打死过一个日军，警察或汉奸走狗。他们的安全完全依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保护，否则，他们不仅寸步难行，还随时都有可能落入日本法西斯魔掌中。

日本投降以后，由于马来亚共产党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让136部队成员以联络官与翻译员身份混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驻接管城市的部队（新队）。1945年11月15日，军委代表刘尧同志宣布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同年12月1日举行仪式，交出武器。战士们饱含着悲愤的热泪复员。

随着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解散，136部队也宣告终结。

（四）

如上所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136部队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军队，前者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它来自人民，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队伍。后者是英军领导的特种部队。前者是为马来亚人民最大利益服务的，后者是为恢复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利益服务的。这就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所在。

五 九一石山脚事件回顾

(转载)

事件前夕

1942年8月31日晚上在吉隆坡郊外9英里的石山脚东北隅的两间茅屋里，集中了40多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州代表，独立队的领袖以及有关人员，因为第二天将召开全马代表大会，商讨抗日大策。担任会场警卫工作的，是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模范中队队长阿燕和他领导下的6名武装战士。7点一到，总部代表召集代表们谈话。在各人自我介绍后，有些代表继续与久别重逢的老友攀谈，有些则准备着明天大会的报告。这一晚，原订主持大会的马共总书记莱特（几年后被揭发是敌人奸细，与日本暗中勾结）、星洲和东彭的代表都还未到达，其他各州和各独立队的代表大部分则已赶到了。当晚在总部代表小忠主持下，举行了预备会。预备会结束后，各位代表们有的继续整理报告，有的草拟提案，有的互相交换各地工作的经验，直到深夜才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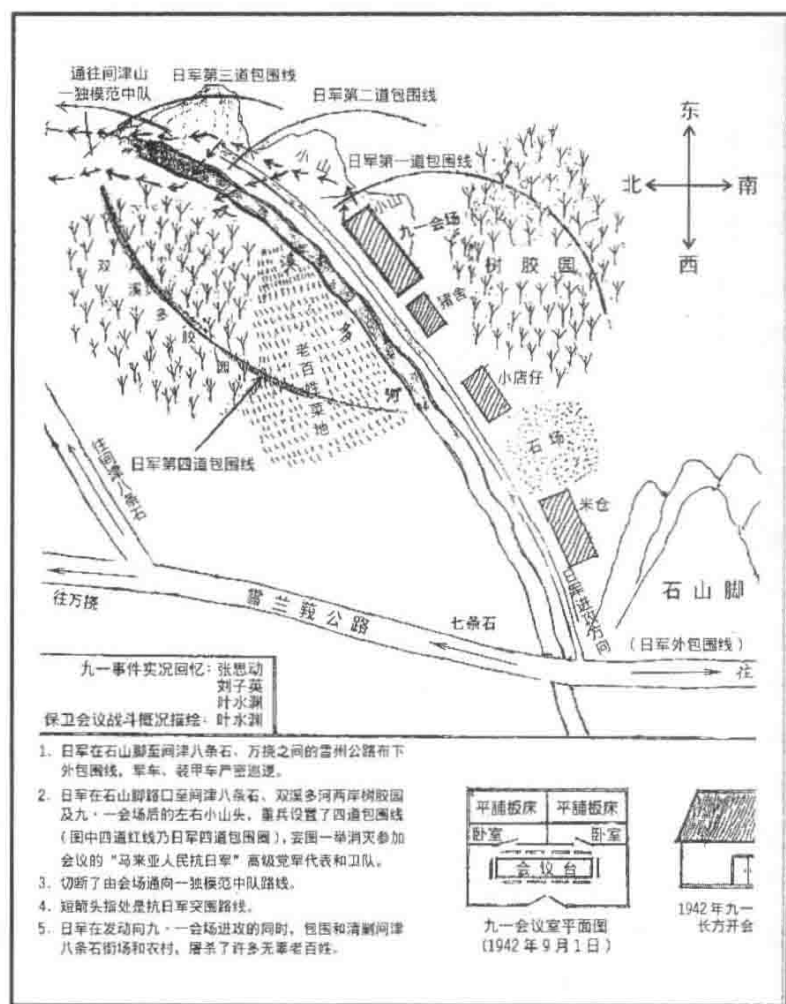
日军早已得到准确的情报，调集了二千余精锐兵力，准备在会议开始的第二天（9月1日）清早，对会场实行大规模进攻，企图一网打尽抗日军的主要干部。日军的部署是，主力部队沿双溪多公路推进，直扑会场，并在场地前面的双溪多河边及过河的胶园公司附近布置伏兵。日军也在胶园的外围双溪多公路上密布岗站，并用装甲车来往巡逻。日军的侧翼部队，由石山脚街场闯入农村，进行肃清搜索；日军的截击部队则由鹅麦进山，沿山边路到会场背后的小土岗上埋伏，以断抗日军退路。此外，为了防止开会的抗日军突围向会场附近的模范中队驻扎地集合，并为了牵制“模中”对会场可能的援助，敌人还要同时进攻“模中”在间津八英里的营盘，扫荡间津一带的农村。

冲出重围

9月1日早上五时三刻，正当日军主力部队已迫近会场，幸好一位警卫员发现敌情，立即扑进会场报告。这位警卫员刚喊出声“鬼子来了”时，哨兵的来复枪声响了，接着手提，轻机和手榴弹声也一齐怒吼起来，小忠立即发出命令，全体代表拿着武器（手枪和手榴弹），带着

文件，在警卫员掩护下，冲出会场，向后面小土岗撤退。

这时天才刚亮，当战士们退到小土岗的半腰时，预先埋伏着的敌军，在小土岗上从多方面用密集火力向抗日军扫射，并把小土岗重重包围起来。在危急关头，全体同志组成纵队，抛出两粒手榴弹，打开一条血路，大家冒着弹雨，从小土岗的右侧猛冲下来。冲下了小土岗，到了一段低地，这时敌人多方面的火力都集中向着抗日战士猛烈射击，为了



掩护同志们突围，5位警卫员和三位服务员坚守在低地，以轻机，手提及步枪向人数多倍的敌人展开极为壮烈的殊死战，以牵制敌人火力，迫使敌人没法集中更大的火力对付突围同志。

突围的同志分成两组，向低地对面斜坡上的敌人作钳形的冲锋。在同志们的英勇冲锋下，斜坡上的人数多倍的敌人被逼得匆忙向后溃退。同志们胜利地冲过斜坡，敌人的第一道包围线冲破了。在冲锋中，四独正队长余洪（阿福），朱佬，阿彪英勇牺牲了，另外有几位同志也受伤了。

突围的战士同志冲上了斜坡之后，向双溪多河前进，冒着敌人在河边埋伏队伍射来的弹雨，胜利地冲过了双溪多河，这是敌人的第二道包围线。这时柔南代表小康已受重伤而不能再走，他在鼓舞战友们继续冲锋之后去世。

冲过了双溪多河，又碰到几百敌军在胶园公司附近的埋伏阵地，同志们继续英勇地凭着手榴弹的火力掩护冲锋，在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大家的怒吼声中，敌人不得不让开一条血路来，战士同志们又胜利地冲过了第三道包围线。

日军的第四道包围线就是密布的岗站，并以装甲车来往巡逻的双溪多公路。在奋勇冲锋下，大家终于冲过了双溪多公路。这时再有几位战友牺牲，但约半数都安全地冲过了敌人最后这道包围线，安全脱险。

冲到间津农村时，彭友已杀得遍身血迹，于是跑到一农家想借套衣裳换换，但他还来不及拍门，就被日军发觉而追赶，一个挂住肩章的军官挥着长剑冲过来。虽然彭友已精疲力竭，手中左轮也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但他却以此弹结束了日军军官的狗命，然后又赤手空拳地和几个日军作生死肉搏，最后英勇牺牲。

当战士同志们冲过双溪多河后，在西北方山麓的沓芭地的那5位卫兵与三位服务员则与三面围攻的敌人作殊死战，其中6位光荣殉难了，剩下刘友与保伦两位战士隐伏在草堆里，刘友是弹绝，保伦只有最后一粒子弹，他的腿则受伤。一片沉静使敌人以为他们全部牺牲了，而大摇大摆地走到沓芭地来。在敌人迫近时，保伦就瞄向带金星挂长剑的中村中佐，这是最后一弹，让中村见鬼去，保伦也在刀下光荣殉难，而刘友却被捕，尔后在吉隆坡警备部残暴的毒刑下牺牲。另警卫战士夏生，肩受重伤，去了大块肉，血流厉害，不能走，钻进塞芭，事后与小腿伤重也钻进塞芭的六独党代表小章碰在一起，撤出现场。

这次战斗，抗日军牺牲了9位优秀的干部，6位模范战斗员，3位服务员，总共18位烈士。但日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死中佐1，中尉1，死伤曹长，军曹，伍长等下士官30余，士兵死200多。

日军事后搜查石山脚一带，洗劫邻近村民。许多无辜者于几个月后才放回，有者则一去不返。

事件影响

9月1日下午，敌军在吉隆坡的爪哇街和暗邦路陈列二、三十颗人头。据说有一部分是石山脚被捕村民的首级。显然日军企图以人头恫吓人民，从而掩盖自己的失利。

确知已冲出包围的有中常委蔡克明、小平、中执委阿福、第六独立队党代表章凌云、吡叻地委书记阿苏、吉兰丹代表“通通”，警卫战士夏生，另有杨木(杨科)与陈勇被俘。

在这一役中，抗日军全体人员约40位，其中警卫员只有7人，所拥有的武器只有一挺轻机、三支来复枪、两支手枪，其他有的只带手枪，有的仅有手榴弹。敌人方面，却拥有50倍以上的兵力，拥有优越的武器，还有准确的情报，经过多天的侦察和部署，主动发动进攻，而且地点是在农村和胶园，抗日军人员是在敌众我寡，火力悬殊和情势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冲出重围的。

这一役，日军的残暴和恫吓并未动摇我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反而激发了全民同仇敌忾的意志。

烈士的形象事迹，成为引导无数后来者主动走向抗日战场的动力；战士的事迹，也一直在民间传颂直到今日。

十八烈士略历

1. 小忠：李振宗，又名李英，亚川，中常委，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司令，福建人，曾领导星洲、雪州抗日运动。

2. 小康：钟振康，或钟晋康，福建人，柔北领导人，马抗总会常委及人民抗日军特别队党代表。

3. 陈炳宏：吉打州地委书记，曾领导槟城、马六甲、星洲各地工人运动。

4. 文燕：福建人，槟城市委书记，曾领导星洲建筑工人。

5. 许庆彪：客家人，第一独立队党代表，曾在槟城及星洲负责学生运动工作。

6. 陈书：客家人，柔北第三独立队党代表。

7. 朱佬：即朱日光，琼州人，中执委，活动于柔南的第四独立队之党代表，曾在雪兰莪、森美兰、星洲、柔佛各州领导工人运动。

8. 阿福：余洪，四邑人，第四独立队正队长，曾在雪兰莪、马六甲工作。

9. 徐清：客家人。即张奇生或浪平，第五独立队党代表，曾负责吡叻州工作。

10-15. 警卫员 6 位：阿燕(大会警卫队长，一独模范中队队长)，队友黄光、保伦、小林、彭友、刘友。

16-18. 服务员：刘三耐、张观风（女）、刘琨。

按：1949 年 6 月，在纪念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一周年时，9 月 1 日被定为“烈士节”，以纪念抗日卫马、争取独立和人民自由的事业而献身的无数先烈。

资料来源：《功勋永不忘》，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编 1.9.2007

六 白衣烈士从法西斯 监牢里寄出来的信

白 衣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本应该将被捕生活情况作一个详细的报告，检讨我们这一次牺牲的原因与所得经验教训，自我批评，对党的希望等等，但因环境关系，不能有系统草写给你们参考，只有分段写给你们。在敌人严密监视下草写或者字迹不明，在所难免，希望你们多费一些精神，不但这封信是我的最后话，同时每次写时，没有五分钟久。写字之难，同志们可想而知。

现将一部分为党事业尽忠的同志姓名、死的日期和原因、未死者我们纪念已死的同志办法报告于下：

十二人在此监房死去。姓名：

林江石即阿黑，七月十八号

古国英即老古，七月二十五号

小王八即黄世锐，七月二十九号

林亚当即惠余，七月三十一号

小路即培青，八月一号下午

阿Q即邱俊杰，八月一号早晨

黄诚即黄石，八月九号

关于上列七位同志全是病死。

其主要原因：A、因受刑过重。各同志都是遍身损伤，其中最重是阿黑和克章等同志。阿黑同志在宪兵部时作第二次逃走不成功，给

敌人将他毒打不能行动。敌人所给我们的刑罚，可说是十八世纪的野蛮时代的刑罚。如用绑手脚压着进行灌水，有些同志被灌十多次，又将手脚捆在一起如绑猪一样，吊在树上身离地，还用大条木棍乱打，使受刑者死去复苏者数次。或长时间跪在地上（有跪六个钟头之久），还要在跪的人腿中夹一条大木棍，两头有敌人将棍用脚踏着，用力转动木棍，使受刑的人痛苦难忍。或数人将受刑者手脚捉住，你推我拉摇来摇去，使受刑者头晕眼花。或数人将受刑者抬起丢高，跌倒知觉尽失，或用电线将受刑者手脚绑起来施行电刑，麻痹受刑者的神经。这些是一部分毒刑，大概还有很多用火烧不给吃饭等等，笔难尽录。总之敌人给我们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法西斯匪徒们，便不是有什么法律和秩序，完全凭着个人兽性喜乐为取舍。我们经过这样的摧残之后，每个同志只有半条人命入到监牢。（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半路，阿黑同志还不断受到宪兵的乱打、毒刑、惨伤，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血仇。

B、长期饿，我们自从被捕后，禁在宪兵部有两个月，未曾吃过一次饱饭。但来到监牢中亦终日挨饿，各同志身体给敌人用各种野蛮刑罚摧残到半死，加上长期饥饿，身体较弱和受刑惨重的同志进到此牢不够一个月就牺牲了。笔录到此，令人切齿和心痛！同志们，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呀！

C、同志牺牲这样快，除上述的事外，还有另一原因，就是没有卫生成为病死的原因。吾等被禁宪兵部时，已有数人面肿脚气，皮肤病等。在宪兵部时有些药及有水洗面冲凉，但到监牢情形就不大相同了。关于监牢的卫生生活情形摘录如下：此监牢是在四排坡 D 号，英政府前时所用监房之一，是由军务管理。所禁的人，罪名都是违反军纪（？）。在此罪名之中还有各种不同的如共产党、义勇军、爱国团、暗杀团、抗日分子，英军俘虏逃走被捕，或日兵兵团反战奸淫抢劫等等而被捕都是监禁此牢。还有此监牢是禁不重要的犯人。看守前一种监牢，最初由宪兵后由探长（经常换人，因这批要调走，另一批要调来），看守后一种监牢是由马来人，日兵不管。我们被禁于前一种监牢共有十余人。因为被杀

和病死日渐减少。其他犯人分为中国人、吉宁人（按：即印度人）、马来人、英国人和澳洲兵等等。有些日兵禁在楼上，前些时候有 14 人，现在有 82 人。因为这日兵不耐烦遵守军阀的军纪，所以被禁的人日多，他们的生活和其他的犯人不同。现将生活简单列下，给同志们明了敌人禁判我们手段的残酷。每日早起没有限定时间，就在房内等候吃饭，没有洗面和漱口等。早餐（注：字迹模糊不清），中午 1、2 时，下午六时，东京时间）。整天关在监房内，没有机会见到水和太阳，更谈不到冲凉和洗衣服。但时间一次（大约半点钟）就冲凉时间由管理的日兵欢喜，无一定。衣服个多月不能洗一次，亦没有衣服换，所以每个被禁的人由房内出来时身体带着一种奇臭难闻的气味。那些病死的同志，从入狱到死未曾见过太阳和水，成日在黑房子里度日，（每个被禁者都如此）同时阿黑、阿当、阿 Q、黄诚四位同志锁住脚链至死这日。关于伙食情形，每餐所食大约平时吃饭所用的碗有一碗饭之多，菜里用海带菜类的水，放在饭里又臭又淡。鱼和肉这一种有滋养料的食品不用想。（被捕到现在不但没有吃过猪肉，看都没看过）每一被禁者在没被捕前不管身体多健壮多好，经被禁在这里二、三个月，那么他一定会病，甚至病到死亡。在宪兵管理时还随时随刻开门进来，将被禁的人殴打一场亦不说原因。后来从八月十五日起伙食方面改良一点，吃饭的碗一律大碟。前时是有大小碟之分，判决的人吃大碟，拘留的人吃小碟。虽有些改良，亦不会吃得饱。换句话，就是说日本军阀离不开战争、饥荒，这就是法西斯三位一体的特征。难道还不明白吗？在改良之后病时有日本医生给一些药。每日倒粪一次，（没有改良时一星期一次），有给冲凉运动等等。但不论何时不给你说话，不管和任何人都不能，这是法西斯压迫人民的必然手段。此牢被判决监禁的刑期最少六个月，最久五年和死刑，和有承认参加过抗日运动的团体（不是共产党）都被判死者不少。如被判死刑还没有被杀之前（因日人封建，杀人要选择日子，有时被判死刑者，还等半个月之久，才拉去杀掉）将被判死刑者手锁住，整天关在房内不给出来，同时不

给木板和毛毡，这是敌人的残忍手段，使你临死还要受罪。听说前些时执行死刑的方法是枪决和杀头，后来改为由医生打毒药针，将判死刑者生命结束。如果此说不讹，那么日人杀人方法亦改良了。

我们为着纪念七位殉难同志，决定每月殉难被死的日子到来之时，那天午餐手持饭放在自己面前默哀数分钟才进食，当作不忘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的一种回忆和纪念。为革命而牺牲于牢者实不少病死，牢中除上述之外，还有古国英同志病死于七月二十五号，槟城秃头同志病死于九月二十八日，还有不相识面熟病死于牢中不少，被判死刑而牺牲更多。黄梅、陈水鸭、林义平等等。霹雳三位被判极刑，（是否同志不知）被杀时十月十四日。每月被杀和病死的同志一样多。我们所知的是一部分而已，大概情形就如上述。阿 Q 同志在临死前四天留下有字在房内，抄在下面，你们就知道监中生活大概了。这些遗字是在四排坡 D 号监房 23 号房内。

哀哟之声耳边闻，病倒监狱何一人，
管狱装聋反作哑，有时还发讥笑声。
疾病于此难活望，大家准备见阎罗。
有福同胞为前路，不幸朋友步后盾。

同志们，你们看见这次敌人来摧残我们作何感想呢？余言不叙，由同志们来决定应做的事业吧！此字是以便桶盖做桌面而草成，在写字之时监视太严，停笔十多次才将此信写成。

（编者按：白衣，原名李良，又名李雪峰，广东省四邑人，建筑工人出身，马共六扩会中委。新加坡沦陷后不久即被叛徒莱特出卖，牺牲于狱中。此信约写于 1942 年 11 月，文字一如原稿）。

七 “抗敌后援会”在马华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马 林

许多人都知道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华侨在中国抗战爆发后对祖国的热心支持和踊跃输将，都知道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对中国抗战的全力支持和重要贡献；但却不一定知道“马华抗敌后援会”在马华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出色表现和所作的牺牲，尤其不一定知道“马华抗敌后援会”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华侨参加和支持马华抗日救国运动方面所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为了客观地认识这段历史，使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不致于湮没无闻，笔者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抛砖引玉并就正于高明。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马华抗敌后援会”的资料，不但现在已如凤毛麟角，就是在当时也很难见诸于报端，这不能不给问题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幸好，当年“抗敌后援会”许多骨干分子，现在还有一些人健在，他们提供的亲身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特别可贵。笔者所以能写成这篇东西，首先得感谢他们的帮助。

一、“抗援会”的成立和组织

“马华抗敌后援会”是“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简称（又称“马抗”或泛称“抗援”）。下设有马来亚各州的“抗援”组织，如雪兰莪州的“抗援”（简称“雪抗”），霹雳州“抗援”（简称“霹抗”）等等。



王炎之



粘文华



戴英浪



辜俊英

在各州“抗援”的领导之下，分设“工抗”（“各业华工抗敌后援会”）、“学抗”（“华侨学生界抗敌后援会”）、“青抗”（“华侨青年抗敌后援会”）、“店抗”（“各业店员抗敌后援会”）、“妇抗”（“华侨妇女界抗敌后援会”）、“文抗”（“华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农抗”（“农民抗敌后援会”）等组织。在“马华抗敌后援会”之下，新加坡专门成立“星抗”（新加坡旧名星洲）以领导新加坡各界抗援组织。

“马华抗敌后援会”是由马来亚共产党创立，并由马来亚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半公开的群众组织。（“星抗”则直属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海外华侨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精神大为昂扬。为推动和发展这一有利形势，马共及时提出了在华侨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口号，并决定成立“马华抗敌后援会”。

“马华抗敌后援会”最初叫“抗日后援会”，为了适应殖民地环境，便于公开活动和开展工作，才改称“抗敌后援会”。1937年8、9月间，戴英浪^{〔注1〕}受马共中央委派，以“马抗中央筹备会”代表名义，巡视全马各地，和各地群众运动积极分子进行接触，在统一认识

注1：戴英浪是30年代马华文化界的活跃分子，“星洲业余话剧社”发起人之一，毕业于上海美术学院，早年曾留学日本。1939年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1986年病逝于杭州。

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各地“马抗”组织。如柔佛州“马抗”就是在戴英浪主持下成立的。1937年9月上旬，在哥打丁宜路十三碑一间咖啡店楼上，召开了有柔佛州各界代表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柔佛州“马抗”组织，并在“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会上公开宣布成立。^(注2)也有一些州的马抗组织，是在当地马共地委的领导下，直接建立的。当时，“马抗中央筹备会”的领导成员除戴英浪外，还有王炎之、粘文华等。^(注3)

因为“马华抗敌后援会”是建立在马共所领导的各界群众运动基础之上，所以短短一个月之内，“抗援”组织便遍布全马各州。如新加坡“工抗”，便是在原来的“星洲赤色工会”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学抗”是在“学联”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青抗”是在“青年团”的组织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如此等等。因此，“马华抗敌后援会”是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唯一具有广泛群众性基础的组织。

在“抗援”的各界组织中，除“马抗”外，只有“学抗”建立了全国性组织，其余一般只有州一级的组织或个别地区或个别城市的组织（如“农抗”“妇抗”“文抗”等）。1938年底（一说1939年初），在新加坡芽笼32巷一间平房里，召开了全马各州的“学抗”代表会议，到会的有檳城、马六甲、吉隆坡和各地代表近30人。会议听取了陈美代表“星抗”和温国华代表“马抗”所作的报告，选举产生了全马“学抗”的领导机关——“全马学抗常委会”。“全马学抗常委会”有委员7人，包括著名学运活动积极分子黄世锐（新加坡沦陷后在日本监狱中牺牲）、彭海涵（彭光涵）、陈荣火（陈青山）、阿特（黄志辉）、赖文明、李明星（李克）等^(注4)。从此，“学抗”便以一支有组织的队

注2：1987年3月王平提供。王原名蓝庚来，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前马共柔南地委委员，1941年春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1987年9月病逝于广州。

注3：王炎之，四君子之一，马华社会活动家，福建南安人。1938年被驱逐出境。60年代初病逝于南安水头乡。粘文华，四君子之一，福建泉州浮桥人，出身海员，与王炎之一起被驱逐出境。1986年病逝。

注4：1987年3月，蔡丽珠和陈青山提供。蔡是新加坡学运和青运积极分子，1951年回国。陈是马来亚学运领导人之一，1941年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伍，投入到抗日救国洪流中，成为当时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一支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力量之一，不仅为当时筹赈爱国运动，也为后来的抗日武装斗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全马最有影响的几间中学，如檳城的钟灵中学、福建女中、吉隆坡尊孔中学、加影华侨中学、麻坡中华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南洋女中、中华女中等，都是在“学抗”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

除“学抗”之外，另一支有组织的队伍是“工抗”。“工抗”虽然没有建立全国性组织，但却是“抗援”组织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不但人数众多，也因为工人支持抗日爱国运动最坚决。许多艰巨的任务，例如惩诫汉奸、抵制日货、纠察会场，包括和各种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势力进行斗争，大都由他们执行或配合其它抗援组织去执行。在当时，凡是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华人会员，一般也都是工抗的会员。由于当时有些行业的工人，已争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为争取扩大影响，一般的抗日救国运动（如募捐、卖花、义卖、演讲等），都以合法工会的名义，而不以“抗援”的名义发动和组织。如新加坡当时几个较有影响的工会（黄梨工友互助会、火锯工友会、人力三轮车工友互助会、建筑工友互助会、码头工友互助会等），都是如此。

和“学抗”、“工抗”同样活跃的是“青抗”。“青抗”曾建立半公开的组织——“青年救国会”，活动范围主要在大、中城镇，特别是新加坡。在“青抗”领导下的合法青年群众团体有：“青年乐心社”、“爱群体育社”、“一心社”、“琼崖青年俱乐部”、“益友社”、“中华国术馆”、“青年口琴会”、“琼州青年剧社”、“金刚音乐社”和“韩江励志社”等等。

总之，“抗援”的活动，除了锄奸、抵制日货、援助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被英殖民地当局认为“妨害”其“法律和秩序”，不能公开的以外，一般都争取以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当时遍及全马各地的读书班、歌咏队、时事报告会、口琴会、流动宣传队、剧社等各种群众组织，很多是“抗援”组织的，或者在“抗援”的推动和影响下成

立起来的。在当时的各种条件互相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华抗日救国运动，涌现了一批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爱国侨领，培养和造就了无数抗日骨干。如果没有这一波澜壮阔的、有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为基础，任何英雄和个人都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

二、“抗援”和“筹赈会”

在马来亚华侨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基础上，筹赈义捐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筹赈会”和“筹赈分会”纷纷建立。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筹赈会首成立，跟着，马来亚各州的筹赈会也相继建立起来。1937年10月10日，在吉隆坡召开了全马12个区筹赈代表会议。会议虽然决定不设全马筹赈总会，但通过成立“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举陈嘉庚为通讯处主任。这样，在马来亚抗日救国运动中，便出现了两个全马性组织：“抗援”和“筹赈会”。前者是半公开团体，成员绝大多数是劳动群众，后者是合法组织，成员多是地方上的侨领，大多数是资本家，也有个别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在新加坡，还有一个半公开的爱国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部”，简称“民先”。它的活动主要限于新加坡。

那么，“抗援”和“筹赈会”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有一种意见认为，马来亚华侨救国运动是由筹赈会(或者“南侨总会”)领导的，因此，一切爱国团体的活动都在筹赈会的影响和带动之下，“抗援”自不例外。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应该承认，筹赈会在号召海外华侨捐款、募寒衣、赈济祖国伤兵难民、推动各种捐献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发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作用是不可抹煞的。特别是在“南侨总会”后期，对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消极抗战和打击海外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分裂活动、促

进华侨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更是居功至伟。对筹赈会这些方面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无疑是不对的。

况且，筹赈会作为华侨筹赈募捐的领导机关，较之马华社会原来建立的地缘性团体（如各帮会馆）、血缘性团体（如各类宗亲会馆）和业缘性团体（如中华总商会），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它是一个能够以马来亚全体华侨的名义说话，并得到马来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唯一组织。这在当时马华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因此，“抗援”的态度是：积极地参加到筹赈会的工作中去，支持它的一切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活动，甚至积极参加筹赈会的建立。凡一切可以公开的合法活动，都以它的名义进行，以便组织和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救国运动中来，充实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筹赈会举行的卖花、募捐、义演、义卖、献金、征募机工回国服务团、救济和慰问因实施对日经济制裁而罢工的峇株巴辖、龙运、甘马挽日资铁矿工人，支持武汉合唱团在全马的巡回演出等等，都可以看到“抗援”成员的活跃身影。在所有这类活动中，“抗援”动员了一切力量来配合和支持筹赈会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抗援”广大成员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才使得马华筹赈运动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抗援”是筹赈会的主要力量和基础，越是到基层“抗援”的这种作用就越突出、越明显。这是当时筹赈救国运动中一个基本情况。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抗援”的作用和力量：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周年，由“星抗”组织和发起，在新加坡快乐世界运动场举行了侨民大会，邀请星华筹赈会和各侨团代表参加。事前，“星抗”曾派代表与陈嘉庚先生接洽，请他出席并讲话。陈嘉庚先生虽然接受了邀请，但表示怀疑“抗援”是否有力量召集这样的大会。不料到开会时万头攒动，人潮汹涌，参加大会的人数足有万余人。而且旗号鲜明（都打着各类“抗援”的旗号），队列整齐，秩序井然。这和同一天由国民党政府驻星总领事高凌百出席讲话的、在中兴俱乐部召开的

纪念会（名为中兴俱乐部开幕典礼），只有百余人参加，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嘉庚先生十分感动，称赞“抗援”从事“暗”的爱国工作（指惩诫汉奸、抵制日货等有违英殖民政府法律的工作）为“难能可贵”，是“无名英雄”。这件事立即成了当天各报的重要新闻！《南洋商报》还接连两天作了详细报道。通过这件事，陈嘉庚先生进一步认识了劳动人民的力量，提高了抗日救国的信心，对他后来的思想转变——从维护国民党正统到投向人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筹赈会虽是华侨筹赈募捐的领导机关，但本身却有很大的局限。首先，它只是一个松散的筹赈组织。正如陈嘉庚先生所说：“至领导机关云者，乃各侨领集思广益，组总会以相联络”，“而通过任何议案遵行与否，总机关实无权干涉。”^{（注5）}在“南侨总会”成立前，（南侨总会成立于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先生曾慨叹：“马来亚分十二区，各设筹赈会以为统筹统汇机关，然各区中每有人私用社团或个人名义，将赈款直接寄交政府（指国民党政府——笔者），不肯交与区会。此其用意所在，固不待言而喻。”^{（注6）}由于这个缘故，有些筹赈会为少数人所把持，成为谋私的工具，有些筹赈会“半身不遂，甚至名存实亡。”^{（注7）}所有这些，都使筹赈会作为华侨筹赈募捐领导机关的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其次，筹赈会“不能干犯当地法律”，一切活动都要在英殖民地政府许可的范围内，是它行动的准则。在新加坡筹赈会成立的前一天，即1937年8月14日，英殖民地当局华民政务司佐顿约见陈嘉庚先生谈话，谓：“经与总督议定，此会当由你负责……一、不得表明筹款助买军火，二、不得提议抵制日货，三、款须统筹统汇，不得别设机关，四、款汇交何处由总督指定。（后指定汇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笔者）”^{（注8）}

注5：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0、54页。

注6：1938年2月6日《南洋商报星期刊》，转引自《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第28页。

注7：吴逸生：《抗战二周年与华侨》，1939年7月7日《南洋商报》。转引自《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第18页。

注8：见《南侨回忆录》第42页。

这些限制，完全是根据英殖民政府的利益作出的。当后来事实证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把华侨的捐款完全用于抗战——许多捐款被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贪污了——而且对抗战最力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扣发军饷的时候，这种限制的反人民性质，就再清楚不过了。“抗援”当然不能接受这种限制，也不能要求筹赈会打破这种限制，这样，从1938年起，在“抗援”的领导下，一个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运动，就在全马各地热烈开展起来。这里有一个事例：星洲人力三轮车工友会，原规定每个会员每天捐献一分钱，每月三角，用以支持祖国抗战。该会有会员八千人，每月共捐献叻币二千四百元。从这时起，这笔款就转为汇交香港廖承志办事处。当时全马汇交“援八援四”的捐款，其数目是相当可观的。

至于筹赈会“组织的不健全”“忽视下层劳动群众，忽视有工作热情与工作能力的文化工作者”，募捐不注意“小众”（指富人——笔者），等等^{（注9）}，所有这些，都妨碍了筹赈会工作的更好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有严密组织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援会”，就愈益显得是抗日救国和筹赈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了。

三、“抗援”的工作和贡献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配合筹赈会，发动广大华侨劳动群众，踊跃捐输，支持祖国抗战，尤其是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抗战。据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披露，“南侨总会成立之后，三年中（1939—1941），马来亚华侨义捐每月平均计有420万元”（国民党法币，下同）。按此推算，三年合计约为15,129万元，如加上从抗战爆发至1938年，马华义捐总数约为18,000—19,000万元，约占南洋华侨义捐总数四亿元的一半。（不包括购买公债、募寒衣、捐助车辆、药品以及家用汇

注9： 吴逸生：《抗战二周年与华侨》。

款等)。据陈嘉庚先生统计,海外华侨“自抗战以来5年间共汇家费义捐国币50余万万元”^(注10),这些捐款百分之六十是华侨中下层群众捐献的,除筹赈会的号召外,当然与“抗援”的广泛发动和参与是分不开的。至于“抗援”领导的“援八援四”运动,总共捐了多少钱,因各地都是秘密汇交香港廖承志办事处,没法统计,但数目一定很可观。这里引用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江纵队史》一书中,提到的海外华侨捐助的一段话,以见一斑:“1939年初,海外华侨寄宋庆龄转交曾生抗日游击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以后还多次送回捐款和被服、军鞋、药品等大量物资。1940年以前,曾生部队的被服、军鞋和药物,主要是靠华侨和港澳同胞捐献的。数年累计,南洋惠侨救乡会约筹集支持祖国抗战的捐款约千万元。”^(注11)南洋惠侨救乡会设于吉隆坡,其主要骨干是爱国侨领和“抗援”成员。曾生部队所得的捐款只占它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捐款的百分之四十,另百分之四十是捐给八路军新四军的。

又据前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林职夫回忆,在他担任新四军敌工部代部长期间,一次就收到从香港转来的捐款二百万元。新四军当时已有数万人,但国民党仍按额定一万人,每月16.6万元军饷发给,后来又被无端砍去10万元,只发给6.6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侨捐款所起的作用,就连三岁小孩也会明白它的重要意义了。(注:笔者手头无林职夫的回忆文章,仅凭记忆。)

第二,配合筹赈会,宣传抵制日货,对那些屡教不改、不顾民族利益的奸商,给予制裁。“七·七”抗战爆发后,马来亚华侨抵制日货的情绪又进一步高涨起来,各地筹赈会都相继通过决议,号召商民不卖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但仍有少数奸商,只图一己私利,用改变包装、伪造产地,甚至冒充国货等种种手法,继续买卖日货。筹赈会因囿于当地法律,虽知情也无可奈何。“抗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

注10:陈嘉庚上揭书第345页。

注11:《东江纵队史》第27页。

甘冒坐监和被驱逐出境的危险，组织特务队或锄奸团，对这类奸商，在调查核实后，先是宣传，后是警告（把其招牌涂上沥青或掷臭鸡蛋），如再无效，即采取行动，将日货加以没收销毁，只有对少数坚持不改或敢于抗拒者，才将其耳朵割去一只或半只，以儆效尤。这样的事件，当时在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檳城、怡保等大中城市，日有所闻。其中因货主抗拒，激起群众公愤，酿成风潮者，也有数起。如 1937 年 11 月 18 日夜，发生于吉隆坡的群众围殴奸商事件，1937 年 12 月 20 日发生在彭亨瓜拉吉挠的抵制日货风潮，1938 年 5 月发生于怡保的抵制销售黄豆风潮，1938 年 7 月 4 日，发生于檳城的“白壳豆事件”和一肥皂厂主人开枪威胁事件……，都轰动了全马。这些抵制日货和对奸商制裁事件，都是“抗援”发动的，而英殖民地政府对这类事件的态度，就是出动军警，加以镇压，先后拘捕群众数十人。虽然如此，但抵制日货，维护民族利益是广大华侨的共同要求，被捕群众获得了华侨上下一致的同情，而那些有劣迹的奸商，却像过街老鼠，极端孤立。对这种情况，英殖民当局也无可奈何。由于广大华侨一致的抵制，日货输马剧减。据当时“日内瓦和平运动局”报告：“世界各国抵制日货最甚者，首推马来亚，日货对马输入的减少约七十五巴仙。”（注12）

“抗援”除抵制日货外，还发动日资企业的工人罢工，以打击日本军阀经济上的作战努力。如当时的新加坡海员和码头工人，就曾因拒绝装运军需原材料赴日而发动罢工，建筑工人反对建筑商使用日产水泥和不为日人建筑宿舍的罢工，而最著名的是 1938 年初柔佛峇株巴辖和哥打丁宜日资铁矿华工的罢工后来转为停工的斗争。此外，尚有加影胶工万余人、新加坡 2,000 多名船坞工人、1000 多名黄梨工人，1000 多名三轮车工人，四排坡医院 800 多名医生和护士等，因抗议日军侵略中国而举行的罢工等。这些斗争都和抗援的发动有关。

第三，发动“抗援”会员，报名参加机工回国服务团，同时积极推动和支持惠侨救乡会、琼侨救乡会组织服务团回国服务。1939 年 2

注 12： 转引自《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第 148 页。

月，“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因当时中国沿海港口都已沦陷，滇缅公路刚刚开通，有大量抗战物资需经此运输。广大华侨机工热烈响应，积极报名参加。数月之间，报名回国的机工就达 3200 余人。不少人抛弃优裕生活，回国服务。其中有不少“抗援”会员。例如柔佛新山温公司的温祺芳两兄弟，他们原开设一间小型汽车维修厂，雇有工人数人，业务经营也不错，经“抗援”动员，毅然结束营业，双双参加机工服务团回国。^(注13)又如士乃有二批机工，共约五、六十人，是经“抗援”组织和先在“士隆园”短期培训后，才以“士乃筹赈会”的名义，报名参加机工回国服务的。^(注14)像这样的事例，不知凡几。

其实，早在 1938 年 10 月，柔南“抗援”就曾以“士乃筹赈会”的名义，组织一批司机回国服务。一行 13 人，领队彭士馨，带有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二辆，先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然后转往延安，受到热烈欢迎。这可说是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滥觞。^(注15)

此外，由吉隆坡惠侨救乡会组织的“东江回乡服务团”，由新加坡琼侨救乡会组织的“琼侨回乡服务团”，都是在“抗援”的推动和领导下成立的。其成员中不少是“抗援”会员。例如，“东江回乡服务团”两才队队长黄志强，文森队队长王春红，“琼侨回乡服务团”团长陈琴，副队长梁文墀等，本身就是“抗援”成员。至于在“抗援”的推动和影响下，个别回国服务的爱国青年，更不知有多少。据《东江纵队史》一书统计：“先后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港澳和华侨子弟共约 1000 人以上。”^(注16)在新四军、八路军中服务的华侨爱国青年

注 13：1987 年 5 月钟源提供。钟是当时柔南地区“抗援”负责人之一，1949 年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注 14：同注 13。

注 15：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 47 页。内称：“1938 年 11 月初，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 11 人来到延安，他们来自柔佛士乃，领队彭士馨，团员：翁亚东、郭嘉、陈全、李玉、郑荀、丘乾水、李荀、黄国光、余枝、彭士钦。原有 13 人。带救护车大小共 2 辆。大车是森美兰州华侨捐赠，小车是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所捐。”

注 16：《东江纵队史》第 28 页。

相信也不少。这些华侨爱国青年，“有的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在被俘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热血，谱写出海外华侨爱国主义光辉壮丽的诗篇。”（注17）

诸如组织“东江回乡服务团”、“琼侨回乡服务团”，以及动员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服务等等，这类事是当时筹赈会难于做到的。

第四，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不断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抗援”成立后，即发动属下广大会员，配合各地筹赈会，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中去。当时各地的歌咏队、演出队、剧团、合唱团、流动宣传队等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全马，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长演不衰。在众多的宣传队伍中，有两个团体对于推进马华抗日救国宣传，是起了带头作用的，这就是“文抗”领导的“星洲业余话剧社”和“星抗”领导的“铜锣合唱团”。

“星洲业余话剧社”虽然成立于1937年2月，但它的主要领导人戴英浪、肖尔加、苏棠影、吴天，都是星洲“文抗”的负责人。“星洲业余话剧社”的最重要贡献，是组织“马华巡回剧团”于1938年春出发，在全马巡回演出，用普通话和各种方言，演出300多场。观众达数十万人次，筹得赈款10万元。这无论对于推进当时的马华戏剧运动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铜锣合唱团”成立于1938年春。先是由“抗援”的活动分子黄志盛、李承、白冰、黄应祥等，在“星抗”的指示下，串连了20多位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便开始活动。由于他们的水平较高，又得到音乐家任光先生的指导，很快就树立起威信，扩大了影响。他们以演唱抗战歌曲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经常活动于学校和工厂之中，并在广播电台播唱，最后还灌制了唱片。在他们的影响下，抗日救亡歌声，

注17：上揭书第29页。

响遍了全马，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侨胞的抗日热情。对推进马华的歌咏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铜锣合唱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此外，当时活跃于新加坡市郊的“四一宣传队”，活跃于中马的“前卫剧社”、“前卫流动剧队”，活跃于北马檳城的“今日剧社”和“钟中流动剧团”，活跃于怡保地区的“新生剧社”，活跃于马六甲地区的“筹赈会流动剧团”，这些团体，或者其领导成员，或者其主要骨干，都是“抗援”成员，是按照“抗援”的指示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杜边为团长的“南岛剧团”。这个剧团在新山组织，星洲“文抗”派人驻团指导。他们从柔佛出发，沿途义演，到马六甲野新时得到支持和扩大，一直演出到吉隆坡附近的煤炭山，才被英殖民当局迫令解散。他们生活非常艰苦，十多个人的伙食，每天才开支两块半钱（叻币），但每次演出的收入，全数交给当地的筹赈会。他们演出的场所，不是城市的舞台，而是矿山、农村和橡胶园。他们是第一个实践了到工农群众中去演出的。这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抗援”除以上的活动外，还用中、英、印、马来文编印和散发了无数的传单和出版油印小报，对于宣传抗日救国、提高华侨爱国主义思想、争取国际同情、争取各民族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都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由于“抗援”坚定的抗日立场和正确的抗日主张，特别是由于能深入群众，和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所以获得广大华侨的拥护和支持。“抗援”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会员遍及穷乡僻壤。据不完全统计，仅新加坡“工抗”，就有会员二至三万人，全马“抗援”的人数，约有20余万之多（一说有40万），成了当时马华抗日救国组织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

四、“抗援”和海外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斗争

(略)

五、英殖民当局对“抗援”的镇压

对于当时马华社会以筹赈募捐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救国运动，马来亚英殖民当局最初采取一种“静观”的态度，表面上不做过多的干涉，但骨子里却虎视眈眈，密切监视。因为当时的“英国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注18)它随时准备扼杀中国的抗战，满足日本军阀的侵略要求，维护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利益，但只是因条件尚未成熟罢了。

随着马华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抗援”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英殖民当局的恐惧和不安也与日俱增。“珊顿总督的主要忧虑是：华人的波澜壮阔的反日运动，‘很可能变成排日与抗英的运动’。因此他必须对抗日宣传运动实行压制的政策，以免失去控制。”^(注19)这样一来，就发生了1938年8月的“四君子事件”。“四君子事件”是英殖民当局有预谋的打击“抗援”的事件。1938年8月24日，辅政司援引驱逐出境令，拘捕“抗援”负责人兼社会活动家王炎之、粘文华、苏棠影、辜俊英（辜是“星抗”负责人之一）等四人，并立即把他们驱逐出境。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违法的“罪证”，但驱逐出境令规定，只要总督认为谁不适于在殖民地居住，就可随时强迫谁离境。这表明，对于“抗援”的活动，它已经决定加以镇压了。

英殖民当局对于马华抗日救国运动的压制，并不自“四君子事件”始，早在1938年1月9日，新加坡华、印两族群众数千人，因响应尼赫鲁“印度之中国日”的号召，在红灯码头集会，募集义款筹赈中国伤民难民。集会结束后，列队赴南天酒楼后街草坪演讲及游行，但英殖民当局以游行集会违法为名，实行镇压，当场拘捕华、印群众130余人。同年6月26日，又有华侨数千人结队游行，拥护英伦人民反对

注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73页。

注19：罗武：《马来亚的反抗》第10页。

日机滥炸广州，结果又有 30 人被捕。又如上文提到的几次因抵制日货而发生的风潮，都有群众多人被捕。所有这些事件，本质上都是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压制，但还能借口是因群众“违法”。而“四君子事件”则表明，为了和“抗援”作斗争，英殖民当局已决定更多地借助于驱逐出境令这个“随心所欲”的法宝了。

果然事隔不久，“马抗”主要负责人之一戴英浪又在驱逐出境令的名义下被捕，不久亦被驱逐出境。接着，又有不少“抗援”活动分子和爱国进步人士在同样的名义下被捕，有些人则被迫自己离境。甚至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开明人士，也不能幸免，如星华筹赈会负责人之一的侯西反的被解出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与此同时，不少爱国社团被迫解散，如“星洲业余话剧社”、“南岛剧团”、怡保“新生剧社”等等。英殖民当局还公布法令，限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又迫使不少学校当局，开除爱国师生。如此一来，许多社团停止了活动，有些则被迫改变了活动方式。蓬勃一时的马华抗日救国运动，顿时呈现了一片肃杀的景象。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1939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开始时它是帝国主义战争。为支援英国对希特拉德国作战，英殖民当局加紧了对马来亚的压榨和剥削，加紧了对各民族人民的进攻，尤其是对工人和劳动人民的进攻。这样就激起了一连串的罢工和抗议示威浪潮。新加坡的电车工人、檳城的码头工人、霹雳的锡矿工人、雪兰莪的树胶工人……都卷入到罢工的浪潮里。其中最著名的是 1939 年底至 1940 年 2 月的新加坡海港局万余工人的罢工和 1940 年“五·一”新加坡五万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对这次“五·一”游行，英殖民当局立即出动大批军警，实行暴力镇压，当场枪杀工人 2 名，伤数十人。紧接着英殖民当局又在全马进行大逮捕，各地工运领袖和工运积极分子被投入监狱的数以千计，被成批驱逐出境的亦时有所闻。“抗援”成员和活动分子不少是工人，大都参加了罢工和抗议的斗争，因此他们成了英殖民当局大逮捕的对象也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如怡保“新生剧社”，被捕和被驱逐出境的，前后竟有 30 人之多！大逮捕给抗日救国运动造成的损害，于此可见一斑。

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了争取马华抗日救国运动的合法存在和继续发展，为了重新建立适合于群众觉悟程度的抗日救国组织，马共中央执委会于1940年2月毅然作出决定：取消“抗援会”，停止以“抗援”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而重新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注20)这样，曾经在马华抗日救国运动中起过伟大作用的“抗援会”，就此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而宣告终结。当然，马华抗日救国运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它的发展，而是在新形式下继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道路。这之后，各地便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了多种不同形式的群众组织，例如，霹雳建立了“霹雳工人救济会”，柔佛建立了“华侨救国会”等等。

由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的政策，由于对“抗援会”和马华抗日救国运动采取镇压的态度，英殖民当局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日军进攻马来亚时遭到完全的惨败。“嘲弄历史者终被历史所嘲弄”，这就是结论。

(1987年5月)

注20：《南岛之春》(1946年1月15日马来亚出版社出版)第20页。

八 “民先”的二、三事

英 群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同年的第四季度，我在新加坡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由于年轻和活动范围局限于英校，对“民先”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只能是东鳞西爪的，故曰“民先”的二三事。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称，起源于中国“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北平的学生为了抗日，组织起来，深入农村、工厂，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新加坡的“民先”是在中国“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华侨抗日救国浪潮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出现的。该组织经过酝酿，于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之际，宣布正式成立。成立后，遵照中国“民先”的章程、队歌、队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活动。

1938年初，“民先”与广东东江游击队的外围组织：南洋东江回国服务团建立了联系。1939年春，张楚琨同志到香港，与连贯、董少石二位同志，也进行过联系。“民先”组织内部有祖先之说，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民先”的基层群众，仅仅知道是与祖国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有联系。

新加坡“民先”的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的华侨同胞共同抗日救国。“民先”的活动，在华侨上层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创建初期，同爱国侨领陈嘉庚的“怡和轩”俱乐部建立了联系，得到了福建籍的知名人士黄奕欢、周献瑞、侯西反、刘牡丹等人的支持。当时，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上层人士的组织，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抗日救国是不分阶层的。同时，也有人认为

它是一个主张“阶级调和”的组织，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其实，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劳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也是现实可行的。

“民先”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组织，它包括了工人、店员青年、妇女和文化界的各阶层，还有驳业工会、青年口琴会等公开社团的支持，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秘书处”，相当于“书记处”。以下有宣传部或文委，负责人是张楚琨同志，工人部或工委，负责人是李白涛同志；店员部或店委，负责人是李文陵同志；青年部或青委，负责人是黄紫焰同志。青年部属下还有“少先队”，包括大坡爱同学校的学生和小坡崇正小学的学生。据了解，在马来亚内地，基本上没有“民先”的活动，仅在彭亨的文冬有“民先”的组织，如汪清、汪洁明两兄弟和刘玉梅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民先”的队长亦称秘书长施方平，原籍福建厦门，小学教师出身。据说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被捕关在厦门监狱。小说家高云览写过《小城春秋》的劫狱故事，施就是越狱者之一，后来辗转到了新加坡。“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率先出来组织了“民先”，被推举为队长。

筹款赈济中国难民，是“民先”的主要活动之一。通过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主持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千方百计募捐资金。“民先”的广大成员在这些运动中，成了“筹赈总会”的骨干力量，为募捐资金支持抗日战争和赈济难民起了积极的作用。记得当时“民先”的一个秘密领导机关，就设在“筹赈总会”同一条街上。

大力宣传抗日主张，对华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先”活动的主要任务。以张楚琨同志为首的宣传部，团结了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如汪金丁、陈如旧、陈祖山、李润湖、蔡贞坚、黄紫焰、墨黑、吴广川、吴柳斯等，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张楚琨同志是《南洋商报》“狮声”副刊的主编，李润湖同志是《新国民日报》“新园地”副刊的主编，吴广川同志是《新国民日报》的编辑兼《现代日报》的记者。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宣传阵地和窗口。宣传部在“猛加卡”^{（注21）}有一个秘密据点，专门从事编写出版油印刊物。青年部有

注 21：俗称“芒胶脚”，位于勝明拉近广惠肇医院一带。

一支口头宣传队，经常到街头、农村、工厂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在新加坡街头巷尾到处都张贴有“民先”的墙报、标语、传单，这些宣传品都是很出色的。他们的宣传品都有一个标记：手握火炬，象征着光明和先锋作用。

组织“战地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战，这一活动是通过“筹赈总会”举办的。抗战一开始，许多热血华侨青年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报名的人非常踊跃。笔者有机会参加了一次欢送会。地点是在大坡二马路法庭对面的一间会馆（宁阳会馆）举行。参加的人密密麻麻的把整个会馆都挤满了。会馆前停放着全新的红十字救护车，回国青年穿着一式制服，胸前戴着大红花，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欢送会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当他们步出会场时，大放鞭炮，真是华侨抗日救国的一大壮举！直接主持这项活动的侯西反先生，后来被英当局以他和“民先”有关系为由，将他递解出境。

抵制日货，这是抗日爱国团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在新加坡抵制日货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日本商人和他的经纪人都龟缩了。华侨都不买日本货，日本商人店前冷冷清清。经营国货的商人则在“大世界”游乐场举办国货展览，热闹空前。但有一些奸商为了赚钱，竟昧着良心卖日货，结果招牌被涂上黑油（柏油），受到制裁。“民先”有一支“锄奸队”，都是彪形大汉，热血青年，专门对付卖日本货的奸商。锄奸队的第一任队长叫林斌华，第二任队长是陈剑魂，他们对祖国无限忠诚，对奸商深恶痛绝。那一家商店卖日货，一经调查核实，就采取措施，勒令该商店向筹赈总会交出一定数量的罚款，否则，招牌就有可能被涂黑。笔者曾举报寄住的店铺卖日本货，结果商店被罚了款，而我却被赶出了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手段是“民先”活动的特点。“星加坡青年口琴会”就是“民先”属下的公开合法社团之一。它设在大坡漆木街口一间咖啡店楼上，斜对面是中央警察局。它拥有近 200 名会员，有口琴队、歌咏队、乒乓球队，也演话剧。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会员参加活动。但是，这些活动被英殖民当局视为眼中钉。1940 年 6 月 30 日晚上被英当局查封，当场逮捕了高志等 11 人，笔者侥幸漏了网，从此离开了学校，不久，也离开了新加坡。

“民先”是新加坡华侨抗日救国的一支积极力量，它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民先”也受到挫折。另一方面，“民先”的活动，虽然严守不介入当地的革命斗争，但也免不了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打击和破坏。最先被逮捕驱逐出境的有颜中允同志，随后有李白涛和李文陵同志，再后有黄紫焰等人被捕。英帝最毒辣的手段是派出 CID（注）分子打入“民先”，从内部进行破坏。陈绍魂就是被英帝派进来的一个冷血动物。

“民先”的队长施方平犯错误，无疑是对“民先”威信的攻击。施方平在 1940 年一次干部会议上声泪俱下，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据说是向水仙门一家大商店勒索巨款，被“民先”内部发现制止，受到谴责，逼不得已宣布自动下台，从此再不是“民先”的领导人。施的耳朵被刈掉一只，可能与他犯错误有关。施的耳朵被刈掉以后，就用棉花纱布盖上，再用胶布粘起来，以掩盖他的缺陷。

“民先”是中共领导的秘密组织。但是，1939 年下半年，通过洪骏声同志的关系，马来亚共产党开始在“民先”内部发展党员。先后入党的有黄紫焰、吴求辉、李电、李浩扬、陈怀梓(陈清江)等人。从此，“民先”起了变化，基层骨干基本上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党员，但是，他们仍然从事“民先”的活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南侵，“民先”的领导人有的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如蔡贞坚同志；有的去了印度尼西亚，如张楚琨同志；有的参加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如陈如旧同志等。日本统治期间，有不少“民先”的成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下，如高永和、黄日光等同志。

“民先”走过了它的光辉历程，它的功绩永载史册，它播下的种子，爱国主义思想，永远刻在广大爱国侨胞的心中。

九 “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 巡回演出的贡献

郭戈奇



武汉合唱团全体团员合影

抗日战争期间，自武汉失守到 1941 年冬日本南进这一时期，国内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到南洋各地从事文化教育、新闻、戏剧和歌咏活动的人很多，他们在宣传祖国抗战、推动文化发展以及同当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特别对华人文化交流方面做

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本文着重追述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巡回演出的一些情况。这个合唱团在 1938 年武汉失守后，由上海国立学院几位同学倡导，联络一部分爱国青年组织起来的，故名“武汉合唱团”。该团由陈仁炳任领队，夏之秋任团长兼指挥，主要演员有项坤、陈文仙、江心美、周保宁等 28 人。团员中有教育家、音乐教师、文学士，还有工程专门人才，可谓人才济济。该团演出节目以歌咏为主，话剧为辅。演唱都是当时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毕业歌》、《大路歌》、《大刀进行曲》、《八百壮士》(夏之秋作曲)、《游击队歌》等等。也演出话剧，如《逃亡到星洲》(该团自

编自演，反映他们从武汉逃亡到星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三江好》、《人性》，还演过《雷雨》，并和“星洲业余话剧团”联合演出《前夜》等等。



夏之秋团长兼指挥



陈仁炳领队

“武汉合唱团”是于1938年12月14日抵达新加坡的。事前约定由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办义演，票价所得概归“南侨总会”汇交祖国作为支持抗战资金。除膳宿费由筹赈会负担外，团员每人每日只有二角零用钱。12月18日晚上，该团在“星华各侨团学校”组织的欢迎会上试演，便引起了轰动。观众和报章交相赞誉。12月22日，正式在“卡必都戏院”（注：即首都戏院）公演，一连八晚，场场满座。以后延长演出，直至翌年1月8日。从1月15日起，又先后到新加坡三大游艺场（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轮流演出，历时达三个月之久，售票收入2万余元。以后该团到马来亚内地巡回演出，经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霹雳、檳城等地，所到之处掀起救国运动和支援祖国抗战的献金高潮。该团自到柔佛麻坡开始，便有一特点，即每巡回到一地，就由该地华侨工商界知名人士带头捐献，并以捐献最多的一人的名字命名：“某某先生之夜”。由于该团的提倡，

从此新马各地演剧或游艺会时，观众即席献金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对于鼓舞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提高华侨捐输救亡的热忱，该团做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计该团在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一年多，共筹得赈款叻币二百万余元。以1938、1939、1940年平均汇率每15元叻币汇国币一百元计算，该团共筹得国币近2000万元，为当年马来亚全体华侨平均每月捐献国币420万元的四倍多，为世界五大洲的华侨平均每月捐输国币1350万元的一倍有余！

海外华侨的踊跃捐输，慷慨解囊，倾自己血汗所得支持祖国抗战的高昂政治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合唱团的成员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记得该团在森美兰巡回演出时，临时被邀请到一个小埠知知港演出，没有戏院，群众就在路边搭起舞台，未到演出时间，男女老幼已从四面八方涌来。当号召献金时，大家争先恐后，好像害怕失去机会似的，不少人脱下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有些人未带现金，就报名认捐若干元。气氛的热烈，场面的动人，使得夏之秋团长和陈仁炳领队两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当场在台上双双朝观众跪下，代表祖国在前线抗敌的战士和受难同胞向海外侨胞致谢。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巴诗班影，该地是一个偏僻小渔港，人口不多，但该晚献金连同售票所得国币一万余元。事后领队陈仁炳曾对记者说：看到侨胞的踊跃捐献，甚为感动。“华侨乃革命之母”，实当之无愧！夏之秋团长也说，他和全体团员每晚都倾注全副精神演出，每当他指挥完毕走下台时，已经筋疲力尽，汗流浹背了。虽然辛苦，但看到海外华侨爱国热情如此高涨，对演出如此支持，不觉劳累全失，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最高的奖赏了。

武汉合唱团在经济上对支援祖国抗战已如上述。该团还作了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贡献，就是通过他们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和话剧，宣传团结抗战，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提高华侨对抗战必胜的信念的同时，对当地文艺界起了积极推动和提高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年，我们这些海外华侨青年，虽然成立了歌咏队、话剧团，但都是业余的，而且在音乐、戏剧等方面的修养、训练很少、很差。不顾自己水平低，凭着一颗“赤子之心”，积极为抗日救亡服务。为了提高艺术水平，我们组织一些人去看合唱团演出，学习他们的技巧。武汉合唱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晚演出结束前，总要领导全体观众合唱抗日救亡歌曲，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组成一个巨大的合唱队，声势浩大，气慨磅礴，起了播种机的作用。领唱较多的歌，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毕业歌》，有时也领唱夏之秋谱写的气壮河山的《八百壮士》。指挥总是由夏之秋担任。他指挥很有气魄，全神贯注，有节奏地挥动指挥棒。全场观众肃立，在他的指挥下，放声高歌。在武汉合唱团的推动下，抗日歌曲在新马大为普及，并出现了一个人人唱抗

日救亡歌曲的高潮！在当时，不论是街头巷尾，或是矿山胶园，到处都可以听到抗日的歌声。到处都有人学唱或教唱抗日歌曲，一直到武汉合唱团离开马来亚以后，还继续坚持下去。这对于推动和提高当地音乐水平，进一步激发当地侨胞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抗日的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间虽已过去 40 多年了，今天，凡是 60 岁以上的新马归侨，大都能忆起在武汉合唱团领唱抗日歌曲时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心情是多么的沉痛悲愤，当唱到“用我们的血和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时，心情又是多么的振奋昂扬，充满战斗的激情；当唱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时，立即感到肩负着救亡责任的重大，有奋勇向前、当仁不让的气概；当唱到“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时，又感到正义和必胜的信念充盈着空间，充盈着世界！还有陈仁炳先生那有声有色的演讲，那催人泪下的控诉，那激起同仇敌忾的声讨，那坚定必胜的雄辩，直到今天，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中国不会亡”！是的，历史早已对当年这一时代最强音做出了正确无误的回答。今天，祖国已以巨人的雄姿屹立于东方，屹立于世界！让我们再一次以当年的抗日救亡热忱，为奏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强音而努力！

十 新加坡铜锣合唱团的 成立经过及其活动

杨成忠



任光与铜锣合唱团全体成员合影

(第三排左一为任光)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激发了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组织各阶层华侨首先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马来亚共产党亦发动广大群众，成立了“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总会”，

领导工界、青界、文化界、妇女界、学生界进行抗敌救亡活动。

1938年初，任光先生来新加坡，当时正是新马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热情高涨的时候，亦是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活动的时候，参加“读书会”、“时事报告会”、“哲学学习班”的都是工人、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时事报告会是半公开的，每星期六在业余话剧社或醒狮体育会举行，由“星抗”或“马抗”的负责人作报告。读书会和哲学班是秘密活动的，以8-10人为一小组，有组长、联络员，活



任光

动地点是不定的。参加读书会和哲学班的人后来都先后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

在一个晚上学习结束时，贾飞同志叫李承、黄志盛、白冰和我几个人（都是学生界活动分子）留下，告诉我们：任光先生来了新加坡，要组织歌咏队，宣传抗日救亡。他布置我们在学生中串联一些爱唱歌的积极分子，在读书日向他汇报。并约定我们去看任光的日期。经过我们两个多星期的活动，串联了二十多人，在林如潮的带领下会见了任光先生。当时有李承、陈燕、李真、黄志盛、叶立天、白冰和我，（还有三个同学，记不起名字了）任光先生向我们介绍了祖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及组织歌咏队的意义后，当场就成立了合唱团的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面时，是讨论合唱团的名称，任光先生提议用铜锣合唱团这个名字，并说明它的意义是：铜锣在古代就是一种唤起民众，号召群众抵抗敌人侵犯的工具，它一敲响，群众就自动集中起来，它的声音很宏亮，很远都能听到它的召唤。我们的歌声就像铜锣一样宏亮，一样有号召力，把民众召唤起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抵抗日本侵略。他还笑着说，耍猴的把铜锣一敲，人们就围拢起来，卖膏药的一敲，人们亦围起来观看，这都是铜锣的号召力呀。当然我们不是耍猴卖膏药的，我们铜锣般的歌声是号召抗日的。说得大家都笑了，大家都齐声同意采用这个名称。接着，就会址和要不要向英殖民当局注册进行讨论，但讨论没有结果，后来决定由黄志盛和白冰找贾飞同志决定。贾飞亦说要和“星抗”的同志商量后才通知我们。过了两天，贾飞同志转达了决定，要我们向英殖民当局注册，公开挂起牌子合法地进行演出，我们推选黄志盛、叶立天出名向英殖民当局注册，很快就得到准许，在罗敏申律边租到了房子。一切筹备就绪，于1938年2月公开成立了铜锣合唱团。

合唱团成立后，以学生为主，每星期三、五进行练唱，演唱的歌曲都是任光先生提供的，有《延安颂》、《延水谣》、《救亡进行曲》、《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救亡歌声传遍

了马来亚。当时男学生最喜欢唱的是《延安颂》，女同学最爱唱的是《延水谣》。由于铜锣合唱团是合法组织，英商百代唱片公司就请去灌唱片，使救亡歌声更广泛地传播开了。许多青年工人、店员都来参加，这是铜锣合唱团的鼎盛时期。

1938年发生了新加坡“四君子”事件，王、粘、苏、辜被英殖民政府驱逐出境。接着又颁布了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法令。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的学生，举行罢课抗议，要求爱国自由。英当局立即采取高压手段，胁迫学校开除学生，华中有几位进步学生被开除了，任光先生被勒令离境。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遭到了挫折，铜锣合唱团的活动亦受到限制，一部分进步青年虽然冒着被捕的危险，仍努力在坚持着抗日救亡运动，但已大不如前了，这是铜锣合唱团的低潮时期。

1941年12月8日，日本进攻马来亚，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发出：“抗日卫马”的号召，并致函英当局，建议合作抗日。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战争形势，英政府终于接受合作抗日的建议。此后，铜锣合唱团又开始活跃起来，抗日的歌声，通过电台的广播，又传遍新马以至全世界，一直坚持到新加坡沦陷，为保卫新加坡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新加坡沦陷后，我们可敬的战友黄志盛、李承同志牺牲了，部分同志亦奔赴内地参加人民抗日军。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同志都牺牲了，幸存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新加坡各地的群众组织又纷纷建立起来。当时新民主青年团第二分团合唱团的一些同志，提议把有光荣历史的铜锣合唱团恢复注册，立即得到大家的赞成，并推选陈志秀同志向英政府申请恢复注册，很快就获批准了，在新那谷街租了一间二楼的前一半作为会址，挂起招牌后，以新民主青年团合唱团为主，再吸收一些男女学生参加，从此，铜锣合唱团又恢复活动了。

1946年4月，“铜锣合唱团”选出了陈志秀为会长，林安为演出，杨坚克为组织，黄清河为司理，邬任平为总务。从此，“铜锣”的民主歌声又在新加坡飞扬。当时李定先生来新加坡，指挥排练《生产大合唱》（又名《新年大合唱》），演出后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后来又配合“中艺”演出《黄河大合唱》、《茶馆小调》、《古怪歌》等。并在爱华音乐会举办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学生运动的图册、影片

展览，影响很大。新加坡国民党一些人很不满意，指使三青团进行捣乱，结果激起了广大侨胞的愤慨，工人自动组织纠察队，维持展览会秩序。以后根据侨胞们的要求，转到三轮车工会继续展览。

1948年6月，英殖民当局在新马颁布《紧急法令》，铜锣合唱团的负责人陈志秀、林安、杨坚克转去马来亚，留在新加坡的一部分团员被英殖民当局逮捕了，一部分回到祖国，从此结束了它的光荣历史。

十一 难忘的一天——记日军在知知港余朗朗村的大屠杀

黄爱萍

知知港是森美兰州的一个偏僻小埠，距日叻务埠约 12 英里，属日叻务管辖。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除种有大量稻谷、菠萝、香蕉……外，还有丰富的橡胶和锡矿资源。

该埠华族人口约 7,000—8,000 人，马来族人口约 500—600 人。华人除极少数是橡胶园主、锡矿场主和商店老板外，大多数人是以割橡胶和做锡矿工为生，马来民族主要是以种稻谷、木薯、香蕉为生。华、马两族，一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

华侨除积极参加当地工农业建设外，非常热爱祖国。自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投入抗日救国的反侵略战争后，知知港的华侨也和全马爱国华侨一样，痛恨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滔天罪行，在马共知知港党组织的推动下，先后组织了“南侨筹赈祖国难民分会”和“抗敌后援会”，为唤起广大同胞敌忾同仇的爱国热情，走上街头和农村，演剧、卖花，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金钱、财物，寄回祖国，支持抗战，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南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同时轰炸新加坡和在哥打峇鲁登陆，仅仅两个多月时间，整个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便沦陷在日本法西斯手中。



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
纪念碑

在马共森美兰州地委的指示下，当地组织把原来的抗敌后援会改为抗日同盟会，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号召和组织知知港各阶层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打击日本侵略军；另一方面，召集当地党、团员和有志抗日青年，组成了抗日游击队，迅速转入山区，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日军进驻日叻务和知知港后，侦悉知知港华侨以往的爱国行动和支持当前抗日武装斗争，于是一个屠杀知知港同胞的阴谋酝酿成熟了。

1942年农历二月初二（即公历3月18日），是日本法西斯在知知港余朗朗村施行它的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的一天。事先它在中芭村，以检查良民证为由，来麻痹人民对它的警惕。早晨八、九点钟，三辆满载日本兵的大卡车由日叻务开来，停在中芭村的公路旁。日兵马上把中芭村包围起来，大声叫喊：“检查良民证！”要群众都到“东昌”号门前集中，每家每户都要到齐，有人外出的要找回，否则以违抗皇军命令论罪。待全村人都到齐了，日兵把村民的良民证逐个检查后又交还给村民，然后假惺惺地向村民宣告无事解散，各自回家。村民都回家去了，但日军却不撤走，坐在公路旁休息。为什么呢？日本兵知道中芭村距离余朗朗村只不过二英里路程，中芭村检查良民证的消息很快传到余朗朗村去，日兵的意图是要使余朗朗村的村民相信，日本兵进村是为检查良民证而来，别无其他。

下午一时，日兵分两路向余朗朗村进发。一车日兵由朱彩门便道驶入双勿里，先把居住在黄泥坳的几家华人赶一起集中，然后又到马来村抓来六、七个马来人，威逼他们带路同黄泥坳捉到的华人一齐步行过河进入余朗朗村。为什么日本兵要捉马来人带路呢？这是它一箭双雕的罪恶阴谋：一、使马来人目睹它杀中国人而害怕，因而不敢反抗日本的统治；二、使别的华人误以为马来人“做鬼”带日本兵杀人，引起民族仇恨，破坏中马民族的团结。

另两车日本兵则由红毛桥头进村，当时村口鸿兴锡矿公司的工人正在吃午饭，日兵不管一切，把锡矿公司的男女老少一个不漏地赶到路旁集中，由几个日本兵押他们进村。其它日兵乘车直到骆贵店仔门前停下，日兵叫人通知全体余朗朗村村民到益群小学集中，说要检查良民证。村民们纷纷议论，有人主张去，有人主张走为上策。这时从

外骑车返村的村民骆生大喊不要怕，要查良民证，上午在半芭村检查过，无事，若不出去检查，就会放火烧屋。这一来，本来主张走的人也犹豫起来。这批人中只有二位等待上队的女同志肖福英和肖丽珍，见情况紧急，动员要走的马上分散向蕉园和小丛林躲避。他（她）们淌过路边的小河，日兵已进入村里占据高地架设机枪。有两位青年因病在一间村屋休息，闻声冲出屋外逃跑，被日兵发现，当即开枪扫射，陈二贵中枪牺牲，亚抗侥幸逃了出来。其它村民被鬼子兵逐家逐户赶到骆贵店仔门前和益群学校的操场集中。有人外出或在田园工作的都被叫回来。有个叫沙解的商人家住余朗朗村，本人在街上做生意，听到日兵检查良民证，他在街上骑自行车赶回村来，到达骆贵店仔前就被日兵拦住，推他与村民们集中一起。这时骆贵店仔门前和益群学校的操场里，挤满人群，日本兵的枪都上了刺刀，把人群围在中间。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日兵先把十五至三十多岁的少女、少妇共三、四十人赶到学校的教师宿舍里关起来，然后日兵拿出村民们用来打水的绳子，开始把青壮年男人逐个绑起来，十至二十个绑成一串，由日本兵赶进屋里，马上用刺刀刺死。当第二批押解走后，村民骆坤发现被押解的两批人中，都不是一家人同在一起，与日本兵讲的核对良民证的说法不相符。在学校旁边住的来喜婆不见她和家人一起押回家而起疑心，便同其他村民商量冲出去，无奈当时老弱妇孺多，青壮年少，加上不少人存在侥幸心理，动不了。骆坤自己开始冲时被日军用机关枪当场击毙。其他的村民都被日军绑着分批押解入村屋刺死。最后骆贵店仔前和学校操场里只剩下几十个老弱妇孺，日军当场用枪射杀，用刺刀刺死，儿童用枪托砸死。片刻间血流遍地，尸体成堆。黄昏时候，日军分散到各村屋去点亮油灯，叫会讲客话的暗探高声呼喊：“喂日本兵已走了，回来煮饭咯！”当时肖福英同志见到她住的一家人全都与她躲在一起，为何她家也亮了灯呢？便叫躲在一起的群众不要上当。可惜当时大家分散躲藏，有些人不明敌人的诡计，回去后又被日军零星屠杀了。当晚敌人大肆搜括群众的财物、牲畜，大饮狂欢，并把关在学校里的几十个少女、少妇集体轮奸，翌日凌晨再将这批被蹂躏得奄奄一息的妇女加以屠杀，然后放火烧屋(包括黄泥坳的几家华人的住屋)，甚至连鸡寮、猪舍也无一幸免。一时火光冲天，余朗朗村二、

三百间民屋转眼成了灰烬，上千村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还有几十堆被烧焦了的尸体，令人目不忍睹。

在余朗朗村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只有极少数从虎口逃生的幸存者。他们是：少解婆一家四口、赖为一家六口、林仙友的妈妈和两个妹妹，肖福英、肖丽珍等，他们听到日军进村时立即离家躲了起来，才得以幸免。负伤的有：刚满十五岁的少年李玉发，他被日兵刺了六刀，幸非要害，倒在血泊中挣扎，解脱手上的绳子，听到旁边和他共绑在一起的难友在呻吟，他不顾自己满身鲜血，爬过去把身受五刀的曾金和身受六刀的骆风救了出来，三人忍痛爬进丛林躲起来。还有肖通、肖富社、单眼刘婆等十多人，每人身上都被刺上四至七刀，皆因并非要害而未死，在血泊中挣脱了手上的绳子爬入丛林或禾竹坝里。另一少妇肖流英被日兵轮奸后还被刺了九刀，最后未死而爬了出来。

日本兵在余朗朗村半天一夜的大屠杀，把全村烧光、抢光。事发时，驻扎在村后突岭山营地的抗日游击队并不知情。翌日晨，获得消息后立即先派出一个小队前往侦察，凑巧与敌人相遇交火，逼使日军赶紧撤出余朗朗村。三辆满载猪、鸡、鸭和日本兵的大卡车开到知知港的街上停下来。日本兵跳下车，荷着上了刺刀的枪分散到各农村去杀人示威。统计当天各村被杀的人有：双沟罗丹村的肖维基、肖先喜、王番仔两兄弟，肖观球被捉到圣堂亚山胶园里刺死。金龙村的肖汉清（又名田螺）被刺死。新港尾寮肖汗杰的儿子被开枪射死。半芭村的刘运金在朱彩店后胶园里被开枪打死。这一天全知知港埠的人民都处在惊心动魄、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日本兵似疯狗一样东奔西窜杀人，示威。下午两时多，才集合离开知知港开回日叻务去。临走时，日军军官还到维持会交待，不准派人到余朗朗村埋葬那些无辜被杀的死难同胞。

余朗朗村遭受大屠杀后的翌日上午，抗日游击队得到消息后立即开进村去，不仅把未被刺死的几十名群众救了出来，用担架扛上根据地收容医治，同时把无辜被杀的村民一一就地安葬。根据抗日游击队统计，合共埋葬尸体 1680 具，其中有部分是外来证赶来避难的人。这就是日军在知知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附录：大西三男到知知港搜集日治时期大屠杀资料

日本州立大学教授小尺有作考察东南亚人文情况，特委派留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现代语言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大西三男，于1976年11月中旬，到知知港访问，搜集1942年3月18日，日军南侵马来亚屠杀佑知港余朗朗村落144条人命史实资料。

当日由该村筹建纪念碑委员会代表肖妙云引导大西三男，亲到曾遭日军大屠杀的余朗朗村现场凭吊罹难者骨骸。骨骸系置于荒山沟坑中。当大西三男亲眼目睹该堆骨骸时，情不自禁地跳下坑中，伏在坑中骨骸堆，痛哭一场(并跪拜致哀)。他深痛地表示，这是我们同血统日军前辈军国黠武主义发动战争带始人类的孽果。我们年轻后代日人，完全不知道有这么悲惨的史实。

大西三男说：小尺有作教授目前正在东南亚各国研究人文情况，他准备搜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在东南亚各国残暴军事行动的资料，以备根据史实证明日本军国黠武主义对人类的残害及错误态度(编者按：应该是“严重罪行”)，俾供提供资料予日本政府教育部，重新审核编纂课本，教育日本后代了解人类战争的恶果，暴露过去日本军国黠武主义蒙日本后人的史实。

大西三男又说：“日本有一小撮人，要恢复军国黠武主义，重整日军威风，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准备搜集史实资料，公诸日本报章，让日本人民知道(日军烧杀余朗朗村的暴行)。

(原载1976年11月18日马来西亚《中国报》)

十二 1943年5月7日冲破 半山芭监狱的回忆

陈大智



陈大智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会刊《南侨会讯》2009年8月号，现征得该刊总编杨国贤同志同意，特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陈大智同志是“吉隆坡半山芭冲狱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于1986年8月亲自写出本文初稿，由他的夫人抄正，送交友人，但从未发表过。他在文中细述了组织冲狱的经过，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社出版的《见证丛书》第四辑：《古

城硝烟》曾辑录了此一冲狱事件的另一位组织者廖周行(又名廖伟生)同志所撰《忆抗日时期半山芭冲狱事件始末》一文，读者可交互参考，对这一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

陈大智同志已于1994年病逝于广东省花县华侨农场，但他的光辉名字将和这一气壮山河的冲狱事件一起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吉隆坡半山芭监狱是英帝统治时期修建的，关禁数千名罪犯，是最大的监狱。日本法西斯占管后，是为禁押罪犯的屠宰场。监狱的结构分为定刑期牢房和未定刑期牢房两部分，未定期牢房在进狱大门的首层，设有审讯室、接待室、警卫护防室、枪支存放库，上吊有大铁环，用十二磅铁锤击环报钟点，犯人关禁在楼上五间暗房里，进监狱大门是用铜板门门锁以数磅的大锁头，要冲出狱大门外需要破坏五道铁栅



吉隆坡半山芭监狱

门的破口才能成功，在此种重心锁链关禁下，日夜有武警和便衣警察把守巡逻，该处是牢不可破的人间地狱了。然而在 1943 年 5 月 7 日临断暗(客家语即傍晚)时分，却被 106 名抗日志士冲破了这座牢狱，震撼了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地位，这个冲狱事件

正值石山脚“九一事件”后给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遭到重大损失的历史情况，因而冲狱成功却鼓舞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反法西斯的斗争意志。

这次冲狱事件至今已有四十余年，适逢祖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年，回忆记录这个事件该是十分有意义的。

当年被关在这里的多数是抗日救国活动分子和抗日军人、共产党人，也有个别私会党徒，多数被汉奸叛徒出卖遭逮捕，被关禁在这里的人，全是日警备部队、宪兵部未审结案或送来待行刑的重案者。

我于三月间被宪兵部解关到这里来，遇到战友陈大龙同志也关在这里。和我同房的同学廖伟生、陈志伟旧相识韩关元等人了解到，不久前关在这里已被日寇于夜间秘密枪杀了 13 人，四月间又绞死了共产党人蓝明、冯瑞升（打狗锄奸人员），他们被残酷的肉刑后已体无完肤而走上刑台，仍然坚贞不屈高喊口号：马来亚民族解放万岁！共产党万岁！这给被押囚徒们极大的震动。由于恶劣和恐怖的囚徒生活的环境，每天早上给半斤熟番茨一小角稀粥水，下午给半斤饭几条臭咸鱼，多数人没有家属的支持食物，有些被施肉刑后，身体日见衰弱疾病骤起，有些满身疥，有的人有家属支援食物，但也无济于事，长期遭折磨和被绞杀的危险，处在这种严酷的考验环境里，我和大龙同志商量发动冲狱战斗吧！就先安定了每天抢餐的混乱情景，说服激起自尊心，以我们都是有骨气的人才被关到这里来的，每抢到好的餐份也

救不了命，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找出路才是，先从我们的房里编号，取餐秩序井然，其它牢房也模仿。引起个别有意识之士借用送饭时机，每天集体冲凉时机串接头密谋组织，三人五人一组，先侦破了监狱防守的弱点，每天下午有一名日兵护送晚餐上楼牢房后便回营，楼下只有一名印籍警察持猎枪配乌沙子弹守卫，锁我们各房间的锁匙是守房门外的一名便衣警察派，女牢只一扇板门和木柱，由女牢冲出狱外，也只有一扇板门加木柱，但冲路较窄，在组织计划布置中能顺利夺取枪支掩护队伍，由我拉上武来岸(地名)部队是理想的目的，着手布置有家属送物品的难友，叫家里多用酒罐装茶水送来，预备在冲凉时装满水作为武器，送来麻包当被盖就拆掉织成绳索用来绑守警，或万一大门不能破开，就用绳索攀登围墙越过，队伍编成冲击组，由符堂、韩美元、屐仔、叶少春带领第一间牢房，前房有廖伟生同学起重点作用，和我同房的陈志伟同学，每天用歌声激愤斗志，我和大龙、伟生同志即在秘密组织煽动斗志，宁愿把鲜血染红半山芭牢狱门前，也不愿意让日本法西斯暗暗地绞死好，让史学家谱写马来亚人民抗日反法西斯史诗。纵观形势，如我们能把队伍拉上部队就更好，万一冲散了，只要朝武来岸方向去找组织联系，说是陈大智指的方向，就会有人收留，总之能冲出去一个得一个。

事先约好定刑期囚徒配合，万一我们未定刑楼有行动，就集体吼叫助威，先将冲击组囚出集中在头房选择断暗(客家话傍晚)时利用夜幕，或大雨掩护。经酝酿动员多次，便于五月七日、当日兵护送晚餐走后，我们便拒不接门警递饭，门警只好将饭排在栅门外，等到临断暗时，就哀求门警开门取饭时，立即发起战斗，先将门警击昏，夺取全部锁匙，负责开门的难友“屐仔”镇定地将各间牢房门开锁，楼梯板门被踩破，队伍蜂涌地向楼下冲，遇到武警开枪反抗，有的难友倒在血泊里，有的负伤冲锋，此时声浪轰鸣，定刑囚徒怒吼助威，整个监狱在震撼中，开枪反抗的武警逃避了，狱外的驻警亦龟缩起来，队伍顺利冲破监狱大门，另分兵向女牢房冲破了出口。我冲到楼下时，大门打开了，随人群冲出，我和难友冲到大门时看见有两名伪警手持木棒分别在左右侧出口处，往冲击的难友便猛击，有的难友被击倒地，

顽警被我和后冲的难友用装满水的酒罐对准顽警头部打去，这两个顽警害怕逃跑了。

因而大门撞开，难友冲出无阻挡，大门部分被冲破，女牢押着女守警打开牢门救出女难友，一起向狱外冲出去。这一事件冲出八十余人参加了抗日组织工作成为积极分子。

小部分难友在冲狱中牺牲。这些难友的鲜血染红了半山芭牢狱门前，为了马来亚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也使我永远悼念。

1986.8.5 陈大智

十三 雪兰莪的抗日武装斗争

吴一石（阿斯）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对马来亚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我国局势发生了急遽的重大变化。日本法西斯成为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在这个关键时刻，1941年12月10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作出了适应新形势的一系列重要决定，把党的全部力量和全盘工作转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中来，并及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抗日卫马”的战斗号召。党的这一重大决策，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我们党坚决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日本法西斯军队的进攻面前，英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坚决的领导马来亚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在短短的时间里，党的各个地方（特别是在新加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卫马的群众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动员总会，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接着，还成立了抗日义勇军，在新加坡保卫战中，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林江石同志当时代表我们党中央进行公开活动。他是“抗日卫马”斗争的杰出领导者之一。

在党的领导下，吉隆坡也成立了抗日动员总会，会址设在吉隆坡惠州会馆。党还建立了抗日宣传队等各种抗日组织，并出版了抗日的报纸。各地的抗日宣传队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在吉隆坡的主要街道上，在各大市镇里，都挂满了标语，贴满了漫画。同时，我们党还进行了反日本间谍和打击亲日分子的斗争。在党的一再交涉和群众的压力下，英帝国主义在日军侵占了北马、东海岸大片土地后，才在1941年12月底分批释放了当时关在吉隆坡半山芭牢狱中的在霹雳、雪兰莪和彭亨被捕的同志。最后一批出狱的同志共有28人，很多

是党的重要干部，党在抗日动员总会举行热烈的欢迎会。这些同志后来被派到各个地区负责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党就考虑训练一批军事干部和找到一些武器，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准备条件。英帝则在策划开展敌后破坏活动，以堵住日军南下。于是，党同英帝当局达成了协议，派遣我党人员到新加坡一零一特别训练学校接受训练。这个军校在新加坡沦陷之前，为我党人员办了四期训练班。每期1个星期至10天，由英国军官讲授射击、爆破等初步的军事技术。训练结束后，由英帝提供各种炸药和用以自卫的武器（主要是手枪），到敌后开展活动。

在一零一特别训练学校里学习的第一批同志共15人，都是新加坡的同志，包括有一些原在别州工作后来被调去新加坡的同志，这些同志原计划派到霹雳去，但由于日军推进迅速，只好改派到雪兰莪。他们结业后，中央于1942年1月1日在新加坡党办事处宣布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并在许庆彪同志带领下，立即开往吉隆坡。这时，局势已是非常紧张，英军在霹雳仕林河的防线已告崩溃，战局急转直下。党抓紧时机，安排他们和其他同志开到雪州北部，准备建立武装部队。1942年1月初，便有同志陆续被派到吉隆坡北部26英里的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离双文丹市场约半英里多，在联邦公路的东面，那里有一个义山亭。由于战局紧迫，同志们已不能继续北上便陆续集中到这个义山亭来，还运来了一些粮食和武器。

1月8日或9日的下半夜，在义山亭的北面与南面，突然炮声隆隆，双方炮弹在同志们的头上飞啸而过。原来，日军沿着联邦公路迅速南下，已到达义山亭的北面。而在义山亭南面的山头上，有一个英军炮兵阵地。在日军发动进攻的时候，英军也开炮还击。炮战一直持续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9点多，便传来了机枪声，日军的步兵已经逼近。大约10点多，双文丹就沦陷了。这时，同志们已撤离义山亭，向东转移到森林边的一座难民所休息下来。这座难民所位于一片开采锡矿后已荒芜了的沙屎坝，有些群众在那里居住。日寇入侵后，又有好些逃离城市的群众搬来，搭起一间大屋子作为临时住地。

双文丹沦陷之后，日军继续南进。英军在万挠、双溪多进行一些抵抗以掩护撤退。不多久，吉隆坡也沦陷了。这样，同志们住的这个难民所就处在敌后了。同志们和其他地区的同志一时中断了联系，而大家对这里又不熟悉，只好去找一些当地群众了解情况，以便做进一步的布置。

当时集中在难民所的共有 50 多个同志，除了从新加坡来的 15 位同志之外，还有 4 个是雪州地委派来的州级和区级干部，其余的大部分是煤炭山的工人，少数是树胶工人，他们大多是党员或地下工会会员。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事前不知道打游击是怎么回事，所以大家穿的仍旧是五颜六色的衣服，戴的是各式各样的帽子。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抱负，就是拿起武器，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同志们十分自豪，把在敌后打游击视为无上光荣，情绪极其高涨，决心非常坚强。

煤炭山是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地方。它位于吉隆坡西北面，是马来亚唯一的煤矿区。战前，这里有一万多工人，是雪州党组织进行工作的重点地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里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工人们经过斗争锻炼，革命性很强。1935 年，工人曾在这里展开轰轰烈烈的斗争，并一度占领过煤炭山，建立过工人苏维埃。

要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就必须有武器。当时的武器都是由参加过一零一特别训练学校的 15 位同志从新加坡带来的。总共有五支手提（即汤姆申式冲锋枪）、30 支点三二曲尺（即自动手枪），还有一些手榴弹和炸药等。上述曲尺手枪后来同志管它叫“芭蜞枪”，因为其射程短，威力差，而且构造拙劣，拆械时容易失火。

同志们来到双文丹难民所的第二天，许庆彪同志站在 50 多位同志面前，庄严地传达了党的决定。他怀着满腔热情向同志们宣市：“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武装部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虽然斗争是艰苦的，但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现在由集中在这里的同志正式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他指出：“这支军队，是我们党在祖国土地上树立起来的第一面武装斗争的光辉红旗。”他还介绍了第一独立队司令部的机构，公布了部队的编制，提出了当前的紧迫任务等。

当时第一独立队的党代表就是许庆彪同志，正队长是陈天庆同志。许庆彪同志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争情绪，同志们以激昂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接受党和人民的光荣委托。雪兰莪州第一独立队的创立，就像一曲雄壮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凯歌，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强有力地鼓舞了各州同志和群众的抗日热情。接着，森美兰、柔佛北部、柔佛南部、霹雳、西彭亨、东彭亨、吉打等州的同志也先后成立了其他独立队，武装斗争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起来。

部队成立之后，在难民所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就考虑应该以森林为基地，但不知道森林里究竟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怎样进去和怎样居住。为此，同志们就去请教当地群众。刚巧碰到一位割山树胶的群众，他说他懂得进森林的路。于是队伍就派出约一半的同志跟这个群众上山。跑了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森林里的一间屋子。这间有浮脚楼式的屋子就是这位群众割山树胶时住的。后来，队伍的大部分同志就开到这里驻扎下来，并搭了几间亚答屋，这就是部队的第一个营房。

队伍在森林里住了不久，司令部就制定了新的计划，决定把队伍编成两个分队：第一分队和第三分队。第一分队向南开拔，移到中区即甘津、石山脚一带。第三分队则向北移动开到新古毛一带。此外，还留下少数同志在原地联系群众。

英军在雪州同日军打过一些战，因此群众不难拾到一些英国士兵遗弃的枪支。在暗邦一带的农村里，就有不少群众拾到枪支。他们有些投入到抗日的行列中来，也有少数拿枪去打抢。后来，我们派同志去教育和组织他们，并在这里建立起另一个分队——第二分队。

部队成立后的主要工作，首先是恢复各方面的联系。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时候，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因此，队伍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要设法恢复联系，找回一些与组织脱节了的同志。其次，是派同志去开展一些农村地盘，逐步组织群众，并在群众中吸收新战士以壮大队伍。第三，是出版报纸，开展宣传工作。雪州以前的党报是《先锋报》，这时加了抗日两字，叫做《抗日先锋报》，简称《抗先报》。第四，是解决武器缺少的问题，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找武器，即使有很大困难也全力以赴。

当时队伍是驻扎在北区，而北区是党的组织以及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这就给部队带来了不少困难。因此，部队必须直接去开展群众工作。一支队伍从双文丹北上，经过艰苦努力，从乌鲁音、叻思、新古毛到吉甦、龙邦以及靠近霹雳州边界一带，初步开创了广阔的农村地盘。

大约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各地党的组织就地恢复起来，各方面的联系也恢复了，队伍扩大了，还收集到一批武器。这样，第一独立队从成立起到1942年5、6月就发展成两个中队。一个由最初成立的第一分队和后来在暗邦成立的第二分队联合组成的模范中队；另一个由原来开到北区活动的第三分队为基础，发展起来成立的第九中队。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的部队不仅创立起来，而且逐步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战争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然而，就在我们胜利地打开工作局面的时候，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抗日游击战争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这就是1942年发生在距离吉隆坡八英里石山脚农村里的“九·一”事件。当时中央决定在那里召开党的第八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并以模范中队派出由正队长阿燕同志亲自带领的7位同志担任大会的警卫工作。由于内奸莱特的出卖，日寇事前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不仅隐蔽地调集了两千多兵力，而且做了周密的布置。在9月1日清早，对会议地点发动了突然进攻。在这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各州的代表同志和警卫战士同数百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冲破敌人的四重包围，终于粉碎了敌人一网打尽的恶毒图谋。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牺牲了包括中央委员和各州代表在内的9位领导干部、6位警卫员同志和3位勤务员同志，共18位同志。同志们在冲破敌人包围的激烈战斗中，英勇作战，消灭了一百多个日寇官兵。其中一个中佐就是警卫员保伦同志用最后一颗来福枪子弹打死的。

日寇除了进攻“九·一”会场之外，还袭击了我们当时设在石山脚的一间小医院。在战斗中，几位正在医病的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日寇还在农村杀害了不少群众和放火烧掉了好些房屋。残暴的日本法西斯还把在“九·一”事件中牺牲的其中6位领导同志的头颅砍下，

悬挂在吉隆坡的主要街道上。敌人妄图用这种白色恐怖恐吓人民群众，打击抗日武装力量。

日寇的这次进攻，确是使抗日武装力量蒙受了惨痛的损失。就雪州来说，在“九·一”事件中，第一独立队党代表许庆彪同志光荣牺牲了。

许庆彪同志是槟城学生出身的干部，受过华文和英文的教育，后来调到新加坡工作，并被党委派为一零一特别训练学校学习的第一批同志的领导人。许庆彪同志为创建部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许庆彪同志对党非常忠诚，有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工作刻苦努力，在斗争中表现英勇。他身体不好，经常抱病坚持工作。在“九·一”前夕，他正患着重病，拿着一根拐杖，在同志们的搀扶下，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到“九·一”会场。许庆彪同志就是以这种令人崇敬的革命精神来为党工作，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给同志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九·一”过后，同志们都发誓，要坚决为烈士们报仇，要更英勇地战斗，更好地工作。同志们的誓言，不仅表达了对先烈们的深切悼念，而且是对敌人的进攻的有力回答。同志们没有被“九·一”事件和敌人后来的白色恐怖所吓倒，没有因此而悲观消极、害怕斗争，而是勇敢地坚持斗争，顽强地继续前进。

在农村，无论是石山脚、甘津或其他地方，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没有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下低头屈服。相反地，他们和全国各民族革命人民一样，更加憎恨日寇，抗日的决心更坚强。日本法西斯无法阻止抗日武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敌人的可耻图谋彻底破产了。

在“九·一”事件的同一天，日寇也向模范中队的驻地发动进攻，目的是为了阻挡这个中队对会场的增援。模范中队在战斗之后便向北转移，和第九中队会师于双文丹北面三巴央的山头上。两个中队的同志集中在这里，为“九·一”事件牺牲的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接着，队伍对今后的工作和斗争做了新的部署。同志们决心用胜利的战斗来回击敌人。

10月15日，一场严惩敌人的战斗终于打响了，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部队的营房是一个沙屎坝，是过去

群众洗过锡米的地方，从营房到农村，只要一个小时就可到达。那时，同志们没有伪装痕迹，一条大路直通农村。部队每天派出一个小队，在距离营房约半小时的运粮路上放排哨警戒，下午四点收回来，营地上就只剩下两个哨，一个哨设在前面的路上，一个哨设在营房的后山上。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懂得了部队的戒备规律。

10月15日，日本鬼子向部队发动进攻的时间，正是选择在我们收了排哨之后。当时营地前面只有一个同志在放哨，而营内也没有设立战斗组和安装警报线。五点多钟，敌人摸来了。哨兵的枪打响后，同志们迅速进入阵地。由于地形的限制，阵地上只能容纳两个小队的兵力。部队的武器装备是几挺轻机、两挺风机（即流益思式轻机关枪），其余是手提和莱福枪。

战斗虽然很激烈，但是同志们打得非常勇敢机智。他们把一排排、一串串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打退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在同志们的英勇还击下，敌人伤亡惨重，一大堆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阵地上。战斗从5点多打到天黑，100多个鬼子被我们消灭了一半以上。残敌乘着天黑争相逃命，滚回三巴央去了。同志们在夜幕降临之后，主动撤出营地。由于夜间行军，人又多，跑了3个小时才到距离营房约15分钟的山腰休息下来。在撤离营房的时候，同志们在营地上埋设了一个装有10磅炸药的石雷，等待敌人前来送死。队伍也在山腰布防，准备消灭前来跟踪追击的敌人。

日本鬼子在第一天遭受严重打击之后，慌忙回吉隆坡求来援兵。第二天早上，他们果然又向营地扑来，结果踏响了石雷。同志们听到石雷爆炸时，高兴得跳起来，连声喊道：“消到！消到！”

敌人中雷后，仍不甘心。当它发现我们撤退的路线时，又不知死活地跟踪上来。同志们在山腰早已严阵以待，队伍在阵地的正面投入了一个分队，侧面再加上一个小队，准备狠狠打击敌人。

大约9点钟，鬼子唧哩呱啦地上来了。一个敌军官挥舞着长剑，指挥鬼子兵往上冲。同志们在昨天的胜利战斗的鼓舞下，越战越勇，居高临下向敌人猛打。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阵地上又丢下几十具尸体。

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 12 点才结束。在这两次战斗中，我们一共消灭了 100 多个敌人。其中 20 多个是被石雷炸死的。而我们只有一位轻机手光荣牺牲，一位同志受伤。这是第一独立队创建以来所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

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后，吉隆坡成了它在马来亚半岛的政治经济中心。这里驻扎着许多军队，对抗日军民展开频繁的军事行动，还有大批的日本宪兵队、特务、走狗，到处进行猖狂的活动。当时也出现了一小撮叛徒。

在面积不大的雪兰莪州，我们的处境非常动荡，斗争极其艰苦。战斗在雪州的同志们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充满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的部队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经历了创建、发展、遭受挫折又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三巴央战斗无疑是一场取得辉煌战果的大胜仗。然而，这场战斗不但充分表现了我军英勇作战的精神，也表明我军还缺乏经验。队伍这样大，战斗之后应该如何保持联络、组织行军和转移等等，大家都没有实践经验，事前没有明确的计划。结果队伍转移时，由于分成许多小股而走散了，后来集中回来的同志只剩下两个小分队。由于当时雪州有些地区群众基础并不巩固，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那些冲散了的同志一时找不到组织关系，有的就走回家去，有的寄居在群众的家里，也有少数被敌人捉走了。不过，这些冲散的同志，大都把枪收藏起来。后来，一部分同志陆续归队，连同武器也带了回来。

队伍经过三巴央战斗之后，就改编成为两个分队，并做了如下的布置：第一分队开赴特区（即煤炭山），从地理上说，煤炭山并不是打游击的理想地方，因为森林较小，地区也不阔，但群众条件却很好，因为这是一个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比较巩固的地区。队伍开到煤炭山之后，就和当地党组织结合，配合民运同志开展群众工作，进行锄奸、开展小规模战斗，以及在群众组织中吸收新战士，以壮大队伍。另一个分队(第十五分队)则开赴雪州南部和森美兰交界的武来岸地区。这里森林条件很好，有大山脉连接森美兰和西彭亨，但是群众条件比较差，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使党同那里的组织失去了联系，有些支部涣散了。因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群众失去了党的领导。当队伍开

到南区的时候，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内，才找到两个党员。日寇曾经在武来岸附近的加蕉进行过大屠杀，被杀害的群众有一、两百人。群众对敌人怀着刻骨仇恨，但是还未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第十五分队开到这里之后，首先就是要发动群众，找到立足点，使队伍扎下根来。但是，这里是一个有待我们去恢复的地盘，农村内部比较复杂，敌奸走狗很猖獗，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必须拔除敌人在农村安下的钉子。因此，队伍经过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后，便进行肃奸工作，准确而有力地打击了敌奸的活动。敌人的耳目被清除了，群众解除了恐惧和顾虑，重新鼓起了斗争勇气，渐渐地又开始投入抗日斗争中来。群众工作先从武来岸做起，后来逐渐开展到加影、士毛月、加蕉和沙勒、雪邦一带。不久之后，司令部也调几个民运干部来加强民运工作。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这里的群众运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在群众运动中，也不断涌现出先进的青壮年，他们参加了武装部队，队伍又逐渐地扩大起来。这样，经过大约五个月的艰苦努力，第一独立队又从两个分队发展成为两个中队。在特区，一分队扩建成为模范中队。在南区，十五分队扩建成为第八中队。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雪州的斗争又遭受了一次打击。这就是1943年发生的“三·一四”事件。3月14日，一独司令部在甘津农村召开会议，只有几位同志担任警卫工作。由于敌奸告密，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司令部正队长陈天庆同志身陷重围，奋战到最后一息。他的光荣牺牲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

陈天庆同志是新加坡人。他是英文九号位毕业生，在英文学校读书时，就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英校学生中有很高威信，他在1941年入党。毕业后，他到福特汽车装配厂当技术工人，组织和领导该厂的工人斗争。后来，党派他参加一零一特别训练学校学习，并成为第一批同志的负责人之一。第一独立队成立时，他被中央委员委任为司令部正队长。

陈天庆同志给同志们和人民群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他非常勇敢，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处境多么困难，他始终带领同志们勇往直前。他虽然出身知识分子，但平易近人，工作作风很好，善于团结同志和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他非常积极和刻苦地进行工作。第一独

立队能够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创建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跟陈天庆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陈天庆同志牺牲后，好些同志和群众都流下悲痛的眼泪。他的遗体埋葬在甘津农村，不少群众到他墓前致敬默哀。有些群众甚至梦见他在九泉之下要枪打鬼子，于是就用纸糊成各种各样的枪，到他的墓前去扫祭。

在“三·一四”事件中，除了陈天庆同志壮烈牺牲外，还有两人被捕。其中一个司令部副队长，他一落入敌手就叛卖革命，敌人立即布置他回来部队搞破坏活动。他回到模范中队时，编造了一套故事，蒙混过关。但是，地委会很快就得到了他充当内奸的准确情报，并立即报告中央。中央授权地委书记钟爱克同志到部队处理。爱克同志带一个警卫员骑脚车去部队。途中碰上一辆载着叛徒特务的汽车，他们两人迅速跳下脚车，隐蔽在公路旁的矮青芭里，开枪射击，成功地摆脱了追踪的敌人。爱克同志安全脱险后，赶到部队，在模范中队党代表的协助下，立即扣留并召开军事法庭审判那个叛徒。这个家伙在确凿证据面前招认了自己的罪行。全体指战员怀着极大的愤怒，除去了这个大害虫。

1943年中，一独成立了新的司令部，刘尧同志任党代表。刘尧同志原是新加坡的洋务支部书记，是参加一零一军校第一批训练的15位同志之一。建队初期，任司令部保管部（即后勤部）部长。1942年年底被捕。1943年4月在服苦役时趁敌人不备逃走。在三年多的抗日战争中，特别是中期和后期，他艰苦奋斗，带病工作，肩负重任，奔波劳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日本投降后，任中央军委委员。部队复员后，任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总会副会长兼该会机关报《战友报》社长。1948年6月，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任党的雪兰莪州委会秘书处委员（相当于后来的书记处书记）。同年7月，因叛徒出卖，在加影农村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不幸牺牲。刘尧同志战斗的一生和光荣的业绩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敌人不甘心失败，继续收买内奸，从内部来破坏革命运动。一个家伙落入敌手叛变之后，敌人又派他潜回部队。这个可耻的叛徒按照敌人的旨意，在我内部进行破坏活动，企图瓦解革命队伍。但是，同志们不久就觉察出他的罪恶行径，把他揭穿并消灭了。

由于叛徒、奸细的出卖和破坏，日本法西斯军队对雪州的革命力量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敌人进攻的矛头主要是对准第一独立队的主力——模范中队。日寇除了封锁农村、企图切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和粮食供应外，还派兵进山向部队发动连续不断的进攻。因此，模范中队在1943年中至1944年中的这段时间里，斗争处境极其艰苦动荡，队伍进行多次战斗，迂回转移了3个区（特区、北区、中区），搬迁了11个营房。

1944年4月，敌人出动两千兵力开入森林，进攻南区第八中队。另从芙蓉到加影的农村地区还有一千多兵力，进攻民运地盘。4月下旬，第八中队派出几十位同志组成的一个战斗队，在森林中伏击敌人。这一战打得漂亮。在同志们的勇猛打击下，敌人死伤40多个，我方只有两位同志受轻伤。这次战斗后，敌人连续进攻，队伍的粮食供应极其困难，处境十分不利。于是，第八中队一百多个在同年五月撤到彭亨文积二十三碑。大约两个月后，再开回武来岸。这支队伍在敌人重兵进攻下进行战斗和转移，经历一个艰苦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了。在转移过程中，他们得到西彭亨六独同志和森美兰同志的亲切接应和大力支援，从而加深了各单位战友们的革命情谊。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雪州同志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三年八个月里，最初很短时间是吃英帝留下的石灰米，接着有三年的时间同志们很少有米吃，基本上是吃木薯和其他杂粮。经常的主粮是辣椒和咖喱粉炒木薯，个别时候搞到峇拉煎和甘孟鱼，就算是很丰富的了。起初很少油吃，后来通过群众到油棕园搞到一些油棕油。但是，油棕油没有提炼过，不大好吃，而且沾到满嘴黄黄，是咖喱粉还是油棕油都分不清。后来群众帮助提炼过之后，就好吃多了。同志们脚上穿的是全部用树胶做的鞋子。雨天穿这种鞋子，因为伸缩性大，走起路来常常会鞋和脚分家。至于衣着，最初两三年内根本穿不上制服，从群众中弄到什么就穿什么。所以，衣服和帽子都是各式各样的。同志们没有背包，用一条布把被单和衣服卷在里面，打起一个结头，挂在背上就是包袱了。那时，医药条件更差。同志们所患的常见病是疟疾、感冒、烂脚和生癩。由于营养不良，药品缺乏，一患上这些病都不容

易治好。有些同志甚至因病不治而光荣牺牲在病榻上。尽管物质生活这么艰苦，但同志们的斗志十分高昂，对胜利前途始终充满信心。

人民群众是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源泉。我们的队伍要生存，要发展，要夺取胜利，就一刻都不能脱离群众。为了加强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扩大群众地盘，当时司令部所在地的模范中队，尽管处境极其动荡，仍然举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每期一个多月，总共训练了党和军队以及群众组织的干部40多人。这些同志学习结业后，就被派出去工作。有些去做群众工作，开展新的地盘，有些去扩建部队，负责分队的工作。群众工作不断发展和领导上不断培训和输送干部，为扩建部队创造了条件。不久之后，即1943年年中和年底，就在雪州北部先后新建立了两支队伍，一支是建立在吉莽地区的二十九中队，一支是建立在新古毛地区的三十五中队。这样，到1943年9月，一独就总共有了四个中队。

除了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之外，雪州的同志们还面对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这个斗争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消灭叛徒、走狗；另一方面是开展战斗，消灭敌人。当时部队和民运系统都建立了打狗队。由于武器缺乏，装备较差，一个打狗队如果配有手提就是顶呱呱的了，配上手枪也算不错。有些队员使用锯短枪管的来福枪来代替手枪，这种枪打起来很响，同志们把它叫做“来福公”。有了打狗队，叛徒、走狗随时都会落到可耻下场，即使在市镇里也逃脱不了严厉的惩罚。部队还积极寻找机会，组织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如伏击小股敌人，夺取武器以装备自己。

1944年1月，一批雪州和外州的领导干部准备去霹雳州开会，集中在雪州北部新古毛三十五中驻地，后来因故去不成，他们除了协助破获日本间谍机关外，还召开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了部队建设，开展战斗，发动群众，加强宣传工作等问题，并统一了人民抗日军四大纪律、八项注意和部队礼节等，对推进抗日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雪州在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几桩重大的事件：

组织过一次成功的越狱斗争。这个斗争发生在1943年5月7日晚上。吉隆坡半山芭监狱是当年马来亚半岛最大的监狱。当时有一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关在那里。监狱里还有一些刑事犯。他们

经过我们同志的教育有了觉悟，也参加了这一越狱行动。这些落入敌人的同志，受尽了鬼子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虐待，但是同志们始终坚贞不屈，顽强地同敌人展开斗争。凶恶的日本法西斯便在法庭上对他们分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在越狱前，已经有 13 位同志先后在绞刑架上英勇就义了。宁死不屈的战友们，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准备与敌人作最后的搏斗，冲出监狱，重回党的怀抱，奔赴抗日战场，继续为解放祖国与人民而战斗。于是，在牢狱中党组织的周密布置下，一场惊心动魄的越狱斗争开始了。同志们原定的计划是，争取狱卒的同情，以达到秘密越狱的目的。但是狱卒不但不表同情，反而进行抗拒，甚至鸣枪报警，使越狱行动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在这生死关头，同志们迅速采取强行冲监的行动，同狱卒和警察展开激烈的搏斗，终于夺到了锁匙，打开了各间牢房，分四批先后胜利冲出监狱。这次胜利越狱的行动人数约 100 人左右，其中政治犯占七十多巴仙，还包括 7 位女同志。五十年代在国外参加国际民主运动的曾雪虹同志，就是在这次越狱中冲出来的。有约 10 位同志不幸又被敌人再捉回去而惨遭杀害，其中包括一位女同志，即戴淑娇同志。这次史无前例的轰动全马的越狱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个斗争再一次在人民群众中层现了马来亚共产党人、人民抗日军战士和其他革命志士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在马来亚革命史上增添了壮丽的一页。

第二、破获敌人的间谍机关。敌人千方百计，设法在各地建立一些间谍机关，进行特务活动。当时雪州是全马各州领导同志经常来往开会的地方。从南马、中马到雪州有一条山路交通线，经过彭亨的文冬到雪州的新古毛。为了摸清这条交通线的情况，敌人在距离新古毛大约十英里(新古毛——都赖公路有一条通向森林的黄泥路连接的地方)开了一间小较石场，大约有职工 30 多人。1944 年 1 月，当我们一批前来雪州开会的领导同志路经较石场附近的时候，同志们就发现较石场的人总是东张西望，监视我们的去向。先前也曾多次发现过这种可疑迹象。当地群众还发现敌人曾在这里设下埋伏，企图袭击我们同志。但由于时间弄不准，扑空撤走了。经过各方面的调查研究，证明这是敌人从吉隆坡派来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特务建立的间谍机关，其任务是切断我们州与州之间的交通联系。我们还进一步查清了这个间

谍机关的所有 10 名成员，消灭了他们当中死不悔改的头目。我们破获了这个间谍机关，从中得到了许多重要情报。敌人不仅在雪州，也在其他州以各种手法为掩护，搞间谍活动。后来，我们又在其他州破获类似的间谍机关。这是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第三、抢救杨果同志。杨果同志在新加坡沦陷后转移到柔佛，病了一个时期，以后调到雪州工作，担任雪州地委副书记。1943 年底，钟爱克同志调回霹雳后，杨果同志担任地委书记。雪州地委会机关设在吉隆坡以北八英里甲洞的农村附近，那里有一座孤山。杨果同志带领几位警卫员和工作人员在密室里工作。1944 年 3 月，有一天早上，杨果同志正和几位同志在密室里办公，突然一辆满载着十多个日本兵、特务和叛徒的军车，闯进村子。他们下车后，便迅速沿小路直扑杨果同志的密室。敌人的行动突如其来，群众来不及通风报信。当敌人冲上来时，杨果同志指挥身边的同志英勇反击敌人，并准备立即突围。但是，在同志们冲出屋外之后，杨果同志不幸中弹负伤。因流血过多，跑不远就昏倒。敌人知道我们人少，又发现有血迹，便追踪搜索。杨果同志终于落入敌人的魔掌。

就在敌人全部去追捕杨果同志的时候，密室里有一位女同志乘机从相反方向跑了出来。当时，有一位由杨秀峰同志带领的 3 人临时组成的打狗队正在农村里活动。这位女同志立即找到了打狗队，向秀峰同志报告了上述情况。他们 3 人原来都是杨果同志的警卫员。秀峰同志还在模范中队当过分队长，后调任杨果同志的警卫组组长。他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犹如晴空霹雳。秀峰同志就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抄小路拦截敌人军车。他端起手提，带领两位拿手枪的同志，迅速赶到公路边设伏。不久，载着正处于昏迷状态的杨果同志和敌军车果然驶来了。当敌车驶近时，同志们立即开火。驾车的日本兵当场打死，敌车动弹不得，车上的敌人纷纷跳出车外。敌人被猛烈的火力打得丧魂落魄，以为遭到抗日军大队的埋伏，连枪也不敢开，就夹着尾巴四处逃窜了。秀峰同志迅速跳上敌军车，把杨果同志搀扶下来，并小心护理着他，安全撤出战场。由秀峰同志带领的打狗队仅仅 3 个人，就奇迹般地把受伤被捕的杨果同志从十多个敌人的魔掌中抢救出来。这个动人的英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四面八方。雪州党和军队的同志们

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齐声欢呼这一重大胜利，称赞秀峰等同志这种热爱领导的模范行为和大无畏的英雄行动。雪州各地的同志都对杨果同志安全脱险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抗日战争时期，雪州跟大多数州一样，从组织系统来说，党的领导和部队的领导是分开的。司令部领导武装部队，地委领导党的工作和民运工作。但是，因为雪州地委不健全，环境又很动荡，所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也由部队直接领导某些民运地盘。当时中区(即吉隆坡周围地区)和特区(即煤炭山区)是地委领导的主要地盘。北区和南区的群众工作则由部队直接开展和领导。由于区域广阔，人手不够，经常是几个民运同志负责一个市镇和周围广大农村的工作。

群众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抗日后备队，是半武装的民兵性质的组织，由部队派出教导团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后备队也配备一些武器，主要是猎枪和山猪镖。他们是农村中的骨干力量，除协助做群众工作外，还担负保卫农村安全的任务。另一种是抗日联合会，是广泛群众性的组织。这两种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对发展和巩固群众地盘，起了巨大的作用。

严酷的抗日斗争，锻炼了群众。随着觉悟的不断提高，群众的斗争性也不断增强。日本法西斯如何穷凶极恶，也无法征服觉悟的人民群众。党领导的群众斗争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芭种植。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胶园和矿场都停止了生产，城市郊区的群众也面临困境。这些群众都纷纷迁移到农村来。我们就普遍发动他们开芭种植，以解决粮食问题。二是通过打狗队和民运同志以及抗日后备队消灭奸细走狗，镇压农村的反革命分子，肃清农村中的强盗土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农村的治安和正常秩序。三是领导群众开展反集中营的斗争。日本法西斯在雪州好些地方对群众实行残酷的镇压，又在一些地方建立起集中营(群众把这种野蛮行径叫做“围猪栏”)，妄图切断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我们的粮食供应，从而消灭抗日武装力量。但是，鬼子只能在一些市镇或市镇周围围上铁丝网，封锁和控制群众，对广大的农村，敌人无能为力。由于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坚决斗争，敌人的阴谋终不能得逞。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奋斗，形势越来越好。从1944年中至1945年8月，大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是雪州抗日武装恢复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

1944年9月，各州和各独立队的代表集中在雪州举行全马高级干部非常会议，地点是在模范中队驻地。模范中队派一个分队负责大会的警卫工作，另一个分队在附近策应。当时，模范中队的正队长是彭少雄同志。为了欢迎各州的领导同志到来开会，他还创作了一首《欢迎歌》，后来修改了歌词，歌名改称《欢迎战友》。

这次会议讨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我们的斗争、壮大我们的队伍、加强军事训练、发展群众工作与农村的关系以及为最后打败日寇做好准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后，又从别州调干部来雪州，加强领导机构。这个时候，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德国法西斯在苏联红军全面反攻下，已经面临彻底复灭的命运。日本法西斯也节节败退，正走向它的末日，而它在马来亚的统治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种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雪州的同志们跟全马各州的同志们一样，以无比高涨的斗争情绪和胜利信心，日以继夜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广大人民群众也斗志昂扬，到处呈现一派热烈拥护党、热爱人民抗日军、大力支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新气象。

特别是在1945年，在各州独立队的互相支持与配合下，雪州的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如果说在这之前雪州的同志们曾经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那么到了1945年，我们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群众运动方面都采用了攻势，斗争迅猛地向前发展。

1944年底，在南区又成立了一个中队——第十二中队，活动在加影、加蕉一带。南区的广大胶工在战前曾经受到党的良好影响，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这时候，南区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45年初，在南区成立了党的区委会。这时，区委会和民运工作都划归地委会领导。1945年初，地委采取了一次轰动整个雪州乃至全马的军事行动，消灭了日本法西斯在吉隆坡的大走狗黄铁山。这个家伙是雪州伪维持会会长，恶贯满盈，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这条大走狗住在吉隆坡，要消灭他，就不比农村或小市镇那么方便和容易。

但是；负责执行这个光荣任务的是战斗英雄杨秀峰同志所率领的打狗队。他们浑身是胆，即使入虎口拔牙也无所畏惧。那一天早上，他们3个人各自配带一支手枪，骑着脚车，雄赳赳地向着吉隆坡进发了。大走狗黄铁山住在市区内一条横巷里，同志们到达他在住家的路口时，两位同志分头警戒，秀峰同志单人独枪，迅速冲上前去，仅用两发子弹就把站在大楼天台上的黄铁山打死了。同志们在完成任务后，从容地撤出市区，凯旋而归。

消灭黄铁山，影响很大，一方面显示了我们党与人民抗日军的威力；另一方面表明了叛徒、敌奸、走狗再也没有一块安全藏身的地方。黄铁山被消灭，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举杯痛饮，表示热烈祝贺。而敌奸走狗则向隅悲泣，预感到自己的可耻结局。

这个时候，许多中小市镇的敌伪组织，实际已经被我们所控制，只剩下吉隆坡和一些城市的敌伪组织中还有一些人顽固不化。消灭了黄铁山之后，这些敌伪组织内部迅速发生变化。我们党紧接着写信给敌伪组织的一些大头目，警告他们不可再充当敌人的走狗，要他们脱离敌人，将功赎罪，在可能范围内支持抗日斗争。昔日这些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人，这时也只好低下头来，接受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敌伪组织的大头目动摇了，下边的组织也随着相继瓦解。这就为我们开展吉隆坡市区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随着各方面工作的蓬勃发展，群众运动更加高涨。在农村里，我们大量地训练抗日后备队，并从中吸收新兵扩大队伍。部队为彻底打败日寇作准备，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战斗力迅速提高。除了锄奸打狗之外，部队还进行了不少次战斗，从打伏击战发展到打袭击战和攻坚战，都取得了胜利。在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同志穿上日本制服和戴上日本兵帽子，指挥员配带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化装成日本军队，乘着一辆大汽车，直驶向吉隆坡北面八英里甲洞的敌人警察局。当同志们跳下车时，伪警察还以为是来了日本皇军，一个劲地弯腰鞠躬。同志们乘敌人不备，迅速采取行动，把敌人的枪全部缴了。这时，这些警察犹如刚从梦中惊醒，个个呆若木鸡，高举起颤抖的双手，无可奈何地望着同志们胜利离去。这是一次出敌不意、出奇制胜的战斗。

在我们同东南亚盟军总部代表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具体措施之后，盟军于1945年6月，开始在雪州空投轻武器和人员。我们就用这些武器装备公开队吸收的新兵，迅速扩大队伍。到了后期，特别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我们的队伍向煤炭山、双文丹、万挠、新古毛、加影、加蕉等许多市镇的警察局发动进攻。同志们在战斗中表现机智勇敢，士气旺盛，而且战术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而敌人特别是伪警察的士气，却日益低落，动摇厌战，有些在暗中和我们取得联系，表示不和我们作对。因此，在战斗中除了个别工事较坚固的警察局之外，其他大部分据点纷纷给我们攻下。我们连战连捷，夺得了大量的武器，队伍就在战斗中进一步壮大了。

到了日本法西斯将要投降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包括秘密队、公开队和民运武装工作队已经发展到1千多人。当时，部队除了打仗之外，还要配合地方党组织大力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譬如，普遍组织宣传队到农村去召开大会，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那时，几乎每个中队，甚至每个分队建立了宣传队。部队还建立了教导团，负责训练抗日后备队。

在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已经在全州范围内发展起来。抗日战争中期，在西南区即巴生一带和西北区即瓜拉雪兰莪一带，群众运动还不广泛，到了后期也普遍开展起来了。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的群众工作主要是在华族地区展开。后来，马来族和印度族的群众也普遍被发动起来。在吉隆坡周围的泗加末、莪唛、蒲种和加影地区的仁加隆以及丹絨加冷等地方的马来群众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我们可以在马来农村里召开千人以上的群众大会。在印族群众主要是印族工人，我们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逐步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到了后期，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党的地方组织，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全州的广大乡村地区和许多中小市镇。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行使着人民政权的职能，处理社会上和群众中的各种问题。

随着形势的发展，雪州的抗日武装力量和群众组织也从距离吉隆坡七、八英里的远郊（如甲洞、甘津、石山脚、蒲种等），逐步发展到距离吉隆坡三、四英里的郊区（如泗岩末、文良港、淡江、莪唛、暗邦、蕉赖、新街场、公蕉园、沙登等）。这些地方的农村和市镇，都

在一定程度上被我们控制了，这就形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吉隆坡的包围。这种形势下，吉隆坡市区的工作也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党全军艰苦卓绝的斗争，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道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向前发展，最后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强大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十四 红旗漫卷东海岸

——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

张凌云

彭亨、丁加奴两州的革命运动发展得比较迟缓。1937年到1939年间彭亨地区只有一个直属于中央领导的关丹支部。1940年初，由于工作要发展，改为彭亨特别支部。同年十月间，在关丹附近牙姆(该地属丁加奴州)的一个橡胶园里，召开全彭包括丁州干部扩大会议，并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党的彭亨地方委员会。这时，党员已有一百六十多人，分布于彭亨州和丁加奴州各地。

1941年2月间，中央指示把彭亨西部(当时有党员五十多人)划出来，另立西彭特委会，归中央直接领导。彭亨地委会则负责领导彭亨东部，包括关丹、北根两个县和丁加奴州的工作。当时，东彭和丁州共有党员一百五十人左右，多数是胶工。牙姆的党员最多，成立了区委会。林明锡矿是重要部门，也有党的基础。各地地下工会与群众组织的成员共约一千人。

日本法西斯入侵我国时，东彭和丁州革命的主观力量还弱小，又没有武器，也没有武装斗争经验。但是，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有着党干部和党员的艰苦奋斗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支人民武装终于建立起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终于建立起来了，并且不断巩固扩大。

在党的领导下，东彭和丁州人民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日本法西斯进行了英勇的、艰苦的斗争，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抗日烽火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我国东北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峇鲁，开始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

12月10日，马来亚共产党举行七届二中全会，向我国人民发出了抗日卫国的战斗号召。日军于12月9日中午侵占哥打峇鲁后，沿东海岸南下，12月下旬进逼关丹。日寇空军几乎天天出动轰炸关丹。日寇地面部队则从牙姆对甘孟进行炮击。而英军也从甘孟机场发炮回击。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东彭地委会在关丹郊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决议，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会议地点正好位于双方炮兵阵地之间，炮弹不断在上空呼啸而过，可是参加会议的五、六位同志却若无其事，在聚精会神地进行着紧张的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12月31日，关丹沦陷。紧接着，1月3日晚，甘孟机场也被占领。关丹和牙姆的党员首先响应党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和群众积极分子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武装抗日的意义，动员和协助革命家属与群众疏散到胶园或芭边，以免遭受侵略军杀害。群众逐渐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并普遍地多种粮食。

地委和其他同志共30余人，暂时居住在离关丹约两英里的沙马务一个树胶山的公所里面，这个树胶山紧靠着芭边。日军还未占领关丹和关丹以北沿海一些城镇(如牙姆、美昔拉)之前，在地委同志亲自主持下；一小组一小组的同志被指派到上述地带去搜寻武器。他们三两人一组，带着一个面粉袋，里面装着两、三条面包，有的带上一罐沙丁鱼。

那些平日作威作福、专门欺压群众的英军和它豢养的雇佣兵，在日军的进攻面前，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大批英军和雇佣兵在大路上筑起街垒，架起大炮，煞有介事。然而，当隐约听到日军的炮声，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连一个影子也见不着。一夜之间，不知他们已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有的甚至连临时架设的军用电话线都来不及拆收，拔腿就跑。

关丹沿海一带，日军只与英军打了两战。一次是在沙马务，有20多个英兵、辜尔卡兵和印度兵分乘1辆坦克、1辆装甲车和3辆军车在沙马务附近遭到日本兵猛烈炮火的突然袭击，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当了俘虏。另一次是在莪泰山。负责收集武器弹药的小组出发到这些地方，或是到英军溃退的交通线，往往可以搜集到一些武器。有一

位领导干部就曾经带领他那个小组的两位同志到战场上去，结果，在英兵和印度兵的尸体堆里和附近的沟渠里，搜到5支来福枪和约一火水桶子弹。为了提防万一跟日本兵碰上，除了进行必要的侦察外，还要在行动时放哨。此外，还得忍受尸体腐烂的臭味。许多同志整天都要在这种臭气熏天的地方搜寻武器，第二天，便头晕恶心。尽管要冒着危险，还有这么多困难，但同志们为了尽早搞到一批枪支弹药，都情绪饱满、精神抖擞地忘我工作。结果，共找到18支来福枪、一桶多子弹、还有刺刀几十把、钢盔几十顶和其他军用物资。

地委会常委萧民同志和一些同志原先开设在关丹三角路的一间咖啡店，被用作掩护同志们活动的地点。关丹沦陷后约一个月，日本鬼子便强迫群众领取所谓良民证。就在这个时候，地委同志率领24位同志在一天晚上12点，将18支来福枪和一批子弹从沙马务驻地转移到党和群众基础都很好的牙姆去。那时，同志们还不会割山破芭。领导同志估计，日本兵半夜出来走动的可能性不大，便带领着东彭一支小小的抗日游击队，在漆黑的夜晚开始了它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军。同志们沿着崎岖的山区公路，迈着雄壮的步伐，胜利的向着第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挺进。

二、首战牙姆日伪警察局

黎明前，东彭第一支年轻的抗日游击队便胜利地到达了牙姆。这个离关丹11英里远的小镇还在安睡中。然而，那些知道游击队已开到的许多胶工群众，却已沸腾起来了。这些革命性很强的群众首次感到有了依靠和希望。他们除了泡咖啡，盛情地迎接同志们外，还马上为同志们准备了一顿鸡饭。在促膝谈心的时刻，群众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子弟兵，十分关怀同志们的衣食等问题。一个多月受尽鬼子凌辱的生活，在他们的心坎里深深埋下仇恨的种子，现在，面对着一群年青有为、威武勇敢的游击战士，他们是多么渴望同志们能为他们向敌人讨回血债呀！青少年们则在同志们之间钻来钻去，羡慕地直盯着同志们一支支乌黑发亮的钢枪，脑子里不停地盘算着：什么时候我也有一支呀！

天亮后，同志们就在离开群众住屋不远的芭边，建立了第一个临时营房。大家尽舞利斧快刀，把一块茂密的矮青芭砍光，搭起几间简陋的屋，开始了游击生活。除了个别同志之外，几乎所有的同志从前都没有拿过枪。他们虚心向会打枪的同志学习，很快便学会了上膛、瞄准、开枪等本领。同志们在地委同志的带领下，利用紧张练武的间隙，经常地进行宣传教育群众的工作。群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开芭种植粮食瓜菜等，以克服鬼子封锁粮食造成的困难。

同志们摸准鬼子的活动规律，只放一个哨兵监视从农村到营地的来路。1942年2月初的一天，即农历的年三十中午，哨兵发现两个伪警在农村搜查群众的屋子，恐吓群众，趁机抢贵重物品，捉鸡捉鸭。哨兵同志看到敌人的暴行，肺都气炸了，便悄悄地把枪上了膛。那两个该死的警察，背着来福枪，两只手都拿抢来的东西，洋洋得意地朝着哨兵撞来。哨兵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喝令他们止步和放下武器。两个胆小鬼被这么一喝，拔腿就跑。哨兵打了几枪，一个应声倒地，再也起不来。另一个则跑得脚跟直打屁股，把抢来的东西丢得满地，一溜烟便不见了。同志们把东西送给受害的群众。他们深受感动，送了不少粮食物资给我军，并控诉伪警察的罪行。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严惩这批为非作歹的家伙。

东彭抗日歼敌的枪声已经打响，为了把整个东彭和丁加奴州的抗日烽火点燃起来，地委经过周密研究后，决定进攻牙姆日伪警察局，打一场漂亮的胜战。同志们知道了当晚就要打战，都异常兴奋。吃过饭后，整装待发的同志们围坐在微弱的油灯下，全神贯注地听着指挥员同志交待战斗任务和具体的作战计划。他们心中按捺不住首次出战的激动，满怀着对人民的深沉的爱和对敌人的血海深仇，热烈地谈论着如何为党和祖国立下第一个战功，如何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出一口气。大家纷纷为打好战斗而出谋献计，如选定突破口、选定主攻方向，等等。而时间却像爬行的蜗牛一样，过得特别慢，真是急死人。尽管指挥员同志宣布散会后要大家利用出发前的间隙多休息一会，但同志们都恨不得马上吹响出发的进军号。好不容易才等到了出发的时间，20多位同志带着19支枪，像一支脱弦的箭，迅速而又隐蔽地开到警察局附近。

夜已深了，贴切地说，已是农历年初一的凌晨时分了。污秽的街道空荡荡的，连白天到处游荡的几条癞皮狗的影子都不见。昏暗的街灯下一片死寂，四处笼罩着萧瑟的气氛。按原定计划，指挥员亲自带领主攻队迂回到警察局的侧面，一组同志则利用路边的土坎匍匐前进到警局的正前方。一旦主攻队伍从侧面偷袭不成功时，他们才从正面以猛烈的火力进行佯攻。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主攻队伍也在一步一步地逼近。这时，警察局里依然是死一般的寂静，隐约也可看到敌哨兵耷拉着脑袋在打着瞌睡。同志们紧握手中枪，圆睁着大眼，仔细观敌情，焦急地等待着第一枪响。突然间，“砰”的一声，战斗的信号枪打响了。紧接着是几阵扣人心弦的排火的巨响。与此同时，同志们立即发动冲锋，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直刺敌人的胸膛。同志们一鼓作气，冲进警察局及其后面的排屋，一脚把门踢开。“不许动”、“缴枪不杀”、“我们是人民抗日军”、“举手投降”的吼声，响彻警局的上空。在枪尖下，惊慌失措的伪警察个个面如土色，在他们还未完全清醒过来之前，同志们已将他们的枪都缴了，总共是13支来福枪和1千多发子弹。同志们英勇无畏，猛冲猛杀，在极短时间内便解决了战斗，取得了全胜。

同志们对俘虏进行口头宣传，讲明我军的目标是打倒日本侵略者，警告他们不得再欺侮群众和替鬼子卖命。这些仗着鬼子之势，敲诈勒索群众，到处耀武扬威的家伙；第一次尝到了抗日军铁拳的滋味。他们龟缩在一个角落，由于害怕，再加上清晨的寒意，不多久上牙直打下牙，那付贪生怕死的狼狈相暴露无遗。

经过一番宣传教育之后，释放了所有俘虏。指挥员便下令撤退。队伍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等战利品，怀着喜悦的心情，踏上归途。这时，东方已呈现微微的鱼肚白，四处响起报晓的鸡鸣。这一战，使刚诞生的人民抗日军东彭部队军威大震，为促进东彭抗日游击战争深入广泛地发展奠定了基石。革命群众亲耳听到枪声，亲眼看见这一大捷的情景，欣喜若狂。

首战牙姆日伪警察局，揭开了东彭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序幕。

三、战斗中茁壮成长的人民抗日武装

东彭部队已发展到三十多人，枪有 31 支。首战牙姆警察局凯旋归来之后，便转移到牙姆山伐木工人的一个居住点。这些山工长期受到党的影响，都积极支持抗日战争。同志们在这里驻营，得到了他们的掩护。

1942 年初的某一天，20 多位同志带一挺轻机到牙姆农村去挖木薯。当队伍在距离营房一个多小时的一条牛车路上行进时，突然在前面不远出现一股二、三十人的鬼子兵。一场激烈的战斗随即展开。尽管这是建军后的第一场遭遇战，而且地形不利，但同志们发扬革命精神，以猛烈的火力狠揍敌兵，把他们压倒。指挥员果断地利用这一暂时出现的有利时机，下令撤退。同志们相互掩护，终于安全地退出战场，返回营房。

这一仗，我方只有一个同志被子弹擦伤了一点皮，敌人的伤亡情况不明。鬼子被打得相当狼狈。同志们撤回营房后，敌兵不但不敢追击，甚至连越过战场一步也没胆量。

我军除了留下两位同志向那几个俘虏进行宣传教育外，其他同志和十几位革命群众负责搬运那几十包白米。从该米店到芭边约有一英里远，所以扛的扛，挑的挑，一直忙到天快亮，才搬运了 28 包白米。大家汗流浹背，迎着清晨的凉风，带着 5 支缴获的猎枪和一袋袋白米，胜利回营。

天一亮，一部分刚回来的同志和另一部分留在营房的同志共 20 多位，领受了新的战斗任务，开拔到芭边去。他们以高昂的战斗情绪，顶住了困倦，在埋伏阵地上等待着敌人前来送死。

这一天格外晴朗，碧空万里无云，露水逐渐被晒干了。忽然瞭望哨发出信号，敌人来了。同志们又兴奋又紧张，因为这次伏击战也是建军后的第一次。只见指挥员以沉着的眼神望了望大家，便微微一笑，似乎是在鼓励同志们为人民杀敌立功。20 几支上了腔的枪朝向一个共同目标。四周静悄悄，偶尔有几声鸟鸣。一会儿，一股 40 多人的鬼子兵在关丹宪兵队长田岛大佐的指挥下，大摇大摆、神气十足地跟踪而来，路上还有不少当天清晨运米时遗落的米粒。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

轻机手阿全同志按动扳机，发出了排山倒海的吼声。这是战斗开始的信号，好几个鬼子应声倒下。几乎是在轻机打响的同时，各种枪也射出了复仇的子弹，激烈的战斗持续了约半小时，田岛大佐已被击毙，鬼子的阵脚就动摇了。阿全同志停止射击，有一位同志却在后面向敌人开了一枪。本来隐蔽得很好的阿全同志抬起他那戴着钢盔的头，朝向那位同志示意他不要再開枪，以避免暴露目标。就在这刹那，阿全同志的头部被鬼子的一颗子弹击中，当场光荣牺牲。轻机副手马上接替上去，向敌人再扣一排火，为死难的战友报仇。在我军的有力打击下，鬼子全线崩溃，他们匆匆忙忙，拖着同伙的尸体，扶着伤兵，狼狈逃窜。

这一仗，鬼子死伤9个。罪恶滔天的田岛大佐伏诛，大快人心，轰动了关丹和整个彭亨，广大群众都竞相传送这个大喜讯。这是继牙姆警局被打下之后，东彭部队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鬼子吹嘘的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抗日军威名远扬，大大鼓舞了东彭和丁加奴州抗日军民的斗志。

这一仗中，部队除了阿全同志牺牲之外，还牺牲了一位同志，名叫黄昆。他是位很勇敢的好同志，参军前是割胶工人，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开枪时身体过于暴露而中弹光荣牺牲。阿全同志也是割胶工友出身，来马来亚之前，在海南岛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游击队。他担任东彭部队的副分队长，英勇善战，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地个出色的轻机手。他热爱组织，爱护战友，关心工友，赢得同志们和割胶工友的爱戴，深受党组织的信任。他忠诚老实，服从分配，遵守纪律，工作积极踏实，牺牲时年仅26岁。

同志们把两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战场边的一个小山岗上，还立了一个墓碑，让烈士的英灵永远注视这他们生前浴血歼敌的战场，也让活着的战友们和革命人民牢记他们的英雄事迹，以便从中获得鼓舞和力量。

鬼子连吃两次败仗，死不甘心，他们把潘添兴的米店改建成警察局，以强化他在峇都沙化的法西斯统治。这些伪警察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一再要求抗日军拔除敌人这一据点。

警察局设立不久后的某一天深夜，部队派出三个小分队（约30人）前往袭击。同志们吸取了攻克牙姆警察局的胜利经验，采用偷袭结合猛攻的战术。袭击组从主攻方向隐蔽地接近敌哨兵，在他还来不及进行有效反抗时，就成功地把他们干掉了。突破口被打开后，冲锋组马上冲进去，控制警察局的战壕和隐蔽室的入口，并包围和监视敌警集中睡觉的几间屋子的门窗，接着便开始向他们喊话。伪警察不敢轻举妄动，一个个衣着不整，畏畏缩缩地出来投降了。同志们缴了12支枪。同志们事先掌握的敌情，是驻在这里的警察有13个，核对之后发现少了一支枪和一个敌警，同志们便问俘虏中的三划小头目。他结结巴巴地说，战斗开始时，那个警察正好在后面放哨，听到枪声可能溜走了。同志们便命令三划去喊话，叫他出来投降。几个同志跟着三划以防他逃跑。这时，有一位名叫吴章的同志，自己一个人跑到附近的一条河边去搜索，当他探头向河边望时，砰的一声，隐蔽在河坎下的那个敌警，竟然向吴章同志开一枪。吴章同志的腰部不幸受了重伤。那个敌警慌忙弃枪跳进河里，泅水逃走。同志们听到枪声赶到出事地点时，隐约地看到他的身影，便用轻机扫了一排火。后来，见他潜入水去，同志们又再扫一排火。那个敌警溜走后，同志们捡起他丢在岸边的枪，抬着吴章同志回来，同留在警察局做俘虏工作和进行搜索的同志会合后，便撤退了。

撤退前，有的同志被敌人欠下的新血债所激怒，恨不得把那个三划枪毙掉。但是同志们牢记党和抗日军的俘虏政策，竭力控制住满腔的革命义愤。回到营房后，地委和部队司令部的负责同志热烈祝贺同志们的新胜利，亲切地问候吴章同志的伤势，并指示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经过十多个小时紧张的努力，仍然医治无效，吴章同志终于光荣牺牲了。

吴章同志割胶工人出身，是一位很好的共产党员。他服从领导，工作积极，处处体现模范作用，为抗日事业献身时，年仅20岁。

这一仗，缴获敌人13支来福枪，子弹一千多发和一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10个军用包袱。在短短的期间内，抗日军在峇都沙化连续三战三捷，没收了敌人的白米28包，歼灭田岛大佐和8个鬼子，又拔除了他新建的警察局，真是大显神威。人民群众同声齐赞扬抗日军英勇

善战，从而更信赖抗日军，也更积极支援抗日军。在首战牙姆警察局大捷的同时，地委领导为了迅速开辟丁加奴州的抗日地盘，派一位地委同志带领一支由几位党员和 20 几位割胶工友组成的队伍，向丁加奴州挺进。他们的武器只有一支来福枪和一支猎枪。队伍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决定攻打甘马士一家日本当店。这间店实际上是一个间谍站，早在日本侵略我国之前，这个日本间谍就被派来甘马士，以开当店为掩护，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在英帝败退时，这个日本间谍便公然宣称，凡是持有枪支的，都必须把枪集中到他那边，否则将被捉去杀头，他共收缴了 120 多支枪。同志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多么希望立即行动呀！

农历新年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地委同志带领了几位同志和近 30 位胶工，将该当店团团围住。那个奸刁的间谍发现已被包围时，还企图顽抗，慌乱放了几枪。同志们用仅有的一支来福枪和一支猎枪同时射击。30 几位战士发动冲锋，一面不断高喊“冲啊、杀啊”在一片冲杀声中，战士们冲进该当店，而那个日本间谍则吓得躲藏在店门口的汽车下缩成一团。同志们发现后，一枪就结束了他的狗命。

就这样，前后才半小时，同志们便带着缴获的 120 多支枪（除几支来福枪外，全是猎枪），两千多发子弹，约四百个金戒指，近 8 千元现款以及其他战利品凯旋归来。这真是极漂亮、极干脆利落的大胜利，不仅在军事上有重大收获；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对鬼子的有力打击。因为就在它白色恐怖统治下的甘马士大街上，它的间谍站被抗日军的铁拳砸得粉碎，这等于挖掉了它的一只眼睛。因此，这一胜仗不仅轰动了甘马士，也震撼了整个丁加奴州，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在战斗中成长的东彭部队越战越勇。1943 年中，有一分队日本兵（50 多人）进山搜索驻扎在班正山芭里的一间板厂。他们经常到森林里乱闯，寻找抗日军的遗迹。同志们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开敌兵的锋芒，相机袭击它的驻营地。敌兵驻扎的板厂离开我军营房只有 3 个多小时的路。一天傍晚，部队一个小分队的同志轻装摸到离敌驻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只见整群鬼子围坐着吃饭，同志们便猛烈地扫了几排火。敌人沉默了近 20 分钟，一枪都不敢回。同志们趁机安然撤退。

第二天一早，鬼子又扛又扶，带着 10 几个死伤的同伙溜掉。我军估计鬼子可能会重新组织兵马回来报复，便在通往营房的路上埋地雷，设伏兵，准备狠狠教训它。但是等了几天，鬼子再也没敢来。这一袭击的成功等于警告敌人，山芭是抗日军的天下，敌人休想撞进来。

较后不久，有两位警卫员护送一位负责同志到丁州甘马挽河边的第二农场去工作，并同丁加奴州的交通接头。在到了农场有交通站后，农场的负责同志便报告说，根据确切的情报，敌人将于当天前来进攻农场。两位警卫员接受了狙击敌人的任务，他们出发到河边，选择了一个便于监视河道与农场来路路口的高地，挖好简便的单人掩体，然后埋伏好，等待杀敌时机的到来。过了不久，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马达声，渐渐声响越来越清晰，接着机器声停止了。两位同志紧张地睁大眼睛观察着，不久，就看到两个日本兵从河边钻了出来，两同志立即开枪，一个敌兵倒了下去，另一个扭转屁股就走。随后，河边传来鬼子叽哩咕噜的叫嚷。过了约莫半小时，马达声又起，船开走了。后来查清，原来当那个受重伤的鬼子兵挣扎着爬回去后，鬼子马上乘船跑掉。这样，两位警卫员同志出色地粉碎了 10 几个鬼子准备进攻农场的计划，保卫住了农场，也保障了负责同志顺利进行工作。这一胜仗也表明鬼子兵在抗日军的连续打击下，士气已经开始下降。

不久后，鬼子又从万立乘船来进攻同一个农场。同志们得到情报后，立即紧急集合，进行部署，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到万立河拐农场小河的三岔河口。20 多位同志进入伏击阵地后不久，就听到从万立河上游传来马达声。再过一会，两艘载满鬼子兵的摩托船缓缓地向同志们方向驶来。一进入伏击圈，同志们使用轻机猛烈扫射。第一艘船中弹后，船身逐渐往下沉，鬼子兵乱成一团，争先恐后地跳河逃命。另一艘被打伤后，加快速度，顺水溜走了。同志们就集中火力消灭在河里垂死挣扎的残兵。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河水很快便被染红了。由于河水很深；鬼子的枪都沉在河床，无法捞取。

抗日军东彭部队在东彭地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和广大劳动人民大力支持下，转战彭亨州东部和丁加奴州，连战皆捷，迅速成长壮大。这个部队早就具备条件成为马亚人民抗日军的一支独立队，但在那硝烟

弥漫的战斗年代，交通联络极为困难。直到 1944 年 5 月才获得党中央批准，把抗日军东彭部队正式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

四、越狱记

日本法西斯侵入马来亚之后，关丹到新加坡的轮船航运中断，东彭地委会原来通过一位当船员的老党员负责同党中央联络的线也断了。东彭地委为了重新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便决定派三位同志到西彭文德甲找关系。考虑到搭车去途中有被敌奸、走狗认出的危险，就决定跑山路。同志们以前没有破芭割山的经验，必将遇到不少困难。但他们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有排除万难的坚强决心，坚信必能顺利完成任务。首战牙姆日伪警察局大捷之后的一天清晨，旭日的霞光普照大地，三位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战友们，迈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翻山越岭走了一整天，到达甘孟附近。但该地的日伪警察局里有几个敌奸，3 位同志便到普罗马尼找冯克同志商量。他那魁梧的身材和豪爽的性格，十足是一个典型的工人。他常常领受锄奸的任务。他那身武艺派上用场，许多敌奸听到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在他的家逗留不久，便有一位胶工匆忙赶来通知同志们说，在街场上听说当地警察正在搜捕 3 个共产党，其中一个肩上挂着一把长巴冷刀。同志们一听，就知道出了问题，看来已被奸细认出，因为他们当中确是有一位是将一把巴冷刀挂在肩上的。冯克同志便带同志们到附近树胶芭一个没有人住的公司里去暂时避一避。第二天大清早，冯克同志带同志们走山路到北干河下游 32 碑。从这里又割山到北干河上游的贞诺。冯克同志带他们脱险后，因工作上的需要便回去了。

在贞诺一个叫四十依葛的地方，3 位同志和一个小园主打交道，认起同乡，谈起话来很投机。当晚，他还杀鸡请 3 位同志吃。3 位同志借口说是要到文德甲找工作，这个小园主也很坦率地表示他不相信，并相当肯定同志们是干革命的。同志们对此不置可否，而是向他进行抗日宣传，争取他同情抗日战争。第二天，他果然答应同志们的要求，带同志们跑一段路。然后表示他怕碰到敌军警，便指着一个方向，要

同志们自己走。同志们也不勉强他，就大胆地按着沿路的路标向前走。原来，这是一条鬼子从东彭入侵时走的路，指示方向的箭头是鬼子标的。半天过后，同志们抵达淡马鲁农村，举目一看，到处都是马来甘榜。走到傍晚，同志们来到河边一间较破旧的屋子，女主人是小贩。同志们便把她卖剩的糕点买来充饥，一方面也借此打听情况，并要求在附近一间空屋子借宿一晚。她的丈夫回来后，还给同志们送来了两张草席和两条沙笼。同志们很感激这两位纯朴的马来劳动群众的热情接待。第二天一大早，那位马来人还用舢舨送同志们过河，并拒绝收下付给他的船费。过了河，他又热心地指示通往文德甲去的路。同志们走到中午 11 点才到达文德甲，很快就找到了一位有地下关系的胶工，并通过他找到了组织关系。

西彭党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这三位同志，把他们安顿在部队的营房。3 月 8 日，西彭的一位领导同志和东彭的一位同志一起骑车到森美兰州的知知港，去会见中央派来联络的代表朱佬同志。遗憾的是，朱佬同志已经走了，无法立即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到了当时森美兰抗日斗争的中心也是森美兰地委会所在地的知知港，打通了同中央的联系，总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特别珍贵的是，拿到了一本森美兰党组织油印的毛主席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回到西彭后，西彭领导同志安排 3 位同志骑脚车回去。他们沿着火车路踏到黄昏，便在离而连突火车站不远的一间印度工人的屋子里过夜。当晚，同志们又饥又渴，但没有东西可吃，只好饿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到而连突街上，每人买了两块炸香蕉和一杯咖啡勉强充饥，接着，又继续赶路。不幸的是，刚过了而连突河，两架脚车的轮胎都破了。沿路又没有修理脚车的小店。同志们只好硬着头皮，骑着脚车向前直奔。下午约 6 点，才到达黄重吉农场。同志们找到一位相识的胶工，借宿了一夜，经他的介绍，3 位同志第二天就搭乘黄重吉农场的一辆罗厘去关丹。同志们想到很快就能和阔别不少时日的战友重逢了，真是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不料，车在甘孟日伪警察局前被拦住，伪警察检查每个人的所谓良民证。同志们镇定地回答说，外出做工时还没有发良民证，现在补做一张罢。但那个伪警察不答应。并把 3 位同志连同他的脚车一齐关进警察局里。当时，维持会的一个头

子假惺惺地来问情况，以示关心。同志们把应付警察的话又重说一遍，不让他看出任何破绽。同志们还故意提出要他担保并代为申请出良民证。这个家伙听了，马上夹着尾巴溜之大吉。第二天，来了一个特务，他认出3位同志中的两位，但他很狡猾，装着没认出，漫不经心地问问就走了。同志们从墙板的缝隙，望见那个特务正与警察局的头目交头接耳，指手划脚，神色颇为紧张。同志们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了。经过研究，决定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越狱，不能听任敌人摆布。

第3天早上，警局头目带着五个全幅武装的警察，杀气腾腾地把3位同志都绑起来。那个反动头目还威胁同志们说：“喂，共产分子不可以交谈，也不可以坐在一起。”当天中午，一位送饭的华族厨夫小声地透露说，他们隔天将被送去关丹日本宪兵部。

情况已经十分紧急，同志们决定当晚就采取行动。吃过晚饭后，一位同志尝试把头从木栏钻出来。太好了，穿得过。由于兴奋，一不留神，便弄响了其中一条木柱。一个敌警便气势汹汹地跑来斥责。同志们就灵活地应付说，是因为身体痒，为了止痒，摩擦木柱，结果弄响了。愚蠢的敌警哑口无言，悻悻而去。当晚，敌警一面加强戒备，一面大吃大喝，敌人还开排枪凑热闹，既像是为自己壮胆，也像是为自己邀功讨赏。同志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个警察局有来福枪和猎枪共18支，还有一支拗枪。同志们心里盘算好，只要越狱成功，非缴它10来支枪不可。

越狱的计划预定在下半夜3点付诸行动。但是时间似乎走得特别慢。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挨到两点40分。守敌都已入睡，万籁俱寂。警局外也没有什么动静。这是个大好机会，决不能放过，同志们果断地行动了。按原定计划，第一个同志小心翼翼地从两条木柱之间的空隙钻了出来，轻手轻脚地从离地面六、七尺的走廊上跳下去，又越过横七竖八地睡着的敌人。第二位同志也成功地钻了出来。当他跳到地面时，不慎发出了砰的响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敌人。乘敌人还未完全清醒过来时，他冲过敌人睡觉的地方，和第一位同志一齐冲出了警局。不幸的是，第三位同志（即詹家普同志）再也冲不出来了，因为清醒过来的敌警已把他包围了起来。天亮后，敌人便急急忙忙地把他押送到关丹日本宪兵部去，对他施加了各种酷刑。但詹家普同志不愧

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顶住了敌人对他肉体上的摧残，保守了党的秘密。越狱前，他一再表示为了革命和党的利益：中心同志应先走，他最后走。即使走不了，也要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口气，为事业贡献出生命。詹家普同志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他英勇就义时，从容自若，毫无惧色。

詹家普同志胶工出身，原是峇都沙化党支部书记。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一向热爱党、热爱领导，是一个很好的基层干部。

两位越狱成功的同志冲出警局后，分两路走。其中一位走了3天才回到营房，同志们喜出望外，但听说一位同志走散了，便组织部分同志去寻找。又听说詹家普同志英勇牺牲了，同志们立即要求领导上批准他们去进攻敌人，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那位中心同志迷了路，走了一个星期，几经周折，在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才找到回营的路口。正巧就在这时，碰到化了装准备到甘孟去寻找的两位同志。他回到营房，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问候。

部队用了20天左右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两位越狱的同志又找来了甘孟警局内工事分布的简图，制订出一个具体的作战计划。

一天晚上，一支40多位同志组成的战斗队带着一面红旗和一支喇叭出发了。队伍进入攻击阵地后，指挥员下令轻机手把哨兵打掉，紧接着，激动人心的冲锋号吹响了。突击组的同志们勇猛地冲进去，少数企图抗拒的敌警正想跳进壕沟，同志们的枪口已对准他们的胸口。这些怕死鬼立即原形毕露，跪在地上举手投降。其他的敌警也战战兢兢地低着头出来投降。这一战，缴获了11支枪，一批子弹和军用物资。可惜，敌警头目和几个敌警没住在警局里，所以有7支枪没缴到。一位越狱的同志参加了这场战斗，找到了被扣押的3架脚车。他将其中一架的坐垫拔出来，从骨架管内取出从森美兰带回来的一本毛主席著作，同志们撤退前，把该警局烧毁，熊熊烈火照亮了甘孟大街，同时还散发了一批传单。

事后才知道，当晚正好有为一百多人的一中队鬼子兵住在甘孟警察局斜对面山丘上的一间学校内。这批日军是在傍晚开到的，战斗

打响后，这批鬼子兵慑于抗日军的军威不敢出来支持，当晚还全部进入战斗状态，一直戒备到天亮。

这一仗，进一步暴露了鬼子兵的纸老虎本质，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特别是青年男女听到抗日军的雄伟军号声，更是激动得彻夜难眠，他们多么渴望参加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在红旗的指引下冲锋陷阵啊！

这一胜仗之后，部队派了五、六位同志到十八碑一带，也就是甘孟日伪警察局的附近，开展群众工作，在短期内便取得了极大的成绩，把群众组织起来了。青年们热情参军，接着，部队便派了一批干部和战士连同当地的青年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分队，密切了党和军队同群众的联系，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五、地雷战大显神威

部队建立后不久，在美昔拉、巴罗、丹那布爹沿海一带以捕鱼为生的两位渔民要求上队，还献出很多地雷。一位群众献出了一百五十多颗，部队便派同志去挑回来，结果挑了两天才完成。为了表彰这两位同志的贡献，部队特地嘉奖了他们。同志们也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拾雷英雄。

原来，英军败退时，在上述地区的公路设布雷区，而鬼子没有走那条路，这些地雷原封不动。这两位同志发现后，就统统搬走，收藏起来。他们细心地把引爆装置的电源切断，取出雷管，使地雷在搬运途中不致爆炸。

牙姆山营房离一条河约半小时，河上有一座小木桥，过了桥就接上从营房来的路，部队在河边设一个哨岗，在河对岸装一颗地雷。一天，一个敌人奸细来到河对岸向哨岗这一面探头探脑地张望，闯到离地雷只有几尺远的地方。哨兵同志拉响地雷，只听到“轰”的一声，这个家伙被炸成肉酱，他携带的手枪也被炸坏了一点。

地雷第一次为革命杀敌，同志们对它开始有了信心。当天，同志们就把地雷爆炸过的痕迹打扫干净，又在原地装上一颗地雷。过了几天，一队有 20 多个伪军的巡逻队来到对岸。当他们走近地雷时，哨兵

同志又拉响地雷，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把成堆的敌兵炸得血肉横飞，死伤累累。敌人马上带着尸体和伤兵往回走，只留下一个重伤的伪军，躺在一条树桐后。同志们打扫战场时，发现他还在呻吟，便遵照抗日军的俘虏政策，把他抬回营房，设法抢救。他自己心有余悸地说：“被炸后，昏迷了15分钟之久。”因为伤势严重，他当晚便死了。这次地雷战，缴获一支来福枪。

这之后，哨兵和地雷被移到离营房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天，又有3个敌人奸细闯进来。这些家伙一出现，哨兵同志机警的目光就紧盯着他们，敌奸再向前走时，地雷被拉响了。随着一声巨响，3条走狗被炸得粉身碎骨。这次又缴获两支来福枪和一支手枪。

1942年中，东彭部队派出30多位同志组成一支机动部队北征丁加奴州。队伍开到甘马挽、基芽一带，便驻扎在一处芭边。附近居住有整十家华族群众。

当鬼子要赶搬家时，这些群众就决定搬进山来和同志们住在一起，连几只猪也赶进来养在一个栏里。同志们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敌术打击敌人。

群众搬进来后的隔天，同志们就在通往营房的路上埋伏，在另一条路上则装了地雷。鬼子果然来了，他们是从埋伏地雷的那条路来，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鬼子跨上一条巨大的树桐，连续往下跳时，正好踩在地雷上，“咚咚”两响，鬼子马上卧倒，但地雷并没有爆炸，鬼子把它取走。两位瞭望的同志看到鬼子安然地越过了雷区，就拉响信号，通知营房里的同志和在另一条路上设伏的同志们。营房里的同志们立即收拾东西。在路上设伏的同志们也赶回来收拾衣物，然后迅速撤出营房。鬼子兵一进营时，看到了两位最后撤离的同志便放肆地追赶，企图活捉。但这两位同志行动敏捷，转眼间就钻进茂密的树林。敌人胡乱开了十几枪，无损于这两位同志的一根毫毛。

同志们撤离营房一个小时后，就派同志摸回营房侦察，发现鬼子已走了。同志们收拾好营房，继续住下来，并挖好了3条战壕，准备痛击来犯的鬼子。

不出所料，过了几天，为数众多的鬼子兵又来了。来路上，有一段拐两个弯的地方，很有利于三面发挥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队伍就

在这里设伏。当同志们紧张地准备最有利的时机突然打击敌人时，有一位轻机副手因经验不足弄错位置，正在向轻机阵地运动，被敌人发现向他开了一枪，就当场牺牲了。这时，同志们立即向敌人猛烈开火，激烈的枪声响彻整个山头。忽然，有一位的枪出了故障，就拼命喊：

“我的枪退不了膛，我的枪退不了膛。”有的同志缺乏作战经验，听不清楚他喊什么就撤退了，这一来，其他同志也跟着撤退了。

这一战，歼灭鬼子约 20 个。敌人阵地上血渍斑斑，到处是鬼子狼狈逃走时丢掉的帽子和面巾，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夺到敌人的武器。事后，鬼子接连 3 天炮轰我们的营房，而我们的队伍却早已转移到甘马士和北加等地开展革命工作(那一带约有两千名华族同胞)，同时也进行整训。这期间只和敌兵有两次小接触，歼敌一名。两个月后，队伍发展到 70 多人，各种枪支 70 多支，人员和武器都成倍地增长。接着，东彭部队司令部为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命令这支取得重大战果的机动部队开回牙姆根据地。队伍集中在甘马士河边的一个山头上等待出发时，一位女群众割山进来送情报说：“一股鬼子兵跟踪来到河边。”同志们紧张地做好准备，随即进入伏击阵地。可是，埋伏一整天，敌人没有来。第二天，队伍就回到牙姆，沿途除了宣传和组织群众外，也警告或惩罚一些反动分子和坏分子。

1943 年，部队进行了一场威震全马的肃奸战斗。抗日军活捉大汉奸张成根，然后把他处决，为人民除了一害，群众又称赞又感激。鬼子却又气又恼，因为它的大走狗被杀了，这在政治上对它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张成根是驻关丹的日本宪兵队长和田得石大佐的岳父，对他本人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张成根被杀后不久，和田便带着几百个鬼子兵，跟踪来进攻东彭部队的牙姆营房。同志们事前在路上埋设了两颗地雷。当这股敌人队伍的前半段进入雷阵时，哨兵拉响了两颗地雷。在天崩地裂的“轰隆”声中，和田大佐和其他鬼子被炸得体无完肤，尸体支离破碎。鬼子兵再也不敢前进一寸，匆匆忙忙抬着和田和其他鬼子兵的碎尸，搀扶着伤兵，丢盔弃甲而逃了。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同志们只用了两颗地雷就炸死炸伤敌兵约二十名，并缴获 1 支来福枪，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图谋。这一场漂亮的地雷战，是继 1942 年中歼灭田岛大佐之后一场大扫鬼子威风的大胜仗。

1943年，东彭部队总部驻在第二农场。这个农场离芭边有半天多路。一天上午约10点，一架日本飞机突然飞到农场的上空盘旋。正在上课的同志们马上散开掩蔽好。敌机随着投下两颗炸弹，其中一颗落在地瓜地里，炸毁了几百斤地瓜，同志们安然无恙；另一颗则落在大芭里。轰炸后不久，一股鬼子兵跟踪来企图进攻这一农场。部队早已在所有通到农场的路上设立哨岗，并按各个地段的地形埋设地雷，数量不等。哨兵同志发现鬼子闯来了，便拉响地雷，炸死炸伤鬼子20多个，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一次，鬼子逃窜得很狼狈。据鬼子事后向群众透露，主要是地雷爆炸后，听到我军的冲锋号。由此可见，鬼子是多么害怕抗日军敢冲敢杀的战斗作风。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地雷战的开展，我军逐渐积累了经验。同志们找出了个别战斗中地雷失灵的原因，做了技术上的改进，并越来越普遍地学会灵活地运用地雷战术，从而更多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建立了功勋。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鬼子的末日已是屈指可数。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频繁的打击下，日寇在我国的法西斯统治也已岌岌可危。但是，它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还要进行垂死挣扎。这一年，鬼子企图凭借它的优势兵力对人民抗日军实行重点进攻。在东彭亨，鬼子集中了1千多日伪军分7路围攻七独的主要根据地牙姆山及其附近的林明、沙马务、峇都沙化等地区。它的进攻矛头显然指向七独司令部。然而，敌人的这一图谋在七独的战士们、务农场的同志们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抗击下，特别是在我军地雷战的有力打击下，终于被粉碎了。

鬼子的第一路兵约有百余人，由甘马挽进山，企图进攻甘马挽半路农场。这个农场的面积约50依葛，由一位支委同志带领20多位男女同志负责经营，全部武器装备只有3支猎枪。他们向司令部领来两颗地雷装在路上，刚装好两天，鬼子来了。当敌人进入地雷阵时，哨兵同志拉响地雷，把队形比较密集的鬼子兵炸死炸伤50多个，尽管敌人折损将半，但它仍继续前进，占领了农场。

由牙姆进山的第二路鬼子兵有3百多人第二天便逼近甘马挽半路农场，和占领这一农场的第一路鬼子兵在农场附近驳起火来。双方激

烈地厮杀了约半天，结果两败俱伤，死伤两百多人，鬼子在上述农场挖了3个大坑用来焚烧和掩埋尸体。

第三路鬼子成百人，组成所谓敢死队，全部配备机关枪或冲锋枪，沿着和田得石大佐被炸死的那条大路进犯牙姆抗日根据地。这些鬼子兵，居然排成两路纵队，队形整齐地大摇大摆闯进来。哨兵同志看准了时机，猛力一拉，3颗地雷同时开花，整个山头简直像是翻了筋斗。一阵巨响过后，地上躺满了被炸死炸伤的60多个敌人。成百名敢死队来势汹汹，却被两名英勇机智的哨兵用3颗地雷炸得折损过半。这真是号称不怕死的敢死队变成了敢来送死的敢死队。

由沙马务闯进来的一股百多人的鬼子兵是第四路。他们占领了第二农场，住了10来天后便进到第三农场，鬼子顺利地占领了两个农场，还企图进到第四农场。但就在他们刚踏上去第四农场的大路上，一声巨响，两颗地雷怒吼了，鬼子兵又死伤几十人。幸免一死的鬼子兵看势头不对，马上缩回第三农场。这批残兵败将在第三农场火葬了他们同伙的尸体后，又赖了十几天，然后才回去交差。

七路鬼子兵中第五路最侥幸。这路敌兵有五六十个，从莪泰山进到民运同志和几个革命群众共同开辟的两个规模较小的农场。这两个农场面积各约三、四十英亩，因为土质肥沃，地瓜或花生种下去都长得格外茁壮，产量高，质量又好。这一路鬼子占领了两个农场之后，几天内吃了不少地瓜和花生。由于出入这两个农场的路较多，这一路鬼子兵碰巧沿着一条没有装地雷的路进出，所以没有伤亡。

第六路日兵有一百多人，从峇都沙化进到班正的广廊里，就在这里的一个泰越山的山垄，和从林明摸进来的第七路鬼子兵一百多人打起遭遇战来，双方没头没脑地猛杀了一通，结果死伤20多个，其中一路后来撤退时又踩响了我军的一个地雷，又死伤了十几个。

日本法西斯苦心策划，动员了1千多兵，分成7路前来进犯，时间长达1个多月，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反而遭到了死伤500多人的惨重损失。这一次反“围剿”战役的重大胜利，是七独全体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大无畏精神所取得的。同志们把装备精良、训练素质和数量都超越七独的鬼子兵打得

溃不成军，死伤累累。鬼子兵谈雷色变，他们事后向群众说：“抗日军在山芭里到处都埋有地雷，密如花生，真是防不胜防。”

这次战役中，由于地雷的装置得到改进，用铁线代替了藤丝，拉起来很有保障，所以没有发生过地雷拉不响的事故。此外，我军还建立由两、三个同志组成的骚扰小组，把暂时占领一些农场的鬼子兵搞到精神高度紧张，吃不安宁，睡觉也不安宁，时时处在草木皆兵的状态。而当他们疲乏时，正是同志们发动袭击的好战机。

七独几百名武装同志、民运同志和农场同志以及数量众多的革命群众胜利地接受了这一紧张艰苦的反“围剿”战役的考验和锻炼。这次战役中，七独付出了极小的代价，只有一位叫阿新的同志在一次骚扰敌兵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这次反“围剿”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后，东彭和丁州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七独在各族同胞中享有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高的威信，群众更热情地在精神和物质上大力支持七独，而日本法西斯却日益孤立，被动挨打。

3年8个月抗日战争中，七独共用了约120个地雷，炸得鬼子、伪兵和敌特死伤惨重，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巧计生擒招安会长

鬼子占领我国后，除了以屠刀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工具之外，也采用政治欺骗手段，扶植一批民族败类充当其忠实走狗，拼凑起一个称为所谓招安会的伪组织。这个反动团体遍设全马各地，是一伙牛鬼蛇神的巢穴，为协助其主子遏制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它四处张贴所谓招安传单。

东彭地委会和部队司令部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以“一群进山抗日的革命群众”的名义写信给招安会，表示愿意与招安会的头目包括彭亨州的和该州各地的招安会正副会长面商具体的合作条件，并听取这些头目的进一步说明，然后再和他们一齐出去，但附有一个条件，即在会见时鬼子兵不能来，理由是妇女和小孩害怕他们。

几天后，招安会便复信表示同意上述建议和条件。这些为虎作伥的家伙显然是利令智昏，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革命群众奉献给主子作为他们邀功领赏的供品。我们看准了他们的这种心情，便故意延慢几天才回信，让他们心急如焚，更易上当。地委和司令部也利用这一间隙，直接安排一批指挥员同志亲自到预定的会见地点去做细致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具体的伏击地点，做好战斗部署。等一切就绪后，才写信约定会见的日期、时间、地点等。

很快就接到他们的回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那种乐不可支的心理。信中说：“我们几方面(指招安会、日本宪兵部和警备司令部)全部同意你们信上写明的意见，并将按照你们指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去带你们出来。”说得那么天真和轻佻，却不知自己已末日临头。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地委和司令部同志率领一支五十位指战员的队伍迎着朝阳踏上了征途。一路上，同志们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到了芭边，队伍便休息上来，派出几位侦察兵到会见的地点进行最后的侦察搜索，并占领了一些制高点。随后，队伍便进入埋伏阵地。因为会面的地点是一个树胶芭，会面的时间还未到，领导同志和几位警卫员继续在原地休息。设伏中的指战员们个个战斗情绪高昂，准备鬼子闯来就狠狠地打击它，让它有来无回。同志们的来福枪都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旦与鬼子短兵相接，便来个刺刀见红。

快到约会的时间了。地委和司令部同志来到约定地点，同志们更是信心百倍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瞭望哨的动静。时间越来越迫近了。突然，哨兵同志发出信号。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手持小白旗，挺着大肚皮，一拐一跛地来了。接着，二、三十个类似的货色跟在后面也来了。同志们一动不动地监视着，特别注意后面是否还有鬼子兵跟来。大家都隐蔽得很好，这些自愿送上门来的蠢猪经过伏击阵地时没有察觉，同志们继续严阵以待，提防出现新敌情。招安会的大小头目进入会面的地点时，个个气喘如牛，定睛一看，在场的不是妇女儿童，而是几十位身材结实、神采奕奕抗日军。个个全副武装，穿着整齐的军装，有的腰间配挂着手枪，有肩上挂着冲锋枪。这一下子，他们的脸色马上一阵青一阵紫，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们的脑海里可能出现一个念头：大芭里怎么有这么多共产党，难道我们自投罗网了吗？他

们强装镇定，咧开嘴巴，想装笑又笑不出来，拼命地点头哈腰，神色不定地向同志问好，伸出微微颤抖的手，请同志们抽烟。同志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大方而严肃地请他们坐下来休息，喝水抽烟。招安会的头目们没有一个敢正视同志们。他们有的东张西望，有的低头搔耳，有的互相盯着，借以掩盖内心的不安。

地委同志首先打破这一沉闷的局面，朝着张成根问：“你们共来了多少人？”“共……32人。”这个彭亨州招安会总会长平时在外面说起话来神气十足，口沫横飞，俨然是个大演说家，如今却变得口吃起来了。同志们听了，感到可笑。“这32人是哪些方面的人？”“他……们都是招安会总会和区会的正副会长和文书。”回答得真是吃力，不仅口吃，连声音都有些颤抖。“有日本兵来吗？”“没有，没有，没有皇……”本想说皇军，但马上改口说：“没有日本兵来。”地委同志便说：“鬼子没有来，双方可减少些麻烦。如果他们敢来，我们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将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会见结束后，你们将亲眼看到我们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军的一支队伍。”

接着，地委同志首先说明来意，表明马来亚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态度，交代党对汉奸、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即首恶必办，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并严正指出，在场的招安会大小头目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欠下了人民累累的血债，本应受到人民严厉的惩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如果向人民低头认罪、将功赎罪，人民将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听到这里，他们如释重负，连连称是，异口同声地承认有罪，并表示要立功赎罪，悔改自新。

其实，他们除了表示要和抗日军合作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外，没有其他脱身之计。这时，司令部便拿出事先拟好的文稿，让他们签名为证。这些伪招安会的头目们，签名时双手直哆嗦，像是发冷病大发作，连个名字也签得歪歪扭扭。

经过约5个小时的斗争和宣传，在政治上成功地瓦解了彭亨州尤其是关丹各地的日伪组织招安会，粉碎了它的招安计划，孤立了敌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集中的号音吹响了。除了担任警戒任务的同志外，其他同志便从四面八方迅速地集队，在一面巨大的红旗下排列着整齐的队列，个个

精神饱满，脸上充满喜悦和自豪。领导同志宣布，将招安会总会长张成根、林明的潘添兴、牙姆的李明和甘孟的温秀等四人加以扣留，其他的必须真正痛改前非，协助抗日，将功赎罪。

下午5点多，会见便在同志们高呼“打倒日本法西斯”、“打倒汉奸走狗”、“马来亚共产党万岁”等震撼山河的雄壮口号声中胜利结束。28个招安会中小头目走后，队伍押着招安的四个头目回到暂时宿营地过夜。

第二天，经过周密的审讯和慎重的考虑后，决定枪决罪恶滔天的张成根，继续扣留潘添兴，释放其他两个。一切处理妥当后，队伍便路经第二农场和第三农场回到农场。

这一胜利战斗，使彭亨州的招安会陷于瘫痪，在一定程度上斩断了日本法西斯在本州岛岛的手脚，这就大大有利于抗日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的开展，尤其是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广大革命群众一致赞扬抗日军有勇有谋，神机妙算，把敌伪的狐群狗党一网打尽。

七、自力更生办农场

早在东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初期，地委会就号召和动员革命家属与革命群众搬迁到胶园或芭边，开芭耕地，尽量多种地瓜、木薯等。这些杂粮较容易种，收成又快，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从而粉碎鬼子封锁粮食的政策。

东彭部队建立后，部队同志和家属联合开辟第一农场，开创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康庄大道。第一农场树立了榜样，以后抗日农场就像雨后春笋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并从芭边深入到大芭里，形成一个星罗棋布的网点。抗日战争中期，农场遍布彭亨州东部的沙马务、莪泰山、峇都沙化、林明、林明新路头、甘孟半路、北干32英里等地以及丁加奴州的牙姆山、万立、甘马挽半路、甘马士、北加等地。部队或交通出发行军，只需带一两餐的饭，不必带粮食，在大芭里是这样，出到芭边也是这样，因为群众都在芭边普遍开荒种粮，不仅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还有余粮支持部队。

农场的面积大小不一。最大的超过三百依葛，最小的二、三十依葛，一般的一百多依葛。工作人员最大的农场达一百多人，一般的大多是几十人至百人不等。初期，农场基本上都是部队开拓创办的。所以，农场也就是部队的营房，革命家属和革命群众都与部队住在一个农场里。领导同志和部队同志如果没有紧迫任务，也同家属与群众一样参加劳动。参加农场工作的人员，每天劳动八小时或更多些，劳动同志则劳动四小时至六小时。后来，革命群众参加农场工作的越来越多了。同部队住在一起不利于作战，而且实战经验也一再证明，部队必须有自己的营地，以便组织和进行战斗，因此决定把农场改为在地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独立单位，并在农场里普遍成立党的支部和小组。这样，农场的任务较单一化了，即主要负责生产；而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农场每个月约开3次会，学习文件或讨论一些耕种问题。此外，还进行军事训练，把军事技术比较好的组织起后备队，专门负责放哨。一般上，一个农场的武器配备是三、五支枪和一两个地雷。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相当完善的了。因为农场在大芭里，离芭边较远，而芭边又有部队同志专设岗哨守卫。如牙姆山有两个山头，有两条比较大的路通到山里，在这条路的路口各有一小队同志把守。他们由部队派出，每10天轮换一次。部队在路口埋设三几颗地雷，敌人前来进犯，放哨守卫的同志就拉响地雷，杀伤敌人。战斗和生活在牙姆山周围的部队同志以及农场的同志和群众一听见地雷的轰炸声，就知道敌人进山了，有充分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加上沿路设伏装雷，打它炸它，敌人很不容易进攻农场。此外，为防止敌奸混进农场，还实行通行证制度，任何人没有出示通行证，不得进出农场；违犯者，哨兵有权扣留。农场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每星期举行一次联欢会，除了唱歌演戏外，就是军事操和拳术表演。这些生动活泼的文艺演出和军事表演，深受群众的喜爱和欢迎，不仅丰富了农场的的生活，也有效地教育了群众。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从小就参加文艺活动，受到了锻炼，进步得很快。能力较强的参加部队的文艺宣传队，到群众中去演说、演戏、唱歌、跳舞，获得群众的热烈赞扬。他们经过事先准备，能在群众集会上不看讲稿就发表演说，说得条条分明，头头是道，使群众很受感动。少年儿童中的先进分子被吸收到部队中组成少先队，

负责勤务、卫生管理等工作。经过教育和斗争锻炼，孩子们迅速地成长，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和平时期，不少成了很好的交通员，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在握枪杀敌，为人民立了新功。

农场设立图书馆，作为进行政治或文化学习的场所，革命书籍和各独立队以及七独出版的报刊都在图书馆出现。负责农场教育工作的同志兼管图书馆的工作。

农场创办初期，医治病痛是一个大难题。当时很难买到药品，治病主要靠青草药，也没有一个医生，同志们自己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逐渐摸索到一些治病的方法。后来，有一位懂得四百多种青草药的老中医参加了农场，领导上就派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向他学习，基本上掌握了医治一些常见病的方法。另外，部队与六独取得联系后，得到六独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六独同志介绍了不少医务工作的宝贵经验。七独也派一些同志到六独学习如何治疗枪伤，回来后又结合老中医的方子进行实践，终于有办法治疗枪伤了。

农场的口粮是每人每天一两米，后来增加到一两半米；部队则二两半，都要加上杂粮才吃得饱。杂粮主要是地瓜，实际上，当时的主粮就是地瓜。农场为了备荒，也囤积了不少粮食。至于蔬菜瓜果特别是薯叶，农场的同志和群众吃得足够有余，还挑最好的大量供应部队。农场还有专人负责养猪和鸡鸭，但主要的肉食来源是靠打象和其他野兽。三年八个月期间，东彭和丁加奴州一带，部队共打死了四、五十头象，单单是打象能手黄忠运同志一个人就打了30多头。他往往独自一人拿支象公枪（这种猎枪威力大，声音也特别响），出发追踪大象，一打到象，部队和农场的同志像过节那样，都要忙碌一阵。大家除了能饱食一顿营养丰富、滋味鲜美的象肉外，还经常将它与木薯合起来做成一种茶果，就叫木薯饭。这种木薯饭也可作为干粮，出发工作的同志，携带和食用都很方便。此外，开联欢会时，它与自己制造的阿华田一样，是同志们喜爱的茶点。这种阿华田的原料是农场生产的鸭脚粟，炒干了辗成粉，味道与阿华田相仿。能自己制造阿华田，这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主要饮料咖啡来源困难的问题。农场有几位专职理发的同志，他们在自己负责的农场里巡回，平均一个月替同志与群众理一次发。

农场对群众的特殊情况有所照顾。有一些革命群众虽然响应号召到山里来耕种，但还不习惯农场的集体生活和集体劳动，他们要求自己开芭耕种。农场同意他们的要求，还供给他们半年的油、盐、米和一些烟。待收成后，他们将余粮半价卖给部队或报效一部分给部队。部队的武器较充裕时，也给他们配备一些猎枪，作为自卫之用。农场的同志和群众，有家庭的和单身的分开居住，他们的屋子都建得很整齐，屋顶盖上亚答，用料虽简陋，却也美观清洁。七独的同志们依靠群众，利用日本法西斯兵力分散，不能持续不断地轰炸破坏农场的弱点，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不畏艰难，白手起家，开辟和经营了许多农场，为东彭与丁加奴州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八、朝气蓬勃的革命堡垒

由于东彭和丁加奴州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度过了短暂的流动生活后，就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七独司令部的营房在党中央批准七独成立的前半年就建好，以后没有迁移过，一直住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个营房建立在牙姆山区的中心，四周有不少农场围绕着。从牙姆进山，必须经过四个农场才能抵达这里。鬼子出动1千多兵分七路围攻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进到第三农场。正是因为有着革命群众的支持和作为前哨的农场的掩护，七独司令部所在地的营房上空红旗始终迎风招展，鲜艳夺目。营房的面积本来并不大，但随着七独的日益壮大，营房不断扩大，工作部门也越设越多。

具有历史意义的七独成立大典就是这个营房里举行的。为了隆重庆祝这一盛大节日，部队同志邀请各农场和各抗日组织的代表团(共约3百人)到营房住了10多天，共同分享节日的欢乐。庆祝活动持续了整个星期：红旗到处飘扬，人们喜气洋洋，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司令部的屋子和礼堂挂满了各抗日组织赠送的对联和锦旗，写上或绣上的贺词热情洋溢，体现了军民水乳交融之情；庆典的文艺节目主要是演戏。参加庆典的同志们和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和极大的鼓舞。庆祝活

动结束后，他们满载部队同志的盛情，带着党赋予的新的战斗任务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为创新功而奋战。

司令部的营房在通常情况下驻有一中队同志(约一百二、三十人)。如有同志出发工作，至少也有七、八十位同志留在营房里。司令部的办事处和领导同志休息的住所在营房的正中间，前面是一个宽阔的操场，再过去是出版部和一小队警卫队的宿舍。操场的右面全部是宿舍，两排宿舍之间矗立着军人俱乐部和礼堂，这是两间两层楼的大屋；操场左面是二、三十人组成的运输队的宿舍以及裁缝部、修械部、宽敞的食堂(内有30张桌子，每桌可坐8人)和厨房。此外，有两间设有许多单人床位的医院和一间医务人员住的宿舍。所有这些屋子都有走廊连接着，全部屋子都是用桃榔叶盖的，这些叶子由80多位阿沙族同胞帮忙砍了送到营房，部队除了供他们吃外，还送他们一些盐、烟和纱布。司令部前竖着一支旗杆，每天清早六时正就吹响升旗的喇叭号。这时，迎着习习晨风与东方的红霞，红旗徐徐升起，营房里顿时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战斗的一天开始了。傍晚6时正，夕阳的余晖把营房染成金黄色，随着降旗喇叭号音，红旗缓缓降下，同志们放声齐唱《红旗歌》，下旗仪式便告礼毕。

参天的大树环抱着这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堡垒，骄阳的光芒，透过树叶的空隙，普照着营房。一条缓缓流着的河从营房淌过，河水清澈见底，最深的地方有3米，阳光照耀下，碧绿的河水，银光闪闪，河边的沙滩是同志们游泳后休息晒太阳的好场所。河中搭起一座浮桥，用树皮和桃榔叶围起来，宛如一间屋子，以便洗衣和冲凉。河对面开辟了一个小菜园，种一些瓜菜，也种青草药树，早晚都有同志抽空去捉菜虫和施肥，所以园圃的植物长得格外茂盛茁壮。

一到下午4点，宽敞的操场上人声鼎沸，异常热闹。同志们认真而又热烈地打排球，进行体力锻炼以适应激烈战斗的需要。修械部主要的任务是修理损坏的枪械和地雷等。支持这一工作的同志本来是关丹市的修表匠，也是党的同情者。部队建立后，修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领导同志觉得这位同志既会修理钟表，当然能较容易掌握修械技术，便动员他参军。这位同志上队后，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通过实践，终于掌握了一套修械技术，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及时表彰好人好事和宣传党的新指示或战斗号令，司令部定期出版名为《大众报》的报纸，对同志们和革命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加强他们的胜利信心。《大众报》出版初期，稿件主要是靠部队的同志们提供，后来农场的同志和群众也踊跃投稿，充实了报纸的内容。各农场接到报纸后，也随即将它登载的文章和消息转载在农场各自的壁报上。

每逢革命节日到来，营房里总是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有一年的红十月节，各农场代表及部队同志 120 多位和部队领导同志共同度这一战斗的佳节。大家聚集一堂，一连 3 晚观看演戏，每晚都通宵达旦，锣鼓喧天，灯火通明。部队同志进行军事表演，包括投手榴弹和射击等，吸引了农场的同志们和革命群众。部队的排球队还同农场的联合队举行了友谊赛，丰富了活动内容。最激动人心的节目是开排枪和试地雷，同志们以这种方式来放礼炮。时间一到，由 34 位同志一齐开枪，地雷也同时爆炸，枪声和雷声惊天动地，恬静的山峦似乎被唤醒了，摇晃的树木似乎在欢笑。

约有两年有时间，东彭地委和七独的领导同志一直在这个营房进行工作。一个个战斗号令从这里发出，在各地掀起巨澜；一支支队伍从这里出发，又凯旋而归。这个营房是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是东彭和丁加奴州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九、穷打猛攻捷报频传

七独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不仅在伏击战中屡战屡捷，而且通过进攻牙姆和甘孟日伪警察局，取得了攻坚战的实战经验，掌握了攻坚战的一些战术技术。1943 年开始，部队有计划地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战，歼敌喜讯从四面八方频频传来。这年年初，部队决定进攻林明日伪警察局，当时日伪军警约两个分队进驻在这个有着一百多间店铺的小城镇。这里有一个全国和全世界最大的地下锡矿。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长期以来通过大规模开采，残酷剥削这里的数千劳动人民，榨取了巨额利润。小城镇位于矿场中央，它的盛衰完全依附于矿场。一天夜里，部队派出约 50 人，其中包括 10 几位运输队同志，采用快打猛攻的战

术，要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战斗，缴枪八支以及一批子弹和军用物资。当地革命群众被这一胜利所鼓舞，纷纷通过地下组织捐献了很多东西。回营房时，同志们个个都背得很重，沿着小火车路的路旁吃力地前进，这条小火车路是汉奸潘添兴私人拥有的。走了不久，便看到有一个工友从火车上向同志们招手，同志们向前去和他打招呼。这位火车司机是党的同情者，十分热情地邀请同志们上车，送同志们一程。火车在有节奏的声响中飞驰前进，在离班正河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同志们卸下东西，司机开动火车，让它自行前进。他则在火车开始运行时跳下来，和同志从前一道涉水过河，进入森林，踏上归途。不久，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那列潘添兴的火车脱轨栽进河里。同志们背着沉甸甸的物资，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终于胜利地返抵营房，受到领导同志和营内同志们的热烈迎接。

在攻打敌人修有良好工事的据点的战斗中，同志们深刻体会到，运用快打猛攻的战术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担负冲锋任务的同志必须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机智地避过敌人的威胁，迅猛扑向敌火力点，把它打掉，使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种速战速决的战术，几经实战的检验，证明行之有效。正确地应用这种战术，就无往而不胜，反之就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会造成牺牲损失。

班正日伪警察局住有 20 多个警察，配备除一挺轻机外，全是来福枪。这是敌人对牙姆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的一系列主要据点之一。七独司令部决定摧毁它，扫除抗日根据地向西南发展的障碍。部队派出侦察组去摸清该警局周围的地形、防御工事和敌人的活动规律，并绘出简要地图。七独司令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准备后，决定派 50 位同志组成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去完成攻占这个警察局的任务。同志们的装备除两挺轻机外，全是来福枪。

1944 年年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队伍就摸到警察局附近的铁丝网边。警局里一片死寂，伪警察还在梦乡，岗楼上的哨兵缩着脖子在打瞌睡。同志们用锋利的大刀，砍断铁丝网，打一排火干掉敌哨兵，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就在这一刹那，冲锋组的同志猛冲向警局，其中一位同志已冲抵警局的门口。眼看胜利在望时，指挥员突然向敌人喊话，命令他们交枪投降。同志们听到指挥员喊话，便停止射击，也停

止前进。狡猾的敌人听到我方喊话，耍了一个花招，高声答应稍等一下就投降。敌人的话音刚落，就跳进楼下的工事，向同志们开火。这样，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同志们知道上了敌人缓兵之计的当，气得怒发冲冠，用火力互相掩护，向前冲击。但敌人凭借有利的工事，以轻机的猛烈火力堵住了同志们的进路。七独的猎象能手、中队长黄忠运同志用轻机一面猛扫敌人，一面勇猛地迫近敌人。但就在他将要冲到工事时，敌人的一阵扫射打中了他和他紧握着的轻机，他倒在血泊里，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志们看到他们所爱戴的中队长英勇牺牲，无不义愤填膺，一位同志在其他同志的火力掩护下匍匐前进。就在他把黄忠运同志的遗体从敌人的枪眼下抢夺出来时，他也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同志们以火力杀伤敌人之外，还向敌阵地投下了几枚手榴弹，但都没有投进敌人的堡垒。同志们连续发动几次冲锋，都没有能够消灭敌火力点，解决战斗。而另一位中队长黄青龙同志却受了重伤。黄青龙同志是一位勇敢善战的优秀轻机手，在日常生活中或在部队的联欢会上，经常表演拳术或刺刀操。他有一套技艺，作风又好，同志们都很喜欢接近他。受伤后，同志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从火线上抬下来，并迅速送回部队抢救。但因流血过多，黄青龙同志终于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前，他对守护着他的医务人员和领导同志说：“我为党的抗日事业而牺牲是光荣的。请领导同志和同志们不必难过。我唯一不安的是，为党工作得还很不够。我始终相信党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日本法西斯一定会被打倒！”最后他握着领导同志的手，用微弱的声音喊出“马来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便和同志们永别了。这场战斗中光荣牺牲的三位同志生前都打过十几次仗，经验丰富，屡立战功。他们的牺牲对七独是一个重大损失，但他们的英勇行为和战斗风格教育了同志们，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留在同志们的记忆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同志消耗了1千多发子弹和几枚手榴弹，仍无法解决战斗，而天已大亮，继续打下去极为不利，指挥员便下令撤退。同志们互相掩护，安全地脱离战场，背着两位战友的遗体回返营房，这一场战斗，是七独进行的攻坚战中最激烈的一次，也是唯一没有取得胜利的一次，而且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牺牲了两位中队长和一位战士，损坏了一挺轻机和一支来福枪，消耗了

大量弹药，敌人却只被我们打死打伤了5个。这一仗之所以失利，根本的原因在于错过了极其短暂的有利时机，让处于被动中的敌人反而取得了主动。当时如果坚决贯彻快打猛冲的战术，在敌尚未清醒过来时就冲进去，以枪口和刺刀直指他们的胸口，迫使他们乖乖投降，他们胆敢抗拒，就全部予以歼灭，肯定能取得全胜。可是指挥员却在刚打开有利局面时忙着喊话，结果反而让敌人有机可乘，组织反抗，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

班正警局虽未能攻克，但担负警戒关丹路的一小队同志却打了个漂亮的战斗。这个小队的任务是打敌人从关丹来的援兵。班正警局的战斗打响约半小时之后，两辆敌军车载满敌兵进入这一小队的伏击圈。同志们以猛烈而准确的火力把前面的一辆打翻栽下山沟，全车10几个鬼子兵不死则伤。第二辆轮胎被打破，前进不得。车上的10几个鬼子兵见势不妙，纷纷跳下车来，趴在路边沟旁，进行顽抗，双方驳火了半个多小时，由于敌人处在死角，不易歼灭它。在班正的战斗已经结束，部队安全撤退后，这个小队才撤退，同志们胜利地完成打援任务，凯旋归营。

美昔拉和巴罗这两个离关丹只几英里的海滨小镇，居民主要是马来同胞，也有部分华族胶工和渔民。马来甘榜中有了一个反动村长兼地主恶霸，卖国求荣，充当日本的走狗，经常将抗日军的活动密告敌人。我军屡次对他进行宣传，他仍顽固不化，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这对七独在这一个地区购买食盐和咸鱼的活动是一个严重障碍。当时包括农场在内整个牙姆山抗日根据地同志和群众所需的食盐和咸鱼，主要靠这一地区供应。于是，七独司令部作出了进攻美昔拉和巴罗两个日伪警察局，警告这个怙恶不悛的村长以及宣传马来群众的决定。

班正战斗后不久，两支精干的战斗队从牙姆山向东挺进，直奔美昔拉和巴罗，以迅雷不掩耳的奇袭战术，在不同时间内分别攻下这两个日伪警察局，缴获13支来福枪和数百发子弹。与此同时，队伍一面派10几位同志包围反动村长的屋子，严正警告他，若不停止罪恶活动，将受到严厉惩罚；一面派同志到甘榜展开抗日宣传。马来同胞对我军的奋斗目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情和支援七独的抗日活动。从那以后，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年多里，七独和革命群众购买食盐和

咸鱼工作顺利多了。在当地华族和马来族群众的掩护和协助下，每次都派二、三十人的运输队去，把大批食盐和咸鱼挑回牙姆山。

丁加奴州的万立地处偏僻的山区，交通又不方便，从林明走山区需要两天才能到达。那里有一个矿场，矿工多数是华族同胞。为了把他们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七独派出一个由3位同志组成的民运工作组到那里去开展工作。民运组受到当地革命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局面迅速打开。群众一再要求拔除当地驻有10多个警察的日伪警察局。七独司令部接受了这一要求，派出一支战斗队轻装前进。一个夜晚的下半夜，在3位民运同志的配合下，队伍隐蔽地接近该警局，在敌人尚未来得及反抗时，就把他们制服了，缴获8支来福枪和几百发子弹。有4个伪警察没有住在里面，所以没有缴到他们的枪。这一胜仗，压下了伪警察的嚣张气焰，群众无不扬眉吐气，热烈赞颂抗日军，他们捐献了不少款项、粮食、布匹和药品，以表达他们敬仰抗日军的心意。革命群众坚定的抗日立场，他们衷心拥护抗日军的盛情，有力地教育和鼓舞了七独的全体指战员。

十、红旗插遍东彭和丁加奴

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和战斗在祖国各地的其他各兄弟独立队一样，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严峻的战争中越战越强。全体指战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排除万难，把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打得晕头转向，狼狈万状。尤其是1944年底和1945年初，抗日战争在全国各地广泛深入地发展，抗日军更加扩大了，抗日后备队也迅速壮大起来，成为抗日军的得力助手。

日寇投降前夕，东彭地委会、七独司令部和出版机关从牙姆山总部营房搬到莪泰山芭边一临时营地，以便更直接更及时地指导对敌斗争。当时的斗争形势变化异常迅速，同志们日以继夜地进行着紧张的工作。在日本法西斯临近最后灭亡的大好形势下，抗日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扩大。这时，不但抗日群众组织(如

抗日同盟会)的参加者大大增加，而且连日伪警察、保乡团、维持会的头目们也纷纷向抗日组织靠拢，敌人的阵营分崩离析，众叛亲离。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彭地委会和七独司令部获悉这个消息后，通过电话命令关丹日本宪兵部24小时向抗日军缴械投降。敌人在同我方举行的谈判中，百般抵赖，胡搅蛮缠，使谈判长达4个小时。可是，谈判后几个小时，敌人就在凌晨从关丹偷偷摸摸地撤走。丁加奴州的鬼子也灰溜溜地乘船从海路溜走。七独司令部早就料到鬼子这一招，连夜派出30多位同志开到甘孟拦截逃走的鬼子兵，并接管当地政权。与此同时，命令关丹市郊的抗日后备队暂时维持关丹市区的治安。紧接着派出30多位战士在一位司令部同志的率领下，分乘3辆卡车，雄赳赳地开进关丹市接管政权，并四处张贴早已用马、华、印、英四种文字印好的党、七独司令部和抗日同盟会联名发布的关于接管政权的市告。至于从关丹撤走的150多个鬼子，当他们逃到而连突时，被六独的同志截住，只好退回关丹。进入关丹的同志们一面作好战斗准备，一面警告鬼子，不可轻举妄动。后来，鬼子不得不接受七独司令部的意见，暂时住在关丹一个指定的地点。

在极短的时间内，七独派出1支劲旅接管东彭和丁加奴州各大小城镇的政权，进驻各地的日伪警察局，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些日伪警察事前将枪架好，抗日军一到，就举行受降仪式。特别是班正警察局在1944年初七独进攻后，敌人增派守兵达30多人。这批家伙深恐遭到抗日军的严厉惩罚，早就作好投降的准备。这样，抗日军很快就从日伪手里缴获机关枪、来福枪等各种枪支达五、六百支，子弹数万发，各种物资不可胜数。各地群众兴高采烈地以各种方式热情欢迎抗日军。党旗、军旗到处飘扬。学校、商店、机关和家家户户都挂上红旗，关丹市商店里的红布都卖完了。街头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游行浩浩荡荡，红旗招展，真是雄伟壮观。在欢腾的鞭炮声中，群众不断振臂高呼：“抗日军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万岁！”、“马来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舞狮队、乐队，以街头为舞台，公开演出。各抗日群众组织还联合演出了有革命内容的戏剧，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接管政权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包括各抗日组织、各族革命群众代表等组成的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人民委员

会发扬民主精神，诚恳为人民服务，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时，党成立了公开办事处，青年团和各行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公开成立，以动员和团结各族各阶层人民，投入维护人民政权的群众运动中去。在革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为了巩固人民政权，首先进行了镇压和肃清敌奸走狗的斗争。关丹地区逮捕了40多个充当鬼子忠实走狗的反革命分子，由党、军、抗日同盟会的代表和各族进步人士联合审讯，经过整整一天的审判，最后一致同意将其中8个血债累累的走狗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其他的则按情节轻重分别加以处理。这一判决大快人心，各族群众热烈拥护，并深受教育。他们从党的实际行动看到了我党我军处事慎重的作风，并赞赏我党对反革命分子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同志们对市镇的管理都很生疏，接管了一个地方要解决的问题一大堆，真是千头万绪。尽管这样，同志们还是把主要工作都抓起来了，既保证日常必需的水电和通讯联络畅通，以及卫生设施完好，也迅速恢复了各族语文学校，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各族工人的生活，尤其是对丁加奴州的马来族工友，不仅关心改善他们的生活，还加强对他们的阶级教育，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此外，还释放了被鬼子监禁在各地监狱的爱国志士和几百名无辜群众，对一般刑事犯如小偷等也酌情处理。被释放者如无路费或经济有困难，还给予必要的照顾，让他们能尽快回家，并在回家后能恢复生产。各族人民特别是劳苦群众对党的一系列正确措施都倍加赞扬。

三年八个月中，七独同志们严明的纪律，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抗日军掌权期间，社会治安特别好，强盗小偷销声匿迹，各族同胞钦佩不已。从山芭进入城市，是个巨大的变化，但同志们牢记党的教导，始终保持部队紧张严肃的战斗作风。每天清晨的喇叭号音唤醒了部队驻地附近的群众，同志们在大街上跑步的整齐步伐声吸引了许多青年，他们都热切要求参加抗日军，有时，同志们还在下午和当地群众团体的排球队举行友谊赛，促进军民关系。

“九·一”烈士节这一天，关丹举行了隆重严肃的纪念大会。会场正中，树立着“九·一”革命烈士碑，四周挂满了党、军、各抗日组织、各群众团体献给“九·一”烈士的挽联和花圈，与会者追怀烈士们的英雄事迹，控诉了敌人的血腥暴行。在东彭和丁州，三年八

个月的激烈斗争中，有十多位英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深受党、军同志尊敬和爱戴的地委常委萧民同志在战争初期因关丹的敌奸告密而被捕，坚贞不屈、死在敌人的屠刀下。萧民同志是一位老党员，割胶工人出身，负责过关丹特支书记和彭亨、丁加奴两州地下工会主席。地委会成立之后。一直担任常委，他的牺牲是我党的一个重大损失。邱英华同志是党在战争中期从西彭调往东彭参加宣教工作的一位干部。他在即将抵达目的地前，于漆黑的夜晚强渡峇都沙化河时，不幸被激流冲走而光荣牺牲。追悼大会是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课，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同志们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为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奋勇前进！

三年八个月驰骋在东彭和丁加奴州辽阔土地上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七独同敌人作战近 100 次，在战斗中缴获各类武器约 300 支，包括日寇投降后缴获的五、六百支在内共达八、九百支，子弹 10 多万发，歼灭日军、伪军、警察、敌奸走狗等近 1 千名，伪警察弃暗投明带枪起义的有几十人，带来了轻机、来福枪等几十件武器。而七独只有 7 位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两位同志被日寇逮捕后英勇就义，4 位同志因意外事故光荣牺牲，其中一位是试炸手榴弹时牺牲，两位是在茫茫黑夜里强渡峇都沙化河时被湍急的河水冲走，另一位是吃错药。这样共有 13 位同志为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把自己鲜血洒在祖国的大地上。在党的领导下，七独全体指战员和革命人民点燃起的抗日战争烈火映红了我们东海岸的天空，东彭和丁加奴州抗日军民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立下的不朽功绩，像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东海之滨！

原载《马来亚风云七十年》

第四篇

抗日英烈

一 马来亚工人阶级杰出 领袖白衣同志

(1911 年—1942 年)

华茵 王水

白衣（原名李良，曾用名李雪峰），出生于广东省台山。

白衣是马来亚工人阶级杰出领袖；反帝、反殖，抗日运动的英雄，他把一生贡献给正义事业，历尽艰辛，壮烈牺牲！

白衣出身贫穷家庭，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很小就到马来亚谋生，他很少对别人谈起家事，因此知道的人很少。

白衣和新加坡第一个建筑工会

新加坡建筑工人中不少是台山籍，白衣同建筑工友相依为命，深刻体会到工人阶级的痛苦、失业、过重的劳动、高利贷，使这位个性强、富于反抗性格的青年工人很快就同那些在工人中进行反帝、反殖民主义宣传的先进分子结成知交，并积极参与各种进步的活动。

由于他本身就是工人中的一员，勇敢，好打抱不平，关心工人兄弟疾苦，很快很自然地得到工人们的拥护。他在工人中积极宣传组织工会的好处，启发工人认识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因而新加坡第一个建筑工会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并进行了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胜利斗争。

建筑工人斗争的初步胜利、大大地鼓励和推动了新加坡、马来亚各地各行业工人运动。

建筑工人和他们的组织——新加坡建筑工会在历次反帝、反殖，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饮水思源，缅怀先烈，直到

半个多世纪后，一些老工人还怀着深情回忆着这位个子不大，皮肤黝黑的自己的领袖！

白衣在吡叻矿工中

马来亚吡叻州是著名的锡矿产地，矿工人数众多，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待遇低微。一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当时一些人无法生活，连金山沟的木材也锯去卖。抢劫的恶性事件也不时有发生，人心惶惶。小市镇的商铺也关闭了，或迁到别地求生。殖民当局甚至把年老工人遣回中国，推卸责任。

为维护工人的权益，白衣来到吡叻。他首先在布先——端洛这个矿山集中的地区。同胡天保(即陈路)等深入工人中耐心宣传，克服巨大的困难，把第一个矿业工会建立起来。当时定名为《矿业工友互助会》筹委会。由于英殖民当局的破坏，阻挠，长期不予注册。白衣等工运人士采取充分发动，组织工人展开同当局合法合理的斗争，终于在1940年底才获批准注册。当时入会者已达两万多人，连家属达到五六万人，分会和办事处遍设全吡叻州各地，声势浩大，气氛热烈。

工会成立那天，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各地还设了分会场以电话传达总会场情况。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也发来快邮代电，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为况之盛，在马来亚史上也是罕见的！

1940年“五一”劳动节——新加坡五万工人 示威游行，罗良助、梁清点二烈士被英帝枪杀。

1940年春，为了筹备“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白衣被调来新加坡担任总指挥，他同战友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考虑到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充分相信自己阶级兄弟的力量，果敢、镇定地领导了这次重大的示威游行。当时要在英帝国主义戒备森严的条件下，组织和领导这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实在不容易。但广大的工人群众，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在“五一”这天，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

行的群众超过五万人，他们人人手持木板扎成的标语牌，从四面八方拥向惹兰勿杀大草场，准备暴力镇压时进行抵抗。此外，在游行经过的马路，也准备了大量的玻璃瓶、石块等，如遇到挑衅，工人就狠狠迎头痛击。五一前夕，殖民当局也大肆准备，除了百般恐吓工人群众之外，还动员了星洲全部警察和驻扎在星洲基地的一部分军队，还从柔佛长堤那边调动大批警察来参加镇压。“五一”一早，当游行队伍通过芽笼路时，街道人群拥集，口号声震天动地，五光十色的标语牌汇成一条巨龙。“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兄弟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大战”“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开放民主自由”“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整个狮城怒吼起来了，像春雷响彻大地，人们的热血在奔腾，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游行队伍在前进。

很快军警已经在路上布下了路障，警察荷枪实弹，截阻群众，游行队伍被挡住了，不能前进了。英帝强令游行队伍要解散，几经交涉，双方相持不下。军警便殴打工人，特别用野蛮手段对付女工，分段截击，企图把游行队伍割成小段，各个击破，引起群众更加愤怒，双方随后发生了正面冲突。这时警棍乱舞，很多任务人被打伤了，头破血流。群众以牙还牙，用木棍，汽水瓶、石块当武器与英帝展开搏斗。英帝竟然开枪向群众射杀，两位染布工友——罗良助和梁清点当场中弹光荣牺牲。

五一大示威游行，锻炼了全马的工人阶级。全马的工人兄弟踏着罗、梁烈士的血迹，奋勇地继续战斗前进。

1940年星洲的“五一”大示威斗争，在马来亚工人运动历程上留下了光辉的史诗，也在马来亚人民反帝斗争的史册中写上灿烂的篇章。在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斗争中，白衣又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

白衣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顽强地学习。在他非常简单的行李中，书本是少不了的。一些经典的革命著作他是反复研读，并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因此他在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时都具有明确的原则性，既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例如，他毫不犹疑地在工人中把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筹集救国捐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暴行，支持司机工友回中国参加抗战服务等等，同争取工友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圆满地，全面完成了任务。

他废寝忘食，不畏艰苦，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崇高品德使周围的工人兄弟、战友们永志不忘！并理所当然地得到大家衷心的拥护。白衣于1942年4月中旬被大西队逮捕后，先后关于东陵宪兵队及四排坡监狱D Hall，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时是马共中央常委。

白衣烈士永垂不朽！

（取材自《血碑》增补本编辑委员会编——《血碑》增补本）

二 星华抗日义勇军总指挥、 传奇性烈士林江石

大 礼

在《血碑》一书中，虽有李菲写的《忆林江石同志》一文，但内容十分简短，略而不详。多承热心的过来人好意寄来资料给我补充，让关心的读者们，有更多了解。

用假名隐蔽自己身份

林江石，是当年新加坡抗日运动中，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英军节节败退中，他是参与领导新加坡人民起来反抗日军侵略的一名马共代表。老一辈的人，如果脑力还好，相信会记得，他的名字比当时的林谋盛还广为人知，后来两者都先后牺牲于日治下的苦牢。他实在并非姓林，全名都是假的。林江石是他在自己被英殖民地政府逮捕时，随意虚报的。不过，他却有一段传奇性的经历。

马共的成员，常因所干的是地下工作，大都使用假名或绰号，以隐蔽自己的身份，使追踪窥伺的特务，混淆不易侦查。有的名字更是滑稽：如“江水”又名“陈水鸭”，“黄世锐”又叫“小王八”，“邱联杰”绰号“阿Q”等等，不胜枚举。可能所有名字，都不是双亲生下时所给的原名。

原名黄伯遂的林江石，1916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增城县，是家中的独子。他出生后，父亲黄某，南来到马来亚吡叻州谋生。后来回乡探亲，遭土匪绑架，勒索赎金不遂而被害。他母亲骆洪便带同小伯遂，到吡叻州布先埠，寄居亲戚家中，自己到琉琅潭（锡矿湖）洗琉琅（淘锡米），以维持母子生活，并送儿子到育志小学校念书。小伯遂聪明又用功，屡试名列前茅。毕业后，到怡保育才中学读初中。但家境贫

寒，被迫停学，到锡矿场里当“行江”（“行江”是矿场中负责买办、供应等事务的职员）。

热心参加抗日运动

小伯遂虽然失学，工余之暇仍然努力学习，不但自修完中学课程，英文也学得不错，可以应付普通的会话。他天生多才多艺，不但是名篮球健将，而且会吹喇叭、吹口琴、弹钢琴和拉小提琴，还擅长唱歌(包括山歌)和演戏……获得青年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各地华侨都群起声援，展开救亡运动，从事筹赈工作。布先虽属小埠，也不例外。林江石更热心帮忙宣传与组织等事务。常在两三千人的集会中，登台演讲。演讲深入浅出，得到群众一致的赞扬，说他讲得有道理，而且大家都听得懂。

他号召人民，不论工、农、商、学，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达到救国救亡的目的。

原来他任职的矿场老板，也是爱国人士的一员，被推为筹赈会会长。老板对他十分倚重，特别多请一个人帮忙，减轻他在矿场中的工作，让他能多为抗日救亡运动尽力。于是他把一切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不但锻炼了自己，还提高了领导的声望。

首批被释放成员之一

约于1934年或35年入党的他，当时已是吡叻州的地委，后来更被选入中委。1939年被调到雪兰莪州任地委书记，1940年转派到新加坡，任市委书记。

1941年3月，林江石在新加坡被英政府逮捕，罪名是参加非法组织，而且是马来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随后提到法庭审讯。他在上庭的时候自我辩护，不顾法官的反对，公然在庭上发表政治性宣言，阐明马共联合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政策，并抨击英国政府镇压行为的不当。说得义正辞严，使旁听者动容。报章也如实报道，传扬各地，轰动一时。虽然法官下令罪名成立，判他入狱半

年，但林江石的大名，却从此不胫而走了。我也是由这则新闻中开始知道有马共的组织。

1941年12月8日，日寇南侵，英军节节败退，局势危急。英政府不得已，才应允侨团各界人士的要求，协议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而各州都把被监禁的马共政治犯释放出狱。林江石是首批被放出来的成员之一。出狱后不但获得工团和各界人士举行盛会热烈欢迎，还在12月28日应邀，与陈嘉庚及各侨领一同出席总督汤姆斯爵士在总督府举行的招待会。

“昨为阶下囚，今成座上客”，正好是当时的写照。

那次官民间的晤谈，促成了星洲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的成立。该会设置了：劳工服务总部、宣传、保卫、民众武装等各部门。林江石，被推选和民众武装部主任。

当时，除了和他同狱的少数同志，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之外，好多较低层，或远在他州的成员和群众，都不知道林江石究竟是谁。后来才知道他是“老黑”黄伯遂，都不禁啧啧称奇，十分惊讶。

青训班四个分队总领导

老黑是林江石的绰号，因为他生得皮肤黝黑，同志便开玩笑，叫他老黑或亚黑。当年，我曾多次见过他并听过他演说。他的肤色的确很黑，而且带点炭色。虽然牙齿洁白，却又不像非洲或美洲黑人。演讲时，态度诚恳，词语平易近人，使人乐于接受和信服，却不如林亚当的激烈、狂热以及具有更高的煽动性。

武装部成立后，招募义勇军的行动开始了。我们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们，当时不但尽力到各处宣传，还协同招募的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大坡大华戏院对面，曾招募到一批爱国青年，并带同他们到“南师”入伍（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当年是义勇军的总部）。

原来，林江石，也是我们青训班四个分队后期的总领导。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不时抽空到来巡视和指导。

有一次，某些队员因班中缺少经济的支持，伙食变差变坏而不习惯。他知道后，便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有心去打游击，就要经得起

锻炼!”接着还告诉大家他怎样自奉俭朴，踏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到各地执行任务等种种经历，令大家敬佩和信服。

新华义勇军虽然获得热烈响应，而招募到两三千人，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发枪械。几经要求，到了狮岛变为孤城，危在旦夕时，才送来枪械。我清楚地看到那穿着深蓝色义勇军军服的勇士手持的一把猎枪，是单管的、最落后的一种，我相信没有记错。我是特意走前去，仔细观察过的（有人却说是双管的，可能两者都有吧）。

苦战多日不免败落

这些装备如此落后的义勇军，誓师出发了。在“南师”操场上举行的盛大群众欢送会上，林江石和林亚当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那使人热血沸腾的大会的情景，使我永难忘记。这一切都在我于1987年1月3日，发表在联合早报《文艺城》的一篇长文《我是青训班中的一员》内详述了。原文亦载人拙著《沧桑怀旧录》一书中。

这满腔热血、抗日卫国的义勇之军，因为训练不足，配备奇差，且由无能的英军军官指挥，虽然大家奋不顾身，苦战多日，终不免败落，蒙受惨重的牺牲，令人痛惜！

2月12日，当知道英军当局准备弃守时，林江石除了加紧安排军中同志撤退的事务之外，自己也匆匆转入“地下”，辗转在后港三条石、六条石等处东躲西藏，以逃避敌人的缉拿。那时新加坡已完全沦陷了。不久后，残酷的肃清大检证进行，林江石和几位同志也排在检证的行列中。他装扮成普通劳工，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虽然日寇在检证时，特别指名要找林江石、林亚当、陈嘉庚等知名人物，他却庆幸能安然闯过被检的险关。

带着手铐越窗逃狱

后来，更联同一些女同志，装扮成一家人，搬到芽笼29巷的一处椰园亚答屋。以为比较安全，却依然躲不过敌人的搜索。一天晚上，在深夜的群犬猛吠声中，他逃出屋外，却在黎明时被日本宪兵逮住。

老黑被押到东陵宪兵部，暂被拘禁在一间洋房候讯。他看到房中天花板上有一扇窗，便在深夜时，攀上去逃出室外。带着手铐的他，竟被日本宪兵发现了，急忙加紧追捕。他拼命狂奔，后来跳进一道大水沟里，逃离搜索，再躲入一个荒凉的墓地，把手铐敲断。然后，找到了一处群众之家，又一次逃过劫数。

4月中旬，他和林亚当、邱俊杰（联杰）三人，在乘坐“舢舨”，准备渡过柔佛海峡时，却不幸被叛徒出卖而再度被捕。捉拿他的不是别人，而是凶残、狡狴的大西觉宪兵部队的成员。他们气恼于他的越狱行为，不但在扣押的时候，沿途毒打，回到宪兵部里拷问，更是刑杖交加，而且把他的手和脚都铐住，直到死亡。

和他同时被捕的同志，在重刑之后，也都奄奄一息。后来一起被转送到四排坡欧南监狱的 D Hall，最终都病死于狱中。

狱中遗诗表露悲愤情怀

林江石牺牲于 1942 年 7 月 18 日，年仅 26 岁。

在 D Hall 的狱中，好几位战士，包括黄诚，都写有遗诗。林江石也作了一首七言绝句，由《自由报》钢板手陈亚贵(又名陈秀朗)传达出来。但第三句，却记不起而缺失。诗如下：

奋身投入血阵中
遍体鳞伤碧血红
X X X X X X X
昔年威武逝如风

《血碑》书中，这首诗只印出第一、第二两句，很不完全。最后一句，是另一位有心人最近告诉我的。他说他记得最后一句。因为，我们从他过去的表现和经历，都深知他是位刚烈、坚毅、勇敢的铁汉。而且，据说他在民众武装部任职时，曾由英军配给大型左轮手枪一把，却被党中央认为带着易于暴露身份，在他转入地下活动时把枪没收了。

他曾在逃过第一次在芽笼被捕后，对其同志说：“如果当时我有手枪在身，我可以用枪还击，便不致被捉了。”

可以想见，他在手脚都被锁紧后身受重刑时，产生出来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不是悲观，而是悲愤！

殉难后不知埋葬何处

因此，我特别在此尝试大胆为他补入第三句：“手无寸铁难言勇”，让全诗完整，表达出他当年手无寸铁、有志难伸的心态。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据说，他虽然被折磨到不能行动，不成人形，但仍然意志坚定。他深知自己身居党中要职，如果不作叛徒出卖同志，并透露党的机密，日寇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自知难逃一死，却宁死不屈。为求早日解脱，虽然仍在病中，却把日寇假仁假义送来的治疗药品，全倒入马桶之中。

于是，抗日烈士殉难了！却不知遗骸埋葬何处。

（又记：老黑的妈妈，曾在早年为他讨了一名童养媳，准备为他传宗接代，但他不要，只把她当作妹妹。后来他和一位陈姓的女同志结合。他的爱人，当年是在新加坡被英政府逮捕入狱，而在牢中产子。儿子名叫仇英，又叫囚婴。现居住在广州。那么，英雄有后了！）

注：此文曾发表于1997年3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上。

三 德才兼备、最有威望的领导者

——张元豹（黄诚）烈士

黄 明



黄 诚

张元豹(1913—1942)，化名黄石、黄诚，系福建省仙游县城东乡宝峰村土寨自然村农民张庆云之长子，自幼沉默寡言，性聪敏，爱好音乐，擅长胡琴。

元豹从小学到初中毕业皆为班上优秀学生，曾先后在县城南门内圣公会所办的培原小学和县立中学念书。1929年，元豹因家贫，无法升学，乃到仙游县东乡折桂小学执教。就在这时，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和反帝同盟会。

次年，元豹又受聘于赖店中心小学执教，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正式加入党组织，成为中共党员。这时，张元豹根据党组织决定，结束了教书生涯，离开家乡到莆田专职从事革命斗争，后来又调返仙游任县委委员，县团特支书记，积极开展工作。1934年初，张元豹调往莆田，任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莆田、仙游两县的共青团工作。同年4月底，因中共福州市委遭破坏而被捕，后趁敌不备，机智脱险，逃亡新加坡，辗转马来亚吡叻州打巴埠一华侨小学任教，并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

1936年，张元豹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成为马共优秀党员。他经常写革命文章，发表在新加坡陈嘉庚办的《南洋商报》上，得到马共中央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张元豹担任马共中央委员和《星洲日报》驻吡叻州特约记者，积极撰写文章抨击日本侵华暴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张元豹后来和一女同志（他的学生，祖籍广州）结婚。

1941 年底，日寇占领了马来亚、新加坡，张元豹因身患肺病，未能参加马共组织的抗日游击队，留在新加坡从事地下革命斗争。1942 年，张元豹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星洲四排坡 D 号监狱中，受尽严刑，坚贞不屈，不久在狱中壮烈牺牲！

作者：黄明（前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

编者按：

（一）我们非常感激黄老先生在 83 岁高龄时为本书写了这篇珍贵的文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得到的有关黄诚同志的最准确、最详尽的资料。

（二）黄诚同志牺牲时是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三）黄诚同志的夫人李明，同时被捕、坚贞不屈被日寇判刑十五年，1945 年 9 月 5 日出狱。于 1994 年辞世。

（取材自《血碑》）

四 悼念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领导人许庆彪同志

何雪梅

许庆彪同志，槟城人。他出生于小康家庭，在华文初中和英文七号位肄业。他年青的时候就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成为战前槟城学运的优秀干部。1938年入党后，就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而斗争。他热情奔放，浑身活力，喜爱音乐，长擅演讲，是当时在槟城蓬勃开展的抗日运动的活跃分子，特别是对当时的抗日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40年2月2日，在槟城爆发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他是这次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斗争中表现英勇顽强。“2·2”事件后，他被调到星洲负责学运工作。1941年12月，南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在这个紧急的历史关头，党及时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经过我党的极力争取，英帝终于同意协助开办训练我党军事干部的“101游击学校”。被党调去受训的第一批同志是星洲的十五个干部，庆彪同志是这批同志的核心。结业后党就派他们到雪兰莪州会同当地同志筹建武装部队。

1942年1月，有史以来党所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在雪兰莪州北部沦陷了的双文丹光荣地成立了。这是党在我国土地上所树立的第一面武装斗争的光辉红旗，庆彪同志是第一任司令部党代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是一个充满伟大战斗的地方，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庆彪同志站在几十个穿着各种衣服但具有一颗红心的同志面前庄严宣布：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成立武装部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第一独立队成立后，接着就同其他兄弟队一起，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庆彪同志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藐视敌人，藐视困难。战争初期，雪兰莪州的环境非常动荡，工作上也碰到许多困难。他英勇坚定地领导队伍勇往前进，胜利地发动广大群众，开辟革命地盘，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庆彪同志有着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有着高度的责任感，热爱工作，关心工作，不分昼夜地执行党的任务，他在一个新的极其紧张复杂的处境里，负责处理部队、民运、宣传出版、同各方面联系等等许多问题，经常工作到深夜。

庆彪同志关怀战友，对同志和群众有高度的革命感情。他对于同志们的身体健康和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难，总是表示亲切的关怀，并设法帮助解决。他对于革命战友的高度热情，成为推动同志们去战胜困难的一股巨大力量。

第一独立队成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征服了重重困难，不但把队伍初步建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使队伍扩大了两倍多，而且开辟了一个相当广阔的革命地盘，使之成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基地，庆彪同志的领导获得了重大成就。庆彪同志对第一独立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2年8月31日傍晚，庆彪同志带着病弱的身体，扶着拐杖来到石山脚农村，准备召开中央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地点。第二天——九月一日的清早，发生了“九一”事件，庆彪同志同其他一批同志，同敌人英勇搏斗后，倒在血泊里，英勇地献出了年青而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1岁。

1972年5月15日

（取材自《马来亚风云七十年》）

五 日寇屠刀下忠贞不屈的 林亚当烈士

刘来芝、黄马顺、郑开兴、林一叶 供稿



林亚当

林亚当，男，原名金惠余，祖籍福州，曾在阿罗斯打华侨中学读书，续至槟城钟灵中学读高中，毕业后，考上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再回华侨中学教英文。亚当早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机敏过人，勇敢沉着坚定。任英文教师时，已是马共吉打州地委会委员，为了不暴露身份，从不直接参加公开的抗日救国活动，而是在秘密的党组织内，逐级领导与布置抗日和反对殖民统治斗争的工作。亚当个性斯文沉静，衣冠整齐，彬彬有礼，有学者风度。

1940年，由马共中央调往新加坡市委会，并被选任马共中央委员。在他领导下，新加坡的抗日救国和工人运动，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初被英帝逮捕。同年12月8日，日军侵略马来亚，英帝近12万军队，不堪3万日军的冲击，迅速败退，兵临城下，火烧眉毛，英帝被迫接受马共提出共同抗日的主张，释放林江石（老黑，原名黄伯遂）、林亚当、陈锡清等被监禁的共产党人。亚当出狱后，积极协助林江石筹办组建星华义勇军，向英政府联系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等事宜。1942年2月12日，星华义勇军被英帝下令解散，亚当又协助办理人员遣散、枪械埋藏，组织撤退等等善后工作。

2月15日，英军无条件投降，日军占领新加坡全岛，3天后就开始大检证、大逮捕、大屠杀（全岛华人被杀约5万人）。亚当避往北部郊区农村一带，全靠革命群众掩护转移。4月底，日军对柔佛海峡的

警戒巡逻稍为宽松，江石和亚当从军港附近偷渡海峡时，却在海上被日军截获。他们被关押在欧南路监狱 D Hall。

亚当和江石都受到格外的严刑毒打，被打得体无完肤，伤势特别沉重，加上另一马共中央委员黄诚(黄石)，3 人脚上都加了铁镣，走路也很困难。吃的只有木薯、番薯、老菜叶和少量粥水，住的地方很肮脏，满是臭虫蚊蝇，又不给洗澡，周身血污汗臭。在野蛮的残酷折磨下，亚当（7 月 31 日）、林江石（7 月 8 日）、黄诚（8 月 9 日）都先后在狱中病逝。

亚当和江石等优秀的抗日反帝英勇战士，在敌人屠刀下忠贞不屈，刚强坚毅，显示出马来亚人民的高风亮节。诚如文天祥所吟：“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取材自林一叶编纂《浩气永存》）

六 抗日优秀干部赖来福

亚 敏



赖来福

来福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37 年了，但他那光辉的英雄形象总是生动地、色彩鲜明地闪耀在我们的眼前。他原是马来亚反帝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干部，又是开展英国重要产业部门——铁船(现代化淘锡机)工人组织的突击手，也是一位有指挥才能的军事干部。最后，他终于以“大汉山崩于前而脸色不变”的英雄气概，为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来福同志原名杜龙山，1922 年出生于霹雳州实兆远力乔区。幼年在实兆远中正学校读书，后来进南华中学。就读期间，1937 年，中国“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马来亚共产党派黄诚等同志，利用公开形式到南华中学进行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宣传，广大学生都受到教育。当来福同志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他就坚决地站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并成为当地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

在马来亚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几年中，来福同志不断受到马共的教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在南华中学毕业之后，他不求个人出路，除了当一家报馆的通讯记者作为社会职务之外，全部时间都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从此，他走上了光荣的革命道路，并于 1939 年成为一位光荣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

1940 年，他毫不犹豫地接受马共组织的调动，到霹雳州南区任区委书记，负责金保至丹戎马林一带的文化、学生和胶工组织的工作，经常独自乘自行车到打巴、三宝岭、美罗、仕林河、丹戎马林等地的

学校、胶园，检查和布置马共和抗援组织的工作。来福同志不仅会写能讲，而且晓弹善唱，多才多艺，幽默开朗，联系工作夹上谈心，严肃之中带着轻松，所以不论有无参加组织的老师、工人，对他都很钦佩和亲热，感情都很融洽。他工作积极，吃苦耐劳，每月只领组织发给的不到6元的生活费，生活相当艰苦，工作却很勤奋，到处奔波，永远不知疲倦。

1941年，马共组织决定调派来福同志打进英资的督亚冷锡矿铁船当工人。锡矿是英国在马来亚非常重要的产业部门，英国垄断资本家从铁船工人的血汗中榨取高额利润。来福充分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毅然决然地负起党组织给予的艰巨任务，投入工人行列，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为一个坚强的体力劳动者。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家里生活也过得去，但由于他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因此经受得了繁重劳动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与考验。

来福同志作风好，和工人打成一片，同吃、同睡、同劳动，在工作上又有魄力，有方法，会说华、马、英几种语言。因此，在短短几个月中，就把区内几艘铁船上的各民族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了铁船工会。但是，由于英国当局对重要产业部门控制很严，工会的注册不易获得批准。他的工作扎实深入，除了发动组织工人之外，还培养了一些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把他们吸收进马共组织里，在铁船工人中建立马共基层组织。在这些新的党员中，有一位是后期马共中央的领导人——拉昔·迈丁，当时他是督亚冷区一家铁船的技术工人，经过来福同志的教育和介绍参加了党组织。

正当来福同志把革命种子传播到英国重要产业部门，并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的时候，不幸发生了意外。有一天，马共霹雳州地委书记黄志锐同志和来福同志等举行会议；会议地点被英国军警团团围住，与会人员全部被捕。在牢狱中，来福同志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崇高和伟大气节，丝毫不向敌人屈服。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马共据理力争和群众压力下，英国殖民当局迫于抗日新形势，从1941年12月20日开始，释放在狱中的政治犯。来福同志被释放出狱，于23日，参加双溪古月会议，会后和黄国平等共30人，由马共中央抽调到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学习。训练

开始之前马共中央原宣布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队长是赖来福，党代表黄国平，之后，又通知两个职务对调。同期学员中来福的英语最好，所以除了紧张学习之外，还担任翻译和代表“二独”与校方联系，其他学员听课不清楚，得劳他辅导。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原则性强。临结业时英军发给学员武器又少又旧，来福向校方交涉，动员队员拒绝参加校方欢送宴会，终于争取到增加供应武器弹药。

赖、黄两人带领武装学员北上，因雪兰莪州已沦陷，遂留在森美兰州开展抗日斗争。由于遭受多次挫折，未能联系上森州地委，半途暂藏的武器丢失，进攻瓜拉庇拉警局以夺回武器的战役失利，粮食、医药供应困难，几十位战士饥病交加，1942年5月30日，马共中央召开中南马党、军会议（柔北三合港会议），暗藏的内奸、叛徒莱特以上述挫折为借口，责令解散“二独”，提出“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联军反攻”等谬论。来福同志受此双重压力，形势严峻，却明确武装抗日大方向，坚定立场，争取“二独”司令部全体成员和森州地委的一致支持，领导全体战士克服困难，坚持艰苦对敌斗争，结果保存下来的“二独”，在两个月后，又得到马共中央的认可。同年七月，来福同志被调到霹雳州，任第五独立队队长。

在抗日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马共中央决定于1942年9月1日在距离吉隆坡西北九英里的石山脚举行第八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之外，还有各州的地方委员会（即州委会）和人民抗日军各个独立队司令部的代表。第五独立队司令部的代表是党代表徐清同志和队长赖来福同志。他们两个在8月31日午后到达会议以后。当时，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人员都已到达。来福和许多代表是相熟的老战友，久别重逢，非常高兴，热烈握手，高谈阔论，屋子里喜气洋溢。当时召开预备会。9月1日凌晨五时许，千余日军完成对会议地点三重包围部署后，战斗就打响了。在中央同志指挥下，来福同志英勇地冲出敌军的包围圈，走到双溪多河边，一位其他州的代表也冲到河边，两人正准备涉水渡河，来福同志发现这位同志小腿中弹受伤流血，伤者却未发觉，来福不顾自身危难，马上取出手帕为他包扎，充分体现出战友之间互相关

心、互相援助的崇高友爱精神。接着，在敌人密集扫射的枪声中，两人一齐冲过双溪多河，机警地摆脱追捕，脱离险境，安全归队。

回到第五独立队之后，来福同志以高度的积极性和认真负责精神，在队伍中加强军事训练，改进一些军事、政治组织措施，使“五独”发展成为北马的抗日主力。1942年底，一个大清早，数百个日军分数路向“五独”司令部所在部队——模范中队营地发动疯狂进攻。来福同志发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沉着而灵活地指挥部队战士，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消灭了一批日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他和党代表带领队伍安全撤退。

1943年年中，来福同志在出发途中，经过一个农村时中了敌人的埋伏，反抗无效，不幸被捕。在日本宪兵部，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勇敢和激昂地谴责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痛斥日兵对群众的残暴罪行。敌人的法庭变为来福同志控诉敌人的讲坛。日本宪兵、军政部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丝毫不能动摇来福同志坚定如山的革命意志，终于昂然走上就义刑场。当天，日军调集三、四百兵力，在霹雳暗邦地区实行戒严，如临大敌。来福同志泰然自若，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法西斯！”“马来亚共产党万岁！”等等革命口号。刽子手挥起屠刀，斩下烈士的首级，却无法斩断各族人民的抗日决心，霹雳州人民的抗日怒火，在烈士鲜血浇灌下，越烧越旺。

赖来福同志牺牲时，年仅21岁。第五独立队为了纪念来福同志，向全体指战员发出通告，号召全体同志向来福同志英勇牺牲精神学习。

安息吧！来福同志！您的英雄事迹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篇，马来亚人民永远把您深深怀念，您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取材自林一叶编纂《浩气永存》）

七 痛悼民族英雄——阿 Q 同志

阿 Q 同志（邱联杰）福建永春人，生于麻坡一个小康阶级家庭，曾肄业于麻坡中华中学。在校时已经参加过学生救国会，后成为马来西亚共产党员。在 1938 年，中华全体学生不满意几个反动教员，便选出代表，向校董部提出要求，结果校董部没有接受，所以便掀起了罢课的风潮，他也是同董事部谈判的代表之一。学潮结束，学生已得到胜利。同年全马在星洲召开代表大会，他以麻坡学生界的代表来出席这个大会。在中华的学业尚未期满，他已不能立足了，便转学到马六甲的培风中学，也同样负起秘密的政治活动。毕业后在马六甲负责青年界的活动，在 1939 年党调他到星洲来负责总工会属下的粮食部门。1940 年担任星洲各民族总工会的常务委员，领导油业工人，海员等工作。以后被党调到“民先”当常委，1941 年负责任星洲党的常委。

在几年前，他和一位女同志谈过恋爱，有一次谈到火热的时候，忽然那位女同志对他说要回家省亲，他那时和她解决这个问题，用一种革命事业精神鼓励她，说服她，因为她那时候的思想不知怎样的转变，阿 Q 同志脑子里虽然想尽百计，也没有办法留住她，从此他俩关系渐渐消沉下去了，但是他还是站在革命事业的岗位而奋斗，不曾感觉任何苦闷，悲观和失望，照常工作生活。

他和我在一起生活是有限的时间，对他的性格是有多少了解，然而并不十分彻底明白，那时我们几个共同在一部门工作，他对同志们的一种态度，我感觉到多少不满意，他喜欢一些奇怪的谈话，性情较暴躁，时而发脾气，对工作是很乐观的，但忽视学习，以为自己能力很强。经过了长时间的集体生活，我才对他的印象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他的革命理论，他的工作能力实在比我强多了，他也认真的指正我，帮助我解决工作上的问题。而且经常指导我怎样去进行工作。例如：我有一次领导某部门的工人要求加薪斗争，他帮助计划一切斗争方针，结果工人得到胜利了，这证明是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沦落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他在4月15日被日寇法西斯逮捕到牢狱去，禁了几个月，敌人用最残酷的毒刑手段来压迫他，收买他，但是他那时的态度表现出是一个非常英勇的优秀布尔什维克战士，始终不愿屈服，不投降，不出卖党的秘密和民族的利益，不和敌人合作，抱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性命。

他与我们全体同志作诀别的第三天，被法西斯匪徒施用最毒辣的酷刑完结他的性命，用鞭打、灌水、飞机吊、火烧等等的毒刑。可怜他，全身肿痛，一点东西也食不下，只有在口里念出一首最宝贵最值得纪念的诗给后人留念（某同志抄录）。直等到8月21日早上他便永久的离开世间，从这凶耗传来，我一时感觉悲伤，眼眶的泪珠好像在旋转着，咬着牙，痛恨着日寇法西斯蒂的罪恶。

阿Q同志！我誓要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底，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以慰牺牲的同志并为你复仇！

注：邱联杰（亦称邱俊杰，阿丘、阿Q）他临逝前写的诗，由陈秀郎烈士于1943年九、十月间从四排坡监狱D号押到A号同另一批约20位难友关在一起时传诵给大家记起的。笔者当时也朝夕同秀郎在一起。该诗如下：

无 题

生在马来半岛 承受革命熏陶
奋斗经历五载 如今身在监牢
生死置之度外 受苦本是英豪
死中亦有不死 坐待远眺三岛

据秀郎烈士称：阿Q同志说：末句的意思是坐在牢房看你日本三岛何时毁灭，还特别交代“亦”即也。真的苍天有眼三年后两颗原子弹落在日本法西斯头上，为烈士们报了仇（当然对原子弹伤害无辜平民那是该否定的）。

（取材自陈凯：《回忆檳吉坡人民抗日斗争》）

附录：马来亚华侨抗日大事记

1937 年

-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马来亚华侨情绪高涨，纷纷发动筹募活动。举行群众集会，号召抵制日货，中华总商会决定于24日召集“侨团大会”，但受到英殖民政府的警诫，施压阻止。
- 8月13日 日军进攻上海，并把“支那事变”改称为“圣战”，触及了英国人在华利益，英殖民地政府决定让侨民大会召开。新加坡华民政务司在侨民大会召开前夕召见陈嘉庚和几位商会董事，宣称总督和他决定由陈嘉庚主持大局，并提出5项先决条件：(1)捐款仅作赈灾用途；(2)不得胁迫公众捐款；(3)收汇捐款概由一个单位处理；(4)不得发表反日言论或号召抵制日货；(5)大会只能号召筹集救灾用途之款项，不得号召筹款以充军事用途。
- 8月15日 中华总商会召开侨民大会，议决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一致推选陈嘉庚为主席。
- 9月 侯西反、黄奕欢、刘牡丹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动青年学生和工人建立抗日灭奸统一战线，抵制日货，促进中英友好合作，和监视及揭发日本第五纵队的活动。
- 10月10日 陈嘉庚在吉隆坡召集新加坡、马六甲、檳城、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柔佛、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等12个州的筹赈会代表开会，设立马来亚各州筹赈会通讯处，以便和中国政府联系，并加强各州之间的联络。

1938 年

- 1 月 9 日 新加坡华、印两族群众数千人，响应尼赫鲁“印度之中国日”的号召，在红灯码头集会，募集义款筹赈中国伤民难民。集会结束后，列队赴南天酒楼后街草坪演讲及游行，但英殖民当局以游行集会违法为名，实行镇压，当场拘捕华、印群众 130 余人。
- 2 月 在南来音乐家任光倡议下，新加坡抗敌后援会的一批成员成立了“铜锣合唱团”，开展宣传抗日救国的歌咏活动。
- 6 月 7 日 有一批龙运日资铁矿的印籍工人，感于正义，自龙运搭乘瓜拉立卑轮抵达新加坡。同日，又有一批为数 50 人的龙运铁矿的罢工离职华侨工人乘坐《安庆轮》离开新加坡赴香港。“华侨救济铁山失业工人委员会”主席陈振贤等人致函香港东华医院，请于工友抵达时，予以接待，转送广州侨务局分别遣送回原籍。
- 6 月 26 日 新加坡华侨数千人结队游行，拥护英伦人民反对日机滥炸广州，又有 30 人被捕。
- 8 月 24 日 新加坡辅政司援引《驱逐出境令》，拘捕“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王炎之、粘文华、苏棠影、辜俊英四人，并立即把他们驱逐出境。这一行动表明，英殖民政府已决定对于“抗援”的活动加以镇压了。
- 10 月 10 日 来自英属马来亚、香港、缅甸、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法属安南、美属菲律宾及暹罗等 45 个城市的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代表 164 人，在新加坡举行大会，议决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负责领导全南洋的抗日救亡筹赈运动，办事处设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并一致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巴城庄西言、菲律宾李清泉为副主席。
- 11 月 由陈仁炳博士领队、夏之秋团长率领的“武汉合唱团”，从香港南来，团员约 30 人，都是大学生，其中还有硕士和博士，最年轻的是独唱《松花江上》的女高音江心美，只有 18 岁。在新马各地巡回演出期间，他们洒下了歌唱和演艺的种子。
- 同年，由侨生和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组织的“新加坡海峡华人筹赈会”成立，选出主席林文庆、副主席李俊承夫人、秘书陈国庆、财政

陈振传，委员郑连德、罗本立医生、黄添福医生、叶平玉、林忠邦、余双全、苏义顺及王长辉等。筹款活动包括售旗售花义演等，以侨生华人剧团 Oleh Oleh Party 的演出最受人注目。侨生华人和华侨之间在 1938 年至 1941 年之间的这种同舟共济的关系，是新华筹赈会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1939 年

- 2 月 18 日 由南侨总会招募的第一批机工 80 人，从新加坡乘法国邮轮《安打拉汶》号起程，取道安南回国参战。
- 3 月 11 日 下午二时，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及粤侨领袖曾纪辰等人在怡和轩举行大会，欢送第二批回国参战机工二百余人。
- 3 月 13 日 第二批南侨机工 207 人，乘《丰祥》轮离新，回国参战。
- 3 月 26 日 下午二时，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养正学校大礼堂会见第三批全体机工。
- 3 月 27 日 第三批南侨机工 594 人，乘《丰平》轮起程，回国参战。
- 4 月 5 日 下午二时，南侨总会假座中华总商会欢送第四批经由安南和第一批经由仰光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并请中央委员程天固莅会讲述国内抗战历况。
- 4 月 9 日 南侨总会在同济医院接待第四批即将启程回国的南侨机工，侯西反代表总会致词，语多勉励。
- 4 月 10 日 第四批南侨机工 158 人，乘《丰祥》轮从新加坡起程，经南西贡登岸，转乘火车赴昆明。
- 5 月 22 日 第五批南侨机工 531 人，乘《丰庆》轮起程，其中女性机工 3 人。
- 6 月 19 日 第六批南侨机工 124 人，乘《丰平》轮起程，其中 6 人为学生。
- 7 月 3 日 第七批南侨机工 117 人，乘《丰庆》轮起程。
- 7 月 16 日 第八批南侨机工 336 人，乘《丰祥》轮从新加坡起程，在越南堤岸登岸，经河内赴昆明。
- 8 月 4 日 第九批南侨机工 507 人，乘《丰庆》轮起程。

- 8月8日 下午三时，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假座中华总商会欢送奉派回国实地视察的机工征募处主任刘牡丹，同时欢送经安南返国之第十批和经仰光返国的第三批回国服务机工。陈嘉庚在致词中，勉励机工要吃苦耐劳，并且阐述委派刘牡丹回国视察滇缅公路等地的动机，希望刘代表虚心探询沿途应设的栈房、宿站、停车棚区域状况。
- 9月3日 英国向德国宣战，陈嘉庚代表南侨总会向殖民地政府宣誓：支持英国向德国宣战。南侨总会并通知各地筹赈会，呼吁他们支持英国向德国宣战。
- 9月 南侨总会招募的3千2百名机工，到云南训练，负责在缅甸和重庆之间的公路上运载战略物资。
- 9月1日 日本政府强迫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接受所谓和平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要求。
- 9月19日 华侨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开展一连串的抵制日货行动，给予日本在新加坡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沉重的打击。
- 10月 中国音乐家任光应聘来新加坡，为百代唱片公司灌录唱片。他在业余组织“铜锣合唱团”，演唱抗日歌曲，还教导团员作曲和指挥，为新马培育了不少音乐人才。
- 10月31日 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侯西反被殖民政府递解出境。筹赈活动逐渐沉寂。

1940年

- 2月 南侨总会从南洋各地挑选了近50名慰劳团成员，分途回国到各地视察慰劳前线将士和灾民。
- 3月4日 晚上八时，新加坡“南洋报社”董事主席李光前假座快乐世界之大同酒家为陈嘉庚、庄西言率领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设筵欢送，以壮行色。
- 3月5日 星华筹赈会设茶会，欢送“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

3月6日 “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40多人，由新加坡乘船经缅甸仰光前往重庆。

6月6日 新中国剧团正式成立，著名话剧及电影演员金山改用原名赵洵和名演员王莹率领剧团到新加坡演剧筹款。

6月17-18日 英德宣战后，英政府为讨好日本，禁止华侨演剧筹款。新中国剧团为突破禁令，特假维多利亚剧院为援英义演阳翰笙着的四幕名剧《塞上风云》。华侨中学和南洋中学学生除参加宣传活动外，也以次要或群众角色登台参加演出。翌年，剧团到马来半岛演出，两校学生成立话剧团，继续同台演出抗日话剧。

同年 由林我铃率领华校学生和英校学生组成30人联合合唱团，在维多利亚大会堂进行连续三晚义演，由郑连德先生指挥，演唱《爱我中华》、《旗正飘飘》、《歌唱八百壮士》等歌曲，受到中上层社会的热烈欢迎。

同年 随着局势的紧张，中国派商震率领杜聿明等随行的军事代表团到达新加坡，在视察防御工事之后，商震向英军当局建议，应该从樟宜角到洛阳沿着柔佛海峡建立防御线，抵抗可能从马来半岛南下的日军攻势。但白思华不相信日军会从马来半岛登陆，从背部进攻新加坡，他认为日军一定从海路进攻，因此决定从樟宜角至丹戎禺建立防线。

1941年

5月4日 以商震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考察团一行14人，由缅甸仰光抵达槟城，进行实地考察马来亚英军的布防计划。次日，考察团续程前往吉打、太平、怡保、吉隆坡、芙蓉、波德申、马六甲等地考察。

5月10日 中国军事考察团抵达新加坡，中国驻星总领事高凌百在领事馆设宴为考察团洗尘。

5月13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正会长连瀛洲、副会长陈六使假南天酒楼设宴欢迎中国军事考察团，考察团团长商震因政躬违和未能出席。连瀛洲在致词中称，中国军事考察团此次南来考察，对于中

英合作，意义重大，谨备薄酌致敬云。继由该团副团长林蔚将军致答词，对于该团组织经过及祖国抗战形势，有极精辟之叙述。

5月14日 中国驻星总领事高凌百假虎豹别墅举行招待会，款待中国军事考察团暨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军政要员波汉姆上将、庞德中將等人。

5月16日 中国军事考察团启程前往柔佛州丰盛港视察当地防区，于下午四时抵达新山时，当地侨领黄树芬等人假座华侨公所礼堂举行欢迎大会。

5月18日 新加坡广帮侨领曾纪辰等人假座曾纪辰之别墅东滨园设宴款待中国军事考察团成员。

5月19日 中国军事考察团在马考察完毕，日内即将动程返国。下午5时，该团应新加坡总督之邀，参加其所设饯别招待会。当晚8时，又应中国驻星领事馆之约，参加饯别宴会。8时35分，又由郑康祺博士代表该团在新加坡广播电台作临别致词，感谢马来亚军政当局及各地人士的热情款待，宣称在马逗留二周，已了解到马来亚防务坚强，谨祝英国作战终得胜利云云。

5月21日 中国军事考察团下午5时乘船离开新加坡返国，英远东军司令波汉姆亲自到船上送行。团长商震临行前，曾到南侨总佮访见华侨领袖陈嘉庚，一来造别，二来奉蒋委员长之谕，商谈改善滇缅公路运输问题，谈话达一小时半。陈嘉庚除提供关于改善滇缅公路之重要意见外，并重申海外华侨一致主张团结抗战及拥护中央之态度，与其本人最近对祖国贪官污吏，要求改善不良政治，增加抗战建国效能之种种期望，相与恳谈，情至融洽。

7月 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在新加坡丹絨峇来设立101特别训练学校，训练敌后秘密活动人员，教官包括曾经在怡保担任警官的戴维斯上尉，和曾经在马来亚担任公务员的布伦上尉等。

7月2日 日本御前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采取南进的步骤：而对德苏战争，暂不介入。

12月1日 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 12月2日 英国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巡洋舰《击退号》驶抵新加坡。
- 12月8日 日军在马来半岛东北部的哥打峇鲁成功登陆。同日凌晨4时，日军海军航空部队飞机轰炸新加坡炭巴船坞、军港和登嘉及实里达空军基地。此外，日机也空袭了亚罗士打、双溪大年、北海、槟城、瓜拉丁加奴、关丹飞机场。同日，日军第5师团主力不发一枪就在宋卡登陆，另一支日军也顺利地在大年登陆。
- 12月18日 英殖民政府迫于无奈，承认马来亚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派遣特工查普曼会晤马共中央书记莱特，讨论如何武装和训练共产党人，组织敌后游击队事宜，双方达成联合抗日协议，由英军设立的“一零一特别训练学校”，培训马共军事干部。
- 12月19日 日军占领槟城。
- 12月23日 日军占领太平。
- 12月28日 怡保失守。同日，新加坡总督汤姆斯在总督府召开包括临时释放的政治犯在内的、一共200余人的各界代表紧急大会，要华侨负起全面的抗敌工作，包括：(1)设立义务警察，协助维持治安、防备燃烧弹、降落伞等；(2)组织宣传队，到各处宣传；(3)代政府雇用临时工人，以应各处需求，并指定由陈嘉庚负责领导。
- 12月30日 陈嘉庚应英国总督请求，在南侨总会召开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议决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
- 12月31日 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共推陈嘉庚为主席，并决定各部主任：总务部：正叶玉堆，副刘玉水；劳工服务部：正林谋盛，副刘牡丹；保卫团：正郑古悦，副黄奕欢；民众武装部：正林江石，副王吉士；宣传部：正胡愈之，副唐伯涛、邵宗汉。办事处设在晋江会馆。

1942年

- 1月1日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在雪兰莪州北部宣告成立。
- 1月11日 吉隆坡沦陷。同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在森美兰州宣告成立。

- 1月13日 日军占领芙蓉。
- 1月14日 日军占领淡边。
- 1月15日 日军占领马六甲。
- 1月16日 日军占领麻坡。
- 1月20日 日军占领昔加末。同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在柔佛州北部宣告成立。
- 1月21日 日军占领拉美士。
- 1月25日 日军占领亚依淡和居銮。
- 1月26日 日军渡过麻坡河，占领峇株巴辖。
- 1月30日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在柔佛州南部宣告成立。
- 1月31日 英军在星柔长堤上炸了一个55米宽的裂隙后，全部撤退到新加坡岛内。马来半岛至此全境沦陷。
- 2月1日 星华义勇军宣告成立。
- 2月3-4日 陈嘉庚、黄奕欢、郁达夫、胡愈之、李铁民、张楚琨、王任叔等分别乘小船离开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避难。
- 2月4日 星华义勇军4个连队，奉调驻守裕廊、林厝港、巴丝班让等防线，与日军作殊死血战。
- 2月6日 晚，400多名日军分乘20多艘登陆艇，向新加坡东部的乌敏岛发起进攻。
- 2月7日 日军进占乌敏岛，猛烈炮轰樟宜海军基地。
- 2月8日 日军向新加坡发起总攻。夜晚10时30分，300多艘登陆艇，每艘载着40名日军，渡过星柔海峡，在新加坡西北部、星柔长堤以西一带登陆。
- 2月12日 英军特别行动执行署(SOE)把林谋盛、王吉士、李金泉、庄惠泉等人暗中载离新加坡，并安排他们从荷属印度尼西亚转移到印度去。
- 2月13日 星华义勇军司令达理上校，在金炎律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总部，宣布上级已决定解散星华义勇军，每人获得十元遣散费。
- 2月15日 下午7时50分，英军总司令白思华签署投降书。新加坡宣告沦陷。

- 2月18日 新加坡日本占领军发出通告，限令华侨到指定的5个地区集中，“不遵令者，杀之无赦”。在“大检证”中，新加坡遭屠杀的华侨达5万人，半岛各地的华侨也难逃一劫，据英军官维德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供证，超过15万人被杀害，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人。
- 3月18日 日军在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进行大屠杀，全村男女老少共有1,774人被残害。
- 3月21日 日军在马六甲举行检证，估计屠杀2千余人。
- 4月6日 在Major Higashigawa Yoshinura 指挥下，日军在槟城进行检证大屠杀，超过5千名华侨被杀害。
- 4-6月 日军大事搜捕抗日人士，马共常委黄诚、白衣、林江石，中委钟步青、林亚当和重要干部邱联杰、黄耶鲁等人先后被捕。除黄耶鲁外，大部分牺牲狱中。
- 6月 日军驱使6万多英澳战俘、20万华侨和马来族民工，日夜修筑泰缅铁路，在极恶劣的环境中，因饱受饥饿、虐待、伤病而死亡的战俘1万多人、民工10万人之多，史称“死亡铁路”。
- 7月31日 森美兰州仁保地区的双溪镡村至少有368名村民惨遭日军杀害。
- 9月1日 人民抗日军干部战士40多人聚集在吉隆坡郊外石山脚农村召开会议，因内奸莱特出卖，会议地点遭到日军围攻，李振宗、钟振康、朱日光等9名领导干部、6名警卫员和3名服务员共18人牺牲。
- 9月15日 日军在槟城举行第二次大检举。前后两次检证，被捕人数超过5千人，大部分被杀。
- 12月1日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在霹雳州宣告成立。

1943年

- 5月7日 被关押在吉隆坡半山芭监狱的106位抗日志士，在陈大龙、陈大智等人带领下，成功越狱，创下马来亚历史上的第一桩壮烈的冲狱事件。不幸的是，在日寇随后实施的全面戒严和搜捕之下，

有 25 位志士又被捕回，壮烈牺牲。其余的 86 位志士大部分人成功回到人民抗日军驻地。

5 月 13 日 136 部队第一批人员乘搭潜艇离开锡兰基地，潜返马来亚开展敌后工作。

5 月 26 日 136 部队第一批人员在邦咯岛登岸。随后，136 部队人员陆续分批潜返马来亚，获得马共霹雳地委书记陈平的接应，引领到人民抗日军的营地。

8 月 13 日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在彭亨州西部宣告成立。

1944 年

3 月 27 日 136 部队马来亚区华人区长林谋盛被日军逮捕。

6 月 29 日 136 部队马来亚区华人区长林谋盛在华都牙也狱中牺牲。

9 月 1 日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在彭亨州东部宣告成立。

1945 年

8 月初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在吉打州宣告成立。

8 月 15 日 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 月 29 日 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秘密绑架杀害。

9 月 2 日 美国将领麦卡瑟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军战舰《米苏里号》上接受日本正式投降。美、中、英、苏等 9 个战胜国代表依序签字，以示接受日本投降。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同日上午 9 时 15 分，日本驻防槟城司令官 Jisaku Uozumi 海军少将在英国军舰《Nelson 号》上向 Walker 海军中将投降。

9 月 4 日 日军板垣大将和 Shigeru Fukudome 海军中将在岌巴港口的英国军舰《Sussex 号》上签署投降书，把新加坡移交给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海军舰队指挥官 Cedric Holland 海军少将和陆军代表第 15 印度军军长 Alexander Christison 中将。

- 9月5日 英军第5印度师师长 Eric Mansergh 少将和他的部队在新加坡岌巴港登陆，接管了新加坡。
- 9月12日 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在新加坡市政厅接受日军的正式投降。寺内由于病重，由板垣代表出席仪式。
- 9月13日 第34印度军军长 Ouvry Roberts 中将在维多利亚英文书院接受日军第29军军长 Teizo Ishiguro 中将投降。
- 10月6日 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
- 10月29日 山下奉文在马尼拉美国军事法庭受审，罪名是他在新加坡指挥日军屠杀 5,000 名华侨，最后被判处死刑。